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当代教师核心价值观研究

- 教师的知识观及其行为表征 马成荣(1)
教师价值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王 玲(6)

素质教育论坛

- 研究生求职行为及其与自尊水平、求职意向的相关性 陈友庆 杨亮清(9)
德国大学生学习经验分析

- 基于第 11 次德国大学生调查的数据分析 沈苏彦(13)
大众化阶段德国研究生教育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崔俊红(16)
高职院校毕业生“宅”生活状态的实证研究 郝 梅 何安会 石春梅(19)
重建学校特色之我见 杨传勇(21)
构建积极健全的儿童文化:教师专业发展的时代诉求 余春瑛(24)
中小学网络辅导员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研究 樊继宽 兰亚竹(27)

教师教育研究

- 论教师实践智慧与教师专业发展 陈国庆(31)
ESP 教师专业化发展途径 孔繁霞(35)
教师同感的研究进展综述 孙 敏 柏 毅 叶兆宁(38)
对教师评价的冷思考
——基于存在主义视角 马志芳(42)

高教研究

- 现代远程高等教育服务质量影响机理实证分析 刘 星(45)
欧洲 CLIL 双语课堂:理论、实践与启示 盛云岚(49)
英语跨文化交际教学存在问题及对策探讨 陈 薇 颜文洁(52)
从心理语言学角度分析英语专业四级短文听写 洪晓丽(56)
国际法学科双语教学效果提升研究
——基于学生意愿的视角 朱小静(58)

高校经管类专业实验教学模式改革与创新研究

- 以广东石油化工学院为例 罗永华(62)

教育史研究

- 我国传统体育特点探析 梁 励(65)
论罗家伦教育思想中的民族主义 孟丹青(68)

论近代徽州教育	胡晓飞(73)
从自主到开放: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与未来 ——李均《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再版有感	刘自团(77)
政史研究	
浅谈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形成	刘建宁(80)
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问题初探	司甜(84)
中共土地策略中富农政策调整的历史考察 ——以新民主主义时期为例	魏正山(87)
论社会保障功能是农村土地制度的重要设置	王曦(91)
法律研究	
试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从“秩序”的建构谈起	于舒 曹缪辉(96)
美国的遗产税问题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姜孟亚(101)
文化研究	
论李渔的文化创意产业活动	陈文兵(106)
全媒体出版的盈利模式研究 ——以中文在线的全媒体运营策略为例	朱梦莉(110)
电视相亲类节目的冷思考 ——以江苏卫视《非诚勿扰》节目为例	陈一雷 朱贵杰(113)
谈新媒体语境下非线性编辑的内涵与创新	陈舒 王茜(116)
音乐教育研究	
谈吴歌中的“词曲异步”现象	王小龙(118)
拉魂腔生存现状与振兴发展刍议	薛雷(121)
传统音乐在江苏高校音乐教育专业中的校本课程应用研究	周振亚(124)
传统神韵的更新	
——法雅《西班牙民歌七首》的民族特征及歌唱演绎	陈艺为(127)
拉威尔 23 首艺术歌曲和声手法研究 ——和声手法中旋律的调式特征	王丞(131)
谈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合唱指挥与视唱练耳课程的融合	张璟(136)
浅谈钢琴弹奏中的手腕紧张及放松	钱丽萍(139)

JOURNAL OF JIANGSU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ocial Sciences) No.4, 2012

MAJOR CONTENTS

Teachers' Concepts of Knowledge and Their Behavior Characterizations	MA Cheng-rong(1)
The Job-Hunting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of Master Graduates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Self-esteem Levels and Job-hunting Intentions	CHEN You-qing YANG Liang-qing(9)
Analysis of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s in Germany —— based on the 11th German Student Survey Data	SHEN Su-yan(13)
Research on the Germany Graduate Education Reform in the Stage of Massific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	CUI Jun-hong(16)
Empirical Research on <i>Indoor Life State</i> of College Graduates	HAO Mei HE An-hui SHI Chun-mei(19)
Thoughts on Rebuilding School Characteristics	YANG Chuan-yong(21)
Building a Positive and Healthy Children's Culture: The Era Demand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YU Chun-ying(24)
Study of Network Counselor Performance Appraisal System	FAN Ji-kuan LAN Ya-zhu(27)
On Teachers' Phronesis and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HEN Guo-qing(31)
The Summarization of Research Progress on Teacher Empathy	SUN Min BAI Yi YE Zhao-ning(38)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odern Distance Higher Educational Quality	LIU Xing(45)
European CLIL Bilingual Classroom: Theory, Practice and Implications	SHENG Yun-lan(49)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English Teaching: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CHEN Wei YAN Wen-jie(52)
An Analysis of Dic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inguistics	HONG Xiao-li(56)
Study on the Improvement of Bilingual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Law: A Perspective of the Student's Willingness	ZHU Xiao-jing(58)
From Independent to Open: the History and the Future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 Thinking on the Second Edition of <i>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History</i>	LIU Zi-tuan(77)
Research on the Profit Model of Federated Media Publishing —— Take the Federated Media Operating Strategy of "Zhong Wen Zai Xian" as an example	ZHU Meng-li(110)
A Serious Thinking on TV Blind Dating Programs: A Case Study of Jiangsu Satellite TV program "If You Are the One"?	CHEN Yi-lei ZHU Gui-jie(113)
On the Asynchronization between Lyrics and Melodies in WU Songs	WANG Xiao-long(118)
The Update of Traditional Charm —— On th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i>7 Pieces of Spain Ballad</i> of Falla and its Singing Interpretation	CHEN Yi-wei(127)

教师的知识观及其行为表征^{*}

马成荣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研究所,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对知识的认识是整个教育教学活动的逻辑起点。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转型, 知识的性质正从绝对真理向生成建构、价值无涉向价值关涉、知识分层向知识分类、普适知识向情境知识嬗变; 受不同知识观的支配, 教师在诸如课程结构和内容选择、知识转化与能力培养以及教师自身发展等实践性问题的认识和处理方式上有着不同的表征; 而要实现教师行为表征的深层变革, 必须从教师知识结构的重建这一源头性问题上寻求路向。

[关键词] 教师; 知识观; 教学行为

[中图分类号] G4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4-0001-05

教育用知识来培养人, 知识是教育的重要内容和载体, 离开了知识, 教育就成为无米之炊, 对知识的认识是整个教育教学活动的逻辑起点。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不仅是教学论研究的一个永恒主题, 也是教育教学改革最为核心的落脚点。“忽视了教师行为的改变, 任何的教育改革也不可能取得成功。从一定意义上说, 教师外在行为的真正改变主要是重构其内在知识基础与信念的结果。”^{[1](P.247)}然而, 长期以来, 教师教育教学行为只是限于经验的研究, 或者更多的是在“有效性”的话语语境中进行研究, 我们很少关注其背后深层的知识基础与信念。本文试图从教师知识观的变化出发, 以及对教师知识结构重建的探讨, 真正促进教师教育教学行为实现新的转变。

一、当代知识观的嬗变

知识观不是指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或人文知识等某一类具体知识的性质, 而是指人们对知识一般性质的看法、见解与信念。它是人们对知识本质、来源、范围、标准、价值等的种种假设, 是人们关于知识问题的总体认识和基本观点。知识观不是知识本身, 它是关于知识的知识, 是伴随着知识的积累、丰

富和增长, 人们对知识所做的一种意识和反思。一个时代或个人对知识一般性质的普遍认识构成了这个时代或个人知识观的主要内容。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转型, 当下知识的性质正从现代知识性质向后现代知识性质转变, 其变化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1. 从绝对真理到生成建构。

在现代知识观面前, “知识”往往与“科学知识”或“真理”相等同; 所有的知识都是客观的, 而客观的知识都是得到证明或证实的, 因而是正确的; 要求人们在知识获取的过程中, 摒弃所有个人的主张、意见、偏见、经验、情感和常识等, 从而确保客观的、实证的、精确的和确定的知识。以此为标准, 除此之外都是“准知识”或“非知识”。而后现代知识观认为, 任何一个认识活动, 都不是纯粹的“外在的”“反映过程”, 而是包括着非常复杂的“内在的”“理解过程”。没有哪一种人类知识的客观存在性是绝对的、纯粹的而不需要进一步质疑的, 所有的知识都应该向未来的批判性检验开放; 同时, 没有哪一个时代的人不需要对前人获得的种种知识进行新的审视、修正或抛弃, 并发展出适合自己这个时代需要的新知识。

* [基金项目]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委托项目“当代教师核心价值观研究”(项目编号:2011SJA880001)。

[收稿日期] 2012-05-03

[作者简介] 马成荣(1964-), 男, 江苏海安人,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研究所所长、职业教育与社会教育课程教材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员。

波普尔认为人类的认识由于人类本身的种种局限性,总是“可错的”,任何问题都不存在“唯一的”或“终结的”解释,任何的解释都有待于进一步的批判。因此,从知识的客观性、绝对性转向生成性、相对性,可以反对认识问题上的形形色色的知识权威主义和知识霸权主义,也可以更好地认识那些被知识的绝对性压抑或剥夺了资格的知识,从而更好地理解自己当下的知识生活。

2. 从价值无涉到价值关涉。

知识的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观认为,“知识是纯粹经验的和理智的产物,只与认识对象的客观属性和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有关,而不与认识主体的性别、种族以及所持的意识形态等有关。”^{[2](P.152)}这种“为知识而知识”的知识观,造成了知识生产与消费、集中与分配的不均衡,强化了知识的客观性和绝对性,加快了本土知识的瓦解过程。然而,后现代知识观认为,正如人是价值存在一样,知识也是价值的存在,所有的知识生产都是受着社会的价值需要指引的,价值的要求已经替代求知的渴望成为后现代知识生产的原动力;所有知识本身都体现着一定的价值要求,特别是对于社会知识和人文知识,根本不存在纯粹的事实,有的只是由价值建构的事实;所有的知识在传播过程中都受着权力制约,都是社会总体权力实践的一部分。早在19世纪中期,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就提出了一个经典的问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到了20世纪后期,美国教育社会学家阿普尔对斯宾塞提出了批判和挑战,并提出了“谁的知识最有价值”的质疑,从中我们清楚地发现知识在教育中的性质由“价值无涉”“价值中立”到“价值关涉”的演进轨迹。

3. 从知识分层到知识分类。

知识分层观认为,知识呈“金字塔”式,塔的顶端主要是科学知识,是知识王国的“统治者”,人们对这种知识几乎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而像本土知识、经验知识或传统知识则处于塔的下层,不被人们重视,有的甚至被排斥在知识大门之外。知识分层是社会等级制的产物和社会分层在知识观中的反映。在认知主义和建构主义视野下,知识从分层走向分类:一类是陈述性知识,涉及事实、概念和规律、原理方面的知识,属于符号体系的范畴,用于理解技术和实践过程、促进实践能力迁移并创造性进行实践的知识,重点解决“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另一类是程序性知识,涉及经验和策略方面的过程性知识,

属于行动体系的范畴,如:直接控制技术过程的知识、技术规则(技术实践方法、程序和技术要求)和技术情境知识、判断知识等,重点解决“怎么做”和“怎样做更好”的问题。在知识分层的视野下,“理论知识才是知识”,程序性知识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甚至都不能称之为“知识”,“明理与制器的分离”、“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就是知识分层观的集中反映。而知识的分类观,重视技术知识的存在性和合理性,重视系统的和过程性的知识的价值,重视经验等具有个人意义的知识的价值等等,从而大大拓展了知识的范围,也重新改写了知识的“标准”。

4. 从普适知识到情境知识。

现代知识的普适性,从其基本内涵来讲,是指“一种知识陈述,如果它是客观的,那么它同时就是超越各种社会和个体条件限制的,是可以得到普遍证实和接纳的。”^{[2](P.151)}这类知识的性质也可称之为“普遍的可证实性”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普遍的可接纳性”。大家普遍接受的是,但凡称为知识,都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普遍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然而,后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通常是理性的代表,但先验、抽象、普适的理性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人类的理性总是嵌入在具体、真实的情境之中的,并随情境的变化而变化。同时,每一情境又都是人类在特定时空下所发生的认知过程与人生体验。“任何的知识都是存在于一定的时间、空间、理论范式、价值体系、语言符号等文化因素之中的;任何知识的意义也不仅是由其本身的陈述来表达的,而且更是由其所位于的整个意义系统来表达的;离开了这种特定的境域,既不存在任何的知识,也不存在任何的认识主体和认识行为。”^{[1](P.151)}

二、不同知识观下的教师行为表征

教师的课程观和教学观是受其知识观支配的。无疑,上述对知识观演变的揭示将给教师教育教学行为带来新的变化。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诸如课程结构和内容选择、知识转化与能力培养以及教师自身发展等方面。

1. 在对待课程结构和内容选择上。

由于学校的教学时空是有限的,因此,必然要根据一定的标准对课程内容进行取舍。知识观作为识别“知识”和“准知识”、“非知识”的标准,为教师确定课程知识边界(解决是不是的问题)和评判知识价值大小(解决好不好问题)提供了基准和依据,并直接影响着课程编制者(主要是课程专家)和课程实

施者(主要是教师)对待课程的态度。

首先,课程知识的分类及其价值问题,直接反映在教师对待主科课程和副科课程的确定以及课时分配上。诸如在学校场域中,教师们总是视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等科目为主科,而音乐、美术、技术等科目则为副科,事实上其背后反映出其对知识价值的认识,在他们看来,知识就是符合“绝对真理、价值无涉、知识分层和普适知识”标准的,因而也是“真正的”知识,只有这样的知识才能成为核心课程。然而,教育的目标不是要把学生训练成学科的专家,而是学生们能够利用文化的智慧和审美的资源,使之成为指导他们的理智行动,帮助他们从复杂的周围世界中创造意义和秩序。由于知识边界的窄化,导致课程教学目标和内容的窄化,使原本鲜活的教育内容成为一种静止的东西,这也是教育创造力不足的根源所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就是增设了技术领域,改变了传统的科学知识一统天下的格局。职业教育课程改革,从学科导向的课程转向实践导向的课程,努力构建项目课程系统化的课程体系,最重要的任务是实现“从理(理论知识)到实(实践知识)、理实分离、去情(情感)去境(情境)”向“以实为主、实中涵理、有情有境”转变,其本质上也是课程知识性质的根本转变。

其次,在对待教材问题上,“教教材”和“用教材教”成为评判教师对待课程知识性质的分水岭。“教教材”的行为所体现的是一种忠实取向,即把知识视为一种类似可以被传递的物品,具有客观普遍规律的“真理性”。反映在教师的行为表征上就是向学生讲授这些似乎确定无疑的真理,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几乎囊括了教学内容的全部,而在实际的课堂教学时,总是试图与教材、教参和教师指导用书上保持一致,虽然也强调启发、讨论,也讲究师生互动,但当学生的见解与教材的观点与答案不一致时,只能以教材的观点为依据。而“用教材教”,所蕴含的知识观预设就是知识的不确定性、相对性和生成性。反映在教师行为表征上,即不再只是课程标准与教材的简单执行者,教材成为教师以及学习者共同质疑、批判、反思和修正的对象。教师也只有理解教材中知识被确定的理由、理解教材所承载的知识背后的价值,教材中的客观知识所蕴涵的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方可被激活,学习者也才能避免成为别人“灌输”或“洗脑”的对象,并防止作为一切知识创造之母的思想自由的窒息。

2. 在对待学生知识转化和发展上。

知识和能力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能力是通过知识培养的。然而,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能转化为能力,这里面涉及到作为教学中介——课程知识的性质问题。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待知识的态度以及对其理解、加工、处理直接关系到知识与学生的关系、学生在教学中的命运以及教学对学生命运的影响。教学活动具有明确的意向性——“意在引起学生的学习行为以达到某种特定的发展目标”,^{[2](P.197)}如果教学过程是一种建立在知识传递和掌握基础上的发展过程,如果教师把知识的性质看成是“神圣性”或“终极性”,那么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将不知不觉地陷入一种“客体化”或“工具化”的境地而成为不折不扣的“教书匠”,教师的主要教学任务只是局限于帮助学生阅读、记忆、背诵、复习资料和再现知识,课堂上大多数学生必然处于一种“被动的”和“静听的”状态,其身心被教学而“规训”。要改变教师对教学意向性的价值缺失,重要的是破除对课程知识内容的迷信或崇拜,认识和理解教学内容中所蕴涵的逻辑意义、经验意义和实践意义,探寻让学生“学”生存技能、生活经验和生命价值的更加明确和完整的教学意向。

要有效地实现知识向能力转化,要积极倡导“问题教学”模式。问题是实现知识向能力转化和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纽带、中介和方法。任何逻辑的、经验的和实践的问题都是课程内容,都具有独特价值,尤其是经验的和实践的问题,由于与学生的生活相联系,从而能更有效地实现应有的教学意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知识向能力转化的前提条件。恰当的知识才能引起兴趣,才可能传递。“如果把知识的意义、价值和可能实现的目标以及内涵的方法明确为知识的性质,那么,知识传递者所获得的知识的性质与知识接受者想获得的知识性质的一致性决定着知识的可传递性,决定着接受者对知识的兴趣”。^{[3](P.43)}因此,对于新课改承载的知识而言,教师和学生是否有共同认知目标、认知态度和认知方法,是实现课改目标、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所在。

能力与实践天然相关,与理论知识对情境的相对抽离不同,实践是情境依赖的。情境学习理论也认为,能力的获得必须镶嵌在相关或“真实”的情境中,从某种程度上讲,能力是活动、交往和情境的产品。只有在情境中或工作过程中才能全面反映学生处理社会、技术和环境等复杂关系的能力。因此,学

习不能被简单地视为把抽象的、去情境化的知识从一个人传递给另外一个人,学习是一个社会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师生共同建构着知识,学生的学习总是处于一个特定的情境中,渗透在特定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中。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中,学生才能有足够的学习兴趣,课程知识也才能有效地转化为学生的能力。

3. 在对待自身发展和教学研究上。

教师的行为表征不仅体现在如何对待教学内容与学生上,还体现在如何面对自身的发展上。事实上,在教师对待自身发展的问题上同样蕴含着知识观的假设。诸如长期以来,“理论与实践相联系”都被教师们奉为自身发展的圭臬。然而,如何看待理论,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更需要教师进行批判的审视。在现代知识观下,教师的知识被看作是形而上的东西,教育理论的研究效仿自然科学理论,将这种形而上的教育理论奉若神明、视为惟一的教育真理,追求教育理论的确定性和超越情境的普遍规则,忽略教育教学的实际状况,尤其轻视、排斥教师的实践性知识。在片面追求教育理论“科学化”的过程中,教育研究严重脱离教育实践的需要,排斥了教师自身丰富多彩的生活体验,割裂了与现实生活世界之间的有机联系,成为一种探寻“价值无涉”的真理过程。教师获得的理论知识主要是一种脱离情境的理性概括,其结果是,新的教育理念和理论大多停留在教师理解的层面,成为教师只能进行“口头表达的教育理念”,而很少真正融入到教师的认知结构中,内化到教师的教学行为中。当下,在教师教育或培训中,这一问题仍然存在,导致一方面是教师教育与培训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经费投入的不断攀升,另一方面教师的能力提升收效甚微甚至延误事业。

而在后现代知识观看,教育问题根本不是一类客观的问题,而是具有时代性、价值性乃至个性的问题。在对教育规律的探索上,教育学家们没有获得一条客观的“教育真理”,也没有发展一条得到公认的“教学规律”。正所谓“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这其中的“法”总是具体的、情境的乃至个性的。因此,教学规律不是像机械原理那样的“动力学规律”或“确定性规律”,而主要是一种“统计性规律”。其实,教师之所以成为教师,更多的是“自我塑造”而不是“被塑造”,教师的专业发展不可能仅仰仗于“学科知识”的培训和规范的教育理论学习,更大程度上只能依靠于个体实践性知识。

教师的实践知识是教师从事教学工作和促进专业发展的重要知识基础。杜威曾提出“实践性学习”,^{[4](P.295)}倡导在教育实践和课堂教学中展开“观察”、“洞察”、“反思”,凭借这种“观察”、“洞察”、“反思”,实现教师教学实践与教学理论基础的融合,而这其中最为核心的东西是反思。抽象的理论与复杂的实践之间存在着客观的距离,经验的简单叠加也难以应对教学实践。在理论的框架指引下,基于教学经验的反思性实践才是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论追求和重要范式。“理论 + 经验 + 反思 = 成长”已成为教师专业发展的定律,甚至可以说教师学会了反思也就学会了研究。教师只有有了反思,才有了“自己的”、“当下的”和“内在的”的理解力、解释力和行动力,才有了教育意义和教学研究的真切体验,才有了不断产生向上攀升、向上发展的主观愿望和研究动力。

三、教师知识结构的反思与重建

上述关于知识观与教师行为表征的探讨,无疑有助于我们对传统的教师行为进行反思,有助于形成新的教师行为表征。但从深层次来说,教师知识观的变革并非自然完成的,教师作为一个专业的专业,还需要一定的知识作为条件。也就是说,教师所具有的知识结构完备性决定其专业化的水平,因而要实现教师行为表征的深层变革,就需要在新的知识观下,对教师的知识结构进行反思与重建。

1. 对教师知识结构的重新省思。

在传统的知识观下,教师应具备的知识结构主要包括3个部分,即教育科学知识、学科知识和普通文化知识。教育科学知识在人们心目中的意象就是,《教育学》教材中所体现的是若干教育学、心理学的一般规律,而学科知识则等同于国家学科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的内容。不仅这3类知识缺乏内在的联系,极少相互沟通与交流,而且在知识的获取上,教师们所接受的只是一套现成的、真理式的知识。毫无疑问,这一现状将必然影响教师自身的教学行为。

在对传统的教师知识结构进行批判的基础上,诸多研究者开始建立起不同的框架与模型。其中最具影响的是舒尔曼(Shulman, L., 1987)提出的教师知识分类框架。他认为教师知识至少应包括以下7个方面:(1)学科内容知识;(2)学科教学法知识;(3)课程知识;(4)一般教学法知识;(5)学习者及其特点的知识;(6)教育情境知识;(7)关于教育目标、目的、价值观及其哲学和历史背景的知识等。^[5]在该模型中,学科教学知识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它体

现了教师的专业特性,被认为对教师的教学行为影响最大,而且与其他部分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在21世纪前后,国内研究者也开始较多地对教师知识结构进行探讨,如国内有的学者较早地提出了本体性知识、条件性知识与实践性知识等不同的教师知识结构划分。

就职业院校教师而言,他们的知识结构主要由4个方面组成,其关系如同“卅”字,其中的“一横”代表教师应具备的“职业价值取向知识”,也即“为什么要当教师”的知识,这是教师的“道”,是“教师履行职能相关的、正当的、不可或缺的行为的价值判断”。^{[6](P.313)}这类知识是影响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知识,在其知识结构中处于上位。“三竖”代表着教师应具备的业务知识:一类是“专业科学知识”,也即“是什么”的知识,主要以累加的概念和原理等学科知识为主。对于科班出身的教师而言,这类知识是最丰富的;但对于较少接受正规教师教育的职业院校教师来说,其拥有的学科知识体系与所要教给学生的“东西”不完全是一回事;一类是“职业科学知识”,也即“教什么”的知识,它主要由生产或服务活动中直接需要的“工作过程知识”构成。这类知识决定着职业院校教师的专业水平,是职业院校教师“应该有的”,也是教师教给学生最重要的“东西”,但这些又是当下职业院校教师最为紧缺的;还有一类知识是“教育科学知识”,也即“如何教”、“如何教得更好”的知识,是教师把课程内容加工转化为学生行动能力的教学法知识等。

由以上的探讨可知,国内外关于教师知识结构尚未有一个统一的框架。虽然研究者们表述与提法各异,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实践性知识在教师行为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认识是一致的。

2. 实践性知识:教师行为变革的知识诉求。

“教师的实践性知识是教师真正信奉的,并在其教育教学实践中实际使用和表现出来的对教育教学的认识。”^[7]它并非一种外在的客观实体,而是一种此时、此地、此关系中的社会文化建构。基于前述知识观的探讨,我们认为,如果教师具有自己独特的实践知识,那么教师与知识的关系将发生深刻的变化。也就是说,教师不再作为知识的消费者出现,而是作为知识的生产者出现,他无时无刻不在生成着自己的实践性知识。在传统的知识观下,专家主导的教育教学理论成为教师的唯一理论知识来源,而丰富多彩的教学情境与个人经验被忽视了,教师自身

被排斥在知识建构的主体之外。这反映在教师行为上,一方面,师生之间仅体现为知识的传递者与接受者的关系,师生之间的共享、对话无从谈起;而另一方面,教师对自己的教学行为也缺乏应有的反思和兴趣,总是寄希望于专家对自己的教学行为提供具体的、操作性的指导。

从教师知识结构的形成而言,教师的实践性知识是其理论性知识的基础和根源,它具有非逻辑性、非公开性、前言语性、不清晰性、个体性、情境性、行动性,相对于理论知识的在先性以及在特定场景中解决问题等特点。诸如,在具体的课堂教学中,我们常会听到“课眼”这个词,一些优秀的教师更是认为,“课眼”是一节课的灵魂。毫无疑问,“课眼”表现在教师的外在行为表征中,我们通过观察一节课能够感受到它的存在,但它又并非一个完全被观察到的实体,而是体现着虚与实的结合。“课眼”形成的背后正是教师独特的实践性知识,它具有在场性和情境性的特点,需要教师不断地进行反思性实践。

教师实践性知识的提出,并非完全排斥教师的理论性知识,而是涵括着对教师的理论性知识的各个方面,同时又摆脱了理论性知识的法则化和脱离具体情境的概括化,努力寻求在特定背景下教师教学生活的意蕴和教师经验对教育教学的价值,在承认教师知识主动性与创造性的基础上,让他们真正认识到自身作为一个“行动研究者”“反思性实践者”的存在。如此,实际的教师行为深层变革才有可能。

[参考文献]

- [1]石中英.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 [2]石中英.教育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3]季翠.教什么知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
- [4][日]佐藤学.课程与教师[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 [5]钟启泉,等.教师知识研究的进展与启示[J].大学·研究与评价.2008(1).
- [6]陈桂生.常用教育教育概念辨析[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7]陈向明.实践性知识:教师专业发展的知识基础[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1).

(责任编辑 陈晓姿)

教师价值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王 玲

(河海大学教务处, 江苏南京 210098)

[摘要] 通过界定教师价值观的内涵, 分别从年龄、性别因素、认知情感因素、环境因素、教师的人格特质、教师发展制度5个方面, 分析了教师价值观的内外部影响因素, 最后提出教师价值观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的6方面内容。

[关键词] 教师; 价值观;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G4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4-0006-03

中国是一个有着尊师重教传统的国度, 人们用“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来描述教师职业的标准, 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来形容教师职业的崇高, 用“辛勤的园丁”“人类灵魂工程师”来强调教师职业的地位, 用“传道授业解惑”“教书育人”来定义教师职业的内容。然而教师这一具有专门性和专业性的群体本身, 如何看待自己的职业? 他们持有怎样的价值观? 教师价值观又有什么样的界定标准? 这些将是本文着重讨论的内容。

一、教师价值观的内涵

价值观是指人们对客观事物意义、重要性的评价和看法, 它构成人们的多层面、多维度评价判断体系, 是态度的重要内容。而教师价值观则是研究者们深化、拓宽价值观研究主体的表现。由于研究的目的和视角不同, 学者们提出了教师价值观的不同内涵。从现有资料来看, 研究者们主要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来界定教师价值观的内涵。

从广义角度来看, 教师价值观体现在教师社会生活、个人修养和教学活动的方方面面, 反映教师内心深处和思想修养中的内在需要、政治信仰和理想追求。^{[1](P.3)}因此, 教师价值观既可以包括教师的政治价值观、教师的经济价值观、教师的道德价值观、教师的生态价值观、教师的审美价值观,^[2]也可以从

人生观、道德观、社会观、职业观、生活观等方面来分析。^[3]从狭义角度来看, 教师价值观可以从职业性质方面进行分析, 即从教师的工作价值观、教师职业价值观等方面来研究。^[4]从这个意义讲, 教师价值观主要包含3个层次内容:(1)从教师角度所觉察到的社会对教师的评价;(2)教师对自身的评价;(3)对社会上评价教师的诸观点, 教师所持的认识。^[5]

基于前人研究的基础, 我们认为教师价值观是教师基于教师角色, 对教师工作价值、职业判断、道德规范所持的评价性看法和观点。它是教师情感需要、主体愿望及道德水平体现的心理倾向系统, 反映教师的信念、理想和追求。

二、教师价值观的影响因素

价值观对个体行为具有指导作用, 是激励、指引人们做出决策和采取行动的动力因素。因此, 探究教师价值观的影响因素, 对引导教师形成积极的教师价值观, 规范教师教学行为和活动,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现有研究对教师价值观影响因素分析, 主要是从内外因两方面展开的, 内因方面主要是年龄、性别生理特征的差异, 以及认知情感因素、人格特质等心理特征的不同。外因方面主要是环境因素和教师的发展制度。

1. 年龄、性别因素。由于需要层次的不同, 教师

[收稿日期] 2012-06-15

[作者简介] 王 玲(1980-), 女, 江苏盐城人, 河海大学教务处讲师, 在读博士。

在价值观追求上表现出年龄差异性。受经济条件和生活水平的影响,青年教师价值观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指向性。中年教师的价值观主要体现在对自我价值实现的关注上,希望能发挥个人潜力,实现个人价值。老年教师的价值观除了和奉献相关外,还因年龄的原因,对健康、医疗保障关注比较多。教师价值观的差异性还表现在不同性别的教师价值观的内容有差异。而一项调查发现,女教师在自我评价、个人成功因素、性别标准、关心国家大事、政治敏感等方面有自己稳定独特的价值观。^[6]

2. 认知、情感因素。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认知和情感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认知通过态度影响个体的价值观,从而对教师的行为起着决定作用。而认知对事物进行评价与抉择的同时伴随着情感体验,教师不同的认知和评价,产生不同的情绪体验,进而产生不同的价值取向,情感对价值观的形成起着导向作用。总之,教师的教学过程和各种教学行为是教师认知活动的外在体现,而不同的情绪体验影响着教师的教学过程中的判断和决策。

3. 教师的人格特质。价值观是人格结构中的重要内容,对价值观与人格特质关系的探讨,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价值观的内涵。^[7]有研究者对 108 名优秀教师价值观进行分析,发现优秀教师价值追求依次为学生获得良好发展、个人修养提高、业务能力、受人尊重。^[8]这些教师在人格特征上表现出爱岗敬业、负责任、宜人性、乐群性、乐于奉献等特质。这意味着,具备这些人格特质的教师在工作中会树立崇高的理想和信念,更易产生职业认同感,进而在工作中获得满足和自我价值实现,产生较好的工作绩效。而教师专业化也对教师人格特质提出新的要求:责任意识、批判和创新精神、自主意识、合作观念等。^[9]因此教师人格特质对教师价值观的塑造有着重要的影响,教师价值观培养要以人格培养为基础。

4. 环境因素的影响。价值观具有可塑性,因此价值观形成的环境就特别重要。环境因素包括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物质环境一般体现为教师的工资和福利待遇、级别等。物质环境是教师发展中的物质条件保障,是教师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物质生活水平过低会严重挫伤教师工作的积极性。^[10]因此,如果教师的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就很难形成坚定的职业信念和崇高的职业价值观。社会环境作为个体成长发展的外因,对教师价值观的形成和塑造都具有很大的影响。社会环境包括社会所倡导的主流价

值观、文化传统、社会风气、舆论、大众媒体的引导、网络传播、以及文化交流带来的文化冲击等等,这些外部社会环境因素,对教师的价值判断以及教师的价值观塑造带来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还会引起教师的价值观冲突和价值观分化。

5. 教师发展制度。教师发展制度是学校文化的体现,更是教师发展的航标,涉及教师教学、职业发展、教师激励各个方面,影响教师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科学、有效的教师发展制度,应以教师成长为契合点,以教师的心理需求为关注点,规划、设计教师的发展机制。反思当前我国的教师发展制度,其问题可归结为行政权力主导价值至上,忽视了教师多元价值诉求;教师发展制度功利价值至上,忽视了教育本真的教育理念。^[3]这种没有以教师为本的发展制度,必然会引起教师多元性价值观的出现和价值取向上以自我为中心,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出现。教师发展制度对教师价值观的影响还体现在学校文化对教师价值观的隐性辐射,教师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是学校文化的体现。学校文化的凝聚力、约束力、导向性支配着教师的日常教学生活,引领和促进教师价值观的生成和完善。

三、教师价值观研究的深化

国内外对教师价值观的影响因素及培养策略的研究,对我们把握教师价值观内涵及其生成机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但价值观是个复杂问题,要全面、深入了解,今后需要进一步深化以下几个方面问题研究。

1. 进一步明确教师价值观概念的界定。国外从 20 世纪 30 年代起开始价值观的研究,取得长足的发展。但以前的研究者对价值观的研究,多数都以大学生或青年人为研究对象,对其他群体的研究关注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价值观理论的完善。^[11]对教师价值观内涵的研究,数量少而且分散。有研究者是从教师面向的对象纵向展开,提出高校教师或中小学教师价值观,有研究者是从价值观的内容横向拓展加以界定,还有研究者将教师价值观和工作价值观、教师职业价值观加以等同,没有做严格区分。今后研究还需将教师价值观概念加以提炼,根据研究的目的界定教师价值观的内涵和外延,明确教师价值观研究对象,细化教师价值观的研究内容,规范教师价值观的操作定义,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2. 拓展教师价值观影响因素的研究。价值观是

一个评价体系,它的复杂性在于它与人性倾向性的诸成分相近,并互相影响。目前教师价值观的影响因素研究,还主要集中在对内因和外因的探讨。但是价值观是高度概括化的态度和信念。而教师价值观和需要、兴趣、态度、动机以及人格特质等内部深层次要素之间关系的研究相联系,以及教师价值观与教学行为的相互关系研究,目前相对不足,还需要实证研究进一步探讨和验证。

3. 改进教师价值观研究方法和测量工具。直接测量取向和间接测量取向的方法是目前国内学者主要的价值观研究方法^[12]。但对教师价值观的研究,目前还没有编制出科学的、有很好信效度的量表。从已有研究来看,教师价值观的研究方法偏文献综述,理论思考型报告占据多数,实证研究偏问卷调查,实验偏少。数据的分析还依赖描述性和差异性表述。今后的研究需要根据研究目的选择适合的教师价值观研究方法。将教师价值观和测量法、实验法结合起来研究,并借鉴价值观研究中定性和定量分析,横向和纵向比较,在研究中引入访谈和投射方法,修订、编制科学有效的教师价值观测量量表,多样化统计分析研究数据,便于更准确地把握教师价值观的特点。

4. 注意教师核心价值观的提炼。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而教师价值观研究不够深入的一个突出表现是目前对教师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还没有达成共识。教师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对教师明确职业要求,引领和鼓舞教师的日常工作,都具有很强的指导价值。有研究者通过理论综述分析,指出高校教师的核心价值观是“教学为本,辩证育人,上善立身,诚信建树”^[13]。这是否能代表当代高校教师价值观的核心价值观?那么中小学教师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作为教师群体,普遍的教师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除了需要对于教师职业内容的精髓加以提炼,更需要多途径拓展研究和论证结果。

5. 进行多样化教师价值观教育。目前教师价值观教育比较多的提法是加强理论学习和教育,而学习和教育的效果往往依赖个体责任意识和自觉性。今后的研究要考虑如何在教师价值观教育中,引入认知疗法,通过改变教师认知,来改变教师的态度和情感体验,塑造教师积极的价值观。其次,价值观的教育离不开自我反省和内在驱动力,应该结合教育心理学中观察学习、联想学习、强化、替代等研究成果,促使个体形成内在动力,自觉自愿、主动去完善

塑造价值观。再次,价值观的教育离不开榜样的力量和社会环境的渲染,如何提高社会对优秀教师的认同和支持,弘扬尊师重教的传统,利用舆论来提高教师的责任意识,是今后我们研究应该关注的另一个重点。

6. 开展教师价值观的跨文化、跨学科研究。考虑到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如何借鉴国外的研究经验和先进研究成果,对照中国本土研究的现实,不断开展跨文化比较研究,把握教师价值观的内涵,深化教师价值观研究。价值观还是多学科、多领域的课题,需要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伦理学、哲学、人类学等领域学者共同协作,运用跨学科视角展开讨论,从而便于更全面掌握教师价值观,更好地发挥教师教书育人的优势,服务学生和社会。

[参 考 文 献]

- [1]章龙,周莉. 价值观研究[M].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2004.
- [2]郭翠菊. 论教师的价值观及其作用[J]. 教育学术月刊,2010(3).
- [3]张昊. 价值引导:高校教师发展制度的核心理念[J]. 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09(9).
- [4]胥兴寿,张大均. 教师工作价值观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 [5]曾孔生. 教师价值观念的操作问题[J]. 学校思想教育,1994(5).
- [6]罗萍,魏国英等. 不要文明的性别歧视——大学女教师价值观调查分析[J]. 中国高等教育,2004(5).
- [7]宁维卫. 价值观:心理学的新认知[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2).
- [8]詹小利. 当代中小学优秀教师专业素质的系统研究[D]. 成都: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11.
- [9]戚万学,唐汉卫. 教师专业化时代的教师人格[J]. 教育研究,2008(5).
- [10]张道理,华杰,李晓燕. 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缺失与重建[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10(12).
- [11]魏源. 价值观的概念、特点及其结构特征[J]. 中国临床康复,2006(18).
- [12]贺荟中,连福鑫. 价值观测量方法综述[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11(2).
- [13]程建军,李欢欢. 试论当代高校教师核心价值观的构建[J].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2(2).

(责任编辑 晨 晓)

研究生求职行为及其与自尊水平、求职意向的相关性

陈友庆 杨亮清

(河海大学应用心理学研究所, 江苏南京 210098)

[摘要] 采用《硕士生求职行为问卷》《自尊量表》《内隐联想测验》和《求职意向问卷》调查了 540 名硕士研究生的求职行为特点, 并分析了他们的求职行为与内、外显自尊和求职意向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 硕士研究生求职主要以正式途径为主, 大部分人求职时间 3—6 个月, 大部分人对求职结果是认可的; 硕士研究生的外显自尊能够显著地预测求职频率——强度, 求职意向则能够显著地预测求职频率——强度和求职性质, 而内隐自尊不能预测求职频率——强度与求职性质。研究结论是: 硕士研究生个体的外显自尊、内隐自尊水平越高, 求职意向越强, 求职就越努力。

[关键词] 硕士研究生; 外显自尊; 内隐自尊; 求职意向; 求职行为

[中图分类号] B8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4-0009-04

一、问题提出

研究者们在分析个体求职行为的预测因素时, 往往力求探明自尊与求职行为的关系。Schwab 曾把经济压力和自尊因素作为求职意向的预测指标, 而求职意向则会对求职行为产生影响。^[1] Alan 等认为自尊与求职行为之间呈正相关, 求职行为的变化是求职者的自尊和求职自我效能的结果。^[2-3] Kanfer 进行的元分析表明, 自尊与求职行为有显著相关。^[4]

近年来兴起的内隐社会认知研究把自尊细分为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两种。外显自尊是指个体能够意识到的自陈式的自我评价。而内隐自尊则是指个体无法通过内省方式获取的, 且往往意识不到的自我评价。由于内隐性的特点, 一般的自陈式心理量表很难达到探测内隐自尊的目的, 比较有效的是采用内隐联想测验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 实践表明该类测验测量指标较好。^[5]

综观已有关于自尊与求职行为关系的研究, 大多是从外显自尊的角度进行的, 从内隐自尊的角度分析得很少, 而自动化的、无法被个体意识到的内隐

自尊却又可能对人的态度和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整合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来进行研究。此外, 有研究表明, 求职意向是求职行为的最强预测因素。^[6] 因此, 本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探讨外显自尊、内隐自尊及求职意向对研究生求职行为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

1. 调查工具。

(1)《硕士生求职行为问卷》。该问卷为自编问卷, 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人口学变量及研究生求职状况的调查; 第二部分为量表式研究, 包括对求职行为中“求职频率——强度”“求职性质”两大因素的测量。问卷采用 Likert 5 点记分法, 答案从“完全不符合”至“完全符合”记为“1—5”分。问卷题目经 16 名心理学专业人士的专家效度问卷修正及对 200 名在校三年级硕士生 (有效问卷 175 份) 的预测后,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0—0.88。探索性分析完成后修改的问卷为 18 题 (求职频率——强度 11 题, 求职性质 7 题), 另选取 218 人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chi^2/df = 1.17$, RMSEA = 0.03, CFI 和 TLI 都大于

[收稿日期] 2012-02-23

[作者简介] 陈友庆 (1964-) , 男, 江苏南京人, 河海大学应用心理学研究所教授, 博士。

杨亮清 (1985-) , 男, 湖南冷水江人, 河海大学应用心理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0.90,表明模型拟合较好。

(2)《求职意向问卷》。采用 Vinokur 和 Caplan1987 年编制的问卷^[7]来测量被试的求职意向。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8。

(3)《外显自尊测量问卷》。采用 Rosenberg 的自尊量表(SES)^[8]来测量被试的外显自尊水平。该量表包括 10 个条目。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68。

(4)内隐自尊测量。采用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来测量被试的内隐自尊水平。内隐联想测验是一种通过测量概念词和属性词之间评价性联系从而对个体的内隐态度等内隐社会认知进行间接测量的方法。^[9]

本研究测验中所用的属性概念词和目标概念词的选择参照 Greenwald^[5]和蔡华俭^[10]的研究,包含自我词、非我词、积极属性词和消极属性词 4 类。

2. 对象。

本研究的调查时间为四五月份,正值研究生三年级(研三)学生求职高峰期。Rosenberger《自尊量表》的调查对象为在校硕士生 540 人(其中研一 174 人,研二 127 人,研三 239 人)。再选取研三的 239 人填答《硕士生求职行为问卷》和《求职意向问卷》,其中尚未找工作者 21 人,其余 218 人为正在找工作或已经找到工作者。

对内隐自尊的测量,是选取了上述的研一、研二、研三(正在找工作但还没找到工作的被试)中部分被试开展的(148 人)。其中:男 74 人,女 74 人;研一 34 人,研二 43 人,研三 71 人;文科生 57 人,理科生 24 人,工科生 67 人。

三、结果

1. 研三学生的求职情况。

(1)调查发现,研三学生选择的求职途径按频数高低依次是:浏览网络的招聘信息,参加招聘会,浏览学校就业中心的招聘信息,老师推荐,同学介绍,亲戚介绍,朋友介绍,浏览报纸上的招聘广告,通过各类人才服务机构获得信息。

(2)研三学生通过正式途径求职的占 71%(包括浏览网上的招聘信息、浏览报纸上的招聘广告、浏览就业指导中心的招聘信息、参加招聘会、通过各类人才服务机构获得信息),通过非正式途径求职的占 29%(包括亲戚介绍、老师推荐、朋友介绍、同学介绍)。

(3)研三学生认为正式途径重要的为 45%,认为非正式求职途径重要的为 10%,两种求职途径一样

重要的占 45%。

(4)研三已找到工作及正在找工作的 218 人,其求职早期和现阶段(或求职末期)选择各种求职途径的比例分别为:正式途径 58%,53%;非正式途径 6%,8%;两种途径并重 37%,39%。可见研三学生求职途径变化不大。

(5)与早期阶段的求职相比,研三学生认为自己现阶段(求职末期)求职强度降低的为 26%,增强的为 28%,基本没有变化的为 46%。

(6)239 名研三学生中还没开始找工作的为 9%,正在找工作的为 44%,已找到工作的为 47%。218 名正在找及已找到工作的人中,求职时间在 1 个月以内的为 7%,1—3 个月的为 27%,3—6 个月的为 43%,6—9 个月的为 7%,9—12 个月的为 3%,1 年以上的为 4%;对求职结果非常满意的占 2%,比较满意的占 31%,一般的占 42%,比较不满意的占 14%,非常不满意的占 2%。

2. 内隐自尊效应。

在本研究的内隐自尊测量中,将所有被试不相容测试与相容测试的平均反应时进行相关样本 t 检验,不相容测试反应时都显著高于相容测试反应时($p < 0.01$),表明在硕士研究生被试中确实存在明显的内隐自尊现象,即他们在无意识水平下,对自己的评价比对他人的评价明显偏高。

3. 内隐自尊、外显自尊、求职意向与求职行为的相关。71 名正在找工作的研三学生内隐自尊、外显自尊、求职意向与求职行为测量结果之间的相关分析(pearson 相关系数)见表 1。

表 1 研三学生内隐自尊、外显自尊、求职意向与求职行为的表现及相关分析($n = 71$)

	M	SD	内隐 自尊	外显 自尊	求职 意向	求职 强度
内隐自尊	0.65	0.32				
外显自尊	27.80	2.42	-0.07			
求职意向	7.66	2.12	0.23*	0.23		
频率——强度	35.75	8.08	0.24*	0.37**	0.49**	
求职性质	25.52	4.70	0.02	0.24*	0.35**	0.23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外显自尊和求职频率——强度、求职性质均存在显著正相关,与求职意向不存在显著相关;而内隐自尊与求职意向、求职频率——强度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与求职性质相关不显著。

4. 内隐自尊、外显自尊与求职行为的回归分析。以外显自尊、内隐自尊、求职意向为自变量,分

别对求职频率——强度、求职性质逐一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见表2)。对求职频率——强度的回归方程为: $\hat{y} = 1.75 + 1.61(\text{求职意向}) + 0.77(\text{外显自尊})$ 。对求职性质的回归方程为: $\hat{y} = 18.57 + 0.78(\text{求职意向})$ 。结果显示: 外显自尊的高低能够显著地预测求职频率——强度, 但不能够显著地预测求职性质; 内隐自尊对于求职频率——强度和求职性质都不能显著预测; 而求职意向能够显著地预测求职频率——强度和求职性质。

表2 外显自尊、内隐自尊、求职意向对求职行为的多元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Beta	t
	方程模型	0.56	0.29	15.17 **			
频率——强度	外显自尊				0.77	0.27	2.63 **
	求职意向				1.61	0.39	4.09 **
求职性质	方程模型	0.35	0.12	9.72 **			
	求职意向				0.78	0.36	3.12 **

四、讨论

1. 研究生的求职特点。

本研究发现,硕士研究生求职主要以正式途径为主,通过非正式途径求职的较少。报告两种求职途径一样重要和正式途径重要的人数比例相同,而报告非正式求职途径重要的人数比较少。研三学生在求职早期和现阶段(或求职末期),主要以正式途径为主,或是正式途径和非正式途径并重,以非正式途径为主的求职方式所占比例比较少。这说明硕士研究生群体在求职时很注重正式途径,而没有充分使用非正式途径。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硕士研究生的自尊心较强,倾向于靠自己的努力来找工作,这样才能彰显自己的价值。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家庭为硕士研究生的就业提供的社会资源和关怀也较少,因此,硕士研究生也只有靠自己的努力去求职。

有研究者在探讨社会支持与身心关系时指出,社会支持是个体从他人或社会关系网络中所获得的一般的或具体的支撑性资源,它帮助个体应付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与危机。^[11]因此,在个体的求职过程中,如果他们能积极地利用各种社会关系,通过各种途径来求职,求职过程也许会顺利些。

本研究发现,半数左右研三学生在求职过程中求职强度基本没变化,但也有一部分同学的求职强度有所增强或降低,并且增强的比例比求职强度降低的比例稍高。这说明,硕士研究生在求职过程中具有坚持性。他们能够坚持不懈地求职,直到顺利

就业。

从求职时间的长短来看,大部分硕士生求职时间为3—6个月,侧面说明了他们就业的难度和求职的艰辛。然而,占被调查人数73%的人对求职结果的满意程度是“一般”和“比较满意”,这说明大多数人对求职结果还是认可的。

2. 内隐自尊效应以及外显自尊与内隐自尊的相关。

内隐联想测验结果显示,在硕士研究生群体中确实存在明显的内隐自尊现象。这与国内外许多研究结果一致。许多研究显示,在无意识水平上,被试倾向于积极的自我认知与评价,面对与自我相关的信息时,会表现出积极的自我评价效应。^[12-13]

本研究发现,内隐和外显自尊间的相关很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双重态度模型说,^[14]即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属于两个相对独立的自我系统。内隐自尊是无意识的,可自动激活的,而外显自尊是有意识的,必须具备一定的认知资源和目的,两者是不同的自尊结构。

3. 外显自尊、内隐自尊与求职行为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外显自尊与求职频率——强度、求职性质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回归分析结果也表明,外显自尊的高低能够显著地预测求职频率——强度。这一结果支持了前人的研究,^[2-4]说明硕士生个体的自尊水平越高,求职就越努力与积极;反之,自尊水平越低,求职行为就越缺乏努力显得消极。这可能是由高、低自尊水平者在人格和行为方面的个体差异造成的。首先,高自尊者的典型特征是拥有信心和勇气,寻求刺激和冒险,期望通过完成某些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而低自尊者则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在许多带有冒险以及挑战性的情境中,首先想到的是失败,因此往往是避免,而非主动寻求这种情境。高自尊者可能会在求职过程中不断挑战困难而不断努力,而低自尊者可能会在求职中退缩而缺乏努力。其次,高自尊者除了对自身价值具有积极的评价和情感体验之外,还表现为能够积极主动地寻求解决问题的策略,在面临困难时具有良好的坚持性,同时能够对自己的目标期望和行为结果进行计划、监督和调节,因此其行为表现就越积极和主动。可以说,自尊是个体适应社会文化环境的心理机制,是行为的中介,它调节人与环境的关系,并影响人际交往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表现在求职中就是高自尊者求职目的明确,在求职之前能够做好计划,求职准备充分,能够积极面

对求职中的困难。

内隐自尊与求职意向、求职频率——强度存在显著正相关,与求职性质相关不显著。这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内隐自尊是在大量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产生的潜意识的、自动化的整体自我评价。高内隐自尊者在成长的过程中累积了大量的正性经验,他们对待事情的看法也就越积极,敢于面对困难和挑战,因此他们的求职意向愈强,在求职中就会表现得愈加努力。而低内隐自尊者由于受大量负性经验的影响,在行为中就表现得退缩,因此他们的求职意向较弱,花费在求职中的时间也少。第二,个体的求职频率——强度主要考察的是个体求职的频率和努力程度,这一因素受到个体求职动机的影响。每个个体在内心都期望获得成功,尽管有时候自己意识不到。这种无意识的动机一直影响着个体的行为。而求职作为个人职业生涯的关键组成部分,是直接关系到个人的前途和命运的。Bosson 和 Swann 的研究表明,对于自发的或情感驱动的反应,内隐自尊比外显自尊有着更好的预测作用。^[15]因此,当个体面临求职情境时,会激活人的内隐态度,自动判断求职对自己的积极意义,内隐自尊就会以自动化的方式影响个体的求职行为。第三,内隐自尊与求职性质没有显著相关。这可能是由于个体的求职性质主要受个体意志等因素的影响。个体意志越强,求职也就越积极主动,因而在求职性质中个体的意志等因素屏蔽了内隐自尊的作用。

本研究发现,外显自尊与求职频率——强度、求职性质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内隐自尊与求职频率——强度存在显著正相关。这说明,自尊作为人格的核心因素,对个人的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

4. 求职意向与求职行为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求职意向与求职频率——强度、求职性质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回归分析也表明,求职意向能够显著地预测求职频率——强度和求职性质,这支持了 Ajzen 提出的计划行为理论。^[7]该理论认为,行为的产生直接取决于行为意向。行为意向表明了一个人执行某种特定行为的动机,反映出一个人愿意付出多大努力,愿意花费多少时间去执行某种行为。这告诉我们,个体的求职意向越强,求职动机就越强,求职也就越积极和努力。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结论是:硕士研究生个体的外显自尊、内隐自尊水平越高,求职意向越强,求职就越努力。

[参 考 文 献]

- [1] Schwab D P, Rynes S L, Aldag R J. Theories and research on job-search and choice [J]. Research in Personnel and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1987(1).
- [2] Saks AM, Ashforth BE. Effects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Job Search Behaviors on the Employment Status of Recent University Graduates [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1999(54).
- [3] Saks AM, Ashforth BE. Change in Job Search Behaviors and Employment Outcomes [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00(56).
- [4] Kanfer R, Wanberg C R, Kantrowitz T M. Job search and employment: A personality-motivational analysis and meta-analytic review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1(5).
- [5] Greenwald A G, Farham S D. Using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s to measure self-esteem and self-concept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0(6).
- [6] Ajzen I. Nature and operation of attitudes [J]. Annual Preview of Psychology, 2001(52).
- [7] Vinokur A D, Caplan R D. Attitudes and social support determinants of job-seeking behavior and well-being among the unemployed [J].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987(12).
- [8]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 [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增刊).
- [9] Greenwald A G, McGhee E, Schwartz J L K. Measur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Implicit Cognition: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8(5).
- [10] 蔡华俭. 内隐自尊效应及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的关系 [J]. 心理学报,2003(6).
- [11] 王雁飞. 社会支持与身心健康关系研究述评 [J]. 心理科学,2004(5).
- [12] 翟群. 中学生内隐自我价值感特征的实验研究 [J]. 心理科学,2005(4).
- [13] 翟群,萧自康. 搏击运动员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发展特征研究 [J]. 体育科学,2006(9).
- [14] Wilson T D, Lindsey S, Schooler T Y. A model of dual attitudes [J]. Psychological Review, 2000(1).
- [15] Bosson J, Swann W, Pennebaker J. Stalking the perfect measure of implicit self-esteem: The blind men and the elephant revisited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0(79).

(责任编辑 师语)

德国大学生学习经验分析^{*}

——基于第 11 次德国大学生调查的数据分析

沈苏彦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江苏南京 210037)

[摘要] 基于德国 2009—2010 冬季学期完成的第 11 次大学生调查的数据, 分析了德国大学生学习经验特征, 即较普遍地认为大学学习要求较高, 担心不能毕业的人数有上升趋势; 对大学教学质量的评价较高; 对毕业后的就业较有信心; 更加关注国外的学习经历。这些分析结果为研究我国大学生学习经验和充实比较高等教育微观层面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关键词] 德国; 大学生调查; 学习经验;

[中图分类号] G6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4-0013-03

一、德国大学生调查和大学生学习经验

1. 德国大学生调查项目。

大学生是高等教育的直接参与者与受益者, 学生是高校教学工作的质量主体, 他们在大学期间的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应该受到重视。德国作为教育强国之一, 从 1982 年开始, 在教育与研究部 (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 的支持下每 2—3 年进行一次大学生调查 (Studierenden-survey) 工作, 其目的在于了解大学生的学习情况、学习体验和经历、教学质量、学习参与度、职业期望、遇到的困难和压力以及他们的愿望和需求等等。^[1]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一直到 2010 年, 德国大学生学习经验调查已经进行了 11 次, 由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小组具体负责。每次都会在全德境内抽取大约 25 所大学的部分学生参与问卷调查。被调查的学生既有在综合性大学 (Universität, 简称 Uni) 就读的学生, 也有在应用科技大学 (Fachhochschule, 简称 FH) 就读的学生。在德国, 综合性大学

(Uni) 和应用技术大学 (FH) 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一般而言, Uni 比 FH 的规模大, FH 的专业设置偏重实际应用和工科类, 有些专业在 FH 中是没有的, 例如医学、药学、法学; Uni 的专业设置比较齐全, 在教学上偏重理论和研究。所有的 FH 都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 而 Uni 中每个教授都可以带博士生。

2. 学习经验的界定。

泰勒认为, “学习经验是指学习者与他能够做出反应的环境中的外部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2] (P. 183)} 这里学习经验包括两层意思, 第一层是外部环境对学习者的作用, 即客体因素, 可以理解为学生的学习经历, 即对大学期间各种学习环境的经历和体验; 第二层意思是学生对外部作用的感知和加工结果, 即主体因素, 可以理解为大学生对学习环境中的人、事、物的感知和反思。值得一提的是, 大学生在高等学校注册学习期间的各种学习活动, 既包括有计划、有目的的正式学习 (formal learning), 也包括日常生活中各种非正式的学习 (informal learning) (如人际交往、个人反思等)。

*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重点资助项目“中德大学生学习经验的比较研究”(项目编号:C-a/2011/01/15)。

[收稿日期] 2012-06-09

[作者简介] 沈苏彦(1979-), 女, 江苏苏州人,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博士。

本文就第 11 次德国大学生调查所公布的数据，分析德国大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所表现出来的主要学习经验特征，以期为中德大学生学习经验比较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第 11 次德国大学生调查及数据分析^①

1. 调查问卷的发放和回收。

第 11 次德国大学生调查在 2009 至 2010 年冬季学期的 25 所高校（15 所综合型大学和 10 所应用科技大学）开展，其中包括德累斯顿大学、莱比锡大学、马格德堡大学等在内的 17 所大学属于原东德地区，包括慕尼黑大学、法兰克福大学、彼得菲尔德应用科技大学等在内的 8 所大学属于原西德地区。表 1 是此次大学生调查的问卷发放和回收情况统计。从问卷的回收来看，第 11 次调查的回收率是历次调查中最低的，只有 27.8%。

表 1 第 11 次德国大学生调查抽样数量统计表

	总和	综合性大学 (Uni)	应用科技大学 (FH)
2009 – 2010			
冬季学期			
发出(份)	27307	21570	5737
收回(份)	7590	6117	1473
百分比(%)	27.8	284	25.7

2. 大学生学习经验特征分析。

(1) 大学生总体概况。此次调查中，42% 的大学生属于教育程度提高者，即他们的父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从调查的结果来看，高中毕业成绩在大学入学、专业选择以及未来学术生涯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专业的性别差异依旧明显，在社会学、教育学和语言学等专业女生比例过大，而在工程和自然科学专业男生比例过大。这和我国的情况基本一致。

(2) 成绩要求与学习能力。调查发现，大多数学生表现出对其专业的喜爱和较高的学习能力，只有少数学生想换专业或者中止学业。但越来越多的学生认为近些年德国大学对学生的要求提高了（见图 1 和图 2）。在这次大学生调查中发现，综合性大学中有 51% 的被调查学生认为大学的学习要求高，是近 4 次调查中所占比例最高的一次。同样的，在应用科

技大学中就读的学生也有 39% 的认为大学学习要求高，有 50% 的认为要求比较高，这两者加起来的比例近 90%。这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学生在如何应对考试方面依然存在问题。调查数据显示，大学考试体系本身，考试内容是否与教材具有一致性，必考内容的掌握等方面是学生反映最突出的问题。对学生要求的提高表现在学习内容增多和考试难度的加大，学生普遍反映学习负担较重。因此，有一半的学生担心不能完成学业，该比例近些年一直在增加。而事实上，德国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不能在规定的学习期限内完成学业，处于延迟毕业的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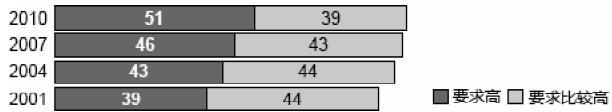


图 1 2001–2010 年德国综合性大学中被调查学生对大学学习要求的感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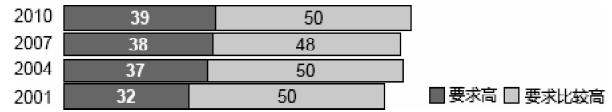


图 2 2001–2010 年德国应用科技大学中被调查学生对大学学习要求的感知(%)

(3) 学习质量和教学评价。虽然大学学习内容有不断增多的趋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遇到了种种问题，但研究显示，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德国各大学的教学质量得到了稳步提高，大多数被访者对教学内容的安排、课程设置和教学活动的组织方面都给予了好评。但是，课后及考试辅导的质量却在下降，特别是像法律和医学等这样需要以国家考试形式毕业的专业，学生们对课后及考试辅导较少给予好评。此外，缺乏连贯性、缺乏实习指导以及缺乏对于学生是否理解教学内容的教学反馈也是被学生经常提出来的问题。尽管本科阶段学生期待教学更贴近实践，然而这些在教学中很难实现。对于综合性大学而言，教师对本科学生成在教学、研究和实习的指导要少于对其他学制的学生。

(4) 职业与就业市场期望。调查数据显示，大学生的职业期待从 2004 年开始再次明显提高。在综合型大学和应用科技大学中有近 1/3 的学生都对就业充满信心（见图 3）。但近些年学生对职业的要求

^①文中数据除个别标明出处的都来源于德国教育与研究部 2011 年公布的文件 Studiensituation und studentische Orientierungen: 11. Studierendensurvey an Universitäten und Fachhochschulen。

和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工作的稳定性在职业选择中显得格外重要。图4列出了被调查学生认为在找工作时重要和非常重要的前6个因素,其中工作的稳定性排在第一位。有超过70%的应用科技大学的被调查学生和超过65%的综合性大学的被调查学生认为工作的稳定性是就业需要考虑的因素。这种观点也影响了学生对专业的选择,即学生倾向于选择未来有稳定工作的专业。学生对于未来就业市场可能会出现各类问题反应出较强的适应性。他们对于各种可能出现的不利情况及负担已经做好了准备,有能力灵活应对。专业不对口的工作学生们一般表示只能暂时性的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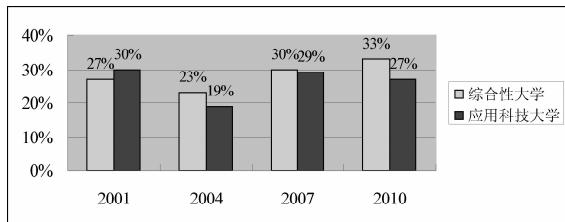


图3 2001–2010年德国大学生调查中被调查者表示“毕业后就业完全没有问题”的所占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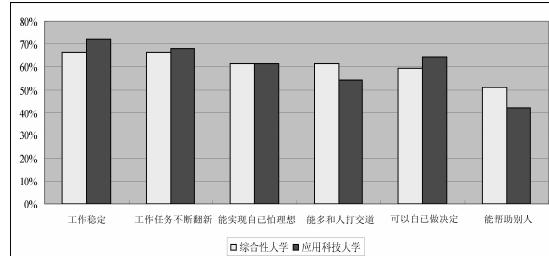


图4 第11次德国大学生调查中被调查者认为的前6个在就业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5)国外学习活动。德国博洛尼娅改革的明确目标之一就是要提高学生的国际适应性。从为学生提供的去国外学习信息的状况来看,结果还是能令学生满意的,有21%的被调查学生对此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有45%的被调查学生表示基本满意。学生对外管局的相关留学咨询也表示出积极的评价。尽管国外学习经历还是相当有用的,但是其在职场上的优势已不如前些年。而学生对于国外学习的兴趣主要是在大学学习的开始阶段。学生是否能实现去国外学习,常取决于学生的家庭出身,主要是受到资金的限制。但近年来,家庭经济条件并不是很好的学生到国外学习的数量也有增多的趋势。此外,外语水平不高以及担心由于国外学习浪费了时间也都是国外学习的限制因素。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限制,但德国各大学中去国外学习的大学生数量还是从2000年的52200人发展到2008年的102800人,

差不多翻了一番。

三、结语

大学生在高等学校注册学习期间的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学习活动经历都是大学生学习经验。它是大学生对其所处的学习环境中的人、事、物所发生的交互作用的认识、体验、感知和反思。大学生是高等教育的直接参与者与受益者,学生是高校教学工作的质量主体,他们在大学期间的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应该受到重视。德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国性大学生调查工作,收集了丰富的研究大学生学习经验的数据资料。本文基于德国2009–2010冬季学期开展的第11次大学生调查所公布的数据分析了德国大学的学生对学习要求的感知,对教学质量的评价,对未来职业的期望和评判,对国外学习的看法等方面的特征。我国针对大学生学习经验的研究实践虽然起步晚于德国,但近年来也受到相关学者的重视,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北京师范大学周作宇负责的教育部规划课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重点课题“中国大学生就读经验研究”^{[3][4]},山东理工大学谭秀森负责的全国教科“十一五”规划课题“当代大学生学习环境调查与研究”^[5],复旦大学于海负责的上海市科教党委委托课题“上海大学生发展研究”^{[6][7][8]}等。这些研究都为充实比较高等教育微观层面的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 Arbeitsgruppe Hochschulforschung. Studierendensurvey: 1983 bis 2011 [EB/OL]. <http://cms.uni-konstanz.de/ag-hochschulforschung/studierenden-survey/>. (2010–8–27) [2012–05–07].
- [2] [美]Ralph W. Tyler. 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M].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
- [3] 周作宇,周延勇. 大学生就读经验:评价高等教育质量的一个新视角[J]. 大学研究与评价,2007(4).
- [4] 周廷勇,周作宇. 关于大学师生交往状况的实证研究[J]. 高等教育研究,2005(3).
- [5] 谭秀森,刘昕. 大学生就读环境研究[J]. 教育发展研究,2008(20).
- [6] 于海. 上海大学生发展研究(2002–2003)[J]. 复旦教育论坛,2003(2).
- [7] 于海. 2004–2005年上海大学生发展报告[J]. 复旦教育论坛,2006(2).
- [8] 于海,钟晓华. 2006–2007年上海大学生发展报告综述[J]. 复旦教育论坛,2008(1).

(责任编辑 陈晓姿)

大众化阶段德国研究生教育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崔俊红

(南昌航空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西南昌 330063)

[摘要] 大众化阶段德国的研究生教育改革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建立研究生院,设立第二文凭教育,改革学位体系制度等。这些改革给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带来了很大的启示,大致体现为探索弹性学制,走“产、学、研”结合的道路,大力发展、培养复合型人才第二学历教育,增强研究生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等。

[关键词] 德国; 研究生教育; 改革; 启示

[中图分类号] G6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4-0016-03

德国的研究生教育最早可追溯到中世纪晚期,在洪堡大学理念的影响下,形成了许多的研究型或学术型大学。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国际化的迅速发展,德国研究生教育模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为了促进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20世纪90年代,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等欧洲国家就欧洲高等学校人员交流、学位可比性和互相承认等事宜进行了广泛的讨论。1999年《博洛尼亚宣言》的签署,宣告德国走上了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的进程。《宣言》的指导思想独立于德国传统的洪堡大学理念之外,并在指导德国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其中在选拔“精英大学”以及在变革固有学位制度方面所进行的探索和努力,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和一致赞同,进而逐步形成德国独特而鲜明的以教学、科研与学习结合为基本特征的近代研究生教育理论体系,基本奠定了德国研究生教育大众化阶段改革和发展的格局,并一度成为世界各国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借鉴和效仿的典范。

一、大众化进程之前的德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状况

自二战以来,一直到60年代初,受纳粹和战争的影响,德国的研究生教育受到了重创,一段时间以

来处于停滞状态,弘扬与恢复德国传统的洪堡精神就成了高校和政府高等教育政策的主要目标。德国研究生教育一直处在世界前列,在大众化进程之前德国的研究生教育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1. **德国研究生教育特点具有典型的德国模式。**德国模式的核心要素是在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前提下,加强博士生的科研训练,重点培养博士生在科研项目中的独立性与创新性。以这个思想为指导的德国研究生教育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四无”,也就是无学士学位、无入学考试、无课程设置和无管理机构。

2. **在研究生教育体系上,德国的研究生教育主要指的是博士生教育,学徒式方式强化对学生理解力、主创造力的培养。**19世纪初,进一步提高和培养学生进行独立科学研究的能力已成为德国教育家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为此,德国的博士生教育主要是通过讲座和研究所来开展的。德国的博士生教育是典型的学徒式教育方式,博士生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并分担相应的科研任务,进而具备能够独立完成博士论文的素质和能力。同时,这也是德国博士生教育的显著特点和一般规律。相比美国的注重基础课程学习和学分进修,以及安排博士生候选人参加相应的资格考试和最终的撰写论文与答辩等,德国则更

* [基金项目] 中国高等教育规划项目“德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项目编号:06AH0050027)。

[收稿日期] 2012-05-15

[作者简介] 崔俊红(1985-),女,山东东营人,南昌航空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加偏向于培养博士生的动手操作和独立创作与完成科研项目的能力。这不仅反映了德国研究生教育对博士生理解力与创造性的要求,而且把博士生作为一个教育的主体,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因此,德国的研究生教育体系主要是为培养能够单独完成科研任务,并不断创新与探索的真正的研究者。它既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趋势,又满足了社会对精英人才的强烈需求。同时,这也是德国高水平博士生教育的重要支柱与力量源泉。

3. 在研究生教育的培养模式上,注重教学与科研相结合。自19世纪以来,德国的研究生教育一直沿袭洪堡传统的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指导思想,并延续至今,这主要体现在德国博士生教育的教学实践与科研实践活动当中。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德国的博士生教育基本不要求学生进行一定的课程学习,而是要求学生以助教或助研的方式去进行各种科学实践活动,并把这种方式贯穿于德国博士生教育的培养体制当中。同时,这种方式也为德国的博士生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经费来源。博士生通过担任助教或从事一系列的教学活动,不仅解决了主要的经费问题,而且把这种教学活动与其博士论文相结合,更能有效培养自己独立的科研能力。

4. 在研究生教育管理体制上,德国的博士生教育相对比较自主。没有设立专门的负责博士生教育的机构,对其培养方式基本都是在研究所进行,师生之间是良好的师徒关系,导师全权负责博士生的学术指导等工作,系里虽设立了一级的博士学位委员会,但并不具有研究生管理与协调职能。在德国研究生教育过程中,完成一篇合格的博士论文难度非常大,博士论文把关严,淘汰率也相当大。这就给学生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在这种无形压力之下学生追求学术的动力就越大,更好地培养了独立的科研工作能力。

二、德国研究生教育在大众化阶段的改革

德国研究生教育历来非常重视教学与科研相统一,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个“洪堡精神”也一直延续着德国高水平研究生教育的传奇。但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和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推动,德国研究生教育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即使传统的博士生教育有其独特的优势,也暴露出诸多不足。为了更好地培养高层次人才和增强国际竞争力,德国

对研究生教育进行了重大改革与尝试,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的研究生教育更是迅猛发展,这个阶段提出的一系列改革和措施至今让我们受益匪浅,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1. 德国研究生教育在大众化阶段的举措及成效。(1)建立具有德国特点的研究生院。德国的研究生院和我国以及其他各国的研究生院有本质的不同,后者是指由高校内部组织并统一实施的一个对研究生进行教育的管理机构,而前者则是由一定数量的教授和研究生共同组成,并有专门的科研方向和课题的研究实体。它的功能是更加偏向于对博士生的培养。研究生院的成立主要是由各大院校根据自己的学校的特点和优势,组织跨专业、跨系以及跨校的若干教授共同拟定一个专门的研究方向和博士生培养方案,并向州政府相关部门提出申请。在获得批准后便能得到来自德国基金会或研究协会的财力支持。研究生院属于非永久性机构,所以规模不大,一般由10至20名教授、15名博士及两三名博士后组成,并向国内外公开招生,由导师负责筛选。研究生院的一个重大改革就是吸收了美国模式的长处,灵活设置课程,聘请国内外专家进行授课、讲座和研讨等,开阔学生视野,激发他们的创造性灵感。与此同时,研究生院还十分注重与其他科研单位的合作,进行全方位的资源共享等。

(2)第二文凭教育。德国高等院校为了向社会输送更多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提出了一个新的教育模式——第二文凭教育。第二文凭教育的招收对象是已经获得硕士学位或具有同等学力的应届毕业生或在职工作人员,继续学习两年左右。目的是为了优化知识结构和培养高层次跨学科的应用型和复合型人才。第二文凭班不需要参加入学考试,但要求硕士毕业总成绩优秀或良好。入学后,由一名导师负责制定学习计划与指导论文。第一年以学习本专业的基础课程为主。第二年按研究方向选修其他专业课,参加研讨班,并分担部分导师的科研工作。学习结束后,必须通过各门课程的笔试或口试,完成毕业论文与答辩,方可取得毕业证书,但通常不授予新的学位。这类毕业生一般很受企业界的青睐,其中不少人成为了企业高管或主要负责人等。

(3)国际化的学位体系改革。德国研究生教育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不断向国际化靠拢,提出了新的学位体系标准,即国际通行的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体系。德国开始努力尝试“本

“硕分读”的教育体系,将本科修业年限正式确定为3年制(除少数本科专业为4年制),硕士修业年限则正式更定为2年制。在此基础上开设了针对学士和硕士的国际通用课程,以英语为授课语言以吸引更多外国留学生来德深造,使德国研究生教育真正走向国际化。与德国原有的学位体系相比,新的学位体系改革重视平日课程学业考核评价,学生毕业后可选择继续深造。自德国研究生教育实施“本硕分读”以来,高校招收研究生的渠道变得更加宽广,规模更加扩大,不仅在校内招收定量的学生,还从世界各地吸纳更多成绩优异的生源。

2. 德国研究生教育在大众化阶段的发展趋势。

(1) 研究生培养的国际化趋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格局及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剧,德国的研究生教育也越来越趋向于国际化,以科研和高教领域的表现最为活跃。在规模较大、学术和研究水平较高的学府表现更加突出。例如在有些大学,由于教授的国际享誉度很高,世界各国的学生慕名前来,就读于其所在的研究所进行深造。研究所云集了来自多国的学者和研究人员,他们的经费受不同渠道的资助,有的是经过严格筛选和考核,由教授直接资助;而有的学校在招收博士生时实行三三制,即来自本校、来自德国其他高校和来自国外的大学毕业生,平均各占三分之一。在欧洲大联合的新形势下,德国正在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指导思想,扬长避短,学习别国的优点,不断改进自己,致力于学位互相认同、跨国界交流与合作等改革,这也成为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2) 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发展走向。德国研究生教育改革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所有参与者都是科研同仁关系,教授的作用在于把科研活动转化为一种教学方式,使科研和教学融为一体,学生的作用则在于把科研活动贯穿于学习当中,使科研和学习合为一体,相辅相成。科研使教授和学生各尽其责,把教学和学习融为一个无缝的知识网络框架,成为一个紧密的科研——教学——学习连接体。这种连结体主要以所长负责制和研究生担任助教的形式作为保障机制。教授直接由教育部管辖与支配,所长全权负责研究所内的所有日常事务,包括研究所自身运行所需的预算、设备的更新以及人员结构调整等。博士生从事科学的研究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兼职助教或科研助手,还有导师的科研合同提供的资金等。

三、德国研究生教育在大众化阶段的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1. 在研究生教育过程中实行弹性学制。一般在中国,一名大学生要从大学读到博士毕业大概需要10至11年的时间;而在德国,大概需要7至10年的时间就能完成。德国的研究生教育更注重学生以完成学业为目标,尽管少数学生可能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才能拿到博士学位。但相比之下,我国学制偏长,统得过死,不利于拔尖人才的脱颖而出。作为一个教育大国,我们更应该以学生的课程学习和科研活动为目标,实行弹性学制,制定出适合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学制标准并认真贯彻执行,允许学生提前或延迟毕业,为社会输送高质量的高层次人才。

2. 加强博士生的科研工作,走“产、学、研”结合的道路。应该把研究生教育的重点放在博士这个层面上,在博士教育中强调和突出科学研究,否则,博士教育就变成了硕士教育的简单传承而毫无创新可言。充分发挥“产、学、研”结合的教育理念,重视高校与社会、企业以及科技界的联系,让研究生有更多的机会进入企业锻炼,各教授一起参与到科学的研究当中去,培养他们独立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推动我国的博士生科学更快更好地发展。

3. 努力探索第二学历教育模式,为我国培养更多优秀的复合型人才。我国一考定终身的教育模式已远远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而第二学历教育作为引进西方的一种教育形式恰好弥补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不足。我国的第二学历教育可适当借鉴德国的第二文凭教育模式,宽进严出,弹性学制,只要修完所选专业的全部课程并通过考试就可以申请毕业,所得毕业证书由主考院校独立颁发并受教育部认可,教育形式相对灵活。向社会输送更多社会适应能力强,具有较高自学能力创新能力的人才。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第二学历将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将向更高层次的研究生教育拓展与延伸,为我国的研究生教育添砖加瓦。

4. 增强研究生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在课程设置、授课语言等细节方面,在教育体系、管理机制等大方面借鉴德国等国改革经验,以本国国情为出发点,建立适合自己的并且能与国际接轨的高等教育体系。

(责任编辑 师语)

高职院校毕业生“宅”生活状态的实证研究

郝 梅¹ 何安会² 石春梅²

(1.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江苏南京 210046;
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学院, 江苏南京 210046)

[摘要] 在对“宅”的态度调查中发现近半数的学生对“宅”有极高的认知度。有的毕业生对“宅”这种生活方式没有形成全面的认识, 职业目标不明确使其备感无所事事, 在从众心理驱使下, 部分毕业生过起了宅生活; “宅”为即将面临环境和角色发生双重转变的毕业生提供了心理避难所。另外, 父母的骄纵加剧了毕业生对宅生活的选择。

[关键词] 宅; 高职院毕业生; 生活状态

[中图分类号] G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4-0019-02

一、问题提出

高职院校的毕业生要面临就业、实习、创业等问题, 因而很多学校都会尽早地结束毕业班级的课程教学, 给毕业生留出时间以便他们能够应对。然而近年来, 很多毕业生在课程结束后并没有忙于找工作, 而是整日待在宿舍睡觉、玩电脑等等, 甚至连吃饭都懒得出门, 叫外卖或者泡面应付, 俨然成了“宅人”。毕业生对于“宅”这种生活有着怎样的认识及态度? “宅”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影响? 有多少毕业生是“宅人”? 是什么原因导致毕业生不去就业而是宅在家中或宿舍? 本研究对此现象探究, 以期学校、家庭、社会全面关注毕业生的成长成才, 提升毕业生的全面素质, 使其能够成为合格的社会工作者。

二、方法

1. 研究对象。随机在高职院校选取2008级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250份问卷, 收回有效问卷198份, 其中, 男生110名, 女生88名; 理科生134名, 文科生42名, 艺术生22名。

2. 工具。本研究主要使用自编问卷, 问卷分为6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被访者的人口背景变量情况以及被访者目前的工作和生活状态, 第二部分是被访者对“宅”的认识程度及态度, 第三部分是被访者“宅”的程度, 第四部分是被访者“宅”的原因, 第五部分是“宅”对被访者现实的影响, 第六部分是被访者“宅”的意愿。

3. 数据处理。本次调查所得数据采用SPSS17.0数据软件进行统计处理。

三、调查结果

1. 毕业生对宅的认识及态度调查。在调查统计中, 只有7.9%的学生表示不了解, 76.4%的学生表示有点了解、基本了解, 15.7%学生表示很了解、非常了解,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发现, “宅”已被大多数学生所认知, 近半数的学生对“宅”有极高的认知度。我们在关于“宅”的态度调查中发现, “宅”作为一种网络文化影响下产生的新型生活方式, 吸引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关注, 只有29.2%的毕业生持明确的反对态度, 多数学生对“宅”这种生活方式并不排斥, 甚

[收稿日期] 2012-01-06

[作者简介] 郝 梅(1980-), 女, 江苏南京人,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教师, 讲师。

何安会(1990-), 女, 江苏南京人,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石春梅(1990-), 女, 江苏南京人,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至有 11.2% 的学生明确表示赞同这种生活方式。

2. 毕业生“宅”的程度调查。在调查数据统计中, 44.9% 的毕业生认为自己还不算是宅人, 有 13.5% 的毕业生认为自己刚刚开始宅生活, 32.6% 的学生认为自己基本上算是宅人, 有 9% 的毕业生认为自己已经很宅了。对于周围同学“宅”化的情况, 9% 的认为很多是宅人, 71.9% 的认为部分是宅人, 15.7% 的认为极少数是宅人, 3.4% 的人认为周围没有宅人。以上数据统计显示, 近三成的学生成为了“准宅人”, 有 9% 的学生成为了标准“宅”人。由此可见, “宅”作为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在校园日渐流行。

3. 被试者“宅”的原因调查。在探讨毕业生“宅”的原因调查中, 31% 的学生担心找不到好工作, 害怕自己不能胜任工作, 59% 的学生表示对走入社会有恐惧与紧张感, 22% 的学生表示工作压力大, 22% 表示无聊, 不知道做什么才好, 18% 的学生认为受他人的影响, 6% 的学生表示想自主创业。

4. “宅”对生活的影响。作为毕业生首先应考虑的是如何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在“宅”对工作的影响调查中, 22.5% 的学生认为“宅人”更难找到工作, 7.9% 的学生认为“宅人”更容易找到工作, 30.3% 的人不知道, 39.3% 的人认为看情况而定。

5. 被访者“宅”意愿的调查。在调查中有 20.2% 的学生表示愿意尝试这样的生活, 40.4% 的学生表示无所谓, 32.6% 的学生表示不愿意尝试, 6.7% 的学生表示不知道, 从结果中也可以发现近半数的学生对这样的生活状态表示无所谓。

四、分析与讨论

在“宅”对找工作的影响调查中, 可以看出大多数毕业生肯定“宅”对找工作是不利的。是什么因素影响毕业生不去找工作, 而是“宅”在宿舍或家中? 结合相关调研数据结果, 依据毕业生的身心特点以及毕业生面临的特殊社会校园环境, 笔者对此现象做如下分析。

1. 电脑为“宅”生活提供了消遣工具。随着科技的发展, 电脑的种类和价格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 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校期间拥有电脑, 毕业生几乎人手“一本”。加之网络技术进步, 网络内容的丰富性、及时性吸引着大学生, 他们不出宿舍便可满足很多需求, 可谓是“尽在弹指之间”。

2. “宅”为面临角色即将转变环境因此改变的毕业生提供了心理避难所。作为即将步入社会的毕业

生而言, 他们不仅要面临从生活单纯的象牙塔里走出, 直面纷繁复杂的社会时的无所适从感, 而且也不得不经历从学生到社会工作者角色的蜕变, 不可知的未来不同程度地引起毕业生的心理焦虑。据《中国青年报》调查, 有近七成的毕业生对前途感到担忧。特别是对一些经常就职面试受挫的学生来说, 他们更是心情沉重, 意志消沉, 对现实中的很多事情失去兴趣。而“宅”这种生活方式迎合了他们的心理需求,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成为毕业生不敢面对现实的心理避难所。

3. 父母的骄纵加剧了毕业生对“宅”的生活选择。调查中有 13.5% 的同学表示家中不需要自己工作。在众多影响毕业生选择“宅”的因素中, 家庭父母的教养方式和态度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特别是一些经济条件比较富裕的家庭, 父母总认为孩子年龄比较小, 担心孩子无法适应社会压力或无法承受工作的劳累, 一些家长并不急于让孩子去找工作。父母的呵护也纵容毕业生选择“宅”在家中。

4. 职业目标不明确使得毕业生备感无所事事, 以“宅”来打发时光。在调查中, 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对于自己毕业后“想做什么”“能做什么”“适合做什么”都没有明确的想法或计划, 他们毫无目的、毫无针对性地去求职面试, 这样无的放矢地寻找工作犹如大海捞针, 多次的求职以失败告终, 加重了学生逃避社会的想法, 有些同学找不到工作就只好“宅”在家中或宿舍, 以“宅”来打发时光。

5. 对于“宅”这种生活方式没有形成全面的认识。“宅”这种生活方式本身无所谓好与坏。社会上某些人本身由于特殊的职业需求成为“宅人”; 有些人结合自我的个性需求和职业生涯规划, 有意识地成为了“宅人”。部分毕业生利用网络科技进行自主创业, 实现人生价值。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仅有 6% 的学生有这样的想法。

6. 毕业生的从众心理。作为网络时代的大学生, 网络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往往能够关注并且及时品味到网络的流行时尚, 去接受, 去模仿, 去学习, 这其中就包括“宅”这种网络的催生物。有些毕业生正是认为别人“宅”了, 所以自己也“宅”。我们应积极引导大学生规划人生, 合理利用网络等高科技实现人生价值, 而非随波逐流。

(责任编辑 师语)

重建学校特色之我见

杨传勇

(青岛福林小学, 山东青岛 266071)

[摘要] 在明确学校特色建设的现实意义和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应从学校发展的深层目标、组织领导、人才队伍、学校文化4个方面着力思考推进策略,切实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

[关键词] 学校特色; 重建策略

[中图分类号] G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4-0021-03

学校特色,是学校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独特、稳定、优质、带有整体性的个性风貌。它是学校办学个性的具体体现,也是学校教育优势的集中反映。学校特色既包括德育特色、课程特色、教学特色、学校管理特色、教育科研特色、教师发展特色、国际交流特色,也包括校园文化特色等。

国家总督学顾问、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陶西平先生在谈到学校特色建设时指出:“学校特色的形成是一个长期过程,它需要经历优势项目——项目特色——学校特色——特色学校的发展过程。从学校特色发展为特色学校,是一个由局部向整体推进的过程。”^[1]审视当前我国学校特色建设的现实背景,我们必须正视3个方面的矛盾,即人才类别的多样化与培养模式趋同化的矛盾,人的发展的个性化与学校发展同质化的矛盾,学校竞争的激烈化与办学人员惯性化的矛盾。^[1]笔者认为,新形势下,必须提倡重建学校特色提升办学品质。

一、重建学校特色的现实意义

1. 学校特色建设,是当今世界的办学趋势,是现代学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要求。追求和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办学趋势。学校特色建设是近些年来教育理论界和教育实践探索中普遍关注的问题,是现代学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要求。加强学校特色建设,是以全面提高学生素

质为根本价值取向的,目的是营造一个能使学生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学会劳动、学会生活、学会健体、学会审美、学会创造的良好育人环境,充分发挥每一个学生的能力专长和个性特长,因材施教,使大批学生学有所长,使学校教育既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又能适应学生全面发展的需求,最终达到培养合格人才的目的。

2. 学校特色建设,是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教育规划纲要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推进素质教育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2010—202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要“树立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注重教育内涵发展,鼓励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出名师,育英才”。在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形势下,学校进行特色建设有利于深化教育改革,满足社会发展对多种人才的需求;有利于开发人的潜能,促进个性健康发展;有利于学校扬长避短,创新发展思路,实现良性循环。走特色办学之路,是学校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也是学校内涵发展的重要平台和支撑。

3. 学校特色建设,是深入提炼学校特色文化内涵,提升学校办学品质,实现优质发展的必由之路。进一步加强学校特色建设就是要发挥每所学校的办学活力,凝聚群众智慧,提高办学品位,发挥学校自身特长和潜在优势,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办人民

[收稿日期] 2012-05-15

[作者简介] 杨传勇(1971-),女,江苏赣榆人,青岛福林小学副校长,小学高级教师。

满意的教育。加强学校特色建设也是学校深化改革的突破口,通过学校特色建设,带动学校全方位的教育教学改革,有利于学校的自身发展。

二、学校特色的基本性质与内涵

笔者认为学校特色应具有4个基本性质,即彰显学校价值取向和教育特质的独特性,符合教育发展规律和学校实际的科学性,传承学校整体优势和传统积淀的稳定性,体现学校发展效益和教育创新的先进性。重建学校特色,彰显办学活力,需要学校领导层进一步深入理解学校特色的深刻内涵。

1. 学校特色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办学理念基础上。发展学校特色必须体现科学的办学指导思想,这是学校办学特色的灵魂。因而学校特色建设必须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遵循党的教育方针、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满足学生生命成长和未来发展的需求,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前景。学校特色的核心是办学理念,它贯穿于办学的整个过程和各个方面,对教师和学生的目标追求起着导向作用,在校风、教风、学风方面起着潜移默化作用。要着力以科学发展的办学理念为支撑,否则学校特色建设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2. 学校特色必须贯穿于以校为本的行动推进中。学校建设应从学校实际、传统底蕴、工作优势、环境资源等方面出发,使学校特色基于学校,生成于学校并发展于学校。要办好学校,形成办学特色,就要立足学校的实际,合理定位,大力挖掘学校内部潜力,找到形成学校特色的突破口、切入点和着力点,把潜在的优势变为显性的优势,以提高学校的整体办学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以校为本,就是对学校自身条件的分析和利用。学校要在办学过程中认真分析本校校情,找出自己的优势,并使之科学发挥,合理利用,长久不衰,这就是特色。

3. 学校特色必须体现在对优质教育目标的追求上。学校特色建设的关键是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优质”是学校特色形成与发展的环境与基础,它决定着学校特色建设的档次,离开了“优质”,办学特色就没有生命力。学校特色应该是亮点突出,有可圈可点之处,能给人以启示。在学校共性的基础上,注重在常规工作中提升独特的办学思想和采取切实可行的举措,赋予学校特色以深厚、独特的文化内涵,形成个性鲜明的办学模式和办学风格。体现优质,学校特色才会得到公众的承认和同行的仿效,才会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真正意义上的学

校特色,必须以优质办学质量作为支撑,它必定是符合素质教育要求而且在教育教学质量上体现较高的水准。

4. 学校特色必须相对稳定并随形势发展不断赋予新的内涵。学校特色的形成和发展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它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发展与自然积淀的过程,被历届师生继承和发展。它不仅表现为学校具有个性化的外显环境、校本化的课程体系、明显优于同类学校的特色项目,更表现在凝聚于学校每个成员身上的一种精神品质。它不因校长的更换而改变,不因教师的调动而弱化,也不因学校的变迁而消亡,它深入学校每个成员的骨髓。同时,它的稳定性也不是绝对的,始终与内外环境相适应,与特定时空相联系,因此,学校特色建设又是一个动静结合的联合体,只动不静形成不了特色;只静不动,发展不了特色。

三、重建学校特色的策略

1. 着力思考学校特色建设的深层目标。学校特色建设是一项长期的、整体的、系统的工程。而重建学校特色,就是要促使学校在原有特色初具态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意识地扩大,实现以点带面的整体提高和优质发展。因而需要学校决策者站在当前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深入思考并全面审视学校特色建设的发展目标,对特色的选择设计和科学把握是学校特色建设实践的起点和核心。

学校必须对自身历史、现实和未来发展的趋势,进行认真分析和科学论证,确立个性化,适于全体师生共同参与的办学理念和明确的发展方向,并加以不断地提炼、固化、升华、创新。区域社区的社会文化背景、经济背景等都是发展学校特色的肥沃土壤,我们应当充分挖掘,合理利用,使它为学校特色建设服务。要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本校的显性优势和潜在优势,并使这一优势科学发挥,合理利用,长久不衰,凝练提升。在学校特色重建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学校物质载体的承受力,真正做到定位准确,扬长避短,推动学校办学品质的全面提升。

2. 致力加强学校特色建设的组织领导。学校特色建设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需要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学校应将其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列入学校发展总体规划,建立学校发展的愿景,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确立清晰合理的学校特色,建设近期、中期、远期发展目标,逐年落实工作计划。在方案制定中,学校领导要把握好方向,把握好框架,把

握好节奏;找准结合点,看准落脚点,选准支撑点,找准生长点,使特色建设方案具有科学性、可行性。在行动推进中,学校领导要带领全体成员长期一贯地为发展目标的达成而努力,应当把创建学校特色工作渗透于整个学校工作之中,体现在日常的学校管理、教育、教学和丰富多彩的学生活动之中。同时,学校还应逐步形成一套能保障学校特色建设顺利、深入、持久开展的有效管理机制,健全学校管理制度和管理网络,决策层、管理层、操作层职责分明。在一个个目标的实现过程中,逐步彰显学校的发展特色,带动学校全面、整体、可持续发展。

3. 倾力打造学校特色建设的人才队伍。校长作为学校的领导者,是学校特色的发展者和创造者。在所有学校特色的要素中,校长是最关键的要素,是一个学校的灵魂。实践证明,校长素质越精良独特,越容易建构造就学校特色,因而学校特色建设的成效与校长素质存在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渊博的文化知识是校长创建学校特色的基本前提,独特的思维品质是校长创建学校特色的原始动力,完善的个性特征是校长创建学校特色的内在依托,成熟办学思想是校长创建学校特色的根本追求,出众的管理才能是校长创建学校特色的有力保障。

校长要以形成先进的办学思想为目标,全面理解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不断更新自己的教育观念,牢牢把握现代教育的发展方向。同时,要以学校特色建设为指向,着手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校本研修培训体系,通过培训强化教师对学校特色建设的认识,促使他们付诸学校特色建设的具体行动,培养和造就一支观念新、素质高、有个性、能创新的新型教师队伍。学校特色建设还应成为全校师生的共同自觉行为,要让每一个师生都能认可,积极践行。要切实做好宣传发动工作,让师生、家长及社会各界

了解学校特色建设的重要意义和具体领域,促使他们关心、支持、参与学校特色建设,不断扩大影响力和覆盖面,形成合力。

4. 聚力建设彰显个性特色的学校文化。学校特色的本质是文化。文化是学校的育人之本,是学校发展的共同愿景和价值标准,也是学校特色建设成功的标志。学校文化建设作为学校精神氛围对师生心灵的熏陶、行为规范的培养,乃至校风校貌的树立,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在学校特色建设的过程中,学校应在多元的文化中认真选择、凝炼独特的学校文化精神,积淀、丰富独具特色的学校文化底蕴,注重建设一种能体现学校特色目标的学校文化环境,着力营造一种浓郁厚实的学校特色文化。其中,学校的精神文化是学校文化的核心,比起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来,它更渗透于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学校精神文化一旦形成,就会以强大的影响力规范学校教育的精神气质,意味着学校的办学思想、教育理念成为了全体师生的普遍自觉,就会体现在每个师生的价值取向、期望与态度中,并最终影响每一个师生员工的教育行为。一所学校最令人品味的就是其深厚浓郁的文化,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学校群体成员进行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精神力量,也是深入实施素质教育的一种激励机制。形成有特色的学校文化,更是推进学校教育创新、教学创新、人才创新的巨大力量。学校特色的“特”是学校文化的整体表现,是学校理念和精神由内而外的自然呈现与自然生成,是与学校文化的整体协调。

[参考文献]

[1] 陶西平. 谈高中特色办学 [J]. 中小学管理, 2009(8).

(责任编辑 师语)

构建积极健全的儿童文化：教师专业发展的时代诉求

余春瑛

(江苏教育学院教管院，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传统文化中成人本位的根深蒂固，急功近利的成人文化的侵蚀，以及社会教化的意义的极其凸显是导致学校文化漠视儿童文化的主要原因。对此，教育者应从反思传统文化和已有教育信念开始，建构科学的儿童哲学观，并行使作为课程创生者的职责与权利，积极地促进儿童文化的丰富和完善。

[关键词] 学校文化； 儿童文化； 教师专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 G45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4-0024-03

建构主义，多元智能，自主、合作、探究等都是新课程的核心命题，在这些理论的影响之下，一些课堂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为数不少的常态课依然“新鞋走老路”，徒有一番热闹。冷静思考之余，制度、惯习当然是原因，更重要的是因为教育者在追随这些理论之前，遗忘了它们都根植于一定的儿童哲学观。在教师没有明确地回答什么是儿童，如何看待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的关系，如何构建积极健全的儿童文化等问题之前，再好的理论也会沦为技术主义和权威主义的帮凶。

一、儿童文化与学校文化的现实对峙

1. 儿童文化的自主性与学校文化的规范性。早在文艺复兴时代，卢梭就认为“儿童是有他特有的看法、想法和感情的；如果想用我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去代替他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那简直是最愚蠢的事情”^{[1](P.91)}，但师生关系是一种制度化了的“支配—从属关系”，当代表社会文化的教师文化所要求的规范与学生的自发性希望出现对立的时候，前者总是表现出盛气凌人的气势。例如，在教学中，教师往往事先制定一个教学计划，遇到意外的情况，教师或是采用置之不理、转移注意或者空许诺的策略压制孩子们表现出来的探究欲望；在管理中，被公认为

优秀幼儿园的教师在课堂上对幼儿如此训话：“什么是棒？老师让你听你就听是棒，让你唱你就唱是棒，学习本领就是棒。”^{[2](P.52)}教育者无视规范的合理度和儿童的自主性，盲目地向儿童灌输成人精神世界的一切内容，或者直接强迫儿童向教师学习，采用简单置换的方式对待儿童的精神成长，儿童自身的学习方式找不到用武之地。

2. 儿童文化的游戏性与学校文化的抽象性。在一定意义上，儿童文化的核心就是游戏精神。作为儿童的存在形式，游戏意味着超现实的灵性，意味着自由浪漫的创造，意味着无止尽的探索精神。在游戏过程中，儿童能达到身与心、物与我的统一，在认识事物本质的同时认识自我，实现自我。

相比之下，学校文化代表的是人类文明遗产的精华，通过听讲和读书获得身心发展，是人类所擅长且不容废弃的方式。因此，具有间接抽象性的学校文化必然与生动活泼的儿童文化之间产生矛盾。受到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承认的诸多价值观（如强调竞争、分数）的左右，后者总是不能不服从于前者，儿童远离了放任本能的游戏童年，围绕着学科知识的课堂学习成了他们的主要活动。“大学教学用的是适合科学家的方法，中学向大学取法，小学向中学仿

[收稿日期] 2012-05-31

[作者简介] 余春瑛(1978-)，女，江西九江人，江苏教育学院教管院教师。

效,从上到下一律侧重逻辑安排而忽视心理程序,便酿造成悲剧。”^{[3](P.27)}尤其在中国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儿童学校生活的大背景就是一个独特的“东方考试文化圈”,在这个生存背景中,教师依赖考题而教,学生依赖教师而学,使所有旨在发挥人的力量的改革裹足不前。

3. 儿童文化的整体性与学校文化的分割性。儿童是以整体的方式认识世界,感知事物的。对同一种事物,只要有可能,他总是会调动自己所有的感官去认识和体验。正因为学习者的心理具有整体性,杜威指出:“学校科目的互相联系的真正中心,不是科学,不是文学,而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3](P.26)}

然而,学校文化以分科课程为主,强调的是不同学科门类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强调一门学科逻辑体系的完整性,这样的课程组织方式与儿童认知特点的整体性和情境性就会产生冲突。当教育者以课程的忠实执行者而非创生者的姿态出现的时候,儿童面临的就是一幅幅毫无关联和意义的抽象图景,而现实生活恰恰是自成一体的,这势必导致儿童对学习产生无助感和沮丧感。

4. 儿童文化的理想性与学校文化的现实性。在儿童的世界,没有传统的陈规戒律,没有高低贵贱的划分。儿童不像成人那样生活在处事哲学的生存之道下,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地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可以不加思考地表达自己最内心的想法,拥有着独特的、本真的文化品格。尽管“学校环境的职责,在于尽力排除现存环境中的丑陋影响,以免影响儿童的心理习惯”^{[3](P.28)},作为社会系统中一个最基本的单位,学校依然还是不能完全摆脱社会文化的消极影响——成人世界的过度竞争,对功名利禄的无止境的追求等,都以各种形式渗透于学校文化中,进而对儿童文化产生影响。

二、学校教育背离儿童文化的缘由分析

1. 成人本位的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人的精神,但与西方的观念不同,它强调人之为人的“人伦”关系,“人”主要是指在由人伦而形成的家族、民族、国家等群体中,被人伦之网规定下来的人,而不是独立存在的个人。这种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秩序,使成人在对待儿童问题上天然地成为权威。在成人的视野下,儿童是“乳臭未干”“视同儿戏”“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一以贯之

的形象,儿童在成人眼里,一直是被当做“不及格、非正式、未成型、待加工”的生命来关爱和呵护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促使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习惯于把成人世界的生活模式和价值标准硬套在儿童身上,千方百计地采用各种手段促使儿童快速成为“成品”——“标准化的成人”。毋庸置疑,这种过于简单地对待儿童成长过程的做法的背后,就是一种基于“成年”的儿童教育哲学,也正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儿童本位的缺席,从根本上导致了学校教育对儿童文化和儿童生活的漠视。

2. 急功近利的成人文化的侵蚀。由于功利化的需要和成人的攀比心理,儿童被过早地抛入了高结构性学习活动之中。家长为使孩子有一个好的开始,往往在孩童时期就灌输竞争意识,强调要为将来做好准备,以至于不输在起跑线上。教师也是“为学生着想”,用自己认为正确的价值、标准来约束儿童,并且迫于学校之间的竞争,给学生施加压力。教育长期笼罩在“苦读”的气氛中,为了“分数”“考试”,儿童甚至被剥夺了基本的人权——生存权,教育竞争成为他们童年生活根本主题,甚至是唯一的主题,单一“工厂模式”教育的挤压使得他们失去了在生活中广泛陶冶的可能性。

3. 社会教化取代了儿童学习。竞争,是这个时代的最典型特性。在竞争这个背景下,现代教育的直接使命变成了为国家培养人才,以及繁荣学术,发达科技。现代教育的这两项使命,都转嫁到了作为受教育者的儿童身上。所以,大国的儿童,包括我国的儿童在内,都被要求成为世界上“最出色的”“最强的”。当国家要求年幼儿童承担公民责任时,必然结果是国家的目的取代了儿童的目的,儿童的学习不是为了其自身当下发展,而是为了一个遥远的将来的义务,即便是还处于充满幻想的童年期,儿童就被迫意识到残酷的现实。换句话说,以生长为内在目的的儿童自发性学习,被以成年的幸福生活(或某种社会目的)为外在目的的社会教化所取代了。

三、儿童文化视角下的教师专业发展

虽然教育改革的成功需要来自方方面面的支持,但是,只有教师才是教室最有力的改革者。

1. 批判性地认识传统文化。文化与教育具有特殊的关系。一定社会文化中的儿童教育会体现该社会文化中最基础最核心的东西。因而,改造教育必然要通过改造文化和社会来进行。另一方面,文化的改造又必然通过教育才能根本实现,即必须通过

新人新文化的诞生才能实现。因此,一个开放和进步的社会,应当允许文化反思。学校应该认识到它的责任不在把社会的全部成就传递下去,而只是把有助于未来社会发展更美好的那部分保存下来,相应地,作为一个教育者,在面对传统文化时,也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和警觉的态度,辨析文化传统中的毒素和精华,理智地看待文化和天性的矛盾,承认天性之于儿童发展和生命完整的意义。

2. 反思已有教育信念。教师专业发展不仅是一个教学技术不断娴熟的过程,也不仅是把技术逐渐提升为艺术的过程,最根本的还是在于个体教育意识的全面觉醒。儿童观作为对儿童总的看法与观点,是教育信念体系中最根本的意识。因此,作为教育者在实施课程之前要建构理性的儿童文化意识,其先决条件是发现和了解教师自己的价值观念,识别出教师所拥有的假设以及在处理与儿童关系时所使用的框架,对教师如何形成自己的教育理念进行反思,询问其他人是如何看待你的信念和假设的。只有帮助教师不断对自己教学行为背后的儿童哲学观和儿童教育观进行深刻的反思,才能使教师真正洞察教育行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什么样的行为表现能有助于扮演好教师的角色,重构教师自己的新的专业实践知识。

3. 建构科学儿童观。长期以来,“国本位”“家本位”“成人本位”的儿童观一直都有把儿童“物化”“附属化”“财产化”的倾向,儿童的情感、人格、想法、权利和尊严常受到漠视和践踏。要从根本上扭转实践中司空见惯的错误,首先必须用人性化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儿童,意识到儿童首先是作为人存在的,具有人之为人的根本特性。教育者应以存在的眼光把儿童当做和成人一样彼此平等、具有相同价值的人,千方百计地保护好儿童的自尊心,给予儿童各项原本就应当属于他们的权利——游戏的权利、表达的权利、学习的权利、生活的权利。教育者还应该学会以“体验”和“生命”为根据,学会站在儿童的立场,用儿童的大脑思考世界,用儿童的眼睛观察世界,用儿童的耳朵聆听世界,用儿童的小手触摸世界,通过儿童化的活动,理解儿童世界独特的成长线索,并通过我们力所能及的行动和及时合理的指导,让更多的儿童能够成为独立的自我。此外,科学的儿童观还要求教师以学习的心态拜儿童为师,意识到儿童文化也有超出成人文化的成分,也有成人文化不可与之

媲美的内容——纯真奔放的性格、超凡脱俗的游戏心态、清新真实的艺术本能、乐此不疲的探索精神。作为教育者,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自觉担当抚养和教育儿童的义务,也需要一改以往的霸权形象,带着虔诚和敬畏之心去从儿童文化中寻觅人性的自然根基和成人身上失落的精神,使成人文化从儿童文化中得到反哺,避免成人世界的异化。

4. 创生基于儿童文化的课程。新课改需要新课堂。教师作为课程与教学的主体,首先必须使课程与教学立足于儿童文化,关注儿童的文化视界和生活方式,从儿童的生活世界出发,以富有儿童文化气息的语言和行为来施加教育影响,承认儿童文化的背景差异,追求儿童自身文化的主体建构性和参与性,用儿童的文化形式,唤起儿童的理解兴趣,并在儿童自身的文化活动中促进他们的文化理解和个体的发展。其次,作为“平等者中的首席”的教师还需要营造平等的交往情境,让学生自在地阅读和理解教师文化。教师不仅是儿童文化的开发者,他本身就是主流文化的化身,是儿童要理解的文化对象。教师总是以文化交流者的角色与儿童产生互动,通过唤醒儿童自身的文化意义吸引儿童的文化关注,并为儿童主动理解。这种文化交流是在没有权威、没有压力的平等情境中进行的。再次,对于一个儿童来说,其他儿童都是文化的他者,都是文化理解的对象,儿童文化总是在儿童同伴互动中寻求生命成长的意义,佐藤正夫把这个过程形象地描述为“交响乐的演奏过程”“异向交往”^{[4](P.46)}。因此,教师一方面需要用心倾听儿童的心声,另一方面应该引导儿童用心倾听并积极回应同伴的声音,在儿童群体文化中培育儿童个体文化发展的土壤,进而推动儿童群体的共同进步。

参 考 文 献

- [1] [法]卢梭. 爱弥儿[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 [2] 原晋霞. 幼儿园班级课程个案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研究[D].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05.
- [3] [美]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 [4] [日]佐藤正夫. 静悄悄的革命[M]. 长春:长春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师语)

中小学网络辅导员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研究^{*}

樊 继 宽^{1,2} 兰 亚 竹³

(1.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2; 2. 连云港市教育局, 江苏连云港 222006;
3.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江苏连云港 222006)

[摘要] 根据工作内容和工作性质, 在关键绩效指标考核法中引入辅助考核指标, 构建中小学网络辅导员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关键词] 绩效考核; 网络; 辅导员; 关键绩效指标

[中图分类号] G45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4-0027-04

近几年,江苏省教育厅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不断加大教师培训力度,教师省级培训的人数逐年上升,师资队伍建设投入经费逐年增加,从培训教师的规模和投入上充分体现了江苏省全面提高教师素质的决心。

江苏省教师网络培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网络培训借助计算机网络,超越了时空的制约,学员可以在方便时随时随地上网,近距离地聆听专家的讲座,查看网上资源;辅导员可以通过网络批改作业,进行辅导;管理员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日常事务的管理。通过网络培训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节省了开支,扩大了教师培训规模,提高了教师培训效率和效益。^[1]

目前我国中小学专任教师共有 1100 万人左右。从历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培训对象的覆盖面、培训规模呈现出骤然上升的发展态势。据了解,自教师网联成立至 2009 年的 6 年间,充分发挥三网合一的优势,共开展中小学教师非学历培训 600 余万人次,年均达到 100 多万人次。^[2] 通过实践和探索,网络培训的形式已趋于成熟,但还存在一些问题急需解决,如构建网络培训中辅导员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等。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1. 国外研究现状。

从国外绩效考核看,美国主要采用岗位评价法,它是在岗位描述的基础上,对岗位本身所具有的特性进行评价,以确定岗位相对价值的过程。^[3] 此外,还有定级尺度法、关键事件法、比较评估法等。哈佛大学管理学院 Robert S. Kaplan 和 David P. Norton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平衡记分卡(Balanced Scorecard)理论。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了关系绩效的概念。日本的绩效考核主要采用 3 次连环考核方法,是通过直接上司、中层管理人员、高层管理人员这 3 个层次的人员对员工进行全面考核的方法。新加坡的绩效考核大致可分为绝对标准、相对标准和客观标准。^[4]

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绩效考核的常用方法有关键绩效指标法(KPI)、360 度绩效考核法、目标管理法等。

(1) 关键绩效指标法(KPI)。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考核是通过对工作绩效特征的分析,提炼出的最能代表绩效的若干关键指标体系,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绩效考核的模式。KPI 必须是衡量企业战略实施效果的关键指标,目的是建立一种机制,将企业战略转化为内部过程和活动,以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地取得高效益。KPI 适用于有战略规划的公司和年度目标的公司。

KPI 考核法的优点:在公司战略目标的指引下,

* [基金项目] 连云港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大规模网络培训的有效管理”(项目编号:201111)。

[收稿日期] 2012-05-22

[作者简介] 樊继宽(1969-),男,江苏连云港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生,连云港市教育局师资处副处长。

能够把目标分解到部门及员工的日常工作当中来,能够使公司集中有限的资源达到公司目标,很好地体现了20/80原则,即80%的工作任务是由20%的关键行为完成的。

KPI考核法的缺点:指标之间没有驱动要素,追求结果,忽略了过程,没有关注重点指标之外的其他基础指标。^[5](PP.81-90)

(2)360度绩效考核法。360度绩效考核也称全方位反馈考核或多源反馈考核,是被考评人的上级、同级、下级和服务的客户等对其进行考评,通过评论的各方面意见,使被评者清楚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达到提高自己的目的。

360度考核法的优点:从多角度考评员工,产生的结果也比较客观公正。

360度考核法的缺点:在收集、整理和提供反馈信息时,为了保证考评者的匿名性和结果的保密性,花费的管理精力较多;容易导致员工之间不团结。

(3)目标管理法。目标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s)是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发明的管理方法,从1954年他首倡目标管理以来,这一管理模式就逐渐成为当代公司管理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6](P.1)目标管理法是根据被考核人完成工作目标的情况来进行考核的一种绩效考核方式。在工作开始前,考核人和被考核人对需要完成的工作内容、时间期限、考核标准达成一致。在时间期限结束时,考核人根据被考核人的工作状况及原先制定的考核标准进行考核。目标管理法对各级管理人员都比较适用。

目标管理法的优点:能够提升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高员工的成就感。

目标管理法的缺点:以结果为导向,重视结果轻视过程;难以对不同的员工设定不同的工作目标;对考核人员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并非所有的工作都可以设定明确的目标。

二、中小学网络辅导员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的构建

1. 绩效考核指标设计。

绩效包括两方面:一是企业的经营绩效,另一个是个人的工作绩效。个人工作绩效也就是这里所研究的绩效,是对比所在岗位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和职责要求,评估个人实际完成的情况。鉴于KPI考核法的优缺点,本文采用关键绩效指标法的同时,引入了辅助考核指标,弥补了这一缺陷,并将这种方法

运用到网络培训中,构建了中小学网络辅导员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关键绩效指标的确定原则。将中小学网络辅导员的总目标细化和量化,逐步分解到个人,直至可以直接评定。管理学者提出:“你不能度量它,就不能管理它。”^[7]在汇总整理出相关的绩效考核指标后,运用SMART原则确定KPI。

Specific(具体的)要求绩效指标是具体的目标,可细化为具体可考核的内容,避免抽象化无法描述的考核内容。Measurable(可衡量的)要求指标是可以被量化的,提出的指标应该具有时间、数量、质量、成本等方面的衡量标准。Accordant(一致的)指员工的目标与公司和部门目标保持一致,避免设立过高或过低的目标。Realistic(现实的)要求指标是可观察的或可以证明的,是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合理的,而非难以达到的。

Time-bound(有时限的):要求目标能在一定时间期限内完成,要规定时间单位(如年、季度、月),避免不考虑时效或时间观念不清晰。

(2)关键绩效指标的确定方法。运用SMART方法确定KPI的具体运作方式如下:以中小学网络辅导员岗位工作职责说明为基础,详细了解其岗位工作内容;选择3—5个最能反映出被考评人业绩的评价指标作为KPI,兼顾网络培训的长期目标和短期利益的结合制定KPI,选择的KPI是对工作业绩产生重大影响的工作内容和占用大量工作时间的工作内容。

根据中小学网络辅导员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性质确定KPI,他们是:布置作业,批改作业,参加课程讨论,汇总班级成绩,提交工作周记。KPI及其描述如表1所示。

(3)确立辅助考核指标。由于关键绩效指标考核的缺点是没有关注重点指标之外的其他基础指标,因此,为了弥补KPI考核方式的缺陷,笔者增加了辅助考核指标,从而能够更加全面地对辅导员进行考核。他们是:发布班级通告、学员问卷调查参与率、提交报表、与网络管理员沟通情况、向专家提交问题、提交工作总结。中小学网络辅导员辅助考核指标及其描述如表2所示。

2. 绩效考核评分标准设计。

中小学网络辅导员的绩效考核评分标准分为几个等级,最高等级得分是100分,最低等级等分是0分。关键绩效考核指标评分标准和辅助考核指标评

分标准分别如表3、表4所示。

三、结论

第一,在网络培训中,根据中小学网络辅导员的工作性质,提取了关键绩效指标对辅导员进行考核,这种考核方式,符合岗位工作特点,考核更趋合理和公平,并提高了辅导员的工作积极性,能够更好地完成网络培训任务。

第二,考核指标体系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做出适当调整,以适应考核工作的实际需要。

第三,由于关键绩效指标法没有关注重点指标之外的其他基础指标,为了弥补这一考核方式的缺陷,增加了辅助考核指标,从而能够更加全面地对辅导员进行考核。这种关键绩效指标加辅助指标的考核方法,希望能够对中小学网络辅导员的绩效考核提供有益的参考。

第四,考核指标体系的完成为中小学网络辅导员绩效考核系统的软件设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参 考 文 献

- [1] 兰亚竹. 关于中小学班主任网络培训的几点启示 [J]. 中国科教创新导刊, 2008(7).
- [2] 苏婷. 推进教师网联计划 深化教师教育改革 [N]. 中国教育报, 2009-07-07(1).
- [3] Tod Perry, Marc Zenner. Pay for Performance.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Compensation Contract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1(9).
- [4] 赵士德, 钱丽萍, 万立军. 基于目标与项目管理相结合绩效考评体系构建的研究 [J]. 黄山学院学报, 2006(2).
- [5] 郝德芳, 李宝生. 绩效管理 [M]. 北京: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8.
- [6] 博瑞森. 卓有成效的目标管理 [M]. 北京: 中国商业出版社, 2006.
- [7] 廖世理, 程广林. 关键绩效指标(KPI)的分解与设计 [J]. 农村金融研究, 2008(9).

表1 中小学网络辅导员关键绩效考核指标

KPI	描 述
布置作业	通过网上的专家视频讲解内容给学员布置作业
批改作业	批改学员提交的作业
参加课程讨论	参与学员课程讨论的发帖和回帖活动或发出课程讨论帖
汇总班级成绩	汇总学习结束后学员的学习成绩
提交工作周记	提交班级每周的工作、学习情况

表2 中小学网络辅导员辅助考核指标

辅助考核指标	辅助考核指标描述
发布班级通告	及时传达省、市级学习精神,发布课程通知等
学员问卷调查参与率	学员参与问卷调查的情况
提交报表	提交学习结束后的各类报表,如结业情况统计表、优秀学员统计表等
与网络管理员沟通情况	与所在班级的管理员沟通,解决班级问题
向专家提交问题	汇总学员希望专家解答的问题,并提交至上级
提交工作总结	培训结束后,提交工作总结

表3 关键绩效考核指标评分标准表

关键绩效指标	评 分 标 准
布置作业	100分:能够高质量、按时布置作业;75分:由于特殊原因有1-2次作业没能按时布置,质量高或能够按时布置作业,质量较高;50分:经常不能按时布置作业,质量不高;0分:不按时布置作业,质量差
批改作业	100分:按时批改作业;75分:由于特殊原因1-2次没有按时批改;50分:经常不能按时批改作业;0分:不能按时批改作业
参加课程讨论	100分:能够积极参与并指导学员的课程讨论,能够发出高质量、有引导作用的课程讨论帖;75分:能够参与并指导学员的课程讨论,能够发出有引导作用的课程讨论帖;50分:能够参与学员的课程讨论;0分:从不参与讨论
汇总班级成绩	100分:及时汇总学习结束后学员的学习成绩;75分:由于特殊原因推迟汇总学员学习成绩,但未影响培训基地的总体进度;50分:推迟汇总学员学习成绩,影响了培训基地的总体进度;0分:未汇总学员成绩
提交工作周记	100分:向培训基地按时、高质量地提交工作周记(包括学员的学习情况、培训中存在的问题等);75分:基本能够按时向培训基地提交工作周记;50分:有时提交工作周记;0分:从未提交工作周记

表4 辅助考核指标评分标准表

辅助考核指标	评 分 标 准
发布班级通告	100分:能够及时发布省市级相关通知公告;75分:经常发布相关通告;50分:偶尔发布相关通告;0分:从未发布通告
学员问卷调查参与率	100分:学员问卷调查参与率达95%以上;75分:学员问卷调查参与率达80%-94%;50分:学员问卷调查参与率达60%-79%;0分:学员问卷调查参与率小于60%
提交报表	100分:能够按时提交学习结束后的各类报表;75分:推迟提交各类报表,但未影响培训基地的整体工作;50分:推迟提交各类报表,影响了培训基地的整体工作;0分:未提交或未完整提交各类报表
与网络管理员沟通情况	100分:时常与网络管理员沟通班级情况,积极解决班级问题;75分:能够与网络管理员沟通班级情况,协助解决班级问题;50分:偶尔与网络管理员沟通;0分:从未与网络管理员沟通
提交专家问题	100分:提炼出学员希望专家解答的精品问题3个,并提交至上级;75分:提炼出学员希望专家解答的精品问题两个,并提交至上级;50分:提炼出学员希望专家解答的精品问题一个,并提交至上级;0分:从不提交
提交工作总结	100分:培训结束后,按时提交高质量的工作总结;75分:推迟提交工作总结,但未影响培训基地的整体工作,质量较高;50分:推迟提交工作总结,影响了培训基地的整体工作;0分:未提交工作总结

(责任编辑 秋 阳)

论教师实践智慧与教师专业发展

陈国庆

(江苏教育学院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教师实践智慧是指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教师具有对当下教育教学情境做出即时、正当反应的理性能力。理解教师实践智慧有4个维度:实践智慧的本质是理性,实践智慧的起点是情境,实践智慧的目的是价值,实践智慧的逻辑是体验。实践智慧对教师专业发展的意义表现在实践智慧为教师的自主专业发展开拓道路,实践智慧为教师的专业发展寻找新的支点,实践智慧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回归教师生命体验。

[关键词] 教师; 实践智慧; 专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 G4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4-0031-04

20世纪中叶,实践认识论的兴起,受到了教育界的普遍关注,并在教师教育领域引起了教育范式的转变,以舍恩、佐藤学、范梅南等为代表的教育学者,逐渐开始关注“实践”在教师专业成长中的意义。诚如艾森纳所说:知识在教师的教育实践生活中并不处于中心地位,“真正核心的是教师的实践本身,通过实践形成的是种问题解决的智慧,它是与每个具体情境相连的,它必须考虑到在实践中的各种复杂性,它依赖于随时生成的各种判断与决定,它根据各种不确定因素而发生改变,它关注各种特别事件,它随时会在过程中因需要而改变其原定目标”。^[1]从纯粹知识(Episteme)到实践智慧(Phronesis)体现了对“理论理性”、“技术理性”为导向的教师教育模式的批判与颠覆,体现了教师教育范式从知识论转向实践论。

一、教师实践智慧的界定

讨论教师实践智慧必须从实践智慧概念的产生处探寻其理论的逻辑起点。促成西方哲学实践论转向的是苏格拉底,但是,哲学上最早形成关于“实践智慧”系统思想的哲学家却是亚里士多德,他在古希腊逻辑思辨哲学传统中,敏锐地洞察到理论知识与道德践履之间存在的不连续性,理论与实践的异质

性决定了理论与实践的展开遵循不同的逻辑,因此,实践活动需要不同于理论知识的别的理性方式来指导,他把用来指导道德实践的理性方式称为实践智慧。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根据人类灵魂的功能和认识对象的性质,区分了3类知识形式:(1)纯粹知识(episteme);(2)实践智慧(phronesis);(3)技艺(techne)。纯粹知识,亦即理论智慧,其本质是对永恒不变存在者的认知性沉思,是人的理性在理论上的运用;实践智慧和技艺是对始终变化的存在者的筹划和行动,是人的理性在具体行动中的运用。所不同的是,实践智慧是以自身为目的的,亦即实践智慧与技艺相比的显著特点是其价值性,换句话说,实践智慧是对行动本身的善的追求,基本价值诉求是善。技艺是需要在行动之外寻找价值赖以显现的基础——目的,因此是工具性的,技艺的诉求是效能。据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智慧是“就那些对人类有益或有害的事情采取行动的真实的、伴随着理性的能力状态”^[2]。亚里士多德对实践智慧的诠释立足于3个维度:对象——具体实存的事物或情境、目的——行动本身的正当性或善、动力——面向实践的筹划与行动。这种理解框架为其后人们对实践智慧的理解奠定了基本的理解框架。

[收稿日期] 2012-03-11

[作者简介] 陈国庆(1969-),男,江苏宿迁人,江苏教育学院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现代研究者中,以里弗(Reeve,C. D. C.)为代表的研究者们认为,实践智慧就是对情景的感知、辨别与顿悟,是一个“动态的、顿悟的、灵活的概念,可以称之为实践顿悟”。以邓恩(Dunne,J.)为代表的研究者们认为,实践智慧“表征了那些知道怎样生活得更好的人”,是一种走向“善”的行动倾向,具有技术倾向所缺乏的道德意识,而且“实践智慧和道德品性是一种互惠关系”。金生鉉将实践智慧描述为:“在实践上知道怎么做的知识类型和推理形式,它不等同于任何脱离主体而存在的‘客观知识’,它是人在生活世界中知道怎样做的知识和经验。”^[3]赵瑞情、范国睿认为,实践智慧是一个人在确定与达成目标的实践过程中,在长期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基础上,根据一定的伦理价值,对正义的、善的、适宜的人与事作出合理判断与抉择的艺术;是一种应对事物、事件、过程、任务的能力;一种洞察、感悟、审视事物及其发展过程的能力;一种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一种科学的、技术的、推理的手段与方法。^[4]

虽然给“实践智慧”下一个能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精确的定义是困难的,但是我们依然能够循着上述研究成果的思路,在最宽泛的层面给实践智慧下一个操作性的定义:实践主体具有能够对具体情境做出即时、正当反应的理性能力。而教师实践智慧是指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教师具有对当下教育教学情境做出即时、正当反应的禀赋和艺术。

二、理解教师实践智慧的4个维度

我们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理解教师实践智慧:

1. 理解教师实践智慧的本质是理性。“智慧”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整体,在哲学意义上,智慧是“wisdom”,指人在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等方面所具有的睿智、学问、德性等;在社会学意义上,智慧是“sensibleness”,指人的思想和行为切合实际、合情合理合法、有效和实用;在心理学意义上,智慧是“intelligence”,指人的聪明才智,智力发达,思维有创造性,能够解决认识上的问题等。换言之,智慧是恰当支配人类认知和行动的理性能力。教师的实践智慧是人的理性在实践领域的应用,它与理论理性的最大差别在于它的境域性和个人性。境域性决定了实践智慧是面向实践敞开的、不断变化的经验体系,它不以追求普遍性的理论体系为目的;个人性决定了实践智慧抛弃公共知识的宏大话语,在面向个体的经验叙事中丰富和发展个体的行动智慧。

2. 理解教师实践智慧的起点是情境。实践是人与世界关联的纽带,实践的情境性强调人与世界的关联是充满戏剧性的,是人与世界不可预知的遭遇过程,在各种可能性的抉择中,体会世界的流变和生命的本质。因此,生存境遇是实践智慧产生的源泉,也是实践智慧的归宿。具体的教育实践本质上是一个聚合了各种异质要素的、充满复杂多变的混然发生的生活情境,这里有思想鲜活的学生个体,有无法掌控的外界环境,以及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教师实践智慧在于能够对教育情境和个人条件“审时度势”而后做出明智而合理的选择,而不是遵从某种先在的理论学说。伯明翰说:“实践智慧是处在特定时空所构成的情境之中,是与特定的任何事相关联的。在教育理论中,纯粹知识可以为实践智慧提供信息,但实践智慧决不是教育理论的简单应用,因为教育情境是如此的复杂、含混和不可预测,以至于不能等同于规则性应用。实践智慧需要的是与情境的特殊性相关的认知和思考。”^[5]

3. 理解教师实践智慧的目的是价值。与理论的求知本性不同,实践的本性是求善,因此可以说,“实践”本身就是一个价值的概念。教育问题不是发展的单纯生物与社会的事实,而是指依据一定的价值观作出取舍选择的有目的的行为,“从实践的观点考察,教育的本质就在于提升人的价值,是主体人的在生产。教育要实现的目的有两种,一种是使受教育者具有谋生手段的外在有限目的,更重要的是指向人的自我创造、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无限目的。”^{[6](PP. 113-114)}实践智慧是关于行动的艺术,它不仅仅是行动的技巧,更要能够赋予行动的理想和信念。拥有实践智慧的教师能够在与当下教育情境展开的对话中,对当下教育情境做出正当的理解与价值诠释,这种理解与诠释不是执着于寻找和验证教育学意义上的客观规律,而是为了从实际中拓展出一个自由的、充满意义的、关于人的整体世界,为教育教学实践树立正当的教育信念,促使教育回归到人的发展上来。

4. 理解教师实践智慧的逻辑是体验。“体验”可以被最简单地定义为:以直觉感知的形式获得对事物概念前的把握。体验可以说是非规定的思,是人把握自身与世界的一种方式,它消除了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它倾听着、感受着、领悟着,在主客体统一性中经历着生命过程和周遭世界的变化。”^[7]教师实践智慧所作用的对象是复杂多变的具

体教育教学情境，教育情境的变化并不遵守共同的规范与严密的逻辑，它是流动的、无始无终的、无法被概念规约的“活”的存在，这种“活”的属性决定了我们应该采取一种更为直接的关照方式回到事物本身，这种方式就是——体验。实践智慧遵循体验的逻辑与教育实践保持直接联系、与教师个体当下感性经验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个体性和体验性特征。因此，教师实践智慧是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通过体验、观察、反思等方式逐渐养成的知识禀赋和行动艺术，它常常以非编码的缄默状态存在于教师的行为图式中，具有鲜明的个人化和个性化的特点。

三、实践智慧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范式转变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教师专业化”概念的提出至今，教师专业化的形象和地位都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教师仍然“只是具有学科专业化却不同时具有职业专业化的群体”。^[8] 研究表明，影响教师专业化的最大挑战来自社会对教师专业发展水平和教师教育的成效持普遍的怀疑和批评的态度。在面向未来的教师专业化改革和研究中，教师个体的专业发展成为教师专业化的核心问题而被普遍关注。

什么是教师专业发展？传统教师专业发展理论侧重于教师内在知识和能力结构的改善，把教师专业发展的侧重点放在教师内在专业结构的丰富、充实和提升。如：霍伊尔(Hoyle, E.)认为：“教师专业发展是指在教学职业生涯的每一阶段，教师掌握良好专业实践所必备的知识与技能的过程。”佩里(Perry, P.)认为：“就其中性意义上来说，教师专业发展意味着教师个人在专业生活中的成长，包括信心的增强、技能的提高、对所任教学科知识的不断更新拓宽和深化以及对自己在课堂上为何这样做的原因意识的强化”。^{[9](P.223)} 事实上，教育的复杂性决定了教育实践不是教师展现知识、演练技艺的场所，而是教师实践智慧的体现过程。实际上，教师的专业成长和发展就是教师健全人格和教师实践智慧的成长过程。舒尔曼认为，“教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学术的专业’”，“一种复杂性的智慧工作”。^{[10](P.3)} 钟启泉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教师专业发展不是基于行为主义基础之上的教师能力本位的发展，而是基于认知情境理论的‘实践智慧’的发展。”^[11]

长期以来，我们在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理论和实践中，过分强调了理论的优先性，导致教师教育领

域理论话语的泛滥，无论是教育研究者还是教育实践者，常常希望通过建构“普适性”的教育理论，指导和改进教育实践。这种希望折射出自夸美纽斯以来，教育理论研究所秉持的基本信念：在教育领域中“存在着所有教室与所有教师普遍有效的程序、技术与原理；教师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掌握一般化的程序、技术、原理；寻求应用这种程序、技术、原理于各个教室之中的教学实践。”^{[12](P.333)} 基于这种信念，教师教育的所有目标、教师专业成长的全部内涵就理论知识的建构，教师专业成长的基本表征就是教学实践中理论的逻辑展开和应用。这种将教育实践理解为“理论的实践化”的观念，这就造成了一种本末倒置，这种倒置就是皮埃尔·布迪厄(Bourdieu, P.)所说的“学究谬误”(seholastiefallaey)：即将理论研究者用来说明实践所建构的理论模型倒置为各种实践的主要决定因素和真正起因，这种谬误亦体现在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评之中“将逻辑的事物错当成事物的逻辑。”^{[13](P.101)} 体现了技术理性语境下理论对实践的宰制。

因此，对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解必须实现范式的转变：从知识论转向实践论。实践是教师与生俱来的“内在的、生成的、动态的”根本品质，是教师的职业性格。立足实践理解教师专业发展，意在表明教师的成长过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积累，而是一门临床的、场域的、生成的、交往的、践行的专业实践。如果教师专业发展以教师的经验和体悟为基础，以教师自主发展为轴心，就需要结构性地转换教师专业发展的过程，为恢复教师的自律性开拓道路，正如艾森纳(Eisner)指出的，“教师教育必须做转变，从知识论(Epistelne)的培养观转向实践智慧(Phronesis)的培养观”。从世界教师培养和发展的趋势看，实践反思是未来教师培养的基本模式。知识在教师的教育实践生活中并不处于中心地位，“真正核心的是教师的实践本身，通过实践形成的是一种问题解决的智慧，它是与每个具体情境相连的，它必须考虑到在实践中的各种复杂性，它依赖于随时生成的各种判断与决定，它根据各种不确定因素而发生改变，它关注各种特别事件，它随时会在过程中因需要而改变其原定目标。”^[1]

四、教师实践智慧对教师专业发展的意义

回归实践视野的教师专业发展，把教师实践智

慧置于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地位,拓展了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对教师专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 实践智慧为教师的自主专业发展开拓道路。在知识论的语境中,知识的优先性被表述为“从理论到实践”的认知和行为模式。基于这种理念,教师被视为知识生产线的接受终端而被置于执行者的最底层,教师个体在教师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两个领域中失去了话语权和主动权。如果我们重视教师实践智慧在教师专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那么,教师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就会发展根本性的变化,教师实践不仅是理论的证明和应用,不仅是技术性的劳动,同时还是批判性和创造性的劳动,教师不仅创生知识,还发展智慧,教师专业发展本质上是教师个体自我成全和主动创造的过程。

2. 实践智慧为教师的专业发展寻找新的支点——教育实践。李长伟在《从实践哲学的角度透析近代教育学的分裂》一文中,精辟地论述了教育的本质是自足的实践,对实践的遗忘导致了自康德以来,近代教育学的分裂与沉沦。^[14]当教师教育热衷于建构理想的蓝图和概念体系时,教师专业发展失去了坚实的基础和可靠的支撑。教师专业发展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教师个体富有个性的成长过程,这个成长过程根植于教师基本的、具体的教育实践中。教师发展的根本和目的都在教育实践,教师专业发展的成功并不体现在造就一个满腹经纶的理论家,而是培养能够对当下教育情境所施与的实际的改善和提高的行动者。从知识论向实践论的转变,教师专业发展获得了一个新的支点——教育实践。

3. 实践智慧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回归教师生命体验。长久以来,我们在重视教育激发学生生命体验的同时,忽略了教师也有自己的生命体验。“对教师生命体验的漠视,也常常成为制约教师发展的‘命门’”。^[15]教师的教育实践和生命实践是两个不可分割的过程,对于教师而言,真正的智慧在于洞察:教育不仅仅是一种工作,更是一种生命历程,一种丰富和完善生命的体验、提升生命品质和生命境界的过程。回归

教师的生命体验,首先是尊重教师在专业发展中整全的生命个性和真实的生命体验,使教师专业发展与生命感悟融为一体;其次是理解教师专业发展在提高教师教学胜任能力的同时,也提升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帮助教师实现生命的价值和超越。

[参 考 文 献]

- [1] Eisner, F. W. From episteme to phronesis to artistry in the study and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J].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002 (18).
- [2] 邓友超,李小红. 论教师的实践智慧[J]. 教育研究, 2003(9).
- [3] 金生鈴. 教育哲学是实践哲学[J]. 教育研究, 1995 (1).
- [4] 赵瑞情,范国睿. 实践智慧与教师专业发展[J]. 教育导刊,2006(7).
- [5] 程亮.“实践智慧”视野中的教育实践[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9).
- [6] 鲁洁. 道德教育的当代论域[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 [7] 孙利天. 21世纪哲学:体验的时代? [J]. 长白学刊, 2001(2).
- [8] 杨启亮. 体验智慧[J]. 江西教育研究, 2003(10).
- [9] 叶澜,等. 教师角色与教师发展新探[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 [10] 教育部师范教育司. 教师专业化的理论与实践 [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 [11] 钟启泉.“教师专业化”的误区及其批判[J]. 教育发展研究,2003(4).
- [12] [日]佐藤学. 课程与教师[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 [13] [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引论[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 [14] 李长伟. 从实践哲学的角度透析近代教育学的分裂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9).
- [15] 李政涛. 心在哪,智慧就在哪[J]. 人民教育, 2008 (23).

(责任编辑 陈晓姿)

ESP 教师专业化发展途径^{*}

孔繁霞

(南京农业大学工学院, 江苏南京 210031)

[摘要] ESP 教师队伍培养与专业发展的关键应根据 ESP 课程与教学的特点, 制定并形成一套完善的 ESP 教师专业发展体系。这包括建立完善的 ESP 教师专业化发展制度, 提升教师专业化自主发展的意识, 创设大学英语教师与专业教师间的合作共同体, 最终达到 ESP 教师专业化发展的目的。

[关键词] ESP; 教师; 专业发展; 路径

[中图分类号] G45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4-0035-03

ESP 将成为大学英语教师专业知识新的发展方向, 基础英语教学的重点将逐渐由高等院校转向中学教育, 而大学英语的教学重心也将逐渐向专门用途英语教学方向转移与发展。在这一大学英语教学重要的转型期, ESP 教师的质量问题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大学英语教师要积极应对并对自身现有的知识结构进行梳理, 结合本院校其他专业的课程, 探寻自己的专业发展方向并做出必要的调整。Robinson, Jordan 等学者认为“专门用途 ESP 教师的关键素质是其具有灵活性, 即灵活地从普通语言教师向专门用途英语教师转型, 同时要有适应性, 即适应不同学生群体的学习需求 (Robinson, 1991; Jordan, 1997; Swales, 1985)。

一、ESP 教师专业化发展的特点

Tom Hutchinson 和 Alan Waters 认为: ESP 教师身兼不同的角色, 除了语言教学外, 还要根据学生的需求, 针对不同的专业进行课程设计及教材的编写, 并进行教学评估。可以说, ESP 教师更需要具备综合的教学与研究能力, 能够承担起 ESP 教师作为研究者、管理者、评估者的职责。因此, 大学英语教师要积极转变观念, 主动对自身的知识与结构进行调整, 根据 ESP 教学与课程的特点向 ESP 教师专业化

发展, 具备多方面的素质。

1. 具备英语与其他专业学科的知识。

最基本的要求是 ESP 教师应具备教学所涉及的专业知识。大学英语教师应调整与补充专业知识, 弥补在专业知识结构方面的缺陷, 加强 ESP 教学技能技巧。我们知道应在公共语言教学的语境下看待 ESP 教学, 这一点不仅适用于教师角色, 同样也适用教学材料和教学法。然而, EGP 教师与 ESP 教师的工作的实践方法是不同的。ESP 教师角色由几部分组成, 实际上, Swales (1985) 比较合理地倾向于使用“ESP 实践者”这个词而不是“ESP 教师”这个词来探索这一领域。除了具有在课堂教学的教师正常职能, ESP 教师还需要处理需求分析, 设计教学大纲, 编写教学材料, 改编和评估。ESP 教学不同于 EGP 教学之处在于绝大多数的 ESP 教师同样也没有接受培训, 他们需要把自己定位在一个新的他们准备并不充分的环境。

2. 具备教育学与心理学的专业知识。

ESP 教学的目的与课堂管理方式不同, 大学英语教师长期从事基础英语的语言教学, 重点是如何保证学生顺利通过英语四、六级考试。而 ESP 的教学目的是满足不同专业的学生的学习需要, 大学英

*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外语”专项课题“基于‘行动研究’的 ESP 教师专业发展研究”(项目编号: Y-b/2011/03)。

[收稿日期] 2012-04-24

[作者简介] 孔繁霞(1963-), 女, 江苏南京人, 南京农业大学工学院副教授。

语教师应适应 ESP 课程的学生的需求。ESP 教师需要从一系列的可供选择中提炼和综合出最适合某些特殊情境的教学方案。这就需要教师具备一定的教育与心理学知识,用健全的英语语言教学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知识做出一系列的决策。事实上,所有 ESP 教师都是构建 ESP 领域的开拓者。

3. 具备教育教学的专业精神。

ESP 教师的要求与大学英语教师的要求略有不同,英语教师应在自己原有的熟练的语言和教学技能基础上,积极主动地在 ESP 教学过程中寻求自我发展,对发展要有“自我意识”而不是被动地补缺自身的不足。当然,ESP 教师除了具备最基本的素质外,还应对 ESP 课程发展与教学形成一种专业理念,即将 ESP 教学视为自己的发展与专业方向,追求 ESP 教学的发展,最终从大学英语 EGP 教师成功转型为 ESP 教师。在 ESP 教学过程中,针对不同的专业知识,以发展自身专业素质的态度不断学习,要有终身学习的意识。

二、ESP 教师专业化制度的建设

1. 建立 ESP 教学专业标准体系。

制定相应专业知要求,包括英语语言知识和有关的专业知识。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ESP 教学是以英语为基础,为其他专业服务的课程。它仍然是英语语言教学的一个分支,只是在不同专业范围内英语语言的一种变体,为此 ESP 教师必须熟练掌握英语语言。ESP 教学同时又涉及不同的专业领域,例如商务、金融、新闻、工程、机械、医学、物流、管理等等,ESP 教师还要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或有从业经验,并结合任职资格对其专业知识进行评估。ESP 教师应掌握与教学所需要的相关知识和教学方法;ESP 教学专业标准的建立既有效提高 ESP 教师教学质量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衡量 ESP 教师专业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教学专业标准应根据 ESP 课程发展不断加以修正。

2. 建立相关的 ESP 教师任职资格制度。

目前,在中国还没有形成和建立 ESP 教师的任职资格标准。政府有关部门可组织进行 ESP 教学的教师相关专业任职资格证书的考试,或在各高等院校制定 ESP 教师专用的任职资格条件规定,以区别于大学英语教师。制定 ESP 教师资格任职制度时,我们可以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来指导我们的工作。例如,在澳大利亚,ESP 课程教师的专业经验、行业和职业教育经验是主要的任职标准。讲授

市场营销英语的教师要求有外贸或市场业务的经验,或至少参加过相关的培训。

3. 制定 ESP 教师的专业实践要求。

ESP 教师应根据不同专业的课程需求组织教学材料、编写教材并进行必要的教学评估,教师承担了教学管理者的责任。ESP 课程改革对大学英语教师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ESP 课程理念在实践中的落实首先需要我们去认可和发展教师实践性知识,关注教师的经验和教学实践,建立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机制,促使参与到 ESP 课程改革情境中的教师发掘自身的实践经验,找到自己知识的生长点和自我专业发展的空间。熟悉专业词汇,学习专业知识;对相关学科的现状与发展、实践运用等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样有助于教师比较清楚了解学生在 ESP 课程学习时已经具备了哪些专业知识。

三、ESP 教师自主发展意识的涵养

1. 形成“自我”“自主”发展意识。

教师专业发展的过程是教师自身为提升其专业化的水准与专业知识的一个重要过程,教师经过自我意识而进行的各项教学活动也是其自身专业化学习的一个历程,这个过程可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并可有效改进教学效果,最终达到提高学生知识学习的效能。为此,可以增强教师自我发展的信心,激发他们建构 ESP 教育知识的热情,促使大学英语教师教育和教学研究朝向 ESP 的方向发展。

从对教师发展的观点来看,其中最为关键的两个词为“自我”。而教师的自我发展意识是其专业发展的根本。这是因为“自我”意识“意味着人不仅能把握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而且具有把自身的发展当做自己认识的对象和自觉实践的对象,人能构建自己的内部世界。只有达到了这一水平,人才在完全意义上成为自己发展的主体”^[1](P.217-218),“独立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能力的形成,它把个体对自身发展的影响提高到自觉的水平。这是一种影响性质的变化,不纯粹是强弱、大小的变化”^[1](P.219)。ESP 教师更应充分挖掘自身潜力,依靠自身能力,把自我发展作为 ESP 教师专业发展的最重要模式。

2. 认识教师专业发展的动态过程。

ESP 教师在必须具备专业自我发展的意识基础上,还要不断顺应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变化。教师具备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发展的意识,才会自觉自愿地采取相应的促进自我发展的措施,从而实现不断超越自我,提升自我价值,获得专业满足感,

达到 ESP 有效教学的目标。教师应该如教师教育研究者 Zeichner 所倡导的那样,铭记教学应是教师生涯的全部过程,教师不论计划做什么,或不论做得多么出色,也只能说是为教师的教学工作做些准备。因此,教师及教育工作者应该有责任和义务进行教学安排,进行知识的内化与吸收,研究教学并加以反思,从而更擅长教学。

四、ESP 教师合作共同体的创设

1. 建立教师之间相互联系、尊重和合作的关系。

在 ESP 教学中,英语语言的基本知识和相关专业知识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通常情况下,ESP 学习者最大的困难并不是缺乏单纯的专业知识或英语知识,而是难以将这两种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做到融会贯通。为了满足学习者特定的需求,ESP 教师应当积极主动地与专业教师进行合作。ESP 教师、专业教师和学习者之间形成一个相互的关系,相互间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各方的把持。通常是 ESP 教师要求专业教师参与课程教学,这就要求两方教师努力创建和谐的工作环境,其中任何一方都要借助其余两方的反馈意见。ESP 教师与专业教师之间最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合作应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在专业教师的帮助下,通过分析学生的需求,专业教师能够帮助 ESP 教师对学生的目标情景 (target situation) 有足够的认识,同时,ESP 教师能使专业教师更多地意识到学习者所面对的语言问题。

2. 建立相互间“同事性”的协同教学关系。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是以教学的创造为核心展开,而推进 ESP 教学的基础在于建构教师间切磋教学、相互学习的“同事性”(collegiality)。从内部推进改革,在教师中形成共同成长的“同事性”。倡导教师进行集体的持续的合作研究,真诚而执著地琢磨课堂中的现实问题,而非在抽象的理论或道理方面争论不休。倡导大学教师间的合作对作为“学习共同体”的学校来说,是教师、专家共同学习的场所。ESP 教学发展方向赋予了大学英语教师与专业教师参与 ESP 课程的开发和课程管理的权利,以此加强教师之间的交流。

五、ESP 教师培训体系的完善

1. 建立与完善“校本”培训机制。

“校本”(school-based) 培训是我国教师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校本培训可通过不同的阶段和形式进行,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确定需要。任何培训意向首先是来自学校的需求,学校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提高教师教学的能力,就会相应实施有针对性的培训。第二,主体培训。通过大学英语教师与相关专业教师共同备课,针对 ESP 课程教学的难点和关键,选择适当的教学方法,设计教学模式。ESP 教师培训还可以采取适当的方式选取培训内容,并根据学校的实际需要不断地作出相应的调整与补充,通过课题研究、合作教学、教师间的相互观摩与交流、各种形式的短训班、讲座、研讨等形式来进行。培训主要进行语言培训 (language training) 和专业培训 (professional training), 使专业教师提高英语语言知识技能,促使大学英语教师对所教专业的专业知识和基本内容加强了解。从专业知识结构、学科发展、学习者群体的特征变化来补充和提高执教者的教学水平,注重加强英语教学法及教育理论等方面培训。

2. 开展院校与企业之间“双向”培训项目。

采用聘请企业专家来学校讲课或安排教师到企业去培训的方式。ESP 教师应主动到一些企业参加专业技能培训,并结合 ESP 课程的特点参加有针对性的培训。实时关注相关行业动态,与行业中的从业者积极进行沟通和交流。

ESP 教学与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实施大学英语四、六级后的专业英语教学势在必行,从宏观角度来看,急需一支合格的教师队伍。ESP 教师作为教授专门用途英语的教师,从教师个人出发,加强专业和语言知识的学习,必须与专业教师合作,参与教材设计,具备跨学科的知识,由大学英语教师的“通而不精”发展成“教有所长”的 ESP 教师。

[参 考 文 献]

[1] 叶澜. 教育概论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

(责任编辑 师语)

教师同感的研究进展综述

孙 敏 柏 豪 叶 兆 宁

(东南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中心, 江苏南京 210096)

[摘要] 同感是指对他人情绪和精神状态的理解及对其行为的推测的能力。教师的同感能力对学生的健康成长与发展有重要的作用, 对教师身心的发展也起到关键作用, 西方教育中一直把教师同感作为值得关注的领域。本文从教师同感的定义和成分出发, 分析教师同感的研究现状和进展, 总结得出应重视教师同感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 并提高教师的同感能力。

[关键词] 同感; 教师同感; 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 G4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4-0038-04

一、教师同感的内涵

“同感”一词译自英文“empathy”, 国内心理学界一般翻译成“移情”或“共情”, 其本质是对他人情绪的一种感同身受, 同时发生同感的个体必须能区分这种情绪源自他人而非自身。笔者在本文中采用“同感”一词。

Edward Titchener于1909年创造了英文词 empathy来取代德文单词“Einfühlung”, 并把它定义为“把客体人性化的过程, 感觉我们自己进入别的东西内部的过程”^[1]。这个定义表明同感通常被看作通过站在他人角度思考或体会他人情绪。Batson(1987)将同感定义为对他人痛苦的一种见证, 这种见证导致个体产生关心、同情等情绪体验;^[2] Eisenberg 和 Fabes(1990)等人则认为同感是一种与他人的感受相同或相近的情绪性反应, 这种情绪性反应来自对他人的情绪状态的认知;^[3] Hoffman(2000)认为同感是知觉到他人情绪状态后所产生的一种感同身受的情绪反应。^[4]因此, 心理学家普遍认为同感是亲社会行为、攻击性行为以及社会偏见等社会行为的决定性条件。^{[5][6]} Singer(2006)认为同感是指对他人情绪的理解及对其行为的推测, 同时指出同感的特征包括: 产生同感的人处于一种情绪状态下, 这种情绪与同感对象的情绪是同形的, 这种情绪源于对同感对

象的观察或模仿, 产生同感的人能意识到当前情绪源自他人而非自身。^[7] Singer对同感的定义及其特征的界定是当前心理学界普遍认可的。

在教育领域中, 教师同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 研究者很早就开始了对教师同感能力的研究。Rogers(1975)认为教师同感是指教师能够站在学生的立场上来体验他们的感受。^[8] Peart 和 Campbell(1999)将教师同感定义为教师能从学生角度出发考虑问题, 能够感同身受地体会与思考学生的感受与想法, 从而以适当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在各个方面成长。^[9] Sharon 和 Carolyn(2007)将教师同感界定为教师向学生表达关注和观点采择的能力。^[10] 教师的职业特征决定了其工作具有较强的助人性, 因而教师能否与学生建立互相理解、相互信任的良好师生关系是其处理各种教育问题的关键。先前研究表明, 教师的同感能力对师生关系、师生沟通方式与效果以及课堂气氛都会产生显著的影响。^[11] 在教育领域中, 学生类似于来访者, 教师则类似于咨询者或治疗师, 教师同感会让学生获得更多的理解和认可, 而他们将因此发展对自己和学校教育的更积极的态度。教师同感的关键在于教师与学生间的交互作用, 通过教师与学生的交流使教师理解学生的感受, 学生会感受到更多的接纳。正如 Carkhuff 和 Berenson(1967)认为来访者产生对咨询者和治疗环境的

[收稿日期] 2012-04-24

[作者简介] 孙 敏(1987-), 女, 山东枣庄人, 东南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依赖,^[12]我们相信经历过与教师进行深刻交流的学生也会对教师和学校教育产生依赖。高同感能力的教师能透过学生的肢体语言、微表情等外显行为,迅速准确地理解学生的真实想法、内在情感和行为动机。高同感能力的教师倾向于关注学生,观察学生,倾听学生的想法,关注学生间的个体差异,洞察学生思维和情感的变化,主动地了解学生,他们的同感行为有利于教学目标的达成以及促进学生各方面的成长。因此,Decety 和 Lckes(2009)指出同感是一种与教育过程和教育成果均高度相关的属性。^[13]

二、教师同感的成分

对同感成分的界定,是同感研究领域中争议较多的部分。Gladstein(1983)提出了同感的两成分理论,认为同感包括情绪同感(affective empathy)和认知同感(cognitive empathy),情绪同感是指对他人的—种替代性情绪分享,即感受他人正在体验的情绪;认知同感是指对他人的想法、意图进行理解,并由此推测其未来的行为。^[14] Davis(1983)建议把同感看成多种成分构成的复杂结构,他认为同感由4个成分构成:观点采择(perspective taking)、想象(fantasy)、同感关注(empathic concern)和个人痛苦(personal distress),其中观点采择是同感的认知成分,同感关注则是同感的情绪成分。^[15] Feshbach(1990)则认为同感由一个情绪成分和两个认知成分组成:情绪成分是情绪反应的能力,认知成分是辨认及命名他人情绪状态的能力和观点采择的能力,同感是三种成分相互作用的结果。^[16]

具体到教师同感的成分,Rogers(1975)提出了教师同感模型,认为教师同感包括两个方面:理解、认同他人情感和观点的能力,对同感对象表达领会的交流能力。^[8]这个模型是依据当事人中心模型和人类的成长发展理论提出的。

Becky 和 Barry(2002)通过对大量教师及学生的访谈和开放式问答认为教师同感可大致分为教师支持(teacher support)和公正(equity)。教师支持指教师对学生进行无偿帮助的行为的总和,使学生感受到来自教师的关心和支持。教师支持包括:交流沟通,关心学生的感受,帮助学生解决困难,教师期望。公正指教师能公平对待学生,关注每一个学生。^[17]

Cooper(2004)通过访谈与课堂观察发现教师同感在教学过程中体现在诸多方面。他认为教师同感可以大体分为基础同感(fundamental empathy)、功能同感(functional empathy)和深层同感(profound empathy)。^[18]基础同感包括开启师生间同感联系所需的基本特征和沟通方法。随着时间的增

加,基础同感可以发展为深层同感。深层同感即通过与他人的社交以及历史关系和外部环境来深刻理解他人。深层同感最主要的特征是教师能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掌握学生状态营造一个开放式的教学互动环境来帮助学生更好地接受知识。功能同感在某种程度上是学校学习环境的产物,它与同感的受限条件联系紧密,它使教师能结合社会、历史文化进而更深入地了解学生。Cooper用下图表示出教师同感的成分(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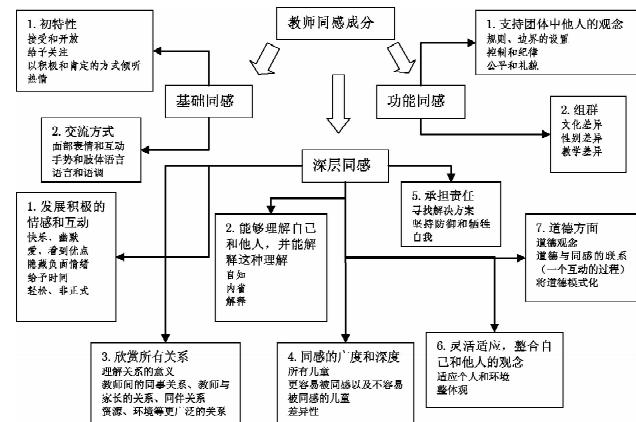


图1 教师同感的部分

三、教师同感的研究现状

1. 教师同感对学生的学业和态度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Aspy(1971)以及Chang, Berger 和 Chang(1981)的研究均证实了教师同感和学生的学业成绩呈正相关关系。^{[19][20]} Rogers(1975)的研究表明,同感能力高的教师能够营造一种促进学生学习的课堂气氛,从而改善学生的学业表现。^[8]同样,教师同感对学生的态度有积极的影响也得到了证实:Wubbels等人(1991)发现,具有高同感能力的教师更善于与学生沟通,师生间的沟通方式也更容易被学生接纳,使学生感到被认可与被理解,从而促进学生的主动学习,改善学生的学习态度;^[21] Chang(2003)的研究则表明孤僻学生在班级中被同伴接纳的程度与教师对孤僻学生的同感有关。^[22] Myrick(2003)在研究中发现,教师同感对课堂气氛、师生关系及师生间的沟通方式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同感能力高的教师对学生的社交、学业及生涯发展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11]

2. 教师的同感能力有待提高。Craig(2000)的研究发现,教职员很少对在学校中受到伤害的学生表现出同感反应。^[23] Cooper(2004)的研究表明教师在受压制的环境中很难对学生表现出同感反应。^[18]尽管教师非常想关注学生,但他们经常会受到工作环境的限制。教师与学生的接触频率较低,因为学

生数量较多,而教师的时间相对紧迫。Sharon 和 Carolyn(2007)采用模拟叙述图片刺激的方法来研究师范生的同感倾向,结果表明只有少数师范生对图片中的受害者表达同感。^[10]

3. 教师对学生的同感存在熟悉性偏好。Hoffman (1982)认为同感存在熟悉性偏好。^[24]研究表明,越熟悉一个人,也就越能理解他的观点和想法。孙炳海(2008)的研究表明,在观点采择分量表与同感总分上,中等生对教师同感的判断显著低于后进生及优等生。^[25]由于优等生受到教师的青睐,他们与教师的互动更频繁更亲密;后进生经常捣乱而引起教师更多的关注;而中等生由于人数较多,且在学业上不是最突出的,又没有一些出格的行为来引起教师的关注,所以通常不被教师重视。

4. 教师同感能力评测工具的局限性。教师同感能力的测量方法有很多种,包括问卷量表法、情境法、行为分析、生理测量法等,其中最常用的测量方法是量表法。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同感能力评测量表是由 Davis(1980)编制的人际反应指标(The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及其改编版本。由于同感既是个体的一种倾向也是一种行为表现,自我判断往往根据内在体验,而他人评价往往根据外在的行为表现,因此社会赞许特别容易使同感自我报告的测量结果产生偏差。孙炳海(2008)对教师同感的自我判断与学生判断的得分进行比较,在不区分学生类型的前提下,对学生与教师相对应的分数进行配对,结果发现教师同感的自我判断在同感总分、观点采择与同感关注上都显著高于学生的判断。^[25]

四、教师同感能力的培养与提高

各种各样的技术已经被证实可以有效地增强教师的同感能力,从角色扮演(Kelly, Reavis&Latham, 1977)、人际关系训练(Higgins, Moracco&Danford, 1981)和道德两难处境讨论(Black&Phillips, 1982)到人际沟通能力发展(Warner, 1984)、积极倾听和辨识情感的培训项目(Kremer, Dietzen, 1991)。^[13]大多数的培训项目包含着复杂的、多层面的方法,使特有的训练成分与同感能力的提高之间的联系变得模糊。对培训项目最主要的要求就是使教师同感能力的提高与教室内学生的行为以及学业联系起来。其中一个例子就是 Harbach 和 Asbury(1976)发现教师人际关系和社会理解的训练使教室内学生的消极行为减少。^[26]与之有密切联系的是 Sinclair 和 Fraser(2002)的研究证实以提高同感能力为目的的训练使课堂环境好转。^[27]对观点采择的训练是一个传统的教育策略,它也可以提高同感能力(Feshbach, 1984; Pecukonis,

1990; Feshbach&Konrad, 2001)。^[13]另外,用于训练的材料也是一个主要因素,儿童和成人都倾向于对使人烦躁不安的内容作出同感反应。很明显,观察不幸的情景可以引发同感(Perry, Bussey&Freiberg, 1981; Barnett, 1982)。^[13]有趣的是,音乐训练也会引发同感反应。芬兰的一项研究证实,经过12小时的音乐活动(唱歌、演奏乐器、听音乐诗等)的培训后,被试的同感反应明显增多(Hietolahti-Ansten & Kaliliopuska, 1991)。^[28]

五、小结

综上所述,教师同感对教育过程的影响无论在研究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仍然处在起步阶段,甚至大多数教育工作者并未意识到教师同感能力对教育过程的重要性。因此在教师同感的社会潜能完全实现之前,仍然会存在大量的研究缺口和挑战,而且也还没有系统的研究来确定是什么在干预同感反应以及对同感的哪种成分干预作用最大。如何根据实际情况,结合不同的同感理论设计培训,使得参加培训的教师同感能力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是研究者亟待解决的难题。21世纪的教育正面临着教师角色和功能的转变,教师不再是知识的传授者,而是学生学习的支持者和组织者,即要求教师能更多关注学生认知和情感的变化。笔者相信教师角色的转变必将促使教师同感的研究成为教育领域的热点问题。

[参考文献]

- [1] Duan C, Hill C E. The Current State of Empathy Research [J]. Journal of Counsel Psychology, 1996(3).
- [2] Botson C D, Fultz J, Schoenrade P A. Adult's emotional reactions to the distress of other's [A]. In: Eisenberg N, Strayer J, eds. Empathy and Its Development [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3] Fabes R A, Eisenberg N, Miller P A. Maternal correlates of children's vicarious emotional responsiveness [J]. Development Psychology, 1990(4).
- [4] Hoffman, M. L. Empathy and moral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for caring and justice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5] Zhou Q, Eisenberg N H, Losoya S, et al. The relations of parental warmth and positive expressiveness to children's empathy related responding and social functioning: A longitudinal study [J]. Child Development, 2002(3).
- [6] Boston P, Towers A, Barnard D. Embracing vulnerability: Risk and empathy in palliative care [J]. Journal of Palliative Care, 2001(4).
- [7] Singer T. The neuronal basis and ontogeny of empathy

- and mind reading: Review of literature and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J]. *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ioral Reviews*, 2006(6).
- [8] Rogers CR. Empathic: An Unappreciated Way of Being [J].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1975(2).
- [9] Peart N. A., Campbell F. A. At-risk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teacher effectiveness [J]. *Journal for a Just and Caring Education*, 1999(3).
- [10] Sharon Tettegah, Carolyn J. Anderson. Pre-service teachers' empathy and cognitions: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ext data by graphical models [J].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07(1).
- [11] Myrick R D. Developmental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apraeitical approach [M]. Minneapolis, MN: Educational Media Corporation, 2003.
- [12] Carkhuff, R. , & Berenson, B. G. Beyond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Winston, 1967.
- [13] Jean Decety, William Lckes. The Social Neuroscience of Empathy[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9.
- [14] Gladstein G A. Understanding empathy: Integrating counseling, develop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perspectives [J].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1983 (4).
- [15] Davis M H. Measur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empathy: Evidence for a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3(1).
- [16] Feshbach N D. Parental empathy and child adjustment/maladjustment [A]. In: Eisenberg N, Strayer J, eds. *Empathy and Its Development* [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17] Becky B, Barry J. Empathy as Related to Sex, Personal Qualities, Clinical Competence, and Career Choice [J]. *Empathy in Patient Care*. 2002(3).
- [18] Bridget Cooper. Empathy, Interaction and Caring: Teachers' Roles in a Constrained Environment [J]. *Pastoral care in Education*, 2004(3).
- [19] Aspy, D. N. Helping and intellectual functioning. In R. R. Carkhuff (E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esources, education, psychology, and social change* [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71.
- [20] Chang, A. F. , Berger, S. E. , & Chang, B. The relationship of student self-esteem and teacher empathy to classroom learning [J]. *Psychology: A Quarterly Journal of Human Behavior*, 1981(4).
- [21] Wubbels T, Brekelmans M & Hooymayers H. Interpersonal teacher behavior in the classroom. In B. J. Fraser&H. J. Walberg(Eds.) *Educational environments: evaluation,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M]. oxford, England: Peamon Press, 1991.
- [22] Chang, L. . Variable effects of children's aggression, social withdrawal, and prosocial leadership as functions of teacher beliefs and behaviors [J]. *Child Development*, 2003(2).
- [23] Craig, Henderson, Murphy. Prospective teachers' attitudes toward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J]. *International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2000(1).
- [24] Hoffman, M. L. Development of prosocial motivation : empathy and guilt . In N Eisenberg (Ed) , *the Development of Prosocial Behavior*[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2.
- [25] 孙炳海, 於丽娜, 黄小忠, 冯小佳. 教师的共情偏好: 自我判断与学生判断的一致性研究[J]. 中国特殊教育, 2008(11).
- [26] Harbach, R L & Asbury, F R. Some effects of empathic understanding on negative student behaviors. *Humanist Educator*, 1976(1).
- [27] Sinclair, B. B. , & Fraser, B. J. Changing classroom environments in urban middle schools [J]. *Learning Environments Research*, 2002(3) .
- [28] Hietolahti-Ansten, M. & Kalliopuska, M. Self esteem and empathy among children actively involved in music [J]. *Perceptual and Motor Skills*, 1991(3).

(责任编辑 师语)

对教师评价的冷思考

——基于存在主义视角

马志芳

(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江苏扬州 225002)

[摘要] 反思我们的教师评价, 它以总结性和行政性评价为手段, 强调评价的甄别功能, 在评价过程中教师的话语权丧失, 绝大多数教师参与评价的机会较少, 评价标准的过于理性化阻碍教师个性化发展。存在主义哲学关注人的存在, 体现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 以存在主义哲学为视角, 为教师评价指明人性化、主体化、个性化的人道主义改革方向。

[关键词] 教师评价; 存在主义; 评价改革

[中图分类号] G4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4-0042-03

“哲学是一种视界”^[1]这一观点可以提供给我们全新的思维方式, 置于哲学视野下重新审视我们的教师评价, 给我们带来全新的视角。存在主义作为关注人自身命运的哲学, 重视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 注重现实人生, 并以“人”作为自己哲学研究的对象和出发点。存在主义是在批判现代西方理性化、科学化的基础产生的, 旨在改革它所宣称的包括实用主义在内的传统教育, 为我们的教师评价指明人性化、主体化、个性化的人道主义改革方向, 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新的视野。

一、对教师评价的反思

1. 教师评价目的过于理性化。

长期以来, 我们确定教师的评价目的是根据社会的需求去同化个体, 使他们成为服务于学校教育的工具。在这种价值取向的规范下, 仅把教师定位在自觉或机械的“听话人”的角色上, 而忽视了教师所具有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具体表现为, 在评价过程中, 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将人的社会化与个性化对立起来, 忽视在实现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实现人的个性化的过程。在现实中, 对教师的评价, 我们过于强调客观性、对象性, 评价目标的设定和评价过程

过于理性化。导致在评价中, 注重对教师结果的评价, 过程评价较为缺失, 这种总结性的、行政性的评价, 一般在学期末或学年末进行, 重视教学效能的核定, 教师评价仍然没有摆脱以分数和升学率论高低的困境。教师评价的主要目的是甄别, 为教师的解聘、晋升、调动、加薪、奖金发放提供依据。评价的过于理性化倾向, 使得在评价过程中较少考虑来自底层教师的声音, 不能对每个教师进行客观、公正、人性化的评价, 因此, 教师评价对被评教师的改进作用不大, 有时由于教师与评价者之间的关系紧张, 导致教师对评价产生不信任感, 甚至导致他们以敌意的态度看待教师评价。

2. 教师评价主体过于单一化。

在现实世界中, 教师专业发展的评价话语权大体有3类: 第一类是由行政管理者发出的权势性评价话语, 第二类是由专家学者制造的各种学术话语, 第三类是由教师自己所发出的个人话语。^[2] 在传统的评价中, 诠释性评价话语和各种学术话语相互支持, 教师的个人话语往往被忽视。运用到具体的教育评价中来, 体现为专家和学校领导组成评价者, 他们运用标准化的尺度对教师进行分析、观察, 评价者

[收稿日期] 2011-09-11

[作者简介] 马志芳(1980-), 女, 江苏南京人, 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与教师的关系是“支配——服从”的关系。绝大多数教师没有机会参加到评价的过程中来，在评价过程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评价者对评价对象的评价是一种“缺席的审判”，一般不让评价对象出席评价自己的现场，甚至被评者无法接触评价自己的材料。这种单向评价的方式使教师习惯于以他人、外界的方式来证明自己职业的合理性和自身存在的价值性，他们也就在不知不觉间放弃了自身的话语权，必然成为失语者，沦为教师评价中的接受者。^[3]当教师经常处于被评价者的地位时，他们极易忘却自我，迷失自我，处于他人发号施令的范围之内，常常以他人的身份考虑自己，筹划自己的职业发展，放弃了自己思考的独立性。

3. 教师评价标准过于统一化。

在“自然的思想态度”的指引下，对教师评价的标准建立在科学化的基础上。所谓“自然的思想态度”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科学研究工作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对待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思想态度。在认识论中，这种态度最典型的表现是只关注认识的客体，不关注认识的主体，或者说用对待客体的方法对待主体。^[4]这种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将理性夸大成唯一的、无限的认识方法，对教师的评价目标定位为大批量生产某种特定类型的劳动力，它牺牲教育目标本身的丰富性、独特性，是一种“不见人”的教师考核方式。对教师评价的理性化从本质上讲是教师在评价制度中处于客体地位，与现今学校管理中的“科层等级制”相一致，教师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中毫无主体性可言，这种评价以提高教学效率为导向，评价管理者成为教师的监督者，机械化的毫无情感的评价标准无人性化、个性化可言，它把人训练成工具，是对人性的异化。这样的评价导致部分教师对评价结果产生怀疑，抑制教师的积极性，阻碍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二、存在主义视角对教师评价的启示

1. 对理性至上的批判有助于确立科学与人文精神相融合的评价目的。

存在主义哲学一反传统哲学的观点，认为哲学应该以人为出发点，研究人的存在。在存在主义看来，个人的存在是最根本的，占首要地位的，并以此作为其全部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海德格尔声称“人的问题就是全部的存在主义”，哲学是研究具体的人学。^[4]存在主义反对西方现代社会的异化现象，反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他们认为，人是活生生的富有感情的存在，哲学问题最终应回归到人，强调

个体的实际存在。他们反对人作为认识能力的存在物之传统，而把个体视为不仅有认识能力，而且具有感情、具有意识的人。^[6]用这种哲学观关照教师评价，有助于教师评价主体性价值观的确立。教师评价的目的应回归到人，以促进教师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存在主义反对人是社会工具，因此教师评价的目标应在理性化的基本上具有人性化、情感性，以帮助教师成长作为评价的终极目标。只有以这样的目标作引领，才能消除教师对评价的焦虑和敌意。

存在主义体现出浓厚的人本主义思想，与其他非理性主义思潮一样，拒斥人是理性判断的动物，重视人的情感体验。萨特主张“把存在物还原到它的表象，以消失一切的二元论”^{[7](P.246)}，不仅考虑认识的对象，而且考虑认识的主体。因此，真正意义上对教师的评价是一种整体性评价，达到逻辑与直觉、理智与情感之间的相辅相成。相反，如果我们以二元对立的理性化评价标准去评价教师，他们就会被迫，或自认为是被迫去按照规定的标准去发展自己，在这样的评价标准下，教师只能是被理性化的标准所异化的“教书匠”。我们对教师评价的目的不是令其适应，而是促其发展。如果说“教育是灵魂的转向”，那我们的评价就是促进教师灵魂的转向，我们的评价目的要关注灵魂，关注教师的成长，使他们成为有灵魂、有信仰的人，我们所追求的教师评价要最终回归到人，以人本关怀为手段，以促进教师成长为目的。

2. 对评价主体单一性的质疑有助于构建“交互主体性”的关系。

海德格尔继承了胡塞尔晚年提出的交互主体性思想，强调人的共在性，坚持人与人之间互为主体的关系，认为人在与他人的交往和理解中存在。教师评价本身就是充满了解释和理解的过程。教师评价的理解性强调人与人主体间的互动关系，在教师评价中，评价共同体的成员由评价者与教师组成，评价活动是评价者与教师交互之间进行的，理解使评价者与教师双方在交往中的关系是交互型的、互动性的。只有评价者在评价的过程中倾听教师，理解教师，以帮助教师成长为目的，才能使教师评价真正发挥它的作用。只有教师参与到评价中来，评价才能引导教师走向自我完善，使教师得到生命意义的升华。在评价过程中，评价者不应是权威者，而是帮助者、促进者，他们应善于将消极的结果转化成具有积极的、具有教育意义的结果。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人格与人格的关系，正如布贝尔所说是“我与你”而不是“我与它”的关系，“我与它”意味着我在与物

交往，“我与你”则意味着两个具有主体性的人的关系，教师与评价者之间真诚地赏识对方、悦纳对方，相互信赖，融为一体，组成生命的共同体，评价者以其人格魅力来影响教师，而不是让教师被迫接受。

理解的外在表现形式则是评价者与教师之间建立平等的对话关系，对话是理想的教师评价形式，能够让教师真正参与进来。布贝尔在《我与你》中说“一切教育工作应是‘对话’关系”，从这一角度说，对教师的评价是评价者与教师对话的过程，消除权威与中心，在教师评价中教师不是处于被评价者的地位，他们与评价者既相互信任，又互不迁就。布贝尔说：“信任，世界上的信任，由于它，人类才存在。”^{[8](P.184)}在双方的对话过程中，评价者不断理解教师，教师只有在这种对话式的评价中，才能回到本真状态，找到真正的自我。

3. 对评价标准统一化的反思有助于实施标准化与个性化沟通的评价方式。

存在主义对“绝对自由”“自我选择”“自我创造”等概念的强调，重新唤起了人类对自己的关注，带来了新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工业化社会中，为了培养大批工业生产的劳动者，我们的教育也追求标准化，对教师的评价也实施了标准化的模式。当今，我们需要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鼓励具有鲜明个性、创造性的教师出现。人是有思想、有个性的，忽视个性存在，采取标准化的教师评价标准将严重压制教师的人性，使人性异化。教师评价的评价对象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他们具有丰富的个性。布贝尔认为“个性”是一个现实的人所潜在的各种力量的独特的精神——物质结构，是一个成品，它的发展实质上是不受他人影响的。^{[9](P.301)}教师评价标准在注重标准化的同时须具有一定的弹性，以利于教育个性化的发展，只有具有个性的教师才能真正具有创造性。

海德格尔说，人人具有“独一无二的个体性”^{[10](P.203)}。因此，存在主义强调发展个体的独特性，强调每一个个体都应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以绝对统一的标准对教师进行评价，不符合人性的发展。在评价标准的确立上要突破工业社会所强调的技术至上的标准化模式，制定更具人性化的教师评价体系。人性化的评价体系，可以让教师拥有更多的自由，创造出更好的发展空间。对于教师的评价，其立

足点应移到个人，评价标准的制定是为教师的发展服务的，教师与评价标准的关系类似于有机体与环境的关系，教师作为有机体需要在自然的环境中健康地成长，作为评价标准的外部世界的环境，应为教师的生存、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为教师实现自己生命价值与发挥潜力提供舞台。从这一角度看，制定教师评价的标准是为自我设计、自我选择和自我实践服务的，教师评价的目的在于培养人的理性自觉意识。

标准化的评价方式使教师仅仅成为毫无个性的知识传播者，就像在一个模子中铸造出来那样，毫无个性可言，在标准化的基础上制定符合每个教师的评价标准是帮助教师成长的有效途径。符合教师发展的评价标准能让教师对教育事业产生更大的热情和极高的信仰，忠于教育事业。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需有信仰，没有信仰就不能成其为教育，而只是技术而已。”^{[11](P.45)}

[参考文献]

- [1]田向阳.对教育价值的哲学思考[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4(2).
- [2]胡福贞.失语与喧哗——教师评价实践中的话语现象分析[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2(22).
- [3]张晓峰.对现行教师评价三个基本问题的批判——后现代主义视角[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10).
- [4]辜筠芳.关于教育存在的思考[J].教育科学,2000(4).
- [5]黄志成.西方教育思想的轨迹——国家教育思想纵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6]李立绪.存在主义教育哲学[J].教育评论,1987(1).
- [7]王丹.西方现代教育思潮[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 [8]吴式颖,任钟印.外国教育思想通史——20世纪的教育思想[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
- [9]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杭州大学教育系.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流派论著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
- [10][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 [11][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责任编辑 师语)

现代远程高等教育服务质量影响机理实证分析

刘 星

(南京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 现代远程教育质量被认为是现代远程高等教育是否能持续发展的关键。从学生满意度入手,通过SEM实证分析得出学生满意度、忠诚度、教育服务质量三者之间高度相关的关系,并由此进一步提出服务质量改进矩阵及相关教育质量改进策略。

[关键词] 现代远程高等教育; 服务质量; 学生满意度; 影响机理; 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4-0045-04

一、现代远程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

科技进步和教育理论的革新带动了现代远程教育这一新兴的教育模式在全球范围内的迅猛发展,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中谈到“信息高速公路最大的益处将来自它在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中的技术应用”,网络的出现使教育普及成为可能。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发展现代远程高等教育符合我国国情,可缓解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力量不足,校园资源和教学设备匮乏等矛盾,逐步缩小我国各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为构建我国终身学习体系和学习型社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工业化特点明显的现代远程高等教育带来的教育规模化能否符合公众的标准?宽进严出,学习自主化,办学规模急剧扩大是否将导致“教育膨胀”?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探讨。

现代远程高等教育质量还存在许多问题,表现在:尚未积累足够的远程教育理论指导经验,尚未使公众形成成熟、合理的现代远程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观和价值观,尚未培养参与者与实践者具备应有的专业素质和理念,尚未建构起高水准的质量保证及控制体系。本文试图构建与我国实际情况相适应的现代远程高等教育学生满意度评价框架模型,

通过设计调查问卷,从研究学生对教育服务的满意度、忠诚度的角度入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统计方法进行验证,最终得出现代远程高等教育服务质量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并提出相应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质量管理建议。

二、SEM的实证设计及研究

1. 学生满意度测评模型与问卷设计。“教育的产品就是教育服务。”刘俊学(2002)认为,学校通过设计教育教学实践,使求学者劳动力商品的质量得以改善,实际上是一种教育服务的提供。学生通过产生和消费教育服务逐渐将之内化为自身的能力与素质,使自身劳动力商品的质量不断提高。^[1]这种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教学过程,实质就是一种教育服务过程。现代远程高等教育的服务一方面具有一般有形产品的共性,另一方面具有其本身一定的特殊性。学生是教育产品最直接的顾客,教育服务质量的影响体现在服务预期、服务的实际感知,乃至整个学生满意度和忠诚度形成的过程当中。

学生对教育服务的预期期望(学生期望)与其接受教育服务后的实际感知(感知质量)之间的差距,是影响学生满意度的因素之一。学生满意度也会受学生需要满足程度的影响,是学生对高等教育服务感知价值的一种评估。因此,笔者在“期望——实

[收稿日期] 2012-02-03

[作者简介] 刘 星(1980-),女,湖南益阳人,南京大学网络教育学院教学部教学研究员,硕士。

绩”模型^[2]和“顾客感知的价值差异”模型^[3]的基础上,结合现代远程高等教育服务的特点,得出学生满意度测评模型(图1)。



图1 现代远程高等教育服务学生满意度测评模型

模型中,从教师教学服务及学生支持服务两方面来测量学生满意度,学生满意度和学生忠诚度是两个结果变量。本模型的逻辑思路为:学生满意度是由学生在学习中产生的对各项教育服务质量的价值的感知所决定的,学生满意度的高低将会直接影响学生对学校的忠诚度。

本文以教师教学服务和学生支持服务两方面为影响现代远程高等教育的主要因素为基础,设计了33个题项来界定、度量现代远程高等教育的服务质量。其中教师教学服务包括教学模式、教学设计、教师素质3个子因素;学生支持服务包括软硬件设施、信息咨询服务、教学资源、支持人员服务、教学环境构建、教学成效评价6个子因素。由此构成的服务质量界定指标体系涉及现代远程高等教育教与学过程的各个方面,表1为由此得出的研究变量构成因子和代码的分布。

表1 研究变量的因子构成与代码

变量名	观测指标	指标代码
服务质量 Service Quality	教学模式	A1
	教学设计	A2
	教师素质	A3
	软硬件设施	A4
	信息咨询服务	A5
	教学资源	A6
	支持人员服务	A7
	教学环境构建	A8
	教学成效评价	A9
学生满意度 Satisfaction(MY)	总体满意度	MY1
	比预期好	MY2
	接近理想的程度大小	MY3
学生忠诚度 Loyalty(ZC)	愿意继续来本学院深造	ZC1
	愿意维护学校声誉	ZC2
	愿意向他人推荐自己学校	ZC3
	如果其他院校学费低,仍愿意选择本学院	ZC4

学生满意度问卷(略)设计以此为基础,采取结构化封闭式形式,分为三大部分,除了第一部分对受访者的人口统计变量和交易变量采用类别尺度来度

量之外,其余两个部分的问卷均采用李克特(Likert)五级量表,由受访者根据每题题项对自己的重要及满意程度,分别给予1至5的分数。使用便利抽样法,抽取南京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嘉兴、南通、西安、南京、苏州等地的学生作为分析样本,以学生自愿参与为原则,直接发放,当场填答,共发出问卷220份,回收207份,剔除填写不完整的无效问卷24份,最后收到有效问卷183份,有效回收率为82.18%。

一般采用Cronbach's α 系数来检定各层面中衡量变量的内部一致性。 α 值越大,显示该层面内容子项间的相关性越大,即内部一致性越大,代表量表越稳定。0.7至0.98之间属于高信度(Wortzel, 1965; Guedford, 1965; 吴明隆, 2003)。通过SPSS量表分析,此问卷的Cronbach's α 值为0.964,说明具有很高的内在一致性,本次问卷调查具有良好的可靠性。

2. SEM实证研究分析。K. Jorekog于1973年提出结构方程模型(SEM,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它包含了回归分析、因子分析、路径分析和多元方差分析等一系列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是一种非常通用的、线性的统计建模技术。结构方程模型作为一门基于统计分析技术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用来处理复杂的多变量研究数据的探究与分析。结构方程模型有效整合了因子分析和路径分析等统计学的两大主流技术,主要应用领域包括假设检验、结构化验证以及模型比较分析。本研究结构方程模型的测量关系图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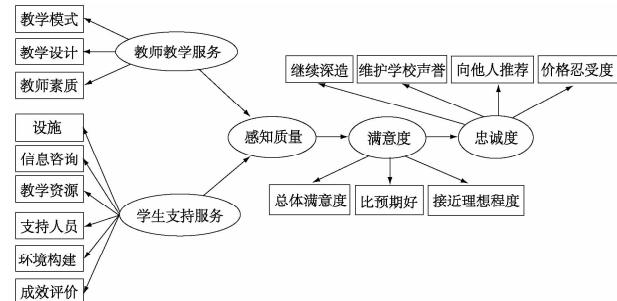


图2 结构方程模型的测量关系图

计算得出模型的结果如图3所示。

从AMOS结果报告中导出有关模型拟合程度的指数,除卡方值与自由度CM/DF之比为6.74不甚理想之外,其他指标均较好。其中,平方平均残差的平方根(RMR)等于0.000;拟合优度指数(GFI)和修正拟合优度指数(CFI)均大于0.9,TLI=0.940<0.1,表明整个模型拟合情况良好,模型结构较为合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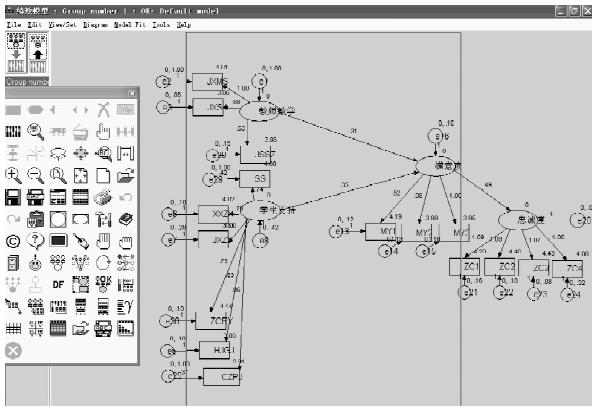


图3 学生满意度测评运算结果

通过潜变量与显变量之间关系的分析,可以发现显变量对潜变量的影响程度,找出对潜变量影响较大的因素。结构变量间的系数表示某一变量的变动引起其他变量变动的程度。计算得出,教师教学服务对学生满意度系数为0.561,学生支持服务对学生满意度系数为0.4,学生满意度对学生忠诚度系数为0.691。显而易见,对于现代远程高等教育的提供方来说,服务质量、学生满意度以及学生忠诚度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因此,若想提高学生满意度,增强学生忠诚感,就必须提高服务质量。

三、教育服务质量的影响机理分析

1. 教育服务质量改进矩阵。实证得出教育服务质量、学生满意度、学生忠诚度三者之间高度相关。实证结果显示,关键的潜变量因素是“服务质量”,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找出影响“服务质量”的关键显变量因素。将影响服务质量的9个显变量的满意度得分及其对服务质量的影响系数绘制成“现代远程教育服务质量改进矩阵”,以满意度为纵坐标,影响力为横坐标。整个区域被分为A、B、C、D 4个部分,如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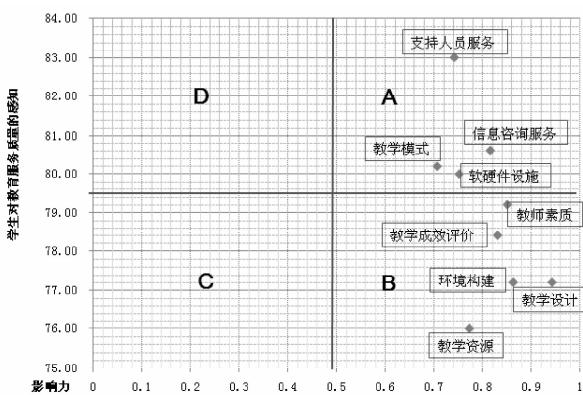


图4 现代远程教育服务质量改进矩阵

A区域(第一象限)聚集了满意度高且影响力大的质量属性。这些质量属性学生非常看重,当前所表现的水平令学生满意,因此,A区域是需要持续改进的区域。

B区域(第二象限)聚集了满意度低且影响力大的质量属性。当前学生对这些属性十分看重并表现出对服务质量不满意。故B区域是急需改进的区域,也称优先改进区域。

C区域(第三象限)聚集了服务质量影响力低且学生满意程度也相对较低的质量属性。学生对这些方面不满,但由于影响力低,这些因素对总体满意度的影响就相对较弱,此区域未包含对象。

D区域(第四象限)聚集了服务质量影响力低但学生满意程度高的质量属性,此区域未包含对象。

2. 教育质量改进策略。从本次调查得出的数据可以看出,虽然C与D两个区域的因素对学生的影响力不大,但仍然不能忽视。因为当某项服务长期稳定地保持高满意度时,学生在评价时有可能忽视,一旦这些方面的服务水平下降,学生马上会感知并表示不满,反映在统计指标上就是这项指标与学生满意度之间的关联性会大大增加。根据这次选取的样本特点,分析的重点在对学生来说影响力大的A与B区域。将调查数据以重要度为横坐标,满意度为纵坐标得出散点图(图略),进行教育质量改进策略的进一步分析。

A区域包含的服务因素对学生影响大且学生的满意度高,是学校的竞争优势,需要继续保持。

(1)支持人员服务。所有因素当中学生满意度最高,总部或学习中心行政人员的服务质量,相对于直接面向学生提供服务管理人员的服务质量来说,更需要进一步改进。实际工作中学生更多是对上层管理人员决策的不满意。

(2)信息咨询服务。及时发布相关教学信息的公告对学生来说是获取学习信息的重要渠道,目前在这方面学生的满意度较高,要继续保持。而针对学生的层次不同,提供入学时诊断性水平测验,学前介绍性讲座(入学辅导)这两项因素学生不是特别关心。这个结果说明了两方面的问题:其一,学生本身对于学习方式意识欠缺,互联网引发的深刻革命迅速扩展到学习领域,学习方式随之发生变化,然而大部分学生并没有做好新教学模式下的角色转变,还不能有效地评价、筛选出对自己有用的信息,自主学习能力不强,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生自身的学

习效果；其二，造成这种现状也有可能是提供的学前测试及介绍性讲座（入学辅导）效用不高，新教学模式下如何为学习能力参差不齐的学生提供个性化服务，这方面将激发我们更多的思考。

（3）教学模式。课程设置的多样性，课程内容对实际工作应用的有效结合性处在急需改进的区域。学生对专业设置，专业知识广度、深度的适宜度较认可，选课的灵活性以及学分制、弹性学习期限等安排相对满意而关注度不高。

（4）软硬件设施。在软硬件设施因素当中，网络环境（网速、稳定性等）对学生来说重要而且令他们不够满意，而学习中心硬件设施的情况相对不那么重要但满意。在实际工作中笔者发现，多数学生自身具备较好的网络学习环境，因此对学习中心是否能提供很好的硬件设施不那么关心，整体的网络环境直接影响学生的很多学习过程的完成，包括学习资料的下载、课件的在线播放、网上辅导的正常进行等等，是在线学习的基础，因此显得非常重要。

B 区域是急需改进的区域，也称优先改进区域。

（1）教师素质。从取样的数据来看，主讲教师的专业水平表现是否优异，对学生来说重要度和满意度都很高，其次是主讲教师的敬业精神；而对助教的专业水平和敬业精神的要求相对较低，学生对此的满意度也比较低。

（2）教学成效评价。这个因素整体的满意度相对不高，其中考试形式多样是要保持并改进的对象。学生对自身参与社会的职业技能认证、考证的满意度不高，说明学生存在这方面的需求，但实际情况不令人满意。学校应积极调查研究，有针对性地给予学生这方面的引导与帮助。

（3）教学环境构建。在教学环境构建的因素当中，学生平台需要持续其操作方便、功能齐全的特征，学生与学生之间协作助学，以及教师网上开展教学、考前辅导等，课下师生之间的沟通互动两方面显

然不满足学生的要求，这个问题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一直存在。如何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缓解因教与学的时空分离带来的交流障碍，如何充分发挥多媒体技术的优势，增进网上或网下的教学互动等等，都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4）教学设计。分析包含在教学设计中的 7 项构成因子（问卷中）不难看出，网上授课中定期辅导、答疑的矛盾表现得最为突出。这与现实教学状况也完全符合。不仅仅是学生需要面对角色的转变，对于教师来说，如何更快地进入角色，培养其远程教育的教学素养这一问题也摆在面前。网上授课、答疑的表现形式，辅导的内容安排等等直接影响教与学的效果，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

（5）教学资源。教学资源因素在整个服务质量改进矩阵中属最急需改进的影响因素。其中公共资源对学生的开放性非常重要，满意度只有 3.8；网上数字图书馆、资源库等，可下载的著名专家学者的讲座也较重要，满意度达到 4.07，相对令人满意。由于学生往往少关心课程成绩硬性指标之外的扩展知识，即使感觉重要还会因为力不从心而缺乏这方面的信息获取意识，学校如何引导在此显得非常重要。

[参 考 文 献]

- [1] 刘俊学. 高等教育服务的“双重属性”及其对高等教育管理的影响 [J]. 现代大学教育, 2001(3).
- [2] Oliver Richard L. A Cognitive Model of the Antecedents Consequences of Satisfaction Decision [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80(4).
- [3] Westbrook R. A. & M. D. Reily. An Alternative to the Disconfirmation of Expectation There of Consumer Satisfaction [J].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1983(10).

（责任编辑 师语）

欧洲 CLIL 双语课堂:理论、实践与启示

盛 云 岚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092)

[摘要] CLIL 双语教学以社会文化理论为理论基础, 其核心是课堂构建自然化的社会认知语境。它跳出了“语言中心论”的传统外语教学的窠臼, 通过基于内容、基于任务、基于课堂交际互动等教学方法, 实现语言学习和学科知识学习的互为语境化, 从而促进语言和认知能力的共同发展。中国在英语教育环境方面与欧洲有着很大的相似性, 欧洲 CLIL 课堂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对中国英语课堂教学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内容与语言整合性学习(CLIL); 社会文化理论; 英语课堂

[中图分类号] H31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4-0049-04

“内容与语言整合性学习”(以下简称 CLIL)是指将外语作为教学用语来教授如数学、地理、生物等非语言类课程, 是欧盟于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的一种兼顾学科知识和外语学习的具有双重教学目的教育模式。随着时间的发展, CLIL 逐渐成为一种融合了全浸入式教学(immersion instruction)、基于内容的教学(Content-Based Instruction)、跨课程英语学习(English Across the Curriculum)等教学模式特点的双语教学模式, 其出发点是希望在学科知识学习的同时促进语言的同步发展, 所谓用一份的价钱买到两份的东西(get two for the price of one)。从定义来看, 任何外语均可成为 CLIL 中的学习语言, 但是由于英语的世界通用语地位, CLIL 的课堂语言主要是英语。

CLIL 模式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推广, 从教学理念到课堂任务设计、教学方法等各个环节都提出了新的思路, 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CLIL 模式的核心是课堂, 其突出特点是英语的使用仅限于课堂学习。在 CLIL 模式中, 英语是外语, 除了课堂之外没有二语社群的有利习得语境, 教师大都是非英语母语者, 这些都与中国的英语课堂学习有着高度的相似性。本文将从课堂教学的微观视角来探讨欧洲 CLIL 模式及其对我国的英语课堂

教学带来的启示。

一、欧洲 CLIL 模式

20 世纪 90 年代初, 在欧盟奉行的多元语言政策(Multilingualism)的推动下, CLIL 在欧洲兴起并迅速发展起来。1994 年欧盟白皮书正式提出统一使用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这一术语, 强调语言与学科知识的整合, 目标是学会使用“Mother Tongue + 2”(即母语加两门外语), 实质上是欧盟建设和谐的多文化、多语言社会的政治要求在语言教育上的反映。推动 CLIL 发展的另一动力来自教育的全球化。新伦敦学派(New London Group)指出, 随着语言文化的多元化、全球化, 我们有必要改变传统的单一语言的教学模式, 开发培育多元识读能力的教育以应对知识社会的挑战。

CLIL 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教学模式。追踪溯源, 使用外语来教授知识可以追溯到欧洲拉丁语时代。那时用一门有威望的外语如拉丁语来授课是精英阶层的特权。现代的 CLIL 模式与加拿大的法语全浸入式教育模式(French Immersion Programs)和美国的双语教育均以外语或二语为教学用语, 同属于基于内容的学校教育(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但由于历史和社会背景等因素, 三者有所不同。欧洲的

[收稿日期] 2012-03-13

[作者简介] 盛云岚(1972-), 女, 浙江宁波人,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博士生。

CLIL 模式有以下特点。第一, CLIL 课堂不是二语习得课堂而是外语学习课堂。在欧洲,英语属于外语而不是二语。外语是指学习者只有在课堂上才接触到而非生活当地的语言社团使用的语言。二语指的是在生活当地社团中使用的非母语,这常常是指移民所要学习使用的语言。第二,在教学目的和内容方面,CLIL 与美国针对移民的双语教育或基于内容的课程教育不同。美国的双语教育主要是通过少数民族人群如移民的母语进行知识教育最终帮助他们过渡到英语的主流教育,其目的是同化。而 CLIL 课堂教学不以生活常识或文化知识为主要内容,而是更多倾向于学术领域或职业领域的学科知识,如生物、地理、数学等课程,但也不排除外语作为一门课程由语言方面的专业教师负责,尤其在小学阶段 CLIL 往往和母语教授的课程并存。第三,CLIL 课堂教师一般都不是目标语的本族语者,通常他们本身不是从事外语教学的专业人员而更多的是学科教师,而加拿大的全浸入式法语教学其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所学语言是官方语言,授课者均为法语母语者。第四,CLIL 的学习者一般都已经掌握了基本的母语识读能力,他们能够把已经具有的母语语言读写能力迁移到外语学习中。CLIL 反映的是欧洲多民族、多语言并存的社会文化现实教育全球化的背景下对通用语的需要,而美国的双语教育和加拿大的全浸入式法语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移民儿童。

二、CLIL 课堂模式的理论基础与教学理念

从实践到理论,双语教学广泛地汲取了二语习得研究的理论成果。总体而论,CLIL 课堂模式主要基于 3 个理论:Swain 的输出假设 (Output Hypothesis),Long 的互动理论 (Interaction Theory) 和社会文化理论 (Socio-cultural Theory)。输出假设和互动理论认为学习者在交际互动中的语言需求变化促使学习者不断地自我调节语言的内容和形式,从而增加语言表现的积累。社会文化理论为双语课堂教学提供了理论上的重要支持。该理论认为,语言习得是一种社会认知过程,习得就是参与 (participation)。人的内心世界与外部物理世界之间的联系是一种中介 (mediation),通过物理工具(如锯子)和心理工具(如语言)得以实现。社会文化赋予人类这些工具性物质,从而建立起人类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对话。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交流是一种中介性的学习,与所处

的社会认知语境紧密相连,学习者在语境中的参与和互动就是语言习得的过程。社会语境是语言习得过程中的工具性因素而不是伴随性因素,对语言习得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CLIL 模式的核心是课堂,CLIL 课堂力求创造自然的类似一语习得的社会文化认知语境。在课堂上,师生之间、学习者之间为完成共同任务所作的交际互动过程既是学科知识的认知过程,同时也是语言的语境化习得过程,学习者在教师的中介 (mediation) 和支持 (scaffolding) 下实现语言的内化 (internalization)。

CLIL 模式采取了“语言作为学科”和“语言作为工具”两种思路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将语言学习与学科知识学习相结合,两者互为语境,互相促进,语言是学习的语言,学习的内容,也是学习的工具,(language of learning, language for learning, language through learning)。这种“合三为一”的模式基于 3 个教学理念:第一,学习者可以有足够的认知学习水平来获得伴随性语言学习 (incidental language learning);第二,单靠外语课堂不能提供足够的有效的语言输入;第三,语言不能被作为孤立的系统来教,而是应当提供给学习者多样化的输入,提高自主学习的机会。CLIL 纲要认为,实施 CLIL 可以带来以下的一些益处:发展跨文化交际技能,为国际化做准备,从不同视角提供学习内容的机会,获取有学科特点的语言术语,全面提高目标语能力,全面提高口语交际技能,促进课堂教学方法和形式多样化,提高学习者动机。

三、CLIL 课堂教学实践

1. 课堂教学 4C 原则。

Coyle 基于在英国诺丁汉大学教育学院对 CLIL 教师培训的经验,提出了 CLIL 课堂教学的 4C 原则,即内容、交际、认知和文化 (content, communication, cognition and culture),与传统外语课堂以教师为主导的 3P 教学模式 (presentation-practice-production) 有着显著的不同。

从图 1 可以看到,课堂交际成为连接文化传递、内容传授和认知发展三者的中心,为语言学习和语言实践创造真实的社会语境,是整个课堂教学的核心。在内容方面,CLIL 课堂突破了传统语言课堂的语言输入的局限,大大提高了语言输入的真实性和多样性,从而提高了输入的质和量。学科内容与认知发展的密切关系也提高了学习者的参与度和学习动机。在认知方面,CLIL 课堂的学科内容挑战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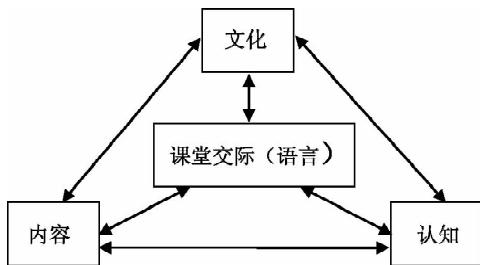


图1 CLIL课堂教学框架

者的认知能力,促进认知能力和语言能力之间的相互转化。在文化方面,CLIL课堂培养学习者运用英语作为通用语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不仅能够与英语母语者之间交流,还能适应与非母语者之间的交流,理解并包容不同的文化视角。

2. CLIL课堂的语言教学。

CLIL课堂的语言教学主要运用了3个方面的教学法理论。首先,交际法理论。该理论认为语言在有意义的社会交际语境中学习可以获得最佳的习得效果。CLIL课堂模拟自然状态下的语言习得语境,在CLIL课堂中,语言不是学习的最终目标,而是在整个教学中获得伴随性的发展(incidental development)。传统的外语课堂把学习者作为无知的初学者,CLIL课堂把他们看作是语言的有效使用者,不是为了语言而使用语言,从而使语言使用有了真正内在的驱动力。其次,基于内容的教学法。这种教学法理论认为内容和语言相结合的语言教学能够提供给语言学习者实质性、功能性的语言接触和实践。在CLIL课堂教学活动中,学科知识“前景化”,语言隐退为“背景”,通过学科内容挑战学习者的认知能力,促进认知能力和语言能力之间的互动和转化。再次,基于任务的教学法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功能性、目的性任务所激发的语言使用和学习动机是成功语言学习的先决条件。CLIL课堂将知识的学习当作即刻的直接的任务,使学习任务具有了真实性和实际意义,激发学习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Dalton-Puffer认为CLIL课堂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有着以下特点:注重整合内容、语言和学习技能,提高专门词汇的输入量;创造真实的学习材料和真实的语言使用语境;注重激活学习者已有的知识、经验和认知;提供学习者围绕同一话题的不同的文本类型;促进对不同体裁和语篇组织的认识;运用多模态的符号体系,提高对语言表现方法和表现力的认识,帮助学习者元语言意识和批判性思维。

另外,CLIL课堂降低了学习者的情感焦虑。

CLIL教师和学习者同为外语学习者,这使CLIL课堂比非CLIL课堂享有更多的权力平等,使学习者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和话语权。Nikula认为在CLIL课堂上学习者的角色认同(learner identity)高于母语课堂。Maillat也观察到在瑞士一所中学的历史和生物课上,学生们所做的角色扮演使用外语比使用母语有更丰富的话语表现,他把这种现象归结于“面具效应”,即外语使学习者具有了另一种说话者身份,如同戴上了面具,可以不受真实身份地位等社会因素的制约,使学习过程演变为自我认同和自我实现的过程。

四、CLIL模式对我国英语课堂教学的启示

CLIL对双语教学中的非语言类学科教师提出了新的挑战。CLIL教师往往缺乏语言教学的专业背景,这就需要CLIL教师反思课堂教学方法,找到语言和内容的最佳结合点来达到知识传递的畅通。CLIL另一个更大的意义在于对广大的外语教师提出了新的思路。CLIL课堂模式对于我国的英语课堂教学有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反思语言在英语课堂上的中心地位。通用语与外语的区别在于前者突出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功能性,而后者突出语言作为学科的知识性。传统的外语教学在倡导运用交际法等各种教学方法来提高学习者的交际能力的同时,往往忽略了语言真实的交际需求所带来的最根本的内在动力。CLIL模式完全跳出了传统外语教学的窠臼,改变了以语言为唯一中心的教学模式。我国的英语教学应该跳出语言的局限,站在社会认知的高度来看待教材中的每一篇课文,将语言教材看作是历史教材、地理教材或科普教材等,并以历史、地理或科普的认知特点和要求来组织、编排课堂活动,以此来创造语言输入的真实语境,从而提高输入的有效性。

第二,提高课堂语言的整合性输出和反馈。传统的英语课堂重视输入而忽视输出,重视分解性的输出而忽视整合性的输出。例如,听力练习只管听得懂,忽视从听到说到写这一理解——输出过程中的许多认知和语言技能方面的要求。在CLIL课堂,学习的发生是通过学习者自身的知识构建而不是通过外部的活动。“内容和语言整合性学习”中的“内容”不仅仅是教师的知识传授,更重要的是它激活学习者已有的知识,并通过信息条块化(下转第55页)

英语跨文化交际教学存在问题及对策探讨

陈 薇 颜文洁

(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 210046)

[摘要] 全球经济一体化客观上要求现代英语教学应加快从早期的语言技能教育为主, 向以思想和文化交流为主的交际能力转变。提高大学生的文化意识和交际能力是大学英语教学师生共同面临的课题与挑战。立足于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这一目标, 分析了当前大学英语教学中跨文化教育存在的问题, 探索以语言学习为基础, 以交际体验为重心, 以跨文化意识为目的的跨文化交际教学在实践方面的应用空间, 试图找到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学生特点的英语教学方法。促进文化和语言的相互交融, 达到语言技能和交际能力的“双赢”。

[关键词] 跨文化交际能力; 大学英语教学; 交际体验

[中图分类号] G6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4-0052-04

现行国内英语教学与文化教学脱节的现象始终存在, 原有英语教学模式重语言、轻文化的情况较为普遍。学生在学习语言形式时, 没能很好地掌握语言形式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 这种教学模式培养出的学生虽然也能具备较强的英语基础语言知识, 但由于欠缺基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不能很好地胜任社会和职业的实际需求。

随着我国与世界各国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愈加频繁, 人们意识到跨文化交际在现实社会中的重要性, 高校英语教学也随之面临改革的必要。教师不仅要教给学生英语语言知识, 而且还应从跨文化这个角度来考虑组织英语教学, 要培养学生得体地使用语言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1](P.45)} 单纯的语法、语言、词汇的教学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社会的需求, 英语教学更应该是全面的英语文化教育。脱离了文化素质, 要实现学生英语综合素质的提升只能是一句空话。

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正是在这种全球化形势下兴起和发展的, 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和交际能力才是外语教育的最终目的。学习和运用外语就必须了解这门语言背后深刻的文化底蕴。本文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来研究大学英语文化教学与语言交际能力

培养问题, 力求通过实践研究, 探索出适合大学英语文化教学和语言交际能力培养的有效途径。

一、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概念

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收者)之间的交际,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 信息的编码、译码是由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进行的交际就是跨文化交际。^{[2](P.118)} 语言交际在不同的文化中都是以自身默契来编码与解码的, 跨文化交际要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与视野去破解东西方社会的不同价值观、人生观, 以建立文化共识, 最终促成交际成功。这个过程受到社会文化、心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又因文化而异。

在跨文化交际中, 两种不同文化发生碰撞, 交际双方往往无法摆脱本族文化的束缚, 交际变得非常困难。跨文化交际本身所固有的复杂性决定了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必要性, 跨文化交际的成功有赖于对不同文化模式的了解。只有提高人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 才能取得跨文化之间的无障碍交际。

Byram 提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情感——认知——行为框架。

态度(情感)层面: 增强自我意识, 认识民族中心

[收稿日期] 2012-03-16

[作者简介] 陈 薇(1972-), 女, 江苏南京人, 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颜文洁(1983-), 女, 江苏南京人, 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博士。

主义思想和成见的存在,消除偏见^{[3](P.70)};培养学习者对异国文化的好奇、开放、欣赏、移情的态度;相信文化无好坏优劣之分,培养文化相对论思想和跨文化意识。

知识(认知)层面:一方面是学习者关于他们自己国家的社会群体和文化的知识;另一方面是关于个人和社会层面交际过程的知识。

行为层面:坦然面对不确定的交际环境,善于调整心态,勇敢面对文化冲撞^{[3](P.71)};愿意并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和处理问题;具有很强的文化敏感性,善于观察和比较文化现象;经常反思本族文化,反思自己的跨文化交际行为。^{[3](P.73)}

这些项目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同时作用,缺一不可。因此,跨文化教育与培训中态度和意识层面,知识层面,以及技能层面的培养必须兼顾,三管齐下,才能实现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这一目标。

二、传统教学模式的不良影响

由于认识上的局限,外语课堂上文化的导入缺乏系统性和主动性,常常是较为随意的。学生也简单地认为听、说、读、写的系列训练就足以保证其跨文化交际的顺利性,掌握单纯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知识就是外语学习的全部目标,结果导致学生文化知识和交际能力的严重缺乏。

传统的以教师为主体的授受式教学,以语言知识的传授和语言技能的训练为中心,如图1所示。课文讲解,词句操练是重要的学习内容。师生之间也会进行互动问答,但多是就课文的理解方面,模拟跨文化交际场景在课堂活动中所占比例较少。教师的讲授是课堂的中心,学生多习惯听课记笔记。在这种教学模式中教师和教材是学生获取知识的源泉,在教学中起重要作用。而传统教学模式对学生的跨文化学习存在一些不良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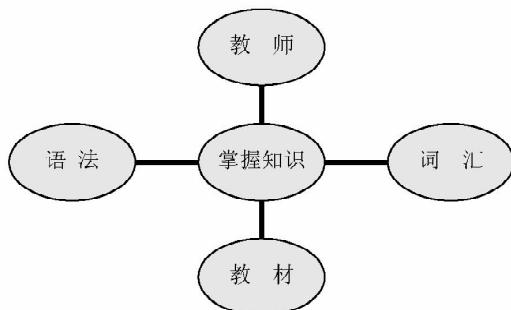


图1 传统的以教师为主体的授受式教学模式

1. 多着眼于表层文化的学习,忽视深层文化的领悟。

文化的内容涉及很广,不仅包含显性的表层文化,而且包括社会制度、风俗习惯、文化心理、行为模式、思维方式和根深蒂固的民族性格等深层文化。深层文化属于精神文化范畴,是文化的核心部分。中西深层文化差异往往是最明显的,也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考的积极性。这些应该成为跨文化教学的重点。文化教学和文化研究中,我们不应忽视深层文化,只注意文化中比较表层的部分,相反,分析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了解其分歧的原因,是我们拓宽文化领悟能力的一种必不可缺的途径。

如果忽视深层文化的学习,学生是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理解语言并掌握语言。目前学生主要侧重与对表层文化的熟悉,如问候、道谢、称呼等习语和禁忌语等。关于深层文化在学习中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因此,学生要注重深层文化方面拓展学习,达到开阔眼界和提高素质。

2. 缺乏真实的语言环境,跨文化理解能力欠缺。

由于缺乏自然习得英语的环境,再加上以知识为重点的外语教学导致了外语实践的数量少、内容窄,学生接受信息能力和获取信息的能力都不尽如人意,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得不到应有的提高。学习语言离不开语言交际的亲身体验,因为人们经常会不自觉地将本族文化的模式、思维定势移植到目的语中,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理解和表达英语,误解就会难以避免。语言的功能和结构规律的习得必须以为实践出发点,对西方文化的了解程度决定学习者最终的交际能力之高低。

3. 教学评估中文化意识缺失,对跨文化知识水平的重视程度不够。

目前的大学英语测试体系不是很合理,不能全面地反映学生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并没有体现出对中西文化差异意识的培养。这些测试主要关注的还是语言的基本知识,对文化的关注微乎其微。应试体制下的教师和学生都很难具有强化文化因素的动力。如果测试不包括对文化知识和能力的评价,而把全部的希望放在教师和学生主动地进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学习和培训,显然是很不现实。

总之,为了完全理解和正确得体地运用目的语,我们只有把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得体、有效地进行交际。这就要求师生提高文化学习的意识,并利用现代教育

技术给文化学习带来的便利条件,在学习过程中积极、主动地关注文化背景知识和交际能力的训练。

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对策

大学英语教学应始终注重以培养学生英语运用能力为目标,应采用学生更感兴趣、能发挥其主体作用的跨文化交际教学,并在其中融入参与式、讨论式、互动式等教学方法,可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语言素材要真实而富有代表性,培养学生学习兴趣。

跨文化交际教学应坚持“以人为本”,通过教学设计重点培养学生自学能力、主动交际、创新精神的跨文化交际教学案例,为学生创造是愉快和谐的学习氛围。

心理语言学家认为,兴趣是推动人们求知的一种内在力量,是取得学习成功的重要因素。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开始的对学习的间接兴趣,很有可能逐渐转化为对学习的直接兴趣,是提高学习质量的最有利的因素。在跨文化交际教学中,教师应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师应提供有趣的、能逐步掌握的、可获得科学知识的语言素材,这些素材通常应该是与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息息相关的话题,这样就能引起学生的关注和共鸣,能吸引学生的兴趣。语言素材要与学生的初始状态相匹配,学生对这些素材也会相对比较熟悉。教师应注意对语言素材进行加工,可删去一些生僻的单词、难句、长句,取而代之的是学生们较为熟悉的词汇和较为容易听懂和读懂的中短句,从而使语言材料的难度匹配于学生的学习状态。

2. 以学生为主体,注重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

学生是学习主体,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辅助,强调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诱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使课堂气氛紧紧围绕教师的言语和教学思路,产生积极的心理情感。跨文化交际教学模式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表现为教师启发引导协助学生,通过建立积极的师生关系,重建教师角色。摆脱传统师生之间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建立良好的友谊关系,使学生摆脱对教师的过分依赖,增加其在语言学习中的主体性,使其获得英语知识,锻炼交际能力。

跨文化交际教学强调学生是课堂教学的主体。学生参与教学活动,在此过程中,从接触到语言材料

到思考语言材料和组织自己的观点,再到表达和分享自己的观点,这一系列的过程就是体验创造的过程。学习的过程再也不是在“一言堂”的教学中听讲和记笔记,而是一个主动体验和建构的过程。合作学习是跨文化交际教学模式的关键。

教学活动中的合作共享是学习者之间交流的重要途径,如,小组学习中的讨论和小组之间的辩论等形式都能使得跨文化交际教学的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学生也能通过与他人的交流与共享获得更多的学习成果,同时自己的学习成果也能被其他学习者吸收。教学活动中的信息传递应该是多维的:从教师到学生,从学生到教师,从学生到学生,从个体到群体,从群体到个体,从个体到个体,从群体到群体等等这些多维的信息传递才能体现出真正的“交际”。

在合作学习中,通过同学之间互教互学、彼此交流知识,深化了互爱互助、相互沟通情感的过程,此过程促进了学生交往能力的提高,也推动了互动教学的顺利展开。在合作学习的过程中,学生增强了交往,强化了交际交流、语言输出,形成了初步的社交能力,有效提高了学生参与交际活动的积极性,增强了他们跨文化交际能力。

3. 重视交际场景构建,设计多样性教学活动。

语言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使用。跨文化交际教学强调“学以致用”,教学活动就是构建模拟交际到真实交际,通过把学生置于使用语言的场景中,使其真正掌握英语交际的真谛。设计多样化课堂交际活动,不同的活动使学生以不同的方式与语言素材发生关系,同时也对学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交际教学活动应该多样化,多样化的交际教学活动的合理化搭配。这是由于各种活动的侧重点不同,教师应该根据每节课的教学目标去合理的选择教学活动的形式和内容以及各种活动内容与形式之间寻求最合理的配合,从而为学生提供尽可能多的多样化的实践机会,促进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发展。

4. 建立科学的教学评价方式,促进跨文化交际教学的良性循环。

教学评价方式是与教学模式相对应的。传统教学模式注重学生知识的训练,学生的技能训练很少或者不科学。其评价方式一般采用终结性的评价,主要为笔试,考题应试教育成分很浓,相当一部分学生学习能力与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之间差距很大。

跨文化交际教学中,“交际法具有灵活性,它使教学过程交际化,因而学生运用语言灵活、实效”。^[4]

在课堂言语交际中,学生注意语言交际功能,在每一节课中主动建构学习,那么传统的评价方式则无法适应交际教学的要求。而阶段性评价利于提高教学效果,对交际教学而言显得更为重要。

终结性评价的方式虽然书面笔试的评价形式依然存在,但不再是唯一因素。教师可以根据自己教学的实践,结合学生运用小组汇报,个人演讲的形式等综合评判学生英语交际能力。

教师要经常的开展阶段性评价,即多采用实践性的评价手段。教师可根据学生在课堂上的演讲质量、讨论的有效性、课堂上主动参与度、每次教学活动任务的完成情况等方面,来评价学生的综合表现,该评价体系可有利于促进学生学习自主能力和自我效能感的提高。

交际教学评价应在终结性评价基础上,以“学生的交际能力提升程度”为依据,重视阶段性评价。当然,终结性评价、阶段性评价体系及其在教学评估体系中权重比例都需要教师不断地探索和推敲,应该与交际教学相辅相成。

跨文化交际教学模式要求教师必须掌握大量的跨文化方面的知识,采用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不断提高自己的跨文化教学水平;学生必须摆脱传统依赖式学习模式,充分发挥学习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大量跨文化知识的学习、语言的实际交际操练来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主动性。教师应该创设交际性课堂使语言在模拟情境中得以运用,启发学生的语言习得机制并以此设计课堂中的交际活动,组织交际

教学过程,分析理解语言结构,为学生提供模拟的现实语境,使学生注意到语言表达的意义,进而帮助学生掌握目标语言。^{[5](P.90)}

跨文化交际研究培养学生以新观念、新眼光,促进不同文化人群间多元文化的互识、互补,以期开展与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沟通和理解,改进人类文化生态环境。在英语教学思想和方法方面跨文化研究具有强烈的实用价值色彩。英语教学应重视文化传授、学生非语言技能和交际技能的培养。越来越多的教师正努力研究英语跨文化交际教学的内容和方法,探索实施外语跨文化交际教学,将使我国传统英语教学思想和方法得到深层次的改革和发展。

〔参考文献〕

- [1]陈申. 语言与文化教学策略研究 [M].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1.
- [2]贾玉新. 跨文化交际学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 [3]张红玲. 跨文化外语教学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 [4]吴长镛. 交际法得失论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8 (3).
- [5]曹倩瑜. 交际性课堂中教师主体角色的隐身探略 [A]. 外国语文教学与研究③[C].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陈晓姿)

(上接第 51 页) (chunking) 和信息再包装 (repacking) 等对知识进行增添、重组和创造。这种构建和高级的思维活动需要借助一个个真实任务的完成来实现,表现为语言的知识化输出,即学习者通过语言构建起整个学科知识。这一语言输出经历了 3 个步骤:输出,反馈和再输出。CLIL 教师在这个学习“三部曲”中充分担当了支架辅助 (scaffolding) 的作用。因此,我们的英语是否可以少一些知识简单呈现的封闭型问答模式,多增加一些任务型、课题型的综合性任务来组织和评估学习者的知识构建活动,提高课堂活动的多样性和挑战性?

第三,创造课堂的社会认知微语境。CLIL 课堂

最大限度地还原语言习得的认知语境,为学习者创造最为真实和自然的语言学习和语言实践的社会语境。我国与欧洲同样缺少英语使用的语言环境,课堂是中国英语学习者的主要习得环境。因此教学的关键在于教师对课堂教学过程的语境化能力。教师应充分利用语言、视觉、声音等多种模态手段,创建多视角、多层次的课堂学习语境,建立平等的共同探索的师生关系,从学习者的认知需求出发,选择、优化学习任务设计,创造更多的课堂学习机会,辅助学习者对知识的语言化构建。

(责任编辑 南山)

从心理语言学角度分析英语专业四级短文听写

洪晓丽

(江苏教育学院外语系,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短文听写是英语教学和测试的手段之一, 它能够综合评价应试者总体语言能力。本文主要通过心理语言学的三个主要方面, 即语音的听辨、言语的理解和记忆来分析短文听写的过程和特点, 由此为应对短文听写和提高此项测试的能力提供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

[关键词] 短文听写; 心理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 H31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4-0056-02

听写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一直是英语教学和测试的手段之一。最初被用来衡量应试者的听力和拼写能力, 后来被看作是能够评价应试者总体语言能力的综合性测试手段。虽然质疑的声音屡见不鲜, 但听写作为测试手段的优势是其他测试方法无法相比的, 因此, 英语专业四级考试(TEM-4)中始终保留此测试项目。听写即是让应试者听一篇短文并记下, 短文的朗读按照意群适当停顿, 这样应试者就有足够的时间将文章准确无误地写下来。在英语专业四级考试中, 一段150个词长度的短文让应试者听四遍。第一遍只听不写, 录音为正常速度(即每分钟120个单词), 给应试者一个整体印象。第二、三遍按照意群停顿, 语速较慢并留有15秒间隙。第四遍恢复常速, 让应试者检查所写内容, 改正错误。听写被认为是综合性的测试, 因其在测试单项语言技能的同时也考查了应试者的实际使用语言的能力。应试者不仅要听和记, 还要运用句法、语义、语篇等方面的语言知识来整合所听到的内容。因此, 听写这一测试项目有它自身的优势: 考查多个语言点, 综合性强, 全面考查语言熟练程度, 和其他多种测试形式的相关度高。^{[1](P.152)}

听写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语音的听辨、理解和记录, 但实际操作远比这几个过程的简单叠加要复杂得多。心理语言学的实验研究表明, 这是个非常积极的、主动加工的过程。听者要充分利用所有掌

握的语言和非语言知识, 包括对外界输入的语音材料进行加工, 运用各种背景知识以达到理解说话者意图的目的。^{[2](P.137)}

一、语音的听辨

心理语言学认为, 不能单用声音分析来解释言语的听辨, 听到了声波不等于听懂了话; 声音无非是一种提示, 供我们辨认事先就储存在我们大脑中的某种声音与意思结合的形式。^{[3](P.18)} 理论上, 听的过程可以分解成音素、词素、词、短语、子句、句子、语段的听辨, 但这只是按照书面文字来拆分的, 实际的语流则存在很多的变化。

首先, 言语是连续的, 这就无法明显地划分音段之间的界限, 即使有一些分段, 界限并不多也不明显, 例如“*I scream*”和“*ice cream*”在正常语流中并不好区分。

其次, 音段(speech segment), 即语言的声音, 分为元音、半元音和辅音, 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指的是语言的音段和该音段的声学特征之间没有对应的关系。同一个音段的产生往往视其所出现的话境而有所变化。因此, 每个音素的发音都会因前后相邻音素的变化而不同, 也就是产生了音位变体(allophonic variation)。

第三, 还有语流的速度和特性的问题。个体之间发音器官的差异, 口音的不同以及男女不同的音

[收稿日期] 2012-03-20

[作者简介] 洪晓丽(1976-), 女, 江苏淮安人, 江苏教育学院外语系讲师。

高都会影响言语的听辨。即使是同一个人，他的语速受不同的场合、情绪、听众、交际的目的和使用同化的程度的影响也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4](PP. 205–206) ^[3](PP. 83–84) ^[5](PP. 18–19)

应试者在听辨过程中对输入的信息主动地合成分析，这种合成分析是合成更大的更具有意义的语言单位，远比孤立音素听辨复杂得多。所以听写的过程中应避免孤立地听写单词、短语，而应该了解音段及语流的特点并运用多方面语言知识，从而真正听懂材料。^[6]

二、言语的理解

话语理解的过程可以理解为意义建立的过程 (construction process) 和使用过程 (utilization process)。理解的过程建立在听辨的基础上，并和听辨过程一样错综复杂。意义建立过程牵涉到词、句子和语篇 3 个层次，即词语的辨认，句法的分析和语篇的解释。第一个层次是在言语听辨的基础上决定有些什么词要进入意义建立过程；第二个层次是建立词之间的相互关系，从句子的表层结构深入到意义；第三个层次是结合语境，利用这些相互关系来建立意义。^[7](P. 347) 话语的理解并不是个简单的线性的过程，听话人不仅要通过各种语言知识理解句子的本意，还要揣测说话人的意图或动机并加以执行。^[3](PP. 90–91) 不过，短文听写只要求应试者准确记下听到的内容而无需执行。

三、言语的记忆

记忆的过程可大致分为 3 个阶段：输入、储存和输出。一般情况下，人们理解了听到的话语之后会记住其大意而不需要记住具体词语，除非是需要背诵，即需要决定了材料输入的态度。短文听写要求应试者完整记录听到的内容，因此难度较高。

心理学家把记忆分为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两种。短期记忆的能力有限。如果输入的材料有意义，则保留在短期记忆里的份量会大大增加。长期记忆是储存较永久的信息的地方，不过储存的一般是意思而不是声音。^[3](PP. 128–129) 短文听写强调的是短时记忆能力和长期记忆的结合。短时记忆暂时记录已听辨的信息，同时结合从长期记忆中调取的相关内容，从而完成对短文内容的准确记录。

记忆的输出有两种方式。人们通过辨认来判断是否以前看过或听过相关内容。另一种可用回想的方法把看过或听到的内容复述或写出。在短文听写朗读第四遍的时候，应试者必须同时运用这两种方式来检查所记录的内容是否完整并符合语言结构、

自己的常识、现实情况及语法等。^[3](P. 129)

四、心理语言学对短文听写教学的启示

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对短文听写过程进行剖析可以发现，听写并不是简单机械的，而是涉及多方面知识的综合运用，应试者若能稍作了解就可以发现一些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法。

1. 适当了解心理语言学理论在短文听写中的体现和应用，用理论来指导具体操作，做到有的放矢。

2. 培养精确的读音习惯，避免因读音错误造成的听写错误。熟知英语的读音规则，适当增加较快语流中的特殊发音现象（如失爆、连读和弱读等）的训练，并在朗读和会话中正确模仿和使用。

3. 加强语法基本功的训练，不让薄弱的语法知识成为短文听写的绊脚石。另外，应学会利用上下文的提示，从句子结构到语义等不同角度听辨短文内容。

4. 强化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训练，形成自己独特的记忆方法。广泛阅读，从而增加英语国家的文化、历史和风俗习惯等知识在长期记忆中的储存以便随时调取使用。

五、结束语

本文着重从心理语言学的视角来分析英语专业四级短文听写，以此指导实际操作并扫清听写中的障碍。另外，应试者也要根据自身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进行强化训练，才可逐步提高听写水平。

[参考文献]

- [1] 武尊民. 英语测试的理论与实践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 [2] 刘润清，韩宝成. 语言测试和它的方法（修订版）[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 [3] 桂诗春. 心理语言学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 [4] 桂诗春. 新编心理语言学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 [5] 董燕萍. 心理语言学与外语教学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 [6] 刘双. 从心理语言学角度分析听写技能 [J]. 外语学刊，1994 (3).
- [7] 桂诗春. 实验心理语言学纲要——语言的感知，理解与产生 [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南山）

国际法学科双语教学效果提升研究^{*}

——基于学生意愿的视角

朱小静

(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南京 210037)

[摘要] 国际法学科教学内容的国际性和教学目的的涉外性使其具备了双语教学的必要性,但是,我国目前国际法学科的双语教学主要是政府自上而下行政推动的结果,学生的意愿没有被充分考虑,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际法学科双语教学的效果。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探究学生对国际法学科双语教学的态度和意愿,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提升国际法学科双语教学效果的对策。

[关键词] 国际法; 双语教学; 学生意愿; 教学效果

[中图分类号] F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4-0058-04

国际法学科包含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含世界贸易组织法)3个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的法律学科,涉及到国家政治、外交、经济关系的各个法律层面,是法学中既具有学理性又具有很强应用性的综合性二级学科,国际法学课程也是我国法学专业本科学生必修的主干课程。

国际法学科教学内容的国际性和教学目的的涉外性,决定了该学科进行双语教学的必要性。一方面,国际法学科的教学内容基本以英文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为蓝本,国内中文教材中的相关内容大多翻译自这些国际公约和惯例,如果国际法学科的教学始终基于中文译本进行,可能会产生理解上的歧义,直接用英文教材进行双语教学会使教学内容更加准确。因此,国际法采用双语教学更符合学科本身的特点。另一方面,国际法学科教学的目的是培养通晓国际法律规则和实务、具有较强外语能力的复合型和国际化法律人才,而双语教学是培养国际化人才的重要途径,国际法学科开展双语教学是我国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和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现实需要。但是,从已有的国际法学科双

语教学的实践情况来看,其教学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这是值得反思和探究的问题。

一、国际法学科双语教学效果不佳的原因

我国的国际法学科双语教学主要是通过国家自上而下行政推动的。教育部于2001年颁布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将双语教学引入我国的教育体系,并明确将法学列为率先开展双语教学的专业。2007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出台了一些开展双语教学的鼓励措施,包括有条件的高校可聘请国外学者和专家从事专业课程的双语教学,鼓励和支持留学回国人员用英语讲授专业课程等。在教育部的这些政策要求和引导下,加之国际法学科教学内容国际性这一鲜明特征,国内很多高校选择在国际法学科中采用英汉双语教学。但是,实践中国际法学科双语教学的实际效果与国家培养国际法专门人才的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

究其原因,这与我国国际法学科双语教学主要

* [基金项目] 南京林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项目“双语在国际法学科教学中的应用研究”(项目编号:2009C14)。

[收稿日期] 2012-03-10

[作者简介] 朱小静(1980-),女,江苏南通人,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

依靠行政推动,而双语授课的对象,即学生的意愿没有被充分考虑有直接的关系。然而学生对于双语教学的意愿决定着他们对双语教学的态度和积极性,而后者又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双语教学的效果。教学是“教”与“学”双向互动的过程,对学生双语教学意愿的关注和研究是合理地进行国际法双语教学相关课程设置、教材选择、教师配置及课堂组织的前提,也是提升国际法学科双语教学效果的重要路径。

鉴于此,笔者对南京某高校法学专业二、三年级学生进行了国际法学科双语教学意愿的问卷调查,通过深入探究学生对国际法学科双语教学的真实态度和意愿,以期更好地开展国际法学科双语教学活动,提升国际法学科双语教学的效果。调查问卷采用当面发放、当场填写的方法,共发放问卷 65 份,回收有效问卷 62 份,有效率 95.4%。

二、学生对国际法学科双语教学的意愿分析

1. 关于国际法学科开展双语教学的必要性。

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学生对于在国际法学科开展双语教学是有需求的,79% 的学生认为国际法学科需要双语教学(见表 1),在国际法学科 3 门课程中,59.7% 的学生认为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都有必要双语教学,24.2% 认为最有必要开展双语教学的是国际经济法课程。

表 1 国际法学科开展双语教学的必要性

	需要	不需要	无所谓
二级学生(人)	24	3	3
三级学生(人)	25	1	6
合计(人)	49	4	9
各自所占比例(%)	79	6	15

2. 关于参加国际法双语课程应具备的英语水平。

在调查中,学生均意识到参加国际法双语课程,对英语水平有一定的要求。53% 的学生认为至少要达到大学英语六级水平,13% 的学生认为应当具备一定的法律英语词汇量和英语听说能力(见表 2)。而被调查学生当前实际的英语水平参差不齐,二级学生因尚未参加大学英语考级,没有可参考的评判标准;三级学生中,有 21 人通过大学英语六级,占比 66%,9 人通过大学英语四级,占比 28%。可见,为了保证教学效果,在开展国际法双语教学前,需摸清学生真实的英语水平,并据此合理地进行教学安排和设计。

表 2 学生认为参加国际法双语课程应具备的英语水平

	通过 四级	通过 六级	达到大学 英语教学 的基本要求	其他(一定 的词汇量和 听说能力)
二级学生(人)	4	20	3	3
三级学生(人)	2	13	12	5
合计(人)	6	33	15	8
各自所占比例(%)	10	53	24	13

3. 关于国际法双语教学教材的选择。

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高年级学生对自己的英语水平更有自信,没有选择中文教材的学生,并且,相比较低年级学生,选择英文原版教材的人数也更多。无论是高年级还是低年级学生,选择中英文对照教材的人数最多,比例最高,达到了 41 人,占比 66% (见表 3)。这表明学生预见到了双语教学与单纯中文授课相比难度更大,希望依靠配套的中文教材帮助课程内容的理解。但是,由于我国与西方国家法律体系和法学教育理念的差异,国内国际法教材的编写体系和内容与英文原版教材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国际法双语教学实践中,寻找高匹配度的中文和英文原版教材难度很大。

表 3 国际法双语教学教材的选择

	英文 原版 教材	中文 教材	教师改编 的英文教材	一本中文, 一本英文 原版教材
二级学生(人)	4	2	3	21
三级学生(人)	7	0	5	20
合计(人)	11	2	8	41
各自所占比例(%)	18	3	13	66

4. 关于国际法双语教学所需授课课时。

如表 4 所示,73% 的学生认为相比单纯中文授课,国际法双语教学需要更多的授课课时。这同样表明,学生预见到了国际法学科双语教学比单纯中文授课难度更大。14% 选择双语教学需要更少课时的学生其实同样预见到了双语教学的难度,只是表现出一定的“畏难”情绪,因为课时与学分是挂钩的,课时少了学分也就少了,可以降低学业难度。可见,有必要根据国际法双语教学授课的内容和学生的接受能力,合理地设置课程的学时和学分。

表 4 国际法双语授课与中文授课所需课时的比较

	双语更多	双语更少	两者一样多
二级学生(人)	21	4	5
三级学生(人)	24	5	3
合计(人)	45	9	8
各自所占比例(%)	73	14	13

5. 关于国际法双语教学中,英语授课所占比重。

如表 5 所示,53% 的学生认为国际法双语教学中,英语授课所占比重至少要达到 50% 以上,这反映出学生对国际法双语教学有所期待,希望在学习国际法专业知识的同时,提升自己的英语水平。这与国际法学科双语教学的目标是契合的,与理论界和国际法双语教学实践中对双语教学的界定也是一致的。莫世健教授结合教育部的相关政策,将双语教学定义为:除外语课程外的,使用以外语为主教授或外语讲授占相关课程 50% 以上课时的课程;该教学模式的目的是提高本科生的使用外语从事专业工作的能力。^[1]这一定义也适用于国际法学科的双语教学。

表 5 国际法双语教学中英语授课所占比重

	30% - 50%	50% - 80%	80% - 100%	无统一标准, 看教学需要
二年级学生(人)	8	18	0	4
三年级学生(人)	14	15	1	2
合计(人)	22	33	1	6
各自所占比例(%)	35	53	2	10

6. 关于国际法双语课程考核的方式。

如表 6 所示,35% 的学生主张考试试题中英文各占一半;29% 的学生主张全英文考试,同时加大平时成绩权重(占 40% - 50%);23% 的学生主张全中文考试;另有 13% 的学生也主张全英文考试,但认为没有提高平时成绩权重的必要。这表明学生对国际法双语课程的考核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要求。

表 6 国际法双语课程考核的方式

	全英文考试, 加大平时 成绩权重	全英文考试, 平时成绩 权重与中文 授课一样	一半中文, 一半英文 考试	全中文 考试
二年级学生(人)	9	5	10	6
三年级学生(人)	9	3	12	8
合计(人)	18	8	22	14
各自所占比例(%)	29	13	35	23

7. 关于国际法双语课程任课教师应具备的条件。

如表 7 所示,近八成的学生要求国际法双语课程的任课教师兼备较高的英语水平和扎实的国际法专业知识。据此,国际法双语教学对任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加大了任课教师课前备课、课堂教学和课后辅导的工作量。因此,培养和形成满足学生需求的国际法双语教学师资力量是提升国际法双语教学效果的重要环节。

表 7 国际法双语课程任课教师应具备的条件

	海归 法学 博士	有海外 学习 经历	英语好, 法学专业 水平不重要	英语好, 具备法学 专业知识
二年级学生(人)	10	2	0	18
三年级学生(人)	1	0	0	31
合计(人)	11	2	0	49
各自所占比例(%)	18	3	0	79

三、提升国际法学科双语教学效果的对策

1. 课程的设置。

在双语教学资源不足的背景下,国际法学科的 3 门课程中,应当优先考虑国际经济法的双语教学。原因有二:其一,是我国国际经济活动日益活跃与深入开展的现实需要;其二,国际经济法具有很强的国际共通性,构成其法律渊源的国际条约、国际惯例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认可,且多以英文文本发布,提供了丰富的双语教学素材,这是国际经济法开展双语教学的优势条件。

鉴于学生的意愿关涉国际法学科双语教学的效果,应当赋予学生选择是否参加双语课程的权利,国际法学科双语课程可设置为专业选修课。至于课时,应依国际法学科 3 门课程的教学内容而定,但是,在同等教学量的情况下,较之纯中文授课,应适当增加双语教学课程的课时。同时,考虑到我国学生的英语总体水平和法学专业知识习得情况,国际法双语课程适宜在大学三年级向法学专业学生开设,并在二年级开设法律英语作为其前置课程。

另外,关于考核方式的设置,应突破传统的期末闭卷考试方式,探索形式多样的、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双语教学效果的考核方式,包括开卷考试、加大对学生平时课堂表现和课后学习的评价比重等。

2. 教材的选用。

目前,国际法双语课程的教材来源有两个:一是英文原版教材,二是任课教师根据国内中文教材篇章结构,参考英文教材和材料编写的教材。英文原版教材大都体现英美法系的特征,与我国的法律体系特点和法学教育方式差异较大,因此,选用英文原版教材面临着如何合理地本土化的问题,即适应我国学生英语水平和知识结构需要,这需要任课教师根据教学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任课教师编写的教材固然比单纯采用中文教材教学效果更佳,但是,这

会给任课教师增加很多额外的工作量,^[2]并且也存在教材内容和英语文字水平是否能与国际真正接轨的问题。

因此,解决国际法双语课程教材选用难题的合理路径是组织有经验的专家和学者用英文编写高质量的国际法课程统编教材,这也是国际法双语教学迈向规范化和标准化的良好开端。

3. 教学方法。

国际法双语教学应当秉承以学生为主体的精神,在教学方法上实现两个转变:一是变教师单向授课为师生互动对话;二是变侧重理论知识讲授为强化案例教学。

如前文所述,学生的参与度与积极性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师生互动对话式的教学方法能提高学生课堂的参与度,促使学生积极思考国际法专业问题,同时锻炼学生英语思维和表达能力。具体而言,任课教师可通过指定课外阅读英文文献、课堂组织主题讨论等方式实现与学生的互动。

国际法学科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单纯的理论讲授难免让学生感觉乏味,影响教学效果,引入案例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兴趣。具体而言,在国际法双语课程案例教学中,任课教师首先应根据教学内容选择合适的案例,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篇幅恰当;其次,可借鉴英美法系国家案例教学中广泛采用的“发现问题——找到规则——分析问题——得出结论”(IRAC公式)方法,^[3]培养学生的法律推理能力;再次,教师的职责是引导学生积极投入案例的分析并发表自己的观点,不宜直接或过多地阐述自己的观点。

4. 授课语言。

国际法双语课程授课应当尽量多地使用英语,当然也要考虑授课对象——学生的英语水平,在各个教学环节灵活运用授课语言:在解释概念时,如果多数学生表情茫然,要适当地用中文讲解,以确保学生正确完整地理解授课内容;上课持续较长时间,学生呈现疲态,反应速度变慢时,也可用中文讲解。但

是,从总量来看,英语授课至少应达50%以上。

5. 教学环节。

除了传统的案例研究、模拟法庭等实践教学方式,在国际法双语课程案例教学中,应探索形式更为多样的实践教学环节。以国际经济法为例,可以组织学生参观外贸企业、外资企业、运输公司、银行、保险公司等,让学生直观地感受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的现实环境,体会国际货物贸易、国际货物运输、国际货物运输保险、国际贸易支付、国际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等法律制度在实践中是如何运用的,这可以帮助学生巩固课堂上所学的理论知识,提升教学效果。

6. 师资培养。

师资是提升国际法学科双语教学效果的关键。提高国际法学科双语教学师资的途径主要有3个:一是通过培训和进修,提高本土现有的国际法课程任课教师的双语教学水平,二是聘请国外学者,三是引进海外留学归国人员。由于各个学校实力和水平的悬殊,后两个途径不具有普适性,也不是治本之法。国际法学科双语教学的师资应立足于本土现有国际法课程任课教师的培养。当务之急是由教育部组织双语教学师资的专门培训,培训宜分学科进行,国际法学科双语教师的培训内容除了法律专业英语,应着重关注国际法双语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另外,国家留学基金委和各省政府留学基金项目也应当优先考虑国际法课程双语教师出国进修。

〔参考文献〕

- [1]莫世健.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法双语教学模式思考[J].中国司法,2007(6).
- [2]李建忠.国际私法双语教学的困境与对策分析[J].浙江理工大学学报,2009(6).
- [3]石慧.国际经济法课程双语教学的实践[J].中国大学教学,2011(1).

(责任编辑 陈晓姿)

高校经管类专业实验教学模式改革与创新研究

——以广东石油化工学院为例

罗永华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广东茂名 525000)

[摘要] 在信息化时代, 经管类专业实验教学应该明确实验教学目标,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 改革传统实验教学方法和手段, 通过构建一个基于 ERP 实训平台的经管类专业实验教学新体系, 以培养学生进行创新和创业的能力。

[关键词] 信息化; 经管类专业; 实验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4-0062-03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中国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全面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与实践能力, 为社会培养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创新型应用人才。而对于经管类专业的大学生而言, 创新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及工具, 搭建一个教师“启发式”教学与学生“体验式”学习的平台, 对于提升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教学质量及人才培养水平, 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就广东石油化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而言, 目前主要开设了会计电算化、审计、市场营销、综合物流模拟、国际贸易实务之报关报检等实验项目, 营销模拟、证券模拟、统计分析等实验也在进一步规划和实施当中。因此, 整合现有实验教学资源, 创新实验教学方法和手段, 采用当前非常时兴的 ERP 软件及 ERP 沙盘, 构建一个基于 ERP 实训平台的经管类专业实验教学新体系, 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一、确立基于 ERP 实训平台的实验教学目标

实验教学目标的确立, 主要在于通过对学生进行实验技能、实验原理、实验方法的培训, 在巩固和应用所学理论知识的基础上, 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促进知识向能力转化, 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1] 根据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经济管理类专业实验教学的实际情况, 构建 ERP 实训平台的实验教学目标可以从以下两点来说明:

第一, 从属于某一门理论课的实验教学目标, 应该根据这门课程的特点来设立。如对管理信息系统而言, 实验教学目标是要让学生在系统掌握 MIS 理论的基础上, 能够熟练地操作一个完整的 MIS 系统, 所以开设了 8 个学时的验证性实验。而对于会计电算化而言, 其实验教学目标是要让学生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的会计知识、熟练地运用会计电算化软件处理各种账务, 因此, 开设了 64 学时的综合性实验。

第二, 经管类专业综合性实验教学目标的确定。目前,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经管类专业主要涉及会计学、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市场营销、市场营销(物流方向)、国际贸易等专业, 各专业之间互相渗透和融合, 涉及的专业知识面较广且不断更新, 仅靠传统单项实验的教学模式使得学生很难将分散在各专业课程中的现代经济管理理论和方法融会贯通并加以有效运用。因此, 高校可以尝试通过开展综合性的经管类专业实验教学课程, 使大学生既能自主地综合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 又能系统地进行创造性、创新性实践的尝试。而 ERP 沙盘及系统的出现, 恰好解决了这一难题。如在沙盘对抗模拟中, 要求学生分组扮演企业的各种角色, 在竞争的环境下, 通过

[收稿日期] 2012-02-20

[作者简介] 罗永华(1979-), 男, 湖南永兴人,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团队协作模拟完成企业的整个运营流程;^[2]同时要求学生能够根据市场环境的改变和竞争对手行为的变化来灵活调整经营战略和策略,以实现自身的经营战略目标,最终达到既使学生能够熟练掌握经管类专业的基本理论方法和基本技能,又能够灵活地运用所学专业知识来解决现实中面临问题的能力,从而真正做到增强自身探索、研究、开拓、创新能力的教学目的。

从以上可知,基于 ERP 实训平台的实验教学目标更多的应该是培养学生的综合运用知识能力,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改革基于 ERP 实训平台的实验教学方法和手段

1. 改革实验教学方法。

传统的实验教学模式多为演示性、验证性的,不利于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发展和提升,更不利于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培养。这就要求高校在实验教学设计时,应进一步加强综合性、设计性及个性化实验项目的设计。^[3]因此,学院根据专业教学计划和实验教学的要求,按照人才培养的要求,在遵循教学规律的基础上,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安排实验教学项目。一是做好会计手工模拟实训,该实训强调会计课程基础的动手操作能力的培养,特别注重学生对会计凭证制作、使用、传递、汇总和分析能力的培养。二是加强验证性实验,主要是对各类主流经济管理应用软件的学习和应用,如会计信息化软件操作、管理信息系统的操作等。通过对各种软件的操作来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及其应用能力的培养。三是强化实践能力的培训,主要强调学生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主要是专业知识的仿真模拟和实际场景决策模拟实验,如沙盘模拟、企业经营模拟等。四是注重实验项目的创新,强调由模拟型实验向综合型、实战型实验转变,努力实现创新创造。在学生实验、实习、实践中,不再像传统实验只停留于教科书中的某一实验,而是从现实应用中提取素材,如通过参与中国创业实习网的全国创业大赛、参与广东省的挑战杯大学生创业大赛等重要赛事来检验学生的创新及创业能力。

2. 创新实验教学手段。

随着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实验教学手段也应该与时俱进,因此,经管类专业实验教学手段应与现代化的教学方法相结合,在沿用传统有效的实验教学手段的基础上,注重对 IT 技术的引进和吸收。如在会计实务

中首先采用的是手工模拟实验,注重对会计凭证的制作、统计和分析,使学生能够对会计工作流程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在此基础上,结合用友会计信息化软件,使学生能够熟练运用计算机对会计帐务进行处理,通过系统的训练,可以大大提升会计专业学生利用计算机进行财务处理和会计核算的能力。

此外,为了更好地做好实验教学,实现经管类专业实验教学资源的共享,应该构建一个以校园网为依托的网络实验教学平台,以实现整个学校实验课程信息发布与查询、多媒体视频点播、网络教学、自测与考试等教学功能,而且通过该平台的建设,可以使全校师生完全基于网络来完成相关的实验教学活动,从而大大提升经管类专业实验教学和管理的效率。

三、构建基于 ERP 实训平台的经管类专业实验教学新体系

如图 1 所示,目前我校经管类专业在实验教学方面只是实现了部分专业课程的基础实验、课程单元实验教学,即第一层面和第二层面的简单实训课程要求,建设完善的第三层面的课程综合实验、第四层面专业综合实验和第五层面创新(创业)实验是今后经管类专业实验教学改革方向和重点。



图 1 经管类专业实验教学体系模型

因此,结合广东石油化工学院的实际情况,通过整合现有的软硬件资源,围绕经管类专业实验教学目标,拟构建一个以集会计信息化、综合物流实训、国际贸易实训及 ERP 沙盘模拟及创业实训四位一体的 ERP 实训平台。

1. 会计信息化平台。

在会计信息化平台的构建中,我们采用的是用友的会计信息化软件(用友通)及用友的审计软件,其实训项目主要包括管理会计、成本会计及计算机审计三大部分,其中管理会计和成本会计整合在会计电算化实训课程中开出,课时累计 64 学时,实训项目主要包括总账处理、报表分析、成本管理、项目管理等模块。而计算机审计单独作为一门实训课程开出,累计 32 学时。通过真实模拟从审计准备、审

计实施到审计终结阶段的审计工作全过程,帮助学生掌握计算机辅助审计技能。

2. 综合物流实训平台。

在综合物流实训平台的构建上,我们采用的是北京博导前程公司的博星卓越综合物流实验教学系统,该系统通过模拟真实物流商业运作为主的教学活动,同时配套辅助以虚拟银行、考试中心、EDI、WMS等教学环境,使学生从大的教学环境到具体的应用能够有直观的认识,从而完成教学的认知性和验证性实验任务。同时将各个子系统的商业活动区分为具体的岗位,并赋予不同岗位不同的职责和任务,使得学生可以从具体职责任务的完成获得参与教学活动的感性认识,了解教学专业知识的具体运用,体会教学专业知识的作用,进而验证教学原理或规律,实现认知性和验证性实验的教学目标。由于是验证性实验,课时设置8学时,作为《物流管理》理论课的补充。

3. 国际贸易实训平台。

国际贸易实训平台的建立,将为学生提供的是现行国际贸易全程仿真的实验和实习环境,软件将外贸交易过程中涉及到的外经贸局、银行、保险公司、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海关、外汇管理局和外运公司等多个角色进行了很好的体现。学生在软件中可仿真模拟进、出口公司进行国际贸易交易,贸易磋商、签订合同、进出口许可证申请、产地证明、审证改证、开具商业发票、货物托运、商品投保、报关、报验、制单结汇、审单付汇、业务善后、发送单证等环节可得到充分的锻炼和运用。

4. ERP 沙盘模拟及创业实训平台。

依托ERP沙盘模拟及创业实训平台,我校主要拟开设ERP沙盘模拟对抗及创业实训两项综合性实验。

首先,在ERP沙盘模拟实训课程中,可以假定一家已经经营若干年的生产型企业,把参加训练的学生分成6~8组,每组5~6人,每组各代表不同的一个虚拟公司。在这个训练中,每个小组的成员将分别担任公司中的重要职位(CEO、CFO、市场营销总监、生产运营总监等),每队要亲自经营一家拥有1亿资产且销售良好、资金充裕的公司,连续从事6~8个会计年度的经营活动,在市场竞争激烈环境下,公司要如何保持成功及不断的成长是每位同学面临的重大挑战。该课程涉及整体战略、产品研发、设备投资改造、生产能力规划与排程、物料需求计划、资金需求规划、市场与销售、财务指标分析、团队协作等

多个方面。学生要在规定的模拟年限内,在顾客、市场、资源及利润等方面进行一番真正的较量,而且每一轮模拟之后,都要进行综合分析,从而有助于学生形成宏观规划、战略布局的思维模式,同时使学生对公司业务达成一致的理性及感性认识,提升其探索、研究、开拓、创新的能力。

其次,在创业实训项目中,目前学校主要通过和中国创业实习网合作,利用其网上创业模拟平台,使学生在网络仿真环境中完成创业实训。这种教学模式的最大好处是不需要占用实验资源,学生在宿舍通过自己的计算机直接访问中国创业实习网,按照老师事前布置的内容及相关操作说明,完全是一种开放式的实验教学,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且中国创业实习网每年都会举办全国性的创业大赛,通过大赛可能真正检验学生综合运用理论经济管理知识的能力。此外,还可以利用用友公司开发的“创业者”电子沙盘,或者金蝶公司开发的“经营之道”及“创业之星”两种创业仿真模拟软件。通过创业仿真模拟,也可以使学生亲身体验创业的全过程。鉴于上述两个实训项目对时间的要求比较集中,因此,在授课安排上,适宜安排在学期期末且集中2周左右的时间进行,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随着现代经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的“课堂填鸭式”实验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信息化时代经济管理类人才的培养需要。对于广东石油化工学院而言,要加强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实验教学,应明确经济管理类专业实验教学目标,通过整合现有的软硬件资源,构建一个集会计信息化、综合物流实训、国际贸易实训及ERP沙盘模拟及创业实训四位一体的基于ERP实训平台的经管类专业实验教学新体系,以培养学生进行创新和创业的能力。

[参 考 文 献]

- [1] 孙良文,魏喆妍.财经类院校经济管理专业实验教学模式研究[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07(4).
- [2] 劳本信.基于ERP平台的经管类专业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式[J].中国教育信息化,2009(9).
- [3] 刘桂艳,董继刚,牛红军.谈新形势下高等院校经济管理本科专业实验教学模式的创新[J].山东农业教育,2008(2).

(责任编辑 光 翟)

我国传统体育特点探析

梁 励

(江苏教育学院人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中国传统教育重视体育教育, 并将其置于学校教育的重要地位, 对教育的传承与人才的培养产生了积极影响。我国传统体育的特点是: 追求养生与体育相结合; 体育与社会及人的发展相结合; 体育与品德教育相结合; 体育与习行的教学方法相结合。这些特点为今天学校的体育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关键词] 体育; 传统体育; 体育教育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4-0065-03

“体育”一词是人类进入近代社会以后才出现的, 但是体育现象是与人类社会同时诞生的。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不仅在其他各个方面创造出了令人惊叹的奇迹, 在体育方面也同样表现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精神。我国传统体育历尽沧桑而不衰, 至今仍然充满了生命力。它给这个古老的民族不断地注入青春的活力, 使我们中华民族历尽千年的兴衰沉浮仍然保持着蓬勃的生气。本文通过探析我国传统体育的特点, 旨在“古为今用”, 为当今我国体育教育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一、传统体育与追求养生相结合

传统体育注重养生, 即摄养身心, 延年益寿, 这是视人的生命为最宝贵的思想。古代养生的目的, 在于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 在于祈求幸福的降临。古代典籍《尚书·洪范》篇中就对人的“福”分别提出五条标准, 即“一曰寿, 二曰富, 三曰康宁, 四曰攸好德, 五曰考终命”。在五福标准中, 有三项指标都与健康长寿有关, 其中长寿是评判幸福的首要指标。在我国第一部诗歌集《诗经》中就有大量关于长寿的词语, 如“永锡难老”, “为此春酒, 以介眉寿”, “南山之寿”, “万寿无疆”等。其中有些词汇直到今天仍然经常被用来祝福人的健康长寿。有了健康长寿的愿望, 人们就开始积极地用行动去实现这一目标。在

长期的劳动生活及切身体验中人们逐步认识到, 人才是主宰自己生活命运的人, 人的吉凶祸福, 都不是命中注定的。《左传》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夫民, 神之主也, 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随着生产力的水平提高和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 养生开始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

我国传统医学的发展, 也为古代养生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养生在于运动, 古代思想家和教育家荀子就认为: “养备而动时, 则天不能病……养略而动罕, 则天不能使之全”(《荀子·天论》)。在这里, 他已明确意识到养生直接关系到人的身体健康, 而运动又对人的健康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古代著名医学家华佗非常强调运动对于健康的重要性, 他认为人的身体应当经常运动, 只有运动才能使吃进去的食物得到消化, 血脉得以流通, 不生病。这就像房门的轴一样, 总是在运动, 所以不会腐朽。在总结前人导引术的基础上, 为强身健体, 他还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动作与神态, 编制了“五禽戏”。练习者在做五禽戏时, 有虎的蓄势欲扑; 有鹿的奔驰反顾; 有熊的倒卧翻滚; 猿的攀枝自悬和鸟的展翅欲飞。这些动作刚柔兼济, 有疾有徐, 全身上下都参与运动, 有着良好的锻炼效果。“五禽戏”可谓是现代体操的萌芽。据《后汉书·方士列传·华佗传》记

[收稿日期] 2011-11-12

[作者简介] 梁 励(1956-), 男, 江苏南京人, 江苏教育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载,其弟子吴普由于长年坚持行“五禽戏”,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养生是目的,运动是途径,长寿和健康的体魄无不与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代养生和体育运动的结合,形成了“生命在于运动”的信念,对于现代人起了示范作用。

二、传统体育与社会及人的发展相结合

孔子曾说过“足食”、“足兵”是治理国家的首要问题,他认为:“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即如果不教百姓讲武功,习战事,就是背弃了人民,从而也会从根本上失去政权。这里,孔子已把体育(主要指军事体育),当作治国安邦、稳定社会的头等大事来加以看待,在他开办的教育中,强调礼、乐、射、御,这些内容都是与学校体育锻炼有关的内容。孔子重视学校体育的思想,对古代教育产生相当影响,许多学者都受其启发,能从体育促进人的身心发展的角度论及体育的重要性。北宋教育家胡瑗执掌国子监时就告诉学生:“食饱未可据案或久坐,皆于气血有伤,当习射、投壶、游息焉”(胡瑗《安定言行录》)。明末清初教育家颜元就提倡:“习行礼、乐、射、御之学,健人筋骨,和人血气,调人性情,长人仁义……为其动生阳和,不积痰郁气,安内抒外也”(颜元《习斋言行录》)。这里,他充分肯定了体育有益于健身、促人发展的作用与价值。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更是继承了这一传统,重视体育在国民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他把体育视为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基础。就教育本身而言,他认为身体的健康对人的发展极为关键,是体力、智力和品德的物质载体。因此,他主张:“少年用功本甚佳事,但若为此转致体力受伤,便是愚事”,并总结说:“夫学所以饰躬,使身体受伤,学何用耶”?所以,他提倡学校从学生体育抓起,提高身体素质,并视为国之兴亡的大事,“一国一种之盛衰强弱,民为之也,而民之性质,为优胜,为劣败,少成为之也”(严复《蒙养镜序》)。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在民国建立之初,就将“军国民教育”定为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方针之一。军国民教育,就是军事体育,在国衰兵弱的时代,他认为挽救危亡,反对外来侵略和打破封建军事割据,就要“行举国皆兵制”,即发展军国民教育。后来,他将军事体育发展成为普通体育,并作为新式学校的必修课程。他认为体育对人的发展至关重要,体育是培养“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的重要环节,“健全的精神,必宿在健全

的身体”。为此,他鼓励学生“各就所好,多多运动”,通过体育锻炼,达成良好健康的身体,从而振奋精神。可见,传统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方面,也有着积极作用。

三、传统体育与品德教育相结合

我国古代体育产生与发展的经济基础是“以农立国”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其思想核心就是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天人合一,顺应自然,持续发展。这使得我国古代体育教育自产生之日起,就走上了反省内求的道路。在此基础上,我国古代体育教育多从伦理、道德等领域来解释健康的人,把人归之于仁、义、礼、智、信之德行,把人性归之于善。

西周时,已经将“射”作为“六艺”教育之一,成为学校教学的重要内容。《礼记·内则》就记载:“年十五学射御”。孔子在教育中十分注重体育,他把射、御等体育运动项目列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他不仅要求弟子们精通礼乐,也要善于射御,通过教育“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孔子本人就多才多艺,精通射御,能歌善舞,他经常与弟子们参加诸如登山,射箭、远足等与体育有关的活动。在人生70古来稀的古代社会,他活了73岁,显然是长寿了,这与他主张体育锻炼,有着健壮的身体不无关系。

孔子主张教育应使人身心和谐,文武兼备,在他的大力提倡下,射箭、驾车被视为学校教育的内容之一,并对“射”提出了“德”与“体”两方面的要求,即以射观德,又以射强体。儒家典籍《礼记·射义》中体现了孔子这一思想,“射击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故事之尽礼乐,而可数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圣王务焉”。“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这里,古代教育家特别强调寓德育于体育锻炼之中,强壮的体魄,还须伴之以高尚的品德;否则,以强欺弱,以武逞强,有违做人的道德准则。在传统体育实践中,武术练习就十分讲究武德,并视之为习武之人的根本。传统体育教育寓德于体,不仅仅在于学生的强身健体本身,还从其中陶冶学生胜不骄、败不馁,尊重对手,光明正大、严于律己的品性。这种重视体育,以德观艺、道艺兼求的做法值得今天体育教育加以借鉴继承。

四、传统体育与习行的教学方法相结合

传统体育讲究习行,即重视实际的演练。如教

学生射箭的技艺时,就要提出“五射”的严格要求,即“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白矢”就是射箭力度要大,能透靶;“参连”,就是前射一箭,后射三箭连成而中,俗称连珠箭;“剡注”,就是箭不可从高而落,而是水平直射,不能形成弧度;“襄尺”就是指射箭时臂直如箭,肘平而稳;“井仪”就是射四箭皆要中靶,并呈“井”状分布。凡男子必须完成射的教育,不能射是失礼和缺乏才能的表现。学生在学“驾御”时,则讲究“逐水曲”,就是驾车经过曲折的水道而不至于坠入水中;“过君表”,就是驱车时能准确地通过模拟设置的辕门而不至于发生撞击;“舞交衢”,就是驱车行于通衢道口,旋转快慢适度,姿态优美,有如舞蹈。这些射御的技艺要求,仅凭学习射箭和驾车的一般知识是难以达到的,必须经过严格反复的训练,通过熟能生巧的习行阶段,才能达到。

传统体育强调习行的同时,许多教育家主张将习行演练提高到理论层面,让人们对此加深认识,并提高习行的效率。荀子就曾提出生命在于运动、运动有益人体健康的观点,他认为人的身体健康与否,并不是由天来决定的,而是由人的“养”与“动”的状况来确定的,从而强调了通过运动促进人体健康的意义。朱熹也提倡学校教育要习行结合,寓体育锻炼于日常生活之中。他认为小学阶段的任务是“教之以事”,即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义,使儿童在做事的活动中,由近及远,由易到难,刻意模仿,“积久成熟”,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并从中锻炼其健康的体魄。颜元也认为:“养身莫善于习动,夙兴夜寐,振起精神,寻事去做,行之有常,并不困疲,日益精壮”,“常动则筋骨竦,气脉舒”(颜元《习斋言行录》)。他还批评不注重体育锻炼的现象,“终日兀坐书房中,萎隋人精神,使筋骨皆疲软,以致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生民之祸,未有甚于此者”(颜元《朱子语类评》)。这里,他充分肯定了“习”、“行”、“动”对一个人身心发展的重要性。

五、传统体育与民间娱乐活动相结合

我国古代的传统文化是非宗教性的以人为本的文化,造就了我国古代体育的非宗教的世俗性,富于

务实,在运动中寻求一种和谐的体育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我国古代体育教育群体本位谦逊、和合的价值观,主张人们在体育活动中不以个人成败论英雄,高贵由中,和谐相处,事必恭谦。所以,我国古代的体育活动,很少看重它的竞技功能,而是把它看作一种愉悦身心的活动。如放风筝、荡秋千、拔河、登高等民间娱乐体育活动。大教育家孔子就非常喜欢登山,并发出“登东山而小鲁”的感慨。古代文人骚客,亦有登高远眺的爱好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质。荡秋千也是我国一项传统的体育项目,它的起源与人类在原始社会攀援树木、采集果实、在树枝上飘来荡去有着直接的关系。为什么将这项活动的名字称为“秋千”,据《汉武帝后庭千秋赋》记载,秋千就是千秋的意思,汉武帝祈福祝愿自己有千秋之寿,所以汉代的后宫都喜好秋千这一娱乐活动,并逐渐流传到民间,成为我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传统体育活动。

中国历史上,人们为了丰富自己的生活,愉悦身心,创造了许多民间娱乐体育活动。舞狮子、耍龙灯、踩高跷等民俗体育,常常作为一种娱乐活动,在不同的场合进行表演,以增添欢乐的气氛,从而将娱乐休闲与体育锻炼结合起来,并且广泛开展。如气功、武术等民间体育活动源远流长,作为一种健身活动,旨在延年益寿,对后人强身健体影响极大。再如风靡世界、倍受人们喜爱的足球、曲棍球等球类活动,围棋、象棋等棋类活动,击剑、射箭、马术、游泳、体操、滑冰等项目均起源于我国,并先后流传于国外,促进了世界各国之间体育文化的交流。这些民间娱乐活动在历史上或多或少对学校体育产生影响,如文人要求精通棋、琴、书、画,所以,棋类运动在我国传统体育中占有重要地位。近代学校,自开设体育课程以来,就将武术、体操、足球等项目列入教学内容,这些都是来自民间体育的瑰宝。正因为体育与民间娱乐活动相结合,才出现了我国传统体育民间化、通俗化、娱乐化和季节性、地域性的特征,其魅力直到今天还不断地显现出来。

(责任编辑 光 翟)

论罗家伦教育思想中的民族主义

孟丹青

(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 江苏南京 210042)

[摘要] 罗家伦是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即认为学术独立是民族独立的前提,大学应该以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为己任,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建设服务。他在担任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校长期间,在这种教育理念的指导下,借鉴西方大学先进的管理体制和理念,有效地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及其现代化进程。

[关键词] 罗家伦; 教育思想; 民族主义; 民国时期

[中图分类号] G40 - 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 - 1696(2012)04 - 0068 - 05

一、民族主义的兴起

罗家伦是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在20世纪20至30年代曾担任国立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两所大学的校长。他在长期的教育实践过程中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教育理念,即他始终从民族的角度来思考大学的使命,把大学发展和民族文化创造以及国家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

民族主义是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原动力之一,尤其是在民族存亡的关头,忧国忧民的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更容易唤醒知识分子的民族情结和爱国激情。蒋廷黻曾经说过:“无疑的,我们当代的中国人都是民族主义者。抛开精神方面问题不谈,中国已因乡土观念和氏族观念而积弱。如果实行高度的民族主义,对中国人一定是有好处的。以当前政治而论,民族主义几乎成了教育界的宗教。”^{[1](P.83)} 关于民族主义的定义,有学者指出:“中国民族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就是在现代化和东西方文化的推动下,中国人民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历史。”^{[2](P.219)}

从十八、十九世纪开始,民族主义成为一股世界性的潮流,民族意识的觉醒成为建设现代国家的标志,民族国家的形成被认为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民族主义’这个词主要指一

种心理的现象,即个人在心理上从属于那些强调政治秩序中人们的共同性的符号和信仰。”而“‘民族’指居于明确边界的领土上的集体,此集体隶属于统一的行政机构。……民族和民族主义均是现代国家的特有属性。……民族若没有形成,就绝不可能会有民族主义,至少绝不会有现代形式的民族主义。当然,我们不能说,没有民族主义就没有民族。”^{[3](P.141)} 而他对民族国家的定义是:“民族国家存在于由他民族国家所组成的联合体之中,它是统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对业已划定边界(国界)的领土施行行政垄断,它的统治靠法律以及对内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护。”^{[3](P.147)}

安德森对民族下的定义是:“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limited)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4](P.5)} “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最终,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4](P.7)}。这种想象的民族共同体能够在人们心中唤起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自豪感,使他们心甘情愿为这个共同体献身,从而有利于民族国家的建

[收稿日期] 2012-02-12

[作者简介] 孟丹青(1970-),女,安徽淮南人,《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编辑,副编审,博士。

立。这也是罗家伦教育思想中民族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

二、罗家伦教育实践中的民族主义

罗家伦把大学作为建设国家的重要力量,强调学术独立是民族独立的基础。1928年9月,他在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做的讲演《学术独立与新清华》中说:“国民政府于收复旧京以后,首先把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正是要在北方为国家添树一个新的文化力量。”他进一步指出:“国民革命的目的是要为中国在国际间求独立自由平等。要国家在国际间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必须中国的学术在国际间也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把美国庚款兴办的清华学校正式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正有这个深意。我今天在就职宣誓的誓词中,特别提出学术独立四个字,也正是认清这个深意。”“从今天起,清华以往留美预备学校的生命,转变而为国家完整大学的生命”^{[5](P.18)}。罗家伦把学术独立抬到民族独立的高度,从民族复兴、民族文化建设的角度来考虑和认识大学的任务和使命,把大学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学术独立应该为民族独立服务,大学应该为建设国家服务,“欲求中国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独立平等,当求中国学术在世界学术界的独立平等”。他希望通过教育为建设现代民族国家而努力,在民族存亡关头,使教育成为建国抗战的伟大力量。

罗家伦指出中国以往的教育方针是借贷式的,“唯一的目的,就在转贩外国已成的学术。留美预备部,就是这种态度的具体表现。这种态度,当然有它片面的成立的理由,但是从民族的观点来看,一个民族要求独立、自由、平等,必须在文化方面、学术方面,先求得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方可。”^{[6](PP.51-52)}他认为国立大学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流大学就很难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难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所以他在清华大学时,致力于建设学术独立的新清华,立足国内,发展大学本部,取消全部毕业生派遣留学的做法,把清华由殖民色彩很浓的留美预备学校转变为独立的国立大学,彻底改变了清华大学的面貌和性质,这些都体现了他教育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结。

罗家伦主持中央大学工作的十年,正是中华民族国难深重的十年,空前的民族生存危机激发起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罗家伦视“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为大学义不容辞的使命,他在《中央大学之使命》中说:“办理大学不仅是来办理大学普

通的行政事务而已,一定要把一个大学的使命认清,从而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以达到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现在,中国的国难严重到如此,中华民族已临到生死关头,我们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当然对于民族和国家,应尽到特殊的责任,就是担负起特殊的使命,然后办这个大学才有意义。这种使命,我觉得就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7](P.236)}

他认为中央大学“应以形成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为理想,使国立大学与民族生存发生密切不可分解之关系;国难至此,中央大学尤应对于中国担负十九世纪初中叶柏林大学对于德意志所负之责任,以此倡导成为全国之学风”^{[8](P.123)}。罗家伦延续了他在清华大学时的办学理念,把大学和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认为大学不只是求学的地方,更应该是国家和民族灵魂的体现。“民族文化乃民族精神的表现;而民族文化之寄托,当然以国立大学为最重要。英国近代的哲学家荷尔丹(Lord Haldane)曾说:‘在大学里一个民族的灵魂,才反照出自己的真相。’可见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大学若不能负起来,便根本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更无法可以领导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活动。一个民族要是不能在文化上努力创造,一定要趋于灭亡,被人取而代之的。”^{[7](P.237)}国立大学之重要,就在于它是“民族文化乃至民族精神的表现”,是“民族文化的寄托”。因此,“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为本大学的使命”,作为高等学府的大学生应该当仁不让地肩负起创造文化的使命,成为民族文化创造的主力军和主力军。他鼓励中央大学师生认清自己的使命,“时刻把民族的存亡一个念头存在胸中,成为一种内心的推动力,由不断的努力中塑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以完成复兴中国民族的巨大事业”^{[7](P.237)}。

罗家伦教育思想中的民族主义既来源于中国传统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爱国思想的影响,又受到德国古典大学理念的影响,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代背景下,他更加重视德国大学在普法战争中复兴民族精神的一面。罗家伦认为,当时中国的局面,正和昔日的德意志在普法战争失败之后的情形类似。他十分推崇德国著名哲学家费希特在法军压境,国内人心涣散的危急时刻,克服种种障碍“围城讲学”,以唤起国民民族意识的做法和主张。罗家伦指出德国的复兴“其具体的表现便靠冯波德(Wilhelm Von Humboldt)创立的柏林大学,和柏林大

学哲学教授菲希特(Fichte)一般人,对于德国民族精神再造的工作。所以现代英国著名的历史家古趣(G. P. Gooch)认定创立柏林大学的工作,不仅是德国历史上重要的事,并且是全欧洲历史上重要的事。尤能使我们佩服的便是当年柏林大学的精神。在当时法军压境,内部散乱的情况下,德国学者居然能够在危城之中讲学,以创立德意志民族文化自任。”^{[7](P.238)}他希望中央大学以柏林大学为榜样,“我们办学校的要做菲希特那般人,我们的中大要做柏林大学,要造成一个普鲁士以为统一的德意志之基础。我们要看得远大,脚踏实地地干,在强固的民族意识之下造成整个的强固的中华民族,看国家复兴起来。”^{[9](P.278)}正因为他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意识,并且用这种精神激励广大师生,使中央大学在战火纷飞之中仍然弦歌不绝,学术水平持续发展,创造了战争中的文化教育奇迹。

三、罗家伦对民族与民族国家的研究

在抗日战争期间,罗家伦曾对民族国家进行过系统研究,大力提倡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1938年2月,罗家伦创办《新民族》周刊,阐述他的民族观和国家观,“拥护发挥抗战建国的国策”^{[10](P.128)}。离开中央大学以后,罗家伦将其在中央大学的演讲重新整理,并合成20余万言的《新民族观》一书,1946年2月于重庆出版。该书分“民族与民族性”“民族的国家”“民族与种族——中华民族血统的混合性”“民族与地理环境”“民族与人口”“民族与经济”6章,这部著作集中体现了罗家伦对民族问题的理论探索。

罗家伦认为民族性的形成必须经过“民族情感”“民族意识”“民族风格”3个阶段。所谓民族情感,即指民族成员之间“聚族而居”,朝夕相处,在共同的语言、信仰、生活环境和社会风俗基础上产生的对本民族利益、荣誉和前途爱护的一种情感体验,是“形成民族性的基础”。但情感的力量很大,流动性也大,“所以必须进一步形成‘民族的意识’,民族才能凝成固体”。民族意识是民族精神的凝聚和升华,它由“历史和习尚”“利害和兴趣”“理想和愿望”“三个晶轴交互构成”。“历史和习尚”是“埋伏在民族里的历史根性”,“利害和兴趣”注重在现阶段,而理想和愿望则着眼于民族的未来。“把这过去、现在、未来三部分联合在一起,于是民族意识的发扬乃能‘六辔在手’。”最后,“民族意识”经过“靡荡鼓铸”形成“民族风格”。^{[11](PP.110-113)}

他说:“民族的国家(Nation State)是一个近代的观念,不但是观念,而且是力量。……到了秦始皇大

一统的局面以后,中国只有天下一家的观念,自然民族的国家这个观念,是无论如何不会产生的。”他认为:“现在一个民族的安全,无国家不能保障;民族的事业,无国家不能经营;民族的文化,无国家不能掩护;民族的地位,无国家不能提高;民族的进步,无国家不能开展;民族的愿望和理想,无国家不能达到。”^{[12](P.76)}民族不能离开国家,“国家是民族的国家,民族是国家的民族”,“民族是国家的躯干,民族性是民族的灵魂”,复兴民族的工作就是改造国民性以建设现代化的“民族国家”。他指出民族国家是“近代式民族的形成和近代式民族的发扬,乃是近代史上的产品,更是十九世纪以来国际政治里的狂潮”。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加上拿破仑的武功及其影响,“把法国的民族意识唤醒了”,而欧洲的其他国家“也在各自的民族意识之下,凝结起来了”。^{[12](P.93)}

就如有学者指出的,民族国家是在欧洲中世纪晚期出现并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普遍形成的“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几个世纪以来,随着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也由于无产阶级在夺取国家政权以后改造了民族国家的传统内容而保留了它的形式,因此民族国家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普遍的国家形式。自民族国家成为世界性的国家体系以来,它不仅是国内政治与法的根本主体,而且是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根本主体。”^{[13](P.264)}

20世纪40年代,罗家伦对民族、民族性、民族国家等问题的学理研究,潜意识里是希望通过唤醒国民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觉来提高民族凝聚力,促进国家统一和团结,使人民的力量集中到抗战和国家建设上来,唤起人们对“中华民族”的族体认同和对“中华民国”这一新建的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

罗家伦教育思想中的民族主义情结使他自觉利用民族爱国意识为新成立的国家政权服务,把高等教育纳入国家建设体系。他希望通过高等教育创造新的融入世界文明的民族文化,塑造新的适应时代要求的民族精神,培养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的人才,推动社会政治、经济组织、思想文化的现代化。罗家伦教育思想中的民族主义主要体现在他对建设现代化民族国家的热情和努力上。

如何使教育和学术成为建国力量是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经常思考的问题。包括胡适在内的少数精英知识分子敏锐地意识到,革命和破坏不能代替脚踏实地的建设。胡适强调“有为的建设必须先有可以建设的客观的条件:第一是经济能力,第二是人才。两件之中,专门人才更重要,因为有价值的建设事业

都是需要专门技术的事业。”^[14]任何国家建设,必须先有人才,没有人才,就不可能有国家建设,可见教育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胡适还区分了民族主义的3种形式:“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最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容易先走上前面的两步。”^{[15](P. 587 - 588)}

罗家伦选择的是建设现代化民族国家,现代化是罗家伦教育思想也是罗家伦民族思想的核心。罗家伦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希望中国早日实现现代化。他多次强调中国要想富强,必须走近代化的道路,而近代化的实质就是科学化。他曾经说过:“近代化这个名词,就是英文的 Modernization,就是摩登化。不过近来摩登 (Modern) 这个名词,被人用坏了,所以我此刻所讲的摩登化,与一般所谓摩登,毫无关系。我们知道一个国家,要能够独立存在于现代的世界上,就非经过近代化不可,……要明白什么是近代化,必定先要知道什么是近代文明的特质。近代文明的特质就是科学,所以近代化,就可以说是科学化。西洋近一百年来,科学完成了种种重大的演化,使世界一切事物,莫不受他的支配。如物质生活受他支配,政治社会的组织,受他支配,以至于学术思想,也受他支配。这是一种不可抵御的力量,顺之者存,逆之者亡。不受近代化的国家,在近代便无生存的余地。”^{[16](P. 384)}罗家伦的教育理念是和复兴民族、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政治诉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呼吁“把‘中华民国’建立为现代化的国家”^{[12](P. 113)}。罗家伦的民族国家理念吸收了西方政治文化精华,是先进的,他所提出的民族国家与封建时代的“王朝”“天下”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具有很强的现代性。他心目中的民族国家是现代化国家,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现代化,而不是封建专制落后的传统国家和某一个人、某几个家族的“王朝”。

四、罗家伦教育思想中民族主义的两面性

民族主义既是现代性的内在要求,也是一柄“双刃剑”。“民族主义转化为政治操作,就必然要和一定的价值观结合起来。”有研究者指出,“用什么样的价值观营造社会发展图景,奉行什么样的规则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形象。民族主义必然要对价值进行选择;如何选择,并不在于神话般古老的文化传统,而在于控制民族主义话语霸权的权力者包括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权力

的利益可以导致进步的、建设性的、温和的、和平的民族主义,也可以分娩出侵略性的、扩张性的、破坏的、专制的甚至是法西斯式的民族主义。问题不在于如何定义什么是‘民族利益’、‘民族平等’和‘民族自觉权’等理念含义,问题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里谈这些理念含义。归根结底,价值取向决定了民族主义的历史命运”^{[2](P. 298)},不同的价值取向同样也决定了民族主义者的历史命运。“由于其本身的现代性,作为普遍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与现代中国的其他意识形态,如进化论、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不仅兼容,而且相得益彰。”^{[17](P. 220)}也就是说,无论是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都可以打上民族主义的旗号,作为一种救国救民策略而对不同人群产生影响。因为罗家伦把中华民国当做新兴中华民族和民族国家的象征,所以他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也就打上为当时政治体制服务的烙印。特别是 1927 年国民政府成立后,确立了三民主义教育宗旨,开始把大学教育纳入国家政权机制之内,加紧对大学的控制。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教育精神逐渐为党派主义、专制主义所取代。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罗家伦教育思想中“五四”时期追求个性解放、个人价值的自由主义色彩减弱,而国家至上、个人服从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想加强。作为体制内教育家,他思想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倾向性也越来越明显。

作为北京大学蔡元培和胡适的得意弟子,同时在欧美名校游学多年,罗家伦既有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基,又深受西方文明熏陶,他的教育思想既有强烈的建设民族国家、维护国家主权的要求,又有强烈的思想启蒙和追求自由民主的要求。在他的教育思想中,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互相作用,互相依存的。虽然他作为国立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的校长,身处体制当中,不得不依附政府,客观上起着维护体制的作用,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对现代化建设的执著追求。他在治理大学期间,尊重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忍受了来自政府、反政府、教师、学生各个方面的压力,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大学的学术独立和自主发展。作为深受蒋介石赏识的人,罗家伦的报国理想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蒋介石的力量,所以随着蒋家王朝的失败,他的教育理想也终结。

民族主义作为推动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动力,构成了中国近代基本的思想意识形态,所以我们要看到民族主义内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罗家伦的民族主义不是狭隘的排外主义或封建保守的文化复古主

义,而是一种调和了现代民主自由精神的理性民族主义,建设现代化国家始终是他民族主义的核心,也是他大学建设的核心。

罗家伦认为大学应该完成两种使命:“对于人类知识的总量有贡献;能够适应民族的需要,求民族的生存。”^{[18](P.485)}大学不是个人求谋生手段与技能、追求物质享受的地方,而应负起对本民族和整个人类文明的责任,青年学生读书的目的不是追求个人功名利禄,而应肩负复兴民族、建设国家、造福人类的神圣使命与责任。罗家伦的教育思想应该说至今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建设仍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和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 [1]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M].长沙:岳麓书社,2003.
- [2]徐迅.民族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 [3][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 [4][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5]罗家伦.学术独立与新清华[A].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五册·演讲[C].台北: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
- [6]罗家伦.养成一种领导时代的健全人格[A].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五册·演讲[C].台北: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
- [7]罗家伦.中央大学之使命[A].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五册·演讲[C].台北: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
- [8]罗家伦.上行政院呈——缕陈发展中央大学步骤[A].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七册·函礼[C].台北: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
- [9]罗家伦.太平洋大战与中国前途[A].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五册·演讲[C].台北: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
- [10]罗家伦.新民族的周岁[A].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一册·论著[C].台北: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
- [11]罗家伦.民族与民族性[A].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二册·论著[C].台北: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
- [12]罗家伦.民族的国家[A].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二册·论著[C].台北: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
- [13]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 [14]胡适.今日可做的建设事业[J].独立评论,1933(95).
- [15]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A].胡适.胡适文集(第11册)[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16]罗家伦.中国近代化问题[A].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六册·演讲[C].台北: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
- [17]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 [18]罗家伦.敬祝母校三十周年纪念[A].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五册·演讲[C].台北: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 刘敏慧)

论近代徽州教育

胡晓飞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浙江金华 421004)

[摘要] 近代徽州宗族越来越多地承担起了发展徽州教育的责任, 成为近代徽州教育发展最主要的因素。近代徽州教育的发展情况大致说来主要有: 新式学堂的建立; 初等教育中职业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凸现; 女子私塾、小学堂等女校的出现; 出现了少量的教会学校等。

[关键词] 徽州; 教育; 宗族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4-0073-04

明清时期徽州素有“东南邹鲁”、“文献之邦”之称, 徽州文化的发展与徽商、徽州教育紧密相连。拥有雄厚财力的徽商热衷教育, 徽州教育也孕育出了大批徽州儒商, 两者交互作用成为徽州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但延至清末、民国, 徽商整体衰落, 原本源源不断的商业捐助已愈来愈不可得, 此时期徽州教育呈现怎样的态势? 这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一、传统时期的徽州教育

明清徽州教育发达, “人物之多, 文学之盛, 称于天下”, 以至“名臣辈出”(《休宁县志·风俗》)。在徽州地区不仅有府学、县学、书院、社学、塾学、义学, 还有书屋和文会。府学、县学属于典型官方性质。唐代歙县即设有府学, 历经变迁, 宋、明清各代官办府学、县学延续发展, 为科举选士之中心。书院则分官办和民办两类, 紫阳书院、斗山书院、崇正书院、还古书院因“主创人”的官方背景, 勉强归入官办学校。但从经费来源、经营管理上而论, 明清之际徽州 89 所书院均可划为民办序列。^①

徽州人历来重视教育, 特别是宗族参与教育的观念盛行, 因此社学、塾学、和义学属初等教育的机构分布零散但规模庞大。社学是遵照明朝“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 推行社学之制的政令开设的, 徽州六县“于邑之坊都, 居民辏集之处”共设立社学 462

所。清朝由于财力不济, 虽亦推行社学之法, 但成效不大, 塾学和义学逐渐取代社学成为蒙养教育的主体。塾学和义学多属不收束脩, 有的甚至还提供膏火, 此类教学机构的大量设置为贫寒子弟提供了与富贵子弟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机会, 凸显徽州各阶层教育机会均等的特点。书屋情况较复杂, 有的似今日之图书馆, 属私人读书、藏书之所, 如歙县岩溪书舍等等; 有的类似塾学和义学, 此类在徽州居多; 再有属文会之所, 其功能主要在于集一乡、一族之士子“偕功制义”, 通过“同类相求、同朋相照、同美相成”^[2], 共同提高, 以增强科考试中的竞争力。

明清徽州教育呈现出机构设置多样、且总数巨大的特点, 这是与徽州宗族对教育的重视分不开的。徽州宗族一向重视族众子弟的教育, 为使子弟能深刻谨记祖先的教诲, 多将重视教育的内容写入族规家训之中。如休宁雍正《茗州吴氏家典》卷一指出: “族内子弟有器宇不凡, 资禀聪慧而无力从师者, 当收而教之。或附之家塾、或助以膏火。培植得一个两个好人作将来楷模, 此是族党之望, 实祖宗之光, 其关系匪小”。《明经胡氏龙井派宗谱·祠规》亦强调: “为父兄者幸有可选子弟, 毋令轻易废弃, 盖四民之中士居其首, 读书立身胜于他务也”。为保证宗族的教育思想能够切实实施, 宗族多主动参与教学的

[收稿日期] 2012-01-18

[作者简介] 胡晓飞(1973-), 男, 浙江淳安人,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副教授。

① 徽州书院的总数实难统计。李琳琦先生在其相关著作中提出 89 所。

开展。从学校的建立到教师的聘任,从学生的一般教学到最终的科考,宗族无不做了周密的安排。徽州宗族几乎没有不开设私塾或义学的,财力充实的宗族甚至自办书院、书屋及文会等较高级别的教育机构。道光《徽州府志·学校》所载的黟县三所书屋即是如此:云门书屋,为三都汪氏建,“岁时子弟课文于其中”;西园书屋,五都南屏叶氏建,“为其族中肄业课文之所”;霭门书屋,一都大宽段姓建,“为大宽段子弟肄业之所”。此外为激励子弟上进,宗族除对其课业严格考核外,还有相应的奖励和处罚。如徽州《明经胡氏龙井派宗谱·祠规》中规定:“凡攻举子业者,岁四月请齐集会馆会课,祠内供给赴会。无文者罚银二钱,当日不交卷者罚一钱,祠内托人批阅。其学名成立者,赏入泮贺银一两。补廪贺银一两,出贡贺银五两。”

那么,徽州宗族的教育经费从何而来呢?徽州宗族几乎“族必有产”,族产包括族田、山场、塘陂、房屋、水碓碾房等,其中尤以族田和山场为大宗。许多强宗大族的族产颇为丰裕,如绩溪《上川明经胡氏宗谱·拾遗》记载说:吾族祀产最多,自宗祠、支祠、下逮近代各家,无不毕有。”绩溪《金紫胡氏祠产册序》也说:“金紫家庙,产业颇丰。”族产不准析分和典卖,只进不出,如果有盗卖等情,宗族要给以严厉惩罚,轻则令当事人取赎,“照祖墨以不孝论罪”,严重者“削支,不许入祠。”由于不准析分和典卖,只进不出,徽州的族产愈积愈多,到清末,“徽州约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土地山林都成了族产,其中尤以山林占的比重更大。”^[2]

教育是一项对资金需求较高的事业,没有财力支持,寸步难行。宗族的教育行为自然离不开资本雄厚的徽商的支持。徽商作为宗族的一员,从小接受宗族教育的熏陶,重视教育的理念已经被徽商自觉内化,“非儒术无以亢吾宗”^[3]、“非诗书无以显亲”^[4]成为徽州商人的共识。成功后的徽商对子女、宗族的教育投资鲜有吝啬。赵华富先生在其《论徽州宗族繁荣的原因》一文中列举了明清时期徽州的仕宦和富商捐输族田、义田、祭田、学田百亩以上的事例有34个,细究他们的身份,我们发现他们差不多都是商人。徽商致富后,对办学表现出高昂的热情,一方面对其子弟业儒异常关切,积极倡建塾学,广设义学;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官办府学、县学的营造和维护,并且参与“束脩、膏火”的筹集和运作。如乾隆、嘉庆时期的两淮总商鲍志道、鲍启运父子,及其

孙鲍均,祖孙三代仅就紫阳书院一所统共捐输白银两万两有余。书院在经费运作上呈现出商业化经营的特点。如前面提到的“存两淮生息”,又如休宁海洋书院将“书院经费存银七千两由城乡各典领本生息”^[5];再如黟县紫阳书院,嘉庆十六年有县令吴华“谋于邑中人士袁费建成,并以余银六万两分发盐、典商生息,计岁入息金三千六百以为延请山长修金、生童住院膏火,而邑中之应乡会试者于此中给以资斧。”(《休宁县志·续志》)对于科举士子的资助徽商更是不遗余力,竭力兴办文会、捐输科举经费、捐建考棚、试院、会馆等科考保障设施。总之,凡关涉教育的地方无不见徽商忙碌的身影。

宗族、徽商共同努力下的徽州教育自然是硕果累累,这一点从科举时代徽州考试及第者甚多可以为证。明代徽州中文进士452人、武进士56人;清代徽州中文进士684人、武进士111人。从全国所占比例看明代占1.82%,清代占2.25%。徽州进士及第之数在全国科举名列前茅,不但如此,从状元数上看更是显赫。清朝258年间共举行112科,共取状元114名,徽州有19人,占17%(不计两名满状元),^①《中国名人大辞典》载清以前名人中徽州原六县就有747人。^{[6](pp.257-258)}如宋代儒家理学奠基人程颖、程颐祖籍在徽州;理学集大成者、南宋大儒朱熹也是婺源人。此外还有唐文学家吴少微,诗人杜荀鹤,南宋史志学家罗愿,学者程大昌,政治家朱升、许国、曹振镛、徐谦,医学家汪机,剧作家汪道昆,数学家程大位,画家江滔,大学问家、哲学家戴震,物理学家郑复光,财经家王茂荫,可谓群星灿烂,各领风骚。

二、近代的徽州教育

道光十二年,清廷废除纲法,改行票法,徽商垄断盐业的局面被打破,导致徽州盐商的衰落,继而间接引发徽州商帮的整体衰落。徽州教育先前倚重的财力支持大为减少,此外战火连绵、政局动荡也影响了它的发展。以官方办学为例,《民国歙县志·营建志·学校》载:“咸同间张中丞蒂督办皖南军务饷绌借用书院本银,兵燹后卷宗尽失,生童公请拨款行课,大吏以无案可稽批饬。皖南道查核邑中士绅杨昌樾等,函商同邑在省诸君子恳求道转稟,以当日借用书院本银时会榜示书院门首,六邑生童皆知即可以补卷据之,缺制府曾国藩乃许拨还本银二万五千两有奇。书院赖以不坠。”

上述记录了在咸同之际官方与紫阳书院在经费

① 以上数据取自李琳琦:《明清徽州进士数量、分布特点及其原因分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方面的一场小冲突。传统社会，徽州书院大多有较好的经费积累，如紫阳书院“乾隆五十五年两淮商人捐资重建名紫阳书院，邑人曹文植倡其议，鲍志道协其筹，程光国董其事，中为朱子堂……其膏火经费据各商禀请于淮南杂项下每年拨给膏火库平银三千七百二十两，由歙县教谕按季赴司请领，巡抚朱珪碑记。雍正十四年邑人徐士修增置号舍，又捐银一万二千两以赡学者，学使双庆记。五十九年邑人鲍志道捐银八千两呈本府转详两淮运宪，又运宪饬交淮商，按月一分起息，每年应缴息银九百六十两，遇闰月加增八十两，由府学教授按年分两次具文赴司请领，两淮盐政全德记。嗣又经费不足，邑人程光国暨子振甲董其事，逐年捐资添补以给支销。自嘉庆十六年至十九年经费由府垫用至四千两，十七年知府恭正劝捐邑人鲍志道之孙均捐银五千两，由府转详两淮运宪仍照原捐章程。按月一分行息，每年缴息银六百两，闰月加增五十两。由本府教授两次具文赴运库请领，又复劝黟邑绅士捐输。邑人将存建靠棚银一万一千两内拨出银六千两，公同捐输以资膏火，又据黟绅胡尚燦、胡元熙、胡积城再捐银五千两，共计银一万一千两，除将银四千两归府垫项，余银七千两由府饬传歙休两邑典商给领生息，每年缴息银八百四十两。”^[7] 紫阳书院自清代以来所入捐银以上材料粗略估算仅生息银两就有三万两千两，累年之息银进项暂且不计，在此“借用——拨还”的过程中已被侵夺许多。财政紧缺的清朝政府已经开始将征敛的触角伸向了书院，使捐助锐减的书院雪上加霜。

那么，近代徽州教育的总体情况如何？大致说来有如下几方面的变化：

第一，近代徽州教育最大的转变莫过于新式学堂的建立。以歙县为例，建立的较大新式学堂有：新安中学堂，在府城内改旧试院为校舍，光绪三十一年创立，呈请两江总督宪李批准。在茶厘二成项下每年动拨银五千两为经费。初创时，学生多不合格，有学舍未经改造，借紫阳校士馆设校屋不敷用，暂定学生60名。次年校舍告成添招学生20名，嗣后逐年加额并添设紫阳师范学堂，经费不足，征收锡箔捐以补助。不收学费，每名年收膳食费二十圆，此为徽州设校之始。初任监督许承尧营创，宣统元年易黄家驹，二年三年又易张旺芝、马维禄。紫阳师范学堂，在县城紫阳书院内，光绪三十二年许承尧营创，初新安中学借紫阳书院开学，以年齿稍长，文理清通者入师范科，并附设师范传习所。嗣中学校舍告成，紫阳书院遂专为师范学堂之用，招贡廪增附各生60名，遵照官定初级师范章程，分门教授，以中学监督兼任监督，经费两校通用。又以紫阳书院学款年息四千余

元，前经进士汪总沂等请准一半在芜湖创办师范学堂，一半资遣出洋游学。学生赴芜入校路远感不便，游学尚少完全资格，收还该款为基金。于是两校始巩固无缺费之虞。^[7]

两所学堂规模应属不大，经费上也难觅以往徽商的巨额捐助，多依靠政府拨款，此外政府增加新税收以补贴学堂经费，“征收锡箔捐”其实是间接强迫此时在茶叶出口中发达的徽州茶商的捐助。其它学堂的情况也大致相似（见表1）。

《民国歙县志》中共记录有26所初等小学堂，由上表部分学堂的情况来看，与清代中叶以前比较，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与以往不同：学堂名称较严格地遵照政府教育体系的规定；学堂营建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异姓共同组建，单一宗族营建学堂已属不易；收取学费纳入经费运作，教育范围明显缩减。但是同样清楚的是，这些新式小学堂无论从学堂命名，还是从学堂财务组织上，都明显地可以看到宗族的影响。

第二，在近代徽州初等教育中职业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凸现。徽州地区虽以最具中国传统的典型社会著称，但徽州社会并非僵化。以徽州教育而言，早在明清，徽州教育的内容就并非之拘泥与四书五经，凸显出一定的职业教育倾向，服务于徽商后备力量的培养，例如编印《土商类要》、《一统路程图记》等商业教科书，到民国吴日法又编印了《徽商便览》，于是就有江南一带“徽州算盘，绍兴刀笔”之谚，徽商教育子弟尤其注重识字和算术。据绩溪余川村老人汪本铨先生回忆，当时他们在燃黎小学读书时，曾经学习过一些关于营商的自编教材，且珠算课程占有相当比重，学生掌握较牢固。

第三，近代徽州教育冲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束缚，出现了女子私塾、小学堂等女校，成为徽州近代教育的一大特色。一些名门望族的女子6岁到13岁可以接受私塾教育。除设置了专门女子私塾外，亦有专供女子学习的《女儿经》《女孝经》等教材。虽然以培养女子的三从四德为主，但就教育本身而言人已属不小的进步。到清末、民国时期，女私塾又逐渐演变为女校。如1905年歙县唐品山创办私立瑞则女子小学堂，招收本族女孩入学；黟县西递胡氏家族的儿媳黄杏仙创办私立崇德女子初等小学，并由她亲自执教，该校毕业生出嫁后又将这种办校之风普及周边。徽州各地均办有类似女校，至1922年，屯溪创办省立第四女子师范学校，徽州女子小学堂办学达到鼎盛。^[7]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女子教育仍属初等教育的范畴。

表1 《民国歙县志》所录部分学堂名录^[7]

学校名称	创立时间	地 址	主持 人	经 费
官立两等小学堂	1905年	县明伦堂	吴棣	倚问政书院款产、租息及水碓捐
中央两等小学堂	1908年	张文毅祠	汪国杰	由县补助不收学费
私立启悟两等小学堂	1907年	大北街	唐澍	款由唐氏祀产内补助兼收学费
公立济通两等小学堂	1912年	鱼梁	姚邦燮	崇报祠为校舍,经费由船业捐助
私立正谊两等小学堂	1909年	邑东蓝田	叶德钦	叶德钦独资创立并分等酌收学费
私立绳正两等小学堂	1908年	县北富堨	汪德源	汪德源、汪标等以民房为校舍兼收学费
公立务本两等小学堂	1907年	邑北许村	许志芬	以本地茶捐为基金并分等酌收学费
私立正本初等小学堂	1909年	县北许村金川	许玉章	以祠款及私人捐助为基金并酌收学费
私立溧川两等小学堂	1906年	邑北呈坎	罗奉翥	以罗氏宗祠为校舍,其经费则罗族祠款与私人捐助
私立惇素初等小学堂	1906年	县西潭渡	黄质等	由黄氏族人捐助兼收学费
私立崇正两等小学堂	1906年	邑西堨田	郑广镇	经费则由发起人汪道泽、汪道滋、程必达、程朝志、谢兴瑞、罗会同等每年捐助银五百元
私立崇文两等小学堂	1907年	西溪南	吴文杰	积余吴族祠堨谷款撙节开支,不敷由族人吴文杰文嘉家等资助
私立溁溪两等小学堂	1909年	邑南桂溪	项明华	以项姓祀产、义仓产收入为经费
公立大洲两等小学堂	1908年	县南岔口	张云锦	款由大洲源茶商捐助,酌收学费

第四,近代徽州出现了少量的教会学校。再以歙县为例,“耶稣堂,邑有基督教新教自光绪二年始至二十一年有教士唐进贤来徽赁居府城小北街,进贤英国苏格兰人,获有硕士学位,制行纯笃与邑人士颇相洽,二十六年乃设学于教堂内。自为教授,勤恳不倦,以是益重之。其高材生在国内外各大学卒业者皆有声于时。进贤旋购所赁宅为教会公产,即今之礼拜堂,后复于小北街购基地建教士宿舍一所。”^[8]然因教会学校数量有限,影响范围不大。

三、结语

传统时期徽州宗族、徽商和教育三要素交互影响,促进了徽州文化的发展。延至近代,徽商衰落,宗族与教育的经济保障受到影响,但是对教育的重视已经深入徽州文化的骨髓,徽州宗族越来越多地承担起了发展近代徽州教育的责任,成为徽州近代教育发展最主要的因素。是故近代徽州也是名人辈出,如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出版家汪孟邹、名画家黄宾虹、人民教育家陶行知、革命音乐家张曜、学者胡

适、文艺理论家叶以群等,徽州依然人文鹊起。

[参考文献]

- [1]江登云.江绍莲续辑·橙阳散志(卷11·艺文志下)[M].嘉庆十四年刊本.
- [2]李琳琦.明清徽州宗族与徽州教育发展[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9).
- [3]吴吉祐.丰南志(第5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 [4]汪道昆.太函集(卷67)[M].万历十九年金陵刊本,上海市图书馆藏.
- [5]休宁县志(卷3.学校志.书院)[M].道光抄本.
- [6]叶尚志.人才问题新探[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
- [7]民国歙县志(营建志.学校)[M].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 [8]江巧珍.徽州女校述略[J].安徽史学,1995(4).

(责任编辑 光 翟)

从自主到开放：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与未来

——李均《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再版有感

刘自团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教所，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作为国内第一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历史的实录，高等教育学家潘懋元先生认为其特殊意义在于它以翔实的历史资料证明了中国高等教育理论，并非依附理论。自主性发展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对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历史发展道路的最好诠释，而立足国内实际，加大开放的力度，全面走向世界是该书对我国未来高等教育研究做全面展望之后所提出的战略性建议。

[关键词]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自主；开放；高等教育研究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4-0077-03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研究伴随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产生而发轫，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成为专门的研究领域。当时，以潘懋元先生为首的老一辈高等教育研究拓荒者曾矢志不渝、筚路蓝缕地为这个新开辟的领地和事业奔走、呼吁，先后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招收了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正式出版了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系统专著《高等教育学》，在世界上率先把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新兴独立学科进行研究……创造了数个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第一，书写了世界高等教育研究史上的奇迹。然而不知何时，这段燃情的岁月正随着时光的流逝慢慢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去，并逐渐开始变得鲜为人知。

作为国内第一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专著，李均博士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为系统考察这段即将被尘封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本书的意义不仅在于其系统地叙述并分析了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历史，完整地保存和整理了当年建立学科时的一些原始资料和访谈记录，更特殊的体现在它以翔实的历史资料证明了中国高等教育理论并非依附理论。目前，该书再版，借此机会，结合读该书的体会谈谈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工作从自主到开放的发

展历程。

一、自主：《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对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历史发展道路的诠释

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与西方高等教育研究间是否存在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学术界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一些学者对此持肯定态度，其直接理由有三：首先，从时间顺序上看，西方高等教育研究起步较早，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形成专门研究领域，而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严格意义上讲是从1978年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成立算起，整整比西方晚了近20多年。其次，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创建前，阿什比、阿特巴赫等一批国外学者的著作就陆续被翻译引进，包含这些著作在内的一些国外理论对我国高等教育学科部分分支学科和专题研究产生了不小影响。特别是近年来，高等教育研究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越来越多的西方高等教育的经典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国外一些流行的高等教育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并引起国内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与研究，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学习和借鉴西方高等教育理论的过程中，无原则盲目搬用的现象的确存在。再次，在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进行高等教育研究时，我们将面临这样一种状况：无

[收稿日期] 2012-04-05

[作者简介] 刘自团(1975-)，男，河南汝州人，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教所助理研究员，教育学博士。

论是高等教育学赖以依靠的教育学和心理学,还是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必不可少的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现代社会科学几乎全是欧美学说的产物。在中国,这些学科从其产生之日就由西方引进,直至今日我们仍在源源不断地移植西方的理论。这些学科如果去除了西方的学说,几无内容可言。特别我们在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对高等教育进行研究时,就等于是用西方的学说来对高等教育做出解释。^[1]当然,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创立与发展所走的完全是一条非依附性发展道路的学者并不占少数,但是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国内已有研究对该观点进行的论证还不够充分,尤其缺乏用确凿的历史资料进行实证。李均博士的专著《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正是以翔实的历史资料论证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创立与发展所走的是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

在这本专著中,李均博士以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为主线,以研究范式转换为主要依据,并结合研究重点的转移、标志性事件或成果的产生以及高等教育研究宏观背景的变化等因素,按照历史发展顺序,把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划分为以下4个时期:前学科时期(清末—1977年)、学科建立时期(1978年—1984年)、规模扩充时期(1985年—1991年)和稳步提高时期(1992年至今)。^{[2](P.21)}虽然此前也有学者对其所叙述的高等教育研究进行过分期,但对分期的依据却很少做出解释。这种缺乏依据的分析或探讨,往往导致很多研究多停留于表象而无法深入,从而研究成果可参考的价值和意义不大。在这里,李均博士以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为主线,以研究范式转换作为划分时期的依据,可以说切中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发展的命脉。之所以这样下结论,一是因为“学科建制”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与西方高等教育研究价值指向的根本区别所在,抓住了本质,研究才有可能深入;二是从科学发展史来看,“范式”的转换往往被认为是科学发展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更替的主要依据,通过考察研究范式的变革和更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高等教育研究前后两个时期是否有质的变化。当然这本书只是把范式的转换作为历史分期的一个主要依据,并不是唯一依据,除了范式转换外,研究重点的转移、标志性事件或成果的产生及高等教育研究宏观背景的变化等都是划分高等教育研究史阶段的依据。^{[2](P.11)}科学地对历史时期做出划分是将历史研究推向深入的前提条件,从这点来讲,李均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4个时期的划分是成功的。

在对高等教育研究历史做出科学分期的基础上,李均博士经过大量的考证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立足于本国实际,走的是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并非依附性地发展。其立论的依据如下:1978年以前,中国还没有出现高等教育研究这个概念,高等教育研究也还不是专门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一些自发、零散和无组织的研究,这一时期所谓的高等教育研究工作只能算做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历史轨迹的起点,依附问题根本无从谈起。而在1978年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形成专门领域到1984年正式建立独立学科的这段时间,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与国外高教研究界交流极少,渠道也不通畅。尽管阿什比、阿特巴赫等一批国外学者的著作在这一阶段陆续被翻译进来,但从这些书中我们只是了解到西方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些情况,对西方各种丰富的高等教育理论和多学科高等教育研究的情况,仍知之甚少。^{[2](P.413)}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发展高等教育研究,创建高等教育新学科只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土生土长”。之后,随着与国外交流的增多,我国的高等教育学科,特别是其个别分支学科,对西方的经验与理论虽有所借鉴,但始终以本土化为立足点,紧密追踪中国高等教育的现实问题,在反映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与解决中国高等教育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创立了富有本土气息的理论框架。在系统叙述和分析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历史的同时,这本专著还对阿特巴赫的“发展中国家的科学与学术只能处于‘边缘’,而依附于‘中心’西方”的观点进行了否定。其切入点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早期开拓者的情况和中外高等教育研究的价值取向。从前者来讲,与多数社会科学开拓者从属于国外理论不同,潘懋元先生等一批中国高等教育的开拓者,几乎都是在中国高等教育实际工作中摸爬滚打若干年后成长起来的,是地地道道的“实践——理论派”。^{[2](P.413)}他们从实践中来,他们的理论更多来自对本国实践中各种问题的思考。尽管他们从不排斥国外理论,但不会对国外的新理论亦步亦趋。反映在价值取向上,与国外“问题研究”指向不同的是,我们的高等教育研究更重视学科建制。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非依附性发展之路的论证比较深入、严密。

二、开放:《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对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未来发展道路的展望

立足本国实际,自主性地发展,李均博士在系统分析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进程之后对我国高等教育

研究历史发展道路所做的总概括。但自主性发展决不意味着与世隔绝和自我封闭,综观我们已有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不难发现,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也具有明显的开放性。一是研究队伍的开放性。有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员,但更多的是高校教师、干部等高等教育实际工作者,他们是高等教育研究赖以生存的群众基础。二是研究过程的开放性。高等教育研究广泛地建立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自然科学、系统科学等科学基础之上,充分利用其他学科的概念、范畴及方法来形成自己的概念和学科体系,从而使自己源源不断地获得“新资源”,促进自己的生长。^[3]三是研究地域的开放性。高等教育研究大量地介绍、借鉴国外高等教育研究的成果,积极参与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交流和对话,正逐步把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推向国际舞台。在该书的余论部分,李均博士在对过去20多年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成就与问题进行总结和分析后,还对21世纪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未来的发展战略及其道路做出了详细诠释和初步展望。

建设“高等教育研究强国”是未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发展的重要战略使命。2003年11月,潘懋元先生在第七届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年会的开幕式上向高教研究界发出了有力宣言:“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高等教育的第一大国,也是高等教育研究的大国。未来的中国,不仅要力争成为高等教育强国,而且要力争成为高等教育研究强国。”那么,衡量“高等教育研究强国”的标准是什么?《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指出,建设“高等教育研究强国”不仅要在高等教育机构、组织、人员、成果等量的指标上继续保持领先,更重要的是在整体研究水平、效益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研究成果不仅适用于国内高等教育,其中若干理论和观点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应有重要影响。“高等教育研究强国”是世界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心之一,将在世界高等教育研究发展中发挥一定程度的引领作用。^{[2](P.400)}以上阐释进一步明确了今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发展的战略目标,在此基础上,该书又指明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具体发展道路。

首先,《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对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进程进行系统分析的同时,就已经证明了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选择自主性发展的正确性。从西方化到中国化的演进,是所有靠依附西方理论而发展起来的中国社会学科必经的历程,虽然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中国高教研究选择自主性发展的道路似乎有些无奈,但却客观上对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繁荣

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各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也证明了选择依附发展的道路具有很大局限性。各国有各国的问题,各国的社会科学也有各国的特色,依附发展意味着永远只能跟在别人的后面,永远甘居从属地位,永远不可能占据社会科学的制高点。^{[2](P.415)}

其次,在坚持自主性发展的同时,《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还要求我们应发挥主体意识,加大开放力度,尽可能地吸收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优秀理论。李均博士认为,借鉴与依附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借鉴的过程中发挥了“主体意识”的作用,对国外理论能有选择地吸收,而不是照搬。值得注意的是,在向国外学习先进理论时,我们也要放宽自己的视野,不应仅局限在少数几个发达国家,而应是学习世界一切国家的先进、优秀的高等教育理论和办学经验。

当然,这种开放是相互的,我们在介绍、借鉴国外高等教育研究的成果的同时,还应逐步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为国际更多的同行熟知和认可,以确立自己在世界学术界的位臵,并力争在世界高等教育研究发展中发挥一定程度的引领作用。我国的高教研究界,虽然近20多年来也开展了不少对外的学术交流,但从总体来看,国际化的水平还比较低,尤其国际合作研究还相当薄弱。针对这种现状,该书指出,今后,中国高教研究界除了从形式上加以重视和完善外,还要在制度和经费上给予倾斜,要更多地参与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使中外学者能携起手来,以共同促进世界高等教育研究的繁荣和发展。^{[2](P.420)}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总之,在我国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研究空前发展的今天,能对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做一番回顾,既有助于我们理性地反思这段历史,又可以为我们今后的发展理清思路,这是笔者读《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后最大的感触。

〔参考文献〕

- [1]林莉.在借鉴与依附之间——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反思[J].高等教育研究,2004(2).
- [2]李均.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 [3]刘振天.透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50年》[J].高等教育研究,2000(3).

(责任编辑 陈晓姿)

浅谈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形成

刘建宁

(江苏教育学院政教系,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来看, 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潮流。公元 1500 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 开始不同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西方国家相继走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形成了“西方模式”。1840 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形成了“中国模式”。本文主要论述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形成以及“中国模式”形成的原因。

[关键词] 现代化; 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国模式”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4-0080-05

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百年来魂萦梦牵的理想。鸦片战争后, 面对席卷全球的现代化浪潮, 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政策下, 古老的中国被迫走上了现代化的艰难的历程。经过一个半多世纪的曲折探索, 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 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在面对 2011 年充满危机和动乱的世界, 胡锦涛主席在 2012 年新年贺词中指出, 2011 年是中国“十二五”时期开局之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中国人民同心协力、锐意进取, 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新进展。胡锦涛主席的新年贺词, 深刻诠释了中国的成功之道。中国的稳定发展, 以无可辩驳的客观事实, 再一次向世界证明了中国道路、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成功与伟大。

我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始于 1840 年的鸦片战争, 到现在已走过了一个半多世纪的历程。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发展,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 世界对中国现代化道路冠之以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已成为世界各国议论的热门话题, 特别是 2008 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 更是让人们对“中国模式”充满了期待

与希望。“中国现代化模式”, 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创造, 体现了当代中国人的智慧, 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和鲜明时代精神的结合, 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自身几十年执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在总结苏联等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和先进管理经验的基础上, 开辟的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形成经历了 3 个阶段:

1. 1978—1982 年是中国现代化模式初步探索阶段。

现代化是一个世界历史进程, 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实现现代化,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了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从 1840 年到 1949 年将近 100 年的时间里, 我国尝试着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 但最终都归于失败, 这说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建国之初就把实现现代化提上了议事日程, 并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但是从 1956 年—1978 年之间,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遭受到很大的挫折, 尤其是十年文革几乎与现代化

[收稿日期] 2012-03-09

[作者简介] 刘建宁(1957-), 女, 江苏扬州人, 江苏教育学院政教系副教授。

背道而驰。其主要原因是没有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1978年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工作中心的转移,重新启动了中国现代化这艘巨轮,并且把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联系起来,重新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1979年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提出“要在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1](P.163)}的奋斗目标。同时在这次会议上他还提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P.163)}邓小平针对当时社会上有人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1](P.166)}现代化就是西化,鲜明地提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1](P.173)}邓小平从一开始就指出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1982年召开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P.3)}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也第一次提出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这一命题。

2. 1982—1997年是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形成阶段。

正确认识国情和我国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党制定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基本依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全面改革的展开,我们党对中国国情与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逐步深化。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准确定位了我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大会还确定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党的基本路线和

“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与道路探索的结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思想被一些传统的观念束缚,总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然而现代化的发展规律表明市场经济阶段是任何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阶段,也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动力机制和体制基础。1978年我们虽然进行了市场化的改革,但在理论上一直存在着姓“资”姓“社”的争论,并严重束缚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邓小平认真倾听实践的呼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重大的课题进行了长期的理论探索,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2](P.373)}。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标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它阐明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和现代化发展的动力,是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重大发展。1992年党的十四大作出了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的决定,并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九个方面,第一次初步形成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科学体系。1997年,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不幸逝世。邓小平逝世后,中国能否沿着他所开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继续前进?这个问题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这一年我们党召开了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大会认为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等一些列基本问题。”^{[3](P.127)}十五大报告还指出:鸦片战争后的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三次历史性巨变,“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开始的新的革命。在建国以来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这标志着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基本形成。

3. 1997—2007年是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完善阶段。

面对世纪之交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2001年9月3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首次阐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

新的理论体系,全面体现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问题的新创造。”^{[4](P.101)} 2002 年我们党召开了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提出了到 2020 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中国现代化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十六大报告还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了科学的阐述,并要求“全党把这一重要思想贯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3](P.165)}。正当全国人民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继续带领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建国 100 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努力奋斗时,2003 年春夏之交,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凸显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城市发展和农村发展不够协调的矛盾。面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关系到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2003 年 10 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3](P.167)} 从现代化角度来认识“发展”,是指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型的过程,与“现代化”一词同义。所谓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5] 科学发展观是以当代中国现代化为主要思考对象,内容包括发展的指导方针、基本原则、目标任务、根本目的等各方面,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实践,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更加全面。2004 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2006 年 10 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的提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3](P.173)} 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更加清晰和完善。

2007 年我们党召开了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十七大报告全面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3](P.183)} 这一概括指明了中国现代化由谁领导、从什么实际出发、完成什么任务、坚持什么路线、通过什么途径、实现什么样的目标等重大问题,揭示了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内涵。

二

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奋斗旗帜,以共同富裕为发展目标,以中国共产党为现代化的领导,以改革开放为实践基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动力,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调发展。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已经得到世界的广泛注意,被冠之为“中国模式”,并成为世界持续议论的热门话题。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在 2004 年曾撰文论述中国现代化进程及发展模式的国际意义。她认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成功解决深刻的国内和国际矛盾的经验,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鲜活榜样,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现代化模式。”美国学者约瑟夫·奈 2008 年 2 月对记者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

“中国现代化模式”既不同于西方模式,也不同于苏联模式,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模式也有很大区别。

1. 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是和社会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毛泽东指出:“新中国成立,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6](P.90)} 1956 年底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的结束,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初步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现代化事业奠定了制度基础,这就决定了我国现代

化发展模式不可能是“西方模式”。这就决定了：在经济方面只能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国家对市场经济实施宏观调控，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政治方面只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文化方面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方面只能是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 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是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联系在一起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也曾照抄照搬“苏联模式”。“苏联模式”产生于战争和革命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在一个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经济落后的资源大国，为了不惜一切代价迅速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不得不采取高度集中的由国家统一指挥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这一模式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弊端，但在历史上起过重大的作用。问题是，后来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这一模式没有及时改革或改革不成功，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趋于缓和，朝着有利于和平、有利于各国人民建设的方向发展，但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没有能够及时把握住时代主题的转换，仍然抱着战争和革命这一时代主题不放。由于对时代主题判断的失误，延误了工作中心的转移。邓小平综观世界全局，精辟分析了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新形势，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2](P.105)}“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P.57)}

3. 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是和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曾经照抄照搬“苏联模式”。但在 50 年代中期就发现“苏联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提出了要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毛泽东在 1956、1957 年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重要的著作，提出了走一条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为后继者的探索提供理论基础。但后来由于指导思想的“左”倾，在选择中国现代化发

展道路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即用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形式来代替“苏联模式”。1966 年又发动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严重违背了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延误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改革开放的英明决策。邓小平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P.150)}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民主政治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实现现代化，要求大幅度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机结合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的一大特色和成功经验。就改革的广泛性和深刻性而言，经济体制改革必然要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并有力带动文化、科技、教育等各项体制的改革，最后达到整个社会的全面的变革。改革还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方式和思维方式，为生产力的发展扫除了障碍。

4. 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是和邓小平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1997 年邓小平去世后，党对邓小平做出了全面的评价，称之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

首先，在“十年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带头批判“两个凡是”，支持和领导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主持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工作中心的转移，开辟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局面、新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围绕改革开放形成了两股思潮：一股是“全盘西化”；一股是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尤其是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大环境的影响，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在这关键的时刻，邓小平于 1992 年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南方谈话”从理论的高度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为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其次，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围绕“什（下转第 90 页）

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问题初探

司甜

(中共徐州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 江苏徐州 221009)

[摘要] 党的建设科学化是关系党的生存和发展的全局性问题。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是时代赋予党建工作的新要求,是解决不符合党内科学发展状况的新路径,是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党的建设需要科学理论作指导、科学制度作保障、科学方法来推进。我们应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提高治国理政的科学化水平,加大党的制度创新力度,来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关键词] 党的建设; 科学化水平; 制度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4-0084-03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这一重大命题和重大任务。党的建设科学化是关系党的生存和发展的全局性问题。“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继续推进党的执政建设指明了方向。

一、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大意义

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就是要不断认识、把握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使党的建设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更加符合世情、国情、党情。党的建设科学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是时代赋予党建工作的新要求。当今世界正处于发展变革时期,国际经济和政治环境正出现明显变化,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日趋激烈,不稳定因素增多,对我国发展和党的执政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给我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面临的国际关系更加复杂,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也将更加明显,外部发展环境存在较多不确定性。当前,我国呈现出新旧矛盾相互交织,党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世所罕见。必须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及其特点,深

刻认识国内外大局以及内政外交的紧密联系,把党的建设科学化放在一个极高的位置来谋划。要以辩证的战略思维审视机遇和挑战、分析和处理问题,做到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内外兼顾、趋利避害,保证中央大政方针和工作部署得到贯彻落实。

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是解决不符合党内科学发展状况的新路径。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的自身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总体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适应的。同时,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与党的先进性不相符合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削弱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面临着严峻的执政考验,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如果自身存在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难以顺利实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就难以保持和巩固。解决好这些问题,只有提高党的建设的实际成效,才能切实解决党自身建设中存在的各种实际问题,更好地适应党建工作目标、任务、对象以及环境的新变化,才能够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才能经受住各种风险和考验,始终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是对执政党建设规律

[收稿日期] 2012-02-10

[作者简介] 司甜(1981-),女,江苏徐州人,中共徐州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讲师。

的深刻认识。作为执政党,必须研究执政党建设的内在规律。能善于执政,驾驭执政,把握执政规律,才能实现科学执政。“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坚持把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同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保证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坚持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保证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改革创新,增强党的生机活力;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高管党治党水平。”^[1]新的发展要把国内发展同对外开放统一起来,特别要求我们深化对内政外交互动规律的认识,积极利用外部环境提供的发展机遇,有效应对外部环境带来的挑战,更好地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深入研究党的建设规律,有很多重大课题需要探索和研究。只有借鉴世界政党政治的执政成果,理性认识政党政治发展趋势,才能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二、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丰富内涵

“党的建设科学化”是指党在科学理论指导下,适应时代、环境、任务等情况变化的需要,不断创新发展理念、完善机制体制、改进活动方式,从而使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实践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新时期党建工作的必然选择。

1. 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

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首先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首要任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党的建设,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强大的精神动力。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分析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总结经验,追寻规律,顺应时势,讲求实效;要克服片面性,减少盲目性,增强工作原则性、预见性和创造性,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我们要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党员干部头脑,大力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使党员干部对科学理论真学真用,做学习的表率,并着力提高理论素养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积极营造崇尚学习的浓厚氛围,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不断推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向纵深发展,不仅贯彻落实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也贯彻落实到

党的建设各个环节和全部过程中,作为检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的根本标准。

2. 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

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历来是党的自身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推动党的建设科学化的重要保证。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强调: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2]我们党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不少成效,但在一些领域、一些地方和部门,有些制度形同虚设,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制度本身存在问题,或者说制度的科学化水平不高。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就要紧紧抓住制度建设这个重要环节,以科学的制度保障党的建设,使党的建设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逐步形成内容完备、结构合理、功能健全的党的建设和党内生活制度体系。在实践中,增强制度的系统性和严密性;建立健全严格的落实制度的保障机制,加强对落实制度的监督检查、奖惩和责任追究。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从坚持改革创新、增强党的生机活力的高度,对建立健全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制度体系作出了具体安排,在提高党内生活和党的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我们要立足实际,推进各方面的制度建设,在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上取得实效。

3. 以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方法的运用对提高党的建设水平至关重要。探索运用现代科学手段和方法,把现代管理学、组织学、心理学运用到党的建设中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尤其是信息网络化程度越来越高,这对我们创新党建工作方法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应利用互联网开展党建工作,办好党建网站,使基层党组织工作信息化,建立党员信息库,实行远程教育,加强党员动态管理,健全反腐倡廉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网络信息收集和处置机制等。要借鉴外国政党政府的有益做法,要吸取其他执政党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

我们要积极运用一系列党建工作新方法,在以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上取得成效。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就是要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三、提升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路径分析

提升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实现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等方面全面发展,需要着力解决党的建设科学发展的关键环节和突出问题。

1. 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

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要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当前党内存在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宗旨意识淡薄,缺乏应有的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其重要原因就是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只有理论上的清醒,才有政治上的坚定。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系统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另一方面,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教育。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全党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中之重,教育引导党员着力增强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引导党员、干部增强党员意识、宗旨意识、执政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筑牢思想防线,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影响,始终保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

2. 加大党的制度创新力度。

在制度创设中要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考虑党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党的任务要求,坚持党的制度建设的正确方向,检省已有制度,视其实行的效果,完善或修正。制度创新是一个能动的过程,要走群众路线。以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通过发扬党内民主,进行民主讨论,使制度成为广大党员群众意志和利益的体现,以保证制度执行的自觉性和自发性;要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培养造就大批优秀年轻干部;建立健全干部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坚持把考核结果作为干部使用、培养和奖惩的重要依据;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提名制度和差额选拔干部办法,扩大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竞争性选拔干部的比例和范围,使更多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要着力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动科学发

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要加强廉洁从政教育,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工作力度,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同时制度作为现实的客观反映和总结,总是落后于现实条件的变化。所以,制度不可能一成不变。党的制度建设要建立起一套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动态开放的制度体系,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

3. 提高治国理政的科学化水平。

作为执政党,要在治国理政中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的理念、执政为民的理念、依法行政的理念,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由于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需要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和复杂关系,从严治党显得更为必要,只有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全面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才能有效推进党的建设;其次,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紧迫问题上,处理好人民群众关注的社会民生问题、公平正义问题,从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坚持科学的发展思路,总揽全局,统筹规划,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为一个整体,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到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要问题上。注重加强薄弱环节,兼顾各方,综合平衡,把经济社会发展看作一个动态过程,既善于调动各方面发展的积极性,又努力实现均衡发展;坚持手段现代化,充分认识到信息网络化在新时期党建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善于运用信息网络等现代科技手段,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工作的形式、载体的创新,提高运用信息网络进行引导和管理的能力,通过科学的方法推进党的建设再上新水平。

面对新的世情、国情、党情带来的新的机遇和挑战,只有与时俱进、积极探索、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才能不断地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确保党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参 考 文 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EB/OL]. 中国新闻网, www.Chinanews.com, 2009.
- [2]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C].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

(责任编辑 光 翟)

中共土地策略中富农政策调整的历史考察

——以新民主主义时期为例

魏正山

(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安徽芜湖 241003)

[摘要] 土地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个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此时期,对土地策略中富农政策的调整经历了一个复杂多变的过程。根据不同的历史阶段特征,中共对富农政策经历了一个由初步认识——保持中立——打击联合——限制改造的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土地策略中对富农政策的调整是一个自身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探索求真的不懈精神,从而正确地解决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富农问题。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土地策略; 富农政策; 新民主主义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4-0087-04

对待富农的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土地策略的重要内容。中国的富农阶级“被称为农村的资产阶级”^{[1](P.643)},他们以出租部分土地和放高利贷的方式带有资本主义性质,同时也以剥削雇佣农民的方式带有半封建的性质。他们从属于农民的范畴,是农民阶级的一部分,但有其自己的性质。毛泽东就曾指出富农问题是一个难以解释和难以处理的问题。对此,中国共产党在针对富农问题的策略上,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社会各阶级之间力量的对比以及党的任务的变化,制定了从保持中立到打击联合再到限制改造的富农政策。详细地回顾和考察这一艰辛的探索历程,总结其经验教训,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和评价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富农政策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探索求真的不懈精神。

一、国民大革命时期(1923 年 6 月—1927 年 7 月)

中国共产党从 1924 年到 1927 年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在此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

国国情认识不透彻以及对中国革命的理论准备不充分,遭受了 1927 年大革命的失败。在国民大革命的时期,中共虽然没有对富农问题制定出相应的政策,但是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农村的不同阶级和阶层上来,开始关注农村中农民的土地问题。1923 年 7 月中共收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指出“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在中国进行国民革命和建立反帝战争之际,必须同时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2](P.137)}。随后在 1925 年 1 月召开的中共四大会议上,明确强调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成分”,“当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需要发动农民起来斗争。^{[2](P.158)}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富农阶级界定于地主阶级和贫雇农阶级之间,富农阶级和地主阶级占有了农村中 70%—80% 的土地资源,通过出租部分土地、放高利贷以及剥削的方式使他们既带有资本主义性质又带有半封建的性质,从而使中国共产党把富农与农村中的封建剥削阶级等同看待并宣布要对其采取革命措施。中国共产党对富农的进一步认识,主

[收稿日期] 2012-02-10

[作者简介] 魏正山(1986-),男,安徽芜湖人,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要体现在毛泽东对富农认识的基础上。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中国农民中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态度》两篇文章中,毛泽东通过对农村中各种阶层的归纳,以及对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的分析,把富农看作是小地主,“他们受军阀及大地主的压迫,从而具有反抗性;然而又害怕‘共产’,故对于现代的革命取了矛盾的态度。”^[3]随后毛泽东在1927年3月又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在文中指出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革命的观感也不同。虽然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已经注意到富农这个阶层,并在不同程度上对富农阶层的特征有了些认识,但中共对整个农村阶级的认识是模糊的,总的认还不够成熟,正如毛泽东所说:“第一个时期,我们没有看清农村。”^{[4](P.132)}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共对富农问题的认识比较模糊,并没有形成和制定出对待富农的具体政策。

二、土地革命时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

从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共产党根据自身发展的状况,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中制定了“中立富农”的政策。这一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虽有反复,但是在总体上有效地控制了富农阶级的负面影响,极大地增强了革命力量,保障了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

面对大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的方针,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2](P.301)},但不没收小地主的土地而是对他们实行减租政策,实际上中共已经把富农阶级划分到小地主当中。1927年9月,中共中央又作出“对小地主的土地必须全部没收”的决定,这就意味着剥夺富农对土地的所有权,把地主和富农的归属范畴一体化,也使中农感到了害怕,这给革命的进程造成了困难。

1928年6月至7月间,中共在莫斯科召开了六大,比较集中地讨论了富农问题和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对待富农的政策。大会通过的《政治问题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等文件,确定了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其主要特点是剥削雇农,他们在使用雇佣工人、出租土地以及从事高利贷剥削,在经济上具有资本主义和半封建主义的两重性。当时社会中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在此基础之上中共提出了“在富农还没有消失革命的可能

性,共产党应企图吸收富农于一般农民反军阀反地主豪绅的斗争之内。”“当富农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时期,在不妨碍贫农雇农斗争范围之内,党不应该故意加紧对富农的斗争,使其更快的转入反革命方面去,而变为革命的积极的仇敌。”“使这种富农中立,以减少敌人的力量。”^{[2](P.332)}的富农政策。六大的决议很快传到各根据地,各根据地根据自身情况,对富农政策作了许多补充和完善。1929年4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兴国土地法》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些做法表明,中共在理论认识和土地革命实践中已不把富农当作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了。当中共正在执行六大的土地政策之际,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关于农民问题的信》,即“六月指示”,批评中国共产党“把中国的富农当作无产阶级的同盟者”^{[5](P.168)}的做法,要求中国共产党克服机会主义,坚决反对富农。“六月指示”改变了中共六大对富农问题的认识,1929年9月,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接受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号召全党必须坚决地进行反对富农的斗争。之后,各根据地的富农政策也相应发生了改变。

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1930年2月以后,“左”的富农政策在苏区推行并对中央根据地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在1931年1月,王明通过六届四中全会,使他的机会主义路线在全党占领了统治地位。他积极推广“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地政策,企图从肉体上消灭地主,从经济上消灭富农。在革命实际斗争中,毛泽东等人逐渐认识到这种极“左”路线的危害,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认为这一政策过分地打击了富农,而且侵犯了中农的利益,破坏了农业生产,增加了敌人的力量。随后,在1933年6月2日中央苏区开展的查田运动中,发布了《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强调“必须把地主和富农分别清楚,在无情的消灭地主残余的斗争中,决不允许任何消灭富农的企图。”^{[6](P.617)}随着1935年后王明统治在中央的结束,党中央及时纠正了过左的政策,保留了富农的资本主义生产因素。

由此可见,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共富农政策经历一个由中立到极左的曲折过程,虽然党内“左”倾错误影响到了土地斗争的路线,但是毛泽东等中共党人在革命的实践过程中,清醒地认识到了极“左”路线的危害,并采取了一些措施保护了富农阶级。

三、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1945年9月)

“七七事变”的发生,使中日民族矛盾急速加剧,

全国性的抗日战争正式爆发。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实际需要和建立并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的土地策略也随之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1937年7月，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承诺：“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7](P.77)}之后，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将“苛捐杂税的减少，地租的减少，高利贷的限制”作为“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使抗日力量无限地提高，巩固政府的基础。”^{[1](PP.347-348)}同年8月中共中央又制定了《抗日救国大纲领》，把减租减息作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1940年12月毛泽东在《论政策》中指出：“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如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过左的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和富农（分坏田），在肉体上消灭地主（不分田）等政策，在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1](P.762)}以便团结更多的人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

随着抗日战争的不断深入，敌后根据地发展非常迅速。为了加快根据地的建设，解决根据地的土地问题，1942年中共发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详细规定了抗日战争时期对富农的政策，认为“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不可缺少的力量。富农不断有抗日要求，而且有民主要求。故党的政策，不是削弱富农阶级与富农生产，而是在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的条件下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但富农的某一部分封建性质的剥削，为中贫农所不满，故在农村中实行减租减息，对富农的租息也须照减。在对富农减租减息后，同时须实行交息，并保障富农的人权、地权、政权、财权。”^{[8](P.282)}显而易见，在抗日战争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共实行了“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的政策，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私人资本主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鼓励和支持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在农村中的运用。^[9]

四、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9月—1949年10月）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在抗日战胜后，农民要求解决土地问题，要求废除封建剥削制度。为了团结各党派、各阶级从而争取和平的局面，中共中央继续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中共在对待富农的政治态度也是建立在这一政

策的基础之上，中共中央要求团结并巩固农村中的统一战线，将国民党陷于孤立之中。但这时的减租减息政策相比较战前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指导思想是放手采取各种有效的方法，去满足群众的迫切要求。^[9]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处于战略防御中的中国共产党对土地策略做出了新的调整。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坚决拥护、支持广大农民群众一切正当的主张和直接进行土地革命的行动，“坚决拥护群众从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10](P.378)}中央在对待富农的政策上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刘少奇在阐述《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中指出：“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如在清算、退租、土地改革时期，由于广大群众的要求，不能不有所侵犯时，亦不要打击得太重，应使富农和地主有所区别，对富农应着重减租而保存其自耕部分。如果打击富农太重，将影响中农发生动摇，并将影响解放区的生产。”^{[10](P.378)}五四指示的颁布，标志着中共土地策略由过去的减租减息逐步过渡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

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再到战略反攻，中共中央在战场上逐渐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鉴于在开展土地革命、执行“五四指示”的过程中出现了某些不彻底性，为了进一步调动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获得更多的人力、物力的支持，中共中央制定了更加彻底的土地政策。1947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讨论并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通过将“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受，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部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从而达到“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的原则。^{[11](P.85)}中共在打击富农阶级的同时，又把新富农和旧富农加以区别对待，消灭封建剥削性质的旧富农，对于新富农给予富裕中农待遇，保护了农村中的新富农经济。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仅稳定了中农，提高了解放区的农业生产，而且进一步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大革命初始到解放战争的胜利，对富农阶级经历了一个由认识不多

到全面认识的实践过程。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发展,农民问题以及涵盖在农民问题中的土地问题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而富农作为农村中的中间阶层,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在不同的革命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不同的富农政策,经历了中立富农、打击富农、联合富农、限制富农、改造富农的政策演变过程。虽然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有曲折,但是中共中央在每一历史阶段对富农政策都进行了及时调整,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 [3]陈果吉.毛泽东民主革命时期对富农问题认识的演

变[J].党的文献,1992(2).

- [4]毛泽东文集(第7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 [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
- [7]周恩来选集(上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8]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9]尤国珍.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的富农政策述评[J].山西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
- [10]刘少奇选集(上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11]中央档案馆.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 光 翟)

(上接第83页)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探索在中国如何走出一条既符合中国实际的、又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和发展模式,总结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揭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形成指导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江泽民同志曾经说过,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也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的前景。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模式”取得的成就世人瞩目,特别是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更是让人们对“中国模式”充满了期待与希望。但是,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与挑战。在国际方面,我国现代化面临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挑战。当前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并不太平,西方国家想方设法挤占我国际空间,对我奉行既接触又遏制的双重战略,支持分裂势力,鼓动周边国家挑起领土、领海争端,想方设法延缓我发展的速度和时间;在国内方面,转型时期国内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凸现,出现社会风险的可能性增大。一是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二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分化呈加大的趋势,“基尼系数”已超过0.4的警戒线,尽

快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已刻不容缓;三是社会思想文化进入多元碰撞期,形成社会共识的难度加大;四是腐败问题已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顽疾,超出公众忍耐的底线。对于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不仅会削弱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吸引力,还有可能葬送30年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因此我们要有忧患意识,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信念,不断创新和完善“中国模式”,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 [1]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简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 [4]郑永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 [5]温家宝.提高认识 统一思想 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N].人民日报,2004-03-01(01).
- [6]教育部编写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光 翟)

论社会保障功能是农村土地制度的重要设置

王 曜

(江苏教育学院人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农村土地制度应具有使相关当事人的决策权和经济利益得到充分实现的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应该是当代我国农村土地制度设置的一项重要内容。土地对农民的保障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耕地的保护又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基础保障。国家立法对农地的保护是农村土地社会保障功能发挥的重要基础。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现状不容乐观。农地合理高效利用与农地流转利益充分实现是其社会保障功能实现的最终路径。

[关键词] 农村土地; 社会保障; 制度

[中图分类号] D63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4-0091-06

一项制度应该保证有关当事人的决策权和经济利益得到充分实现。土地制度也是如此。土地决策权的来源一般表现为这样几种形式,即政权,政府依此拥有对土地的管理权;财产权,土地所有者对土地拥有的系列权利以及因契约的约定而产生的权利。经济利益的分配项目可以由土地税、地租(地价)、经营土地的利润、劳动者的工资等方面组成。^{[1](P.10)}如果相关当事人的这些权利和经济利益在现有的土地制度下得不到保障或只能部分得到保障,那么这个土地制度就不能被称为是现实有效的。

一、社会保障功能应该是当代我国农村土地制度设置的一项重要内容

农民是土地的主人。传统农民,世代繁衍生息在土地上,与土地结有不解之缘。长期以来,土地就是农民生养死葬的根基,特别是土地对农民的保障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在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缺失的农村地区,土地几乎承担了对农民的全部保障功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农村因改变了以往实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土地制度,即集体所有、统一经营使用的土地制度,取而代之以集体所有、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主的土地使用制度

而极大地调动起中国农村和我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因此发挥出农村土地巨大的功效,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农业生产的最高成就。由此我们既能够看到农民对土地的热爱和获得土地利益的喜悦,更能够看出农民对土地权利的期盼和对土地利益的依赖心理。在我国,土地才是农民们利益实现的最根本源泉与途径。当代农民对土地的观念则是既有传统的依赖感,又有现代的兼营观。但不管怎样,到目前为止,我国仍然有近7亿农民不同程度地依靠对农村土地的耕作获取其基本生存利益。可以说,无论是过去或是现在,土地始终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农民最可靠的社会保障。这就使得实现农民的生活保障权必然成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一项重要功能与任务。

不仅如此,中国的人口多,人均耕地少,这是不争的事实。用仅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1/4的人口,始终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压力。中国每年新增约2000万人口,非农业人口也不断增加,而且,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建设与发展一直不断使耕地面积减少。人地矛盾会越来越突出,城市土地与农村土地的矛盾也会日渐突出。^{[2](PP.17-20)}因此,在

[收稿日期] 2012-02-20

[作者简介] 王 曜(1972-),女,湖北武汉人,江苏教育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我国,农村土地问题在相当长时间内始终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现今中国,种植业和畜牧业仍然是农业的主体。农业生产中,土地是劳动场所,更是提供动植物生长发育养料的重要来源,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民,当然离不开土地,不能没有土地。我国对于农业用地,特别是耕地的保护则必然应该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根本所在。它不仅直接关系到广大农民的生存利益,更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基础保障。

基于此,我国农村土地制度设置充分实现其社会保障功能的必要性是显见的。

二、国家立法对农用土地的保护是农村土地社会保障功能发挥的重要基础

《土地管理法》对于农业方面的土地使用了农用地、耕地、基本农田等不同的概念。其中农用地是一个大概念,除了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外的所有土地均属于农用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等。耕地属于农用地的范围,是农用地中的一种;基本农田属于耕地的范围,但并不是所有的耕地都是基本农田。一般来说,只有那些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的耕地,才属于基本农田。针对耕地和基本农田的使用与保护,国家现有法律均有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是我国农村土地社会保障功能得以发挥的法律基础。

1. 国家对于现有耕地维持的法律保障。

耕地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基础,是我国农民生存利益的源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耕地保持是我国整体经济社会顺利发展的基本保障。我国人均耕地面积明显少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在我国现有发展条件下,耕地占用又是不可避免的。与此同时,这些年来,我国建设用地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人口和经济的增长速度,大量建设项目用地基本上采取了粗放式的外延扩张方式,造成严重的土地浪费也在直接导致耕地的锐减。应该说保护耕地的意义极为重大,但任务也非常艰巨。显然,采取严格措施促进土地的节约使用,减少土地闲置,减少耕地有形和无形的流失,实现耕地的合理高效利用,才能保障我国农民生活和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

其一,对不合理利用耕地行为的规制。通过合理利用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以尽量避免对耕地侵占,是在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时期,最为有效的,也是最应予以提倡的做法。这其中既应有合理

利用土地的规定,更应该包括对非法占用耕地的管制。我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六条第一、二、三款规定:“非农业建设必须节约使用土地,可以利用荒地的,不得占用耕地,可以利用劣地的,不得占用好地。”“禁止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这实质上就是在对土地使用提出要求:(1)对非农业建设项目使用耕地的限制性要求。即根据建设项目的的要求和技术能力等方面实际情况,如果非农业建设项目可以开发利用荒地的,就不允许占用耕地,可以开发利用土壤、地力比较差的劣地的,就不允许占用地力高、土壤肥沃的好地。这一规定的根本目的在于减少对耕地、优质土地的占用,以保证我国粮食的正常生产,实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2)建窑、建坟等行为的实施,会完全破坏耕地的耕种条件,甚至造成该耕地耕种性能永久性地不可恢复。要对耕地实现良好地保护,就必须对这一行为进行严格管制。这一规定,是对农民任意行为的约束,更是对农民长远生存利益的保障;(3)我国耕地大量减少,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农业结构内部调整。所谓农业结构内部调整,即在大农业的范围内,进行农业生产项目的调整,比如由种植业转为养殖业,由蔬菜生产转为种植果树等。这种调整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调整后的农业生产项目不影响耕地的性能,耕地仍可以作为耕地使用;第二种情况,是因调整后的农业其生产的特殊性,致使耕地变成非耕地,或者耕作条件难以恢复或者恢复成本很高而失去耕地的意义。很明显,对于第二种情况是应当加以限制的。现实情况是,基于农业结构调整的可见利益,事实上已经大量导致耕地减少。但农业结构调整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经阶段,一概禁止既不符合现实发展需要,还涉及到农民的承包经营权和土地耕作权等问题,不适于简单地以国家强制力控制和解决。鉴于此,《土地管理法》只做出了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的规定。

其二,对耕地充分利用行为的规引。耕地是我国宝贵的资源,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耕地资源紧缺,必须加以充分利用,才有可能保障社会发展需要。任何持有耕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耕地,都与我国国情所不相容,应该为法律严厉禁止。有鉴于此,我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七条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

耕地。已经办理审批手续的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一年内不用而又可以耕种并收获的，应当由原耕种该幅耕地的集体或者个人恢复耕种，也可以由用地单位组织耕种；一年以上未动工建设的，应当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缴纳闲置费；连续二年未使用的，经原批准机关批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无偿收回用地单位的土地使用权，该幅土地原为农民集体所有的，应当交由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恢复耕种。”“承包经营耕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二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耕地。”这其中，既包括对非农业建设单位使用已经审批的耕地的行为的规范，也包括对承包土地的农民耕作行为的管制。特别是对农民闲置耕地的行为的管制，充分体现出法律对于耕地的社会保障功能的诠释。耕地是农民生存利益的源泉，国家将土地交由农民承包经营本是基于对农民利益实现的考虑。如果农民大量闲置耕地必然会导致国家基础保障受到严重影响，会给国家建设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基于此，《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对土地承包经营问题作了相应规定，明确了承包土地的农民、单位或者个人都有保护和按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承包经营耕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二年弃耕抛荒的，即在二年的时间内连续地使耕地处在荒芜的状态，为保证耕地的高效利用，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耕地。承包耕地的单位或者个人即丧失对该幅耕地的承包经营权。

其三，对未利用地开发的鼓励，促进对耕地的保护。对耕地的保护不仅在于要求对既有耕地的保护，加强对未利用地的开发和使用，减少对耕地需求的压力同样是保护耕地的重要举措。在我国国家建设高速发展的情况下，耕地的占用是不可避免的，单纯依靠对耕地使用用途改变的严格控制，实现对耕地的保护明显是不现实的。并且，我国耕地后备资源十分贫乏，而经过建国后长期开垦，使得目前我国现有耕地后备资源还存在质量差、开发难度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在加大我国实施耕地保护的难度。基于此，对被占用耕地必须实现有效补偿才是达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要求可取之径。对此，国家鼓励对未利用的土地实施合理、有效开发和利用的行为。《土地管理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国家鼓励单位和个人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防止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的前提下，开

发未利用的土地；适宜开发为农用地的，应当优先开发成农用地。”“国家依法保护开发者的合法权益。”第四十条规定：“开发未确定使用权的国有荒山、荒地、荒滩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可以确定给开发单位或者个人长期使用。”《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九条在第三十八条对开发未利用地提出了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规定了开垦未利用地的限制条件。该条规定：“开垦未利用的土地。必须经过科学论证和评估，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划定的可开垦的区域内，经依法批准后进行。禁止毁坏森林、草原开垦耕地，禁止围湖造田和侵占江河滩地。”“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破坏生态环境开垦、围垦的土地，有计划有步骤地退耕还林、还牧、还湖。”而这一规定又是与《水土保持法》的规定相一致的。

其四，提高土地地力，保持耕地动态平衡。土地的地力是提高土地单位产量的关键因素。在耕地数量有限的前提下，提高土地地力，改善现有耕地质量同样也是保护耕地的可取之策。耕地的表层土壤是宝贵的资源，往往需要经过多年培育才能形成。耕地被占用后，其表层耕作层土壤被破坏，短期内难以重新生成。但如果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的耕地属于高产、优质耕地，其在使用耕地前能够将所占耕地的表层耕作层土壤剥离，移至别处，用于新开垦耕地、劣质地或者其他耕地的土壤改良。这样，就可以使原耕地耕作层的优质土壤作用于新开垦耕地、劣质耕地等耕地的土壤改良，有利于实现耕地的动态平衡。基于此，《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二条做出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要求占用耕地的单位将所占用耕地耕作层的土壤用于新开垦耕地、劣质地或者其他耕地的土壤改良。”此外，我国以往对于水土保持工作的忽视，造成土地的荒漠化、盐渍化现象十分严重，水土流失和土地污染都在不断加剧，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耕地能效的充分发挥。因此，法律在要求土地耕作者对土地实施保护的同时，在《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维护排灌工程设施，改良土壤，提高地力，防止土地荒漠化、盐渍化、水土流失和污染土地。”

2. 国家对基本农田的特殊保护。

据国务院1994年颁布的《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二条的规定，所谓基本农田，是指根据一定时期人口和国民经济对农产品的需求以及对建设用地占用情况的预测而确定的长期不得占用和基本农田保护

区规划期内不得占用的耕地。基本农田是耕地的一部分,是长期不得占用的耕地,是基于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而设定的,也可以称之为“吃饭田”、“保命田”。它是我国城乡人民农产品需求的满足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保障,在规划规定的期限内必须保持其相对稳定。

基本农田保护,即是在国家对耕地实施保护的基础上,对于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的耕地实行的特殊性保护。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禁止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行为,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禁止擅自将基本农田保护区内的耕地转为非耕地等行为;除了能源、交通、水利等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无法避开基本农田保护区,经批准可以占用保护区的耕地外,其他非农业建设项目一律不准占用保护区内的耕地。确需占用的,必须依照《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审批程序和审批权限,由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被;对于开发区设立需要占用土地的,一般不准占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的耕地。因特殊情况确需占用的,有关单位申报设立开发区时,必须附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非农业建设经批准占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的路地的,应当依照《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实行耕地占用补偿。即开垦与所占耕地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或者缴纳耕地开垦费;对于需要征用基本农田的,一律由国务院批准。

三、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现状不容乐观

虽然农地社会保障功能的重要性已是不争的事实,国家也以法律明文规定了对农地的保护,但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现状不容乐观。

农民一方面深深地依恋着土地,视土地为生命;而另一方面,在现今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经济总体水平较快提升中,农民又因务农无法实现生活水平明显提升而产生“弃农厌农”的思想。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一直呈缓慢发展态势,农民增收困难。从1997年到2003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增幅连续7年没有超过5%,占全社会人口62.7%的农民,总收入只占全国总收入的不到20%。这其中,来自于农业的纯收入更是连年保持低水平,1997年农民人均收入来自农业的为1268

元,自1998—2003年,连续6年都低于这一水平。这段时期的另一现象就是,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的持续低势使得其增量不及城镇居民的1/5,2003年,二者的差距扩大为1:3.24。^{[3](P.294)}直到2004年后,伴随中央对农政策的倾斜,农业较大幅度增收,农民依靠农业的收入才有所改观,但城乡收入差距依旧很大。现在的农村,青年农民弃农进城务工普遍存在。应该说,农地生产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明显不足。

伴随大量年轻农民的外流,致使土地利用出现“恶性循环”的趋势,并进一步衍生出严重的社会问题。这种问题的存在,对于农村而言,直接导致农村劳动力结构老化,科学种田水平难以提高。而粗放式生产经营又导致地力的浪费,农地资源无法充分发挥功效,经济效益也无法显著提高,土地利用出现了“恶性循环”的趋势;对于城市来说,面对农民兄弟的大量涌入,目前我国的城市建设程度与配套制度明显是捉襟见肘的。而城乡二元管理制度的长期存在,使得即便是在城市有较稳定收入来源的农民,仍被视为盲流,得不到平等待遇,而身份不明也无法平等享受城市保障制度所带来的权益。这种状况造成农民利益保障的缺失,也带来大量的城市秩序问题,会形成新的城乡对立,甚至演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由此可见,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明显是缺失的。

造成这一问题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得不说国家农村土地制度的设置是重心所在。土地始终是农民生活保障与利益实现的首要选择,如果农民选择离开土地,放弃土地,那么国家对于农地制度的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应对此负有责任。农民群体历来是社会利益集团中的弱势群体,利益博弈的失利必然使其权益的实现受到损失,这就需要国家给予对农业、农民一定程度的特殊保护,既是对国家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保障,也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与体现。对这一社会保障性问题的思考与解决自然是农村土地制度设置的要务。

四、使用方式的转变是农地社会保障功能实现的最终路径

初级阶段的农业,对工业化提供的食品、原料贡献,是社会经济持续稳定的基础。虽然农业的改善不会自动地单独地抑制通货膨胀,但消除来自食品价格的压力,就会减少引起价格不断螺旋上升的因素。……在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主要政策目标的那

些国家,必须把引导农业部门为市场生产更多的农产品作为政府农业中心目标。反过来,农业又能为工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经验表明,大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的扩张,其中最具潜力市场部分扩张的规模和速度将决定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进程。^[4]农业还是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力失业的主要流向而具有社会稳定器的功效。在整个社会利益格局变动剧烈的时期,尽管农业比较利益相对低下,但农民因其消费水平平均大大低于城市居民,而所有人都有基本就业保障,这就保证了农村的社会稳定。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目前农村土地的保障作用大体呈现两种态势。一是,部分农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保障生活等各方面需求实现;二是,脱离乡土,将土地流转出去,从事非农就业实现生活所需。

对于第一种情况,目前我国农业很大程度上依然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在农业初级阶段,基于我国人多地少、耕地资源稀缺的现实情况,采取平均分配农地使用权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农地经营模式,是较适合于我国农业发展初级阶段的体制形式。它使农民能够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享有稳定的土地使用权,将这种农地使用制度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明确化、法律化,能够明显作用于农业发展初级阶段农业经济的稳定而快速增长,也构成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但这种土地产出方式往往会产生“过密型商品化”现象。“过密型商品化可能通过充分地利用家庭劳动力而带来较高的家庭收入。它甚至可能通过每个劳动力每年工作更多天数而带来每个劳动力较高的年收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单位工作日生产率和收益的发展,后者通常惟有通过劳动组织的改良、技术的进步,或更多的单位劳动力资本投入才可能实现。换句话说,过密化解释了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悖论现象”^[5](pp. 147-148)。这就与我国现代农业建设与提高农业的比较利益和农民收入发生强烈冲突。很明显,我国在此存在严重问题。如何更好利用农村土地,使农民个人经济收入得以提高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

农业发展的更高阶段,就是农业的集约化生产与适度规模经营。在我国,就是要解决因土地家庭承包而过于零碎细小,不利于农地高效利用和现代农业发展的问题。更进一步则是要对土地、劳动力、资金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合理组合提高农业集约经营水平的问题。在我国实践中已有很多地区采取多种

方式使农地适度集中起来以达到规模经营的程度。法律也有相关规定允许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流转,以利于实现土地的适度集中。但是真正实现土地集中,其外部条件是一部分人能够放弃土地经营。目前,我国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远未达到使农民完全弃农从事非农产业的高度,就是使那些已在农外产业有稳定收入的农民,也仍然将土地视为一种失业保险,不愿转出土地。

另一种情况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劳动力逐步向二、三产业转移。这导致农村非农就业比例的提高以及农户对土地生产依赖性的减弱,同时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又催生了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这些因素就必然促进了农村土地的流转。^[6]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这预示着农地流转将进入新阶段。但是,农村土地除了具有最基本的农业生产要素功能外,它对农民而言还具有社会保障功能,而农地流转的推广势必会对原有的功能产生重要影响。

农地流转的市场化不仅改变了两种生产要素,即农村劳动力与土地的结合方式,而且也改变了农民的收入结构及风险承担方式。与此同时,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不断涌人到城市,农民职业不断分化。新生代农民,其收入主要不是来源于农业劳作。东部经济发达农村地区,农民就业早已多样化,收入已多元化。他们对农地产出的依赖明显减弱,对农地的价值认识在发生变化。土地产出对农民的保障效用减弱,经济生产和投资效用增强,这使农地对农民的效用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拓宽了农民社会保障的选择范围,已实质上改变原有的保障体系。当然,农民并非同质的整体。农户之间在资源禀赋(包括人力资源)方面存在巨大差距,同样的土地流转政策、市场水平对不同农户会形成不同的收入效应及保障程度。但无论如何,农民所从事职业越偏离纯农业,就越得倾向于选择社会化保障方式,这是不争的事实。对于这部分农民,农地流转利益对于农民社会保障的实现极为重要。

客观地看待以上问题,农业的更高阶段的发展决不是我国现有土地制度足以实现的。这其中,不仅仅在于农村土地使用权制度的安排,让农民有更大的自主性,调动起来农民的生产(下转第105页)

试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从“秩序”的建构谈起

于 舒¹ 曹 缪 辉²

(1.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江苏南京 210046; 2. 南京大学法学院, 江苏南京 210024)

[摘要] 中国传统政治社会孕育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法律的首要和永恒价值是维护“秩序”的稳定,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一直体现着维护统治秩序、政治秩序、等级秩序的特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不仅促进了“秩序”的建构,也在维护“秩序”的使命中形成了其独有的特点。本文试从统治秩序建构的合法性基础、政治秩序实现的手段及等级秩序维护的措施三方面论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关键词] 中国传统; 法律文化; 秩序

[中图分类号] D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4-0096-05

中华民族自诞生以来,历经风云沧桑,创造了屹立于世界文明之巅的灿烂文化。其政治文明的发展,自始就伴随并依存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而政治秩序的稳定亦依赖于法律的维护。

自西周武王登基始,统治者为了长久的保有天下,便着力于寻找稳定社会秩序的良方。周公旦巧妙地利用宗法等级制建构起一套“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左传·桓公五年》)的政治等级制度,并以此作为血亲分封的基础,从而形成了金字塔式牢不可摧的政治等级和稳定的政治秩序。与此同时,西周的统治者不再似夏商两朝仅用简单的“天命”来解释政权的合法性,而是创制了体系严整、内容丰富的“周礼”,以此作为规范进行社会控制。不可否认,这种规范在很大意义上便是当时社会的法律。尽管早于西周的夏朝之时就已有制定法的出现,但无论是作为法律雏形的氏族规则、氏族习惯,还是奴隶制社会的制定法,以至于“周礼”的产生,目的无一例外的都是为了建构起一套适合社会生产及统治利益的稳定秩序。周公制“礼”让这种“秩序”的建构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以此为起点,在此后

几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各朝各代的统治者都运用法律的手段以求维护政治秩序、等级秩序、社会秩序以及道德秩序。又深受“周礼”的影响,这种法律的手段在外表上总表现出与礼治和道德的结合的特点,共同影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特点的形成。

从中国传统法律产生的起点和历史脉络看,法律的首要价值既然是维护秩序的稳定,且法律在表现建构“秩序”、维护“秩序”、惩罚“无序”时手段也不尽相同,那么由此而孕育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维护“秩序”时自然也会表现出各式特点。本文拟从“秩序”建构的角度,梳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一、统治“秩序”建构的合法性基础——远古“宗教”向儒家“哲学”的发展

法律作为政治统治的工具,其加以维护的政治秩序形成在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之上。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为了确立统治权威,统治者首先必须解释政权的合法性,从而达到收服民心的目的。而法律又是建立在这种合法性解释之上,并且通过法律思想等来表现并维护这种合法性基础。这种思想基础在最开始的时候往往来源于宗教及具有宗教性质的哲学

[收稿日期] 2012-04-15

[作者简介] 曹缪辉(1987-),男,江苏如东人,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思想。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P.2)}。统治者往往通过宗教来欺骗、麻醉人们的神经，编出一套令人信以为真甚至顶礼膜拜的话来使民众心甘情愿地臣服于统治者的权威，从而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维持一定的社会稳定。在这种宗教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法律思想的演变上显现出以下特点：

1. 夏商两朝——恭行天罚，鬼神定罪。

《尚书·召诰》记载：“有夏服天命”。《礼记·表记》记载：“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奴隶制社会早期，由于人类的生存状态仍一定程度上存有原始社会生活形态的特征，生活水平落后，对自然界众多未知事物无法解释，便只能将其归纳为超自然的力量，视为“神意”而膜拜之。占有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利用了这种社会条件，“夏代统治者利用宗教鬼神进行统治，将其掌握的国家权力说成是神授的，把法律说成是神意的体现，而法律的实施则是‘恭行天罚’”^{[2](P.20)}。到了商朝，这种“天讨”、“天罚”的神权法思想则发展到了顶峰。《礼记·表记》有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6]甚至定罪量刑也要诉诸鬼神，《礼记·曲礼》有载：“敬鬼神，畏法令也。”将统治者实施刑罚说成是上天意旨，是秉承神的意旨，代天行罚。夏商两朝统治者，利用宗教鬼神解释了自身权力的合法性，从而为其进行有效统治奠定了基础，于是法律为了维护这种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基础，也表现为通过占卜等古老方式实施法律、定罪量刑。

2. 西周——以德配天，明德慎罚。

夏商神权法的思想被西周统治者继承和发展。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奴隶主贵族，总结并吸取夏代、商代灭亡的教训，提出“以德配天”的君权神授说。“天命”属于谁，就看谁有能使人民归顺的“德”。这一说法，同样也是通过宗教式的说辞为西周取代商代制造舆论。此时的宗教已逐渐摆脱了原始的“鬼神”之说，统治者引导人们信奉的是一种新的“至上神”——“天”，而统治者则自诩为“天命”的承受者，所以要求被统治者必须遵从自己，这也就是遵从了“天命”。然而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利用对“天命”敬重的过程中，西周统治者提出了“保民”的思想。《尚书·五子之歌》中提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当然，当时的“民本”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君”，说到底就是一种“君王本”。但无论是出于何种统治目的的考虑，统治者在利用“鬼神”、“天命”等迷信治理国家时，也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宗教的惩罚性。他们虽然

利用“天命”，但他们也相信“天命”的存在。“天命”要求他们，必须要考虑民间疾苦、不能横征暴敛，只有为民服务，才能更好地稳固民心，否则便不“配享天命”。这种治国方略运用于法制方面，要求“明德慎罚”，即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立法、司法都必须宽缓、审慎，执行刑罚更要慎重。可以说，此时的法律已逐渐脱离了“神权法”的法律思想，同时也可以看到，这种思想对后世历朝历代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3. 汉武帝以后——天人合一，效法自然。

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与西方封建社会极为不同的一点是，西方封建社会处在漫长的宗教统治之中，而中国社会在西周甚至西周之前时就已逐渐摆脱了宗教的控制。在中国封建社会，从来没有宗教治国的时期，一直是“王”（或“皇帝”）治理国家，宗教只在一定时期的统治中起到了被利用的作用。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者巧妙地创制并解释了其统治权威的哲学基础。其主流便是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家”思想。

汉武帝之时，董仲舒运用阴阳学说来论证政治与法制原则，进而形成“大德小刑”的德主刑辅的立法司法原则。他的理论着眼于解决两个问题：统治者的权威从何而来以及为何要尊重这种权威？董仲舒给出的答案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并通过“王”的造字来说明天子权威的至高无上，“古之造文者三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贵而三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3]与之相对应，在我国传统法律观念中，认为犯罪行为就是对宇宙间和谐有序的自然秩序的破坏，是对天道的侵犯。因此，对犯罪的惩罚，应该顺应天道的要求，使自然的和谐秩序得以恢复，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天人合一，从而实现理想社会秩序与自然秩序的和谐一致。在董仲舒“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和“效法自然”的法律思想影响下，后世封建王朝在法律思想、制度、设施各个方面上均对其有所体现：

第一，君权神授，法自君出。既然君权至上，“天子受命于天”，那么天子不仅仅代表着权威，还代表天意。同时，天子作为神意的承受者，自然是世俗社会道德水准最高的人。从这两点来看，天子无疑拥有最高的立法权，任何人都不会质疑这一点。从法律形式可窥见一斑，自夏朝始，王命就已成为最初的法律形式。此后，尽管王命的名称变化丰富，但皇帝发布的诏令无论何时，理论上都可以不受制定法或成文法的约束，拥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第二,息争止讼,刑期无刑。无讼思想是追求和谐思想的又一体现,这一思想来源于孔子:“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大学》)含义是没有诉讼,是封建统治者希望达到的社会秩序和谐、法律无用武之地、诉讼无以产生的一种理想境界。法律在此时的作用便是四个字:“刑期无刑”。“无讼的价值取向也是以中国传统文化身后的积淀为基础的。”^{[4](P.343)}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便是崇尚和谐。“人法天,天法地,地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古代的人们在整个自然界中寻求秩序与和谐,而无讼则是和谐的家庭、和谐的家族、和谐的社会在司法领域中的要求和反映。但由于“无讼”思想过于强调秩序稳定,使人们的思想在保守中难以发展,弱化了法律意识,形成了“贱讼”、“厌讼”的心理。

第三,恤刑慎杀,重惜民命。汉朝以来,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中便有了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汉惠帝曾下诏令,规定凡70岁以上、10岁以下的人,犯了罪可以免除刑罚。汉朝景帝、宣帝、平帝都对刑事责任年龄做了具体的规定,这些规定使刑罚呈现出愈加宽缓的趋势。唐朝时,亦有老幼废疾减免刑罚的刑罚原则。除此之外,为了维护封建伦理道德,中国古代法律中还有“亲属容隐”原则。亲人犯了罪,不能告到官府。这项原则从秦朝区分“公室告”、“非公室告”时就有所体现。另外,历代统治者中省刑罚、薄赋敛、以民为本、体恤民困的统治思想也不少,虽然这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但也充分表明了统治者意识到民众作为主体的价值与意义及其人格尊严的权利,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的人文主义精神,也是中华法系的主要特点。

第四,则天行刑,春生秋杀。董仲舒在其“天人三策”中详述了“天人感应”的理论。他认为:“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庆赏刑罚与春夏秋冬以类相应”,所以,应当“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即春夏行赏,秋冬行刑。汉朝时便规定除了“立决”之犯外,其他死刑犯的执行时间都必须在秋天霜降以后冬至以前。如果违反天意,会招致灾祸,受到上天惩罚。“秋冬行刑”遂被载入典籍,成为一项法令而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灭亡。这种制度客观上也为某些蒙受冤屈的死刑犯提供了翻身的机会,例如汉朝的“录囚”制度,就使一些蒙受冤屈的秋冬行刑犯有伸冤翻身的机会。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制度也为中国传统法律的司法公正提供了客观条件。

二、政治“秩序”实现的手段——礼法结合,伦理立法

周公制“礼”,从而确立了宗法等级制的规范性基础,形成了有效的社会秩序。后来产生的儒家思想将“礼”作为思想的内核,要求在全社会施行“礼治”,无论是立人、立国、立业,都要有“礼”作为根据。“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必要条件,提出了“制度在礼”,“为国以礼”,“礼者,法之大分”。儒家思想的出发点当然不单单在于维护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和谐世态,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礼”来巩固封建专制的等级秩序。因此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不可避免地受到“礼”的影响,法与礼互相结合,在不同的社会时期两者的地位、关系虽有不同,但它们都一起构成了实现封建等级秩序的手段。由此而生的中国传统法律制度自然就形成了其独特的特点:

1. 德主刑辅,明刑弼教。

《唐律疏议·名例》中概括“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即以礼义教化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法,而以刑罚制裁作为治理国家的辅助手段。其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两者不可或缺。《唐律疏议·名例》中比喻到,德和刑“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二是两者地位不同。法虽然是“国之权衡”、“时之准绳”,但不能专任刑法,而要以德礼教化为主,要大德小刑,先德后刑,而不能相反。

至明朝时,这种礼刑关系在立法思想上的体现发展成为了“明刑弼教”。儒家理想化的基层社会是九族相亲、乡里和睦、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而教化齐同。^[5]自宋代时,处理礼刑关系上有了新的突破,宋代朱熹对“明刑弼教”新的阐释中,有意提高了礼、刑关系中刑的地位,认为礼法均是理的体现,二者对治国同等重要,“不可偏废”。“故圣人之治,为之教以明之,为之刑以弼之,虽其所施或先或后,或缓或急,而其叮咛深切之意,未尝不在乎此也。”(《朱文公文集》,戊申延和奏札)从而,德与刑在封建社会中成为维护封建秩序的重要手段。在司法活动中,也体现为“礼去刑取”、“出礼入刑”。当然,这里的礼指的是封建等级秩序下的礼教,其带有明显的封建等级性。

2. 春秋决狱,原心定罪。

儒家思想成为正统以后,法律仍基本沿袭了《法经》的思想与体例。汉武帝时期开始强调的儒家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中的“礼”、等级和人伦在汉朝基

本沿用了的秦朝法律中没有体现，此时法律内容和法律指导思想间出现冲突。于是，董仲舒亲做“春秋决狱”式，由此掀开了以儒家经义作为参照、依据，对案件进行裁决的“春秋决狱”的序幕。而“春秋决狱”实指以儒家的经义为依据，谋求法律与儒家伦理间冲突的解决。司法官员断案时既要体现儒家的伦理，又要不违背法律。

由此，“春秋决狱”确立了中国古代定罪量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原心定罪”。“原”乃推究、考证之意，“心”指动机，“原心定罪”是说在某些犯罪的情况下，犯罪人犯罪的动机将决定量刑的轻重。

“春秋决狱”之风的兴起与“原心定罪”量刑原则的确立，促使在以礼为本的法律制度中，在法律适用上形成了稳定的司法秩序。它不仅使司法官员断案时于法有据，也使得其在判刑时体现出中国古代法律“情理法”的特点，依据犯罪动机来判罪，有利于从根本上扼制犯罪的发生，这在当时来说是极有进步意义的。当然，这种司法秩序的形成也为政治秩序的形成奠定基础。

3. 亲属相隐，存留养亲。

儒家思想维护的是封建等级秩序，而这种封建等级秩序不仅体现为政治秩序的“尊尊”，也体现为构成社会个体的家族秩序中的“亲亲”原则。古人认为，只有实现了家族秩序的稳定，才有利于形成整个社会的政治秩序的稳定。因此要“齐家治国”，齐家而后才能治国；因此也强调“父父子子”，必须尊敬地位比你高的人。这种思想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上有着鲜明的体现，成为中华法系的又一个独有特色。

秦朝时期就有“公室告”和“非公室告”的区分。“公室告”是指控告主体对其家庭以外的人所犯的杀伤人、偷窃财物之类行为所提出的控告，而“非公室告”是指控告主体对其家庭内部的犯罪行为向官府提出的控告，对此种控告，官府不予受理。

汉朝时法律在亲属相隐方面已有了非常完善的规定。汉宣帝在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下达诏令：“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金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汉书》，宣帝纪）这段话意指亲属之间互相隐瞒犯罪的行为，是合乎父子之亲亲、夫妇之道的，对这种行为，法律应不予追究。其实这正是对儒家所提倡的家族道德的一种维护，同时也意味着孔子的

道德观念已经被转化为法律原则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同样也有“五服制罪”的定罪量刑原则与“存留养亲”的刑罚执行制度，它根植于孝的观念，维护着等级秩序的构建。

这种思想在后世历朝历代予以延续，唐朝时刑法原则中明确规定同居相隐不为罪，以法律的力量将儒家的宗法伦理道德观念灌输于全社会，使之成为每个人思想和行为的准则，通过维护封建家族秩序，进而巩固封建国家的统治。当然，也规定不得以“亲亲”害“尊尊”。

三、等级“秩序”维护的措施——礼刑分野，家族本位

在强调“亲亲”“尊尊”的家族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封建社会，为了维护这种等级秩序的实现，无论是在构成国家这个“大家”基本单位的“小家”内部，还是在维护“大家”的秩序时，都通过严密的等级结构，为不同等级的人群确立了不同的权利与义务，从而实现了有序的等级秩序。

1.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礼治”的基本特征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是指“礼”制定的出发点是为了调整贵族、奴隶主的行为，而非规范庶人、奴隶的行为。贵族等级的秩序通过道德就可以形成。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贵族犯罪的行为不受到刑罚制裁，只是他们所受的刑罚制裁有一套特殊的制度，这也是最早的“特权法”。“刑不上大夫”是说“刑”制定的出发点是为调整庶人、奴隶的行为，只有通过强权与暴力，才能形成这一等级人群的秩序。这种“礼刑分野”的局面充分说明西周实行的是一种公开不平等的特权法，即奴隶主享有特权的奴隶制法。由于贵族和平民、奴隶在政治地位上表现出不平等，因此他们所享有的权利与所负担的义务在法律上也体现出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的法律制度正是为了维护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等级秩序。它使得中国古代社会贵贱有别、上下有分，由身份而决定的命运让不同等级的人各安其命、各司其职，减少了社会的动荡，维护了统治者期待的稳定秩序。

2. 家族本位，服制有分。

建立在宗法等级制上的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结构，从其产生之初就体现出家族本位的特征。再加上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族不仅是生活的单位，同样也是生产的单位，人们大多

生活在较为封闭的单一家庭环境中,与外界的联系被隔断。因此在相对应的法律制度中,显现出了家族本位的特征。这种家族本位的特征,一方面体现在前文所述的“亲亲”思想为基础的孝道原则,其在法律上表现为“亲属相隐、存留养亲”;另一方面体现为当在个人之间发生纠纷时,人们习惯于通过家族内部自我解决的方式来处理争端,这不仅因为中国古代的诉讼费用高、诉讼不便利,也因为人们更加信任于这种家族等级所形成的权威,对这种家族权威从内心予以认可。从而,族规、家法等替代了国家成文法,而惩治的犯罪理由中很多也是对“孝道”以及封建伦理的触犯。

当然,这种家族本位中的处罚是通过亲等地位的高低、血缘的亲疏来实现的。通常,只有服制愈重时,这种处罚才愈可能实现,例如父对子、夫对妻的关系。这种家族本位的法律特点,对形成有效的亲等秩序,从而维护政治等级秩序与社会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3. 贵族特权,十恶规制。

中国古代的法律为维护等级秩序,最显著的措施就是为贵族设置了“特权法”,等级有分、特权不一。西周法律有“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的规定;汉代有“先请”之制,对犯罪的贵族官僚的审理,要先奏请皇帝。魏律根据《周礼》的“八辟”规定了“八议”。至隋、唐,封建特权法相因沿袭又不断发展,《唐律》规定的“议”、“请”、“减”、“赎”、“官当”等按品级减免罪刑的法律制度是集中的表现。唐之后,宋、元、明各代法典均将其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肯定。

但即便是为了对不同人的身份等级以示区别而赋予各种人不同的特权,这种特权也有它的底线。这种底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处于封建等级最顶端的天子的权力不容许任何侵犯,这仍旧是为了维护政治统治秩序;二是作为这种封建秩序基础的伦理纲常不得触碰,否则将会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封建政权的基础崩塌了,这种社会秩序不复

存在了,那么统治者的政权也将走向灭亡。

四、结语

诚然,现代法治观念中的“秩序”一词来源于西方,今天我们在探究各国之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时也大谈“自由”与“秩序”,但法律其自身的起源与发展历程已明确地告知世人,法律的首要和永恒价值即是维护秩序的稳定。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自始至终都表现了其为维护传统统治秩序的稳定而形成的鲜明特色,这其中不仅有人类法律文明发展的共同规律,更是中华法系下传统政治文明的映射。这种传统的“政治秩序”与“社会秩序”已与当今社会相去甚远,甚至被现世之人所批驳、诟病,我们总不停地展望着“自由”的蓝图,期待“自由秩序”的形成,但须知能够推动文明之发展,必有为我所借鉴之处。某些论者只接受西方理想图景或原则并且彻底否弃中国各种“传统”法律资源是不可取的。我们也应看到,法律保障自由须在法律维护了秩序之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维护秩序为目的形成的种种特点,为我们构建当代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法律体系提供了良好范式与借鉴;同时,只有以史为镜才能明得失,才能对我们社会主义经济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有所促进,社会才能在法治的带动下稳定向前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3.
- [2] 曾宪义. 中国法制史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 [3] [汉]董仲舒. 春秋繁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 [4] 张晋藩.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4.
- [5] 赵世超. 中国古代引礼入法的得与失 [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1).

(责任编辑 光 翟)

美国的遗产税问题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姜孟亚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北京 100720)

[摘要] 现代意义的遗产税在美国实施了将近百年,但是近年来美国总统对废除遗产税所作的努力和妥协引人瞩目。美国的遗产税、尤其是联邦遗产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猛烈批评,首先最为激烈者当数美国经济学界。他们认为遗产税是政府对成功者的惩罚,对中小企业危害太大,且征收成本太高。仔细分析美国在遗产税废除过程各方的博弈可以为我国开征遗产税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借鉴。

[关键词] 税收经济学; 美国遗产税; 社会公平

[中图分类号] F810.4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4-0101-05

人们普遍认为开征遗产税能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体现社会公平。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很多研究显示主要发达国家的遗产税制存在着种种弊端,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也未能实现人们所预期的社会公平。随着世界各国减少税种、简化税制潮流的兴起,遗产税的征收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等国已陆续取消了遗产税。遗产税的改革正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一、西方国家的遗产税制度

遗产税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税种。据考证,远在古埃及、罗马帝国时代就有历史记载。遗产税最早产生于4000多年前的古埃及,出于筹措军费的需要,埃及法老胡夫开征了遗产税。古罗马时期,由于战争急需军饷,奥古斯都大帝曾令公民在遗嘱内须注明,至少应将遗产的5%上交国家。公元6年,奥古斯都迫使罗马元老院通过遗产税法案,规定对继承人继承的遗产份额课征5%的遗产税,以作士兵养老费用和屯田基金。^[1]当时征收遗产税的目的是用来作为老弱士兵的养老金。在中世纪,教会法曾规定,教徒要把遗产交给“最神圣的天主教会”,这是一种自觉的宗教义务。这项规定盛行于欧洲,尤

其是英伦三岛。爱尔兰法规定,死去的人要把1/10的遗产划归教会。这实际上是古罗马征收遗产税制度在教会法上的表现。14世纪末,一些意大利自治城市因财政困难,先后开征了遗产税,采用比例课税,税率为2%~5%。可见,早期遗产税是按比例课税,其开征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弥补财政支出(主要是军饷)的不足。^[2]

而近代以促进社会资产平均分配为目的遗产税则始于1598年的荷兰。此后英国于1694年、法国于1703年、日本于1905年、美国于1916年相继开征了遗产税。早期世界各国开征遗产税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增加政府收入,解决暂时性的财政困难,如筹措军费、应对灾害等。美国也不例外,历史上联邦政府三度开征又三度废止遗产税,都与军事行动有关。直到1916年宪法修正案才使遗产税的征收合法化。最初,遗产税的起征点为5万美元(相当于现价72万美元),最高税率为10%。为防止通过生前赠与以及将遗产以信托方式传给后代来逃避遗产税,美国又相继开征了赠予税和隔代遗产转让税。^[3]

现代累进税率的遗产税制是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形成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限制财富过分集中,缩小贫富差别。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急速发展,资本

[收稿日期] 2012-04-10

[作者简介] 姜孟亚(1972-),男,江苏沭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江苏省行政学院法政部副教授。

积累的规模扩大,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贫富差距愈益悬殊,埋下了社会不安定的隐患。同时,随着社会财富的空前增长,食利阶层逐渐出现并壮大,而这又可能引起社会发展的停滞。因此,在18世纪末期及19世纪初,西方一些经济学家、法学家就明确提出要按累进税率征收遗产继承税,限制财富在家族范围内无限积累和集中,控制和减少食利阶层。约翰·穆勒在19世纪30年代曾明确提出应该限制遗产权,防止财富的过分集中。他认为应该对接受赠与或继承财产的任何人规定一个接受或继承财产数额的最高标准,在这个限额内,继承人或接受人有权自由地加以支配,超出这个限额即是不合法、不合理的,应当用遗产累进税加以限制。约翰·穆勒的构想对英国后来的遗产税立法产生一定影响。1853年,英国颁布的《遗产管理办法》确定了遗产累进税制度,规定遗产税适用累进税率,根据遗产数额和继承人与死亡人的亲属远近关系来划分不同税率。这一法令后来被1949年的《遗产管理条例》取代。美国的遗产税制度基本上是从英国引进的。^[2]

二、开征遗产税的理论依据

遗产税的课征是基于遗产继承关系。那么,遗产继承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如何呢?

遗产继承首先是基于私有制的存在。在原始社会氏族制度下,生产资料氏族公有,人们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不存在财产私有现象,也就不存在遗产继承问题。到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社会大分工的出现,生产力水平有了提高,一个人除了能养活自己,还能提供剩余产品,部落战争的胜利者不再杀死战俘,而是把他们变为奴隶。随着阶级的出现,为保护和巩固特定人(阶级)对特定财产(土地、牲畜、剩余产品、奴隶)的占有的私有制也产生了。历史经过了几千年的沧桑巨变,但财产私有制本身没有怎么变,只是财产私有主体“风水轮流转”,从奴隶主、封建地主转到近代的资本家乃至普通百姓。而他们的财产私有多以家庭为单位出现和存续,集中表现在遗产继承上。财产继承的链条延续着一代代生生不息的命脉。遗产继承之所以首先在家庭成员间进行,是因为家庭和个人承担着人自身的繁衍任务。

关于遗产继承的合法性,则是无庸置疑的。世

界各国都把遗产继承作为确认并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实证典范。我国1982年《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我国《民法通则》第76条规定:“公民依法享有财产继承权。”我国《继承法》则对我国公民的遗产继承作出了详细规定。所有这些规定都是我国遗产继承合法性的法律依据。^[4]

那么,开征遗产税的理论依据是什么?理论界主要有权利说、没收遗产说、追税说、均富说、享益说、课税能力说等。^[1]现代各国开征遗产税多以均富说、权利说和能力说为依据。^{[5](P.147)}

(1)权利说。此说认为,遗产发生继承关系,缘由是遗产人与继承人之间的血缘或其他情谊关系。从经济角度来看,继承人所得的遗产是一种不劳而得,对彼此情谊疏淡者更是意外之财。国家允许私人间的遗产继承,即是国家授予私人以财产继承的权利,国家既然授予私人以继承的权利,自然亦有课征和处理遗产的权利。

(2)均富说。此说为学者穆尔所主张。认为国家应行使课税权,以平均财富分配,防止财富集中于少数个人手中。而且,凡个人所获财富过多,有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之倾向时,应采用多税课征,以促进社会资产平均分配。

(3)课税能力说。此说为塞里格曼所倡导。他认为,应以负担能力为纳税标准,继承人获得了遗产即增加了纳税的能力,自然应该纳税,而且还要随着其继承遗产的不同数量课以不同的累进税,使多继承者多纳税,少继承者少纳税,以符合公平合理原则。^[6]

古罗马和古埃及遗产税开征的主要目的还是经济上的,我们从欧美等国家遗产税开征历史来看,可以发现主要目的是相同的。历史地来看,遗产税产生的缘由并非富人太多,而多半是政府缺钱。亚当·斯密认为,中世纪欧洲各国,都将继承税“视为国王的主要收入之一”。其历史脉络非常清晰地显示,政府缺钱,巧立名目设立新的税种,借以增加财政收入,无疑是许多国家出台遗产税的直接诱因,而与富人数量并不相干。^[7]因此,我们可以说早期遗产税是按比例课税而且税率较低,其开征的目的是为了增

^[1]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了“技术价值论”和“社会资源垄断论”两种新的遗产税征税依据。参见王文龙、金丽馥.遗产税:“劫富济贫”还是“替天行道”[J].社会科学战线,2005(3);张永忠.遗产税的法理依据新论[J].兰州商学院学报,2011(6).

加国家财政收入,弥补财政支出(主要是军饷)的不足。但是,现代之累进税率的遗产税制则是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产物,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限制财富过分集中,缩小贫富差别。“在现代社会,巨额私有财产的继承会造成子孙不劳而获,并使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差距扩大,这不利于国家的长久发展和社会安定。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允许无限制继承,为避免财富分配不合理而造成不劳而获,并使之回归社会,西方各国都设立了遗产累进税制。”^[8]

三、美国遗产税的争论

在美国,联邦和州两级政府均开征遗产税。联邦政府的遗产税首次开征于1797年,其目的是为美国海军的发展筹集资金,以应付当时美国与法国的紧张关系。但仅隔5年,即1802年美国国会就废除了遗产税。直到1862年,出于为南北战争筹措军费的需要,国会又决定重新开征遗产税。随着南北战争的结束,国会于1870年再度废除遗产税。遗产税的第三次开征则是在1898年,起因是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急需军费,与以往一样,此税随着这场战争的结束而再次被停征。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来临,遗产税于1916年在美国重获新生。由此不难看出,美国联邦遗产税始终是与战争密不可分的。^[9]

现代意义的遗产税在美国实施了将近百年,但是近年来美国总统对废除遗产税所作的努力和妥协引人瞩目。美国的遗产税、尤其是联邦遗产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猛烈批评,首先批评最为激烈者当数美国经济学界。1998年12月7日,众议院联合经济委员会发表了由该委员会高级经济学家丹·米勒撰写的报告《遗产税经济学》,这篇报告成了取消派论辩的蓝本,以后多数遗产税经济观点和数据都出自这篇报告。另外,许多知名经济学家如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费尔斯帝恩、曼昆等都撰文支持取消遗产税。其次,在反对遗产税问题上,共和党是不愁经济来源的,因为富有的潜在遗产税纳税人们肯定愿意为取消遗产税的政治活动提供资金。此外,共和党还把许多有利害关系的团体集结在自己的旗下,借他们的力量对民主党和总统施加政治影响。^[10]

与民主党相比,共和党的政治思想更保守,其经济政策主张倾向经济自由主义,反应在税收政策上,共和党一直把减税做为推动经济繁荣的法宝。早在1995年,中期改选后开始在国会占多数的共和党人就提倡进行以税收减免为主旨的税制改革,遗产税

制改革是其中的重点。可见,共和党在中期改选的胜利是引发遗产税改革的导火索。

共和党一直认为巨额财政盈余是减税和实行彻底的税制改革的大好时机,民主党人则把这看成是增加公共支出、扩大政府职能的机会,这实际上是两种经济思想的较量。共和党主导国会以后,这种较量开始走上政治舞台。1997、1998、1999和2000年国会都提出了类似的包括改革遗产税在内的减税议案,都被克林顿总统否决,但总统的否决越来越困难,其中2000年共和党在众议院提出的取消遗产税议案竟获得了65名民主党人的赞成票。^[10]

美国社会各界反对遗产税的主要理由有如下5点:

第一,就社会公平的角度看,遗产税难于实现既定的公平目标。根据美国国内收入署的统计,价值在2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额遗产适用的平均税率明显低于价值在250—500万美元之间的小额遗产。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纳税人可轻易地利用以下多种渠道规避纳税义务,最典型的方式有:“直接赠与”,如每位受赠者每年都可获得价值1万美元免税财产;“间接赠与”,包括通过提供优惠性个人间贷款而转移的利息收入,通过改变人寿保险的受益人变相转移收入等等;“未申报的赠与”,纳税人对小额不动产的转移即使不予申报,征收机关也难以察觉。

第二,就经济效率角度看,遗产税几乎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一方面开征遗产税,事实上是对投资、工作和储蓄积极性的打击,人们为逃避遗产税不是减少投资、工作与储蓄,就是增加即期消费;另一方面,遗产税本身就是一个得不偿失的税种,以1998年为例,遗产税虽然筹集了230亿美元的财政收入,但是其征收成本却高达460亿美元。

第三,就税制本身来看,遗产税是美国税制最复杂的一部分之一。仅遗产税纳税申请书的续写说明书就有22页,而纳税申请书本身则长达41页。据美国国内收入署的估计,正确填写此申请书的时间需要一周,但实际要完成此项工作则需要4周时间,因此大部分的纳税人都聘请专业律师来完成此项工作。

第四,就财政收入角度看,遗产税属于小税种。无论是从绝对量,还是从相对数来考察,这一税种的收入水平一直保持相对稳定。事实上,仅仅1998财政年度的个人所得税,就超过了美国在整个20世纪的遗产税收入总额。^[9]

第五,1999年由伦兹研究公司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0%的被调查者认为,即使自己也许永远

不可能成为遗产税纳税人,但遗产税也是最不公平的税种。这给民主党和克林顿总统当头一棒。取消遗产税既然如此符合民心,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当然会在这上面大做文章拉选票。事实证明,这个武器很有力。2000年总统竞选时,戈尔阵营一方面抨击小布什的这一政策是“讨好富人”,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匆忙间推出一个改革遗产税的计划。^[10]

2001年布什上台后第一批政策措施之一就是提出题为“经济增长与缓解税收法”的一揽子法案,包括把最低所得税由15%减至10%,最高由45%减至33%,同时逐步取消遗产税。其方向与里根政府被称为“劫贫济富”的政策有类似之处。经过激烈争论后,国会两院通过修正后的税法,并由总统于2001年7月7日签署。有关遗产税部分规定从法案生效日起,逐步递减,到2011年全部取消。但是又加一条补充规定:到2011年重新回到2001年的征税水平,这一条称作“夕阳条款”。也就是说,减免是暂时的,10年以后从头再议。当然这一条是反对取消者力争得来的。取消派于心不甘,到2002年7月同一届国会(第107届)第二次会议时,又提出删去这一保留条款,使取消遗产税成为永久性的。此案在列入日程前达成一项协议,即参院必须有60票,而不是简单多数通过。结果众议院通过后,参议院表决是54:44,未达60票,没有通过。那是中期选举之前,当时参议院民主党尚占多数。投票之后,布什总统表示:这一结果令“美国人民”失望。

布什及拥护派的理由是:此法案实施的10年中,那些本应交税的人将少交2360亿美元,而他们用这笔钱投资所得利润将使政府增加比这更多的税收,既符合增长又符合公平原则,与整个减税方案一样,有助于鼓励人们承担风险和创造财富。现行遗产税挫伤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对于那些凭自己的努力和才能积累了财富的人不公平。而且,同一笔财产在生前已经交过所得税,死后再征税,等于重复征税,这是“政府惩罚成功者”。特别对那种世代相传的中小家庭企业和农场打击最大,有的下一代因交税后产业缩水而无法继续经营下去。因而使这些企业和农场主在生前不集中精力经营其产业,却要花很多时间根据遗产税策划死后的财产。2002年共和党人在国会中再次提出取消这一条款时,还是以维护中小企业利益为辞,说如不取消这一条,10年以后,遗产税又会“从坟墓里钻出来”危害中小企业,实际上他们在这10年中也不得安心。这一派人把遗

产税简称为“死亡税(death tax)”,布什总统在正式讲话中也用了这一名词。^[11]

但是对此做法也有强烈的反对声:2001年年初包括金融大鳄索罗斯、世界第四富投资家巴菲特以及美国首富微软总裁比尔·盖茨的父亲威廉·盖茨等120位最有钱的美国富翁主动上书国会请愿,要求继续征收遗产税,造福穷人,并要求将他们的意见在2001年2月18日的《纽约时报》上刊登。美国总统布什刚刚宣布的1.6万亿美元的减税计划包括普遍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为已婚夫妇减税、取消联邦遗产税、增加慈善捐款的税收扣除等。收入越高,减税额越多。显然,减税计划将给拥有美国大部分财富的最富有阶层带来巨大好处。但这120名富翁却反对这一做法,他们认为这将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从而减少了政府对医疗保健、社会保障、教育等领域的投入。巴菲特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说:“取消遗产税是个大错误,是极其愚蠢的。取消遗产税会造就一个贵族阶级。”拥有280亿美元的巴菲特和拥有420亿美元的比尔·盖茨都表示死后要捐献出大部分财富。^[12]

四、美国遗产税问题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布什政府2001年提出的包括逐步取消遗产税的“经济增长与缓解税收法”一揽子法案,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引发了对遗产税征收与否的新一轮思考与辩论。受此影响,英国和日本调低了遗产税的征收税率,欧洲的意大利和瑞典,亚洲的印度、马来西亚以及我国的香港和澳门,大洋洲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也先后停征了遗产税。可以说在21世纪初全球遗产税的征收进入了一个低潮期。^[13]

近年来,关于遗产税“存”与“废”的争论,集中反应了世界各国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税收价值取向的取舍。“存”“废”之争充分反映了税收立法的两种思想——效率价值和公平价值取向的对立性。“存”派强调“公平价值”优先,他们认为遗产税实质上是一种“劫富济贫税”,取消遗产税不利于税收调节财富分配、维护社会公平功能的实现;“废”派强调“效率价值”优先,他们认为遗产税是重复课税,阻碍了自由竞争,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是“对成功者的惩罚”,存在诸多弊端问题。^[14]

正因如此,学术界对遗产税历来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个别观点极端的学者甚至认为,遗产税是“给居丧家庭增添痛苦的不公正、不道德的税收”,也是“文明世界中最恶的税收之一”,西方20世纪上

半叶的税收理论权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塞里格曼教授就持类似的看法。^[9]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贫富分化的不断加大,社会各阶层对遗产税开征的呼声越来越高。许多知名学者和普通人士一致认为: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遗产税的开征,由于经济基础已经具备,其不仅仅具有可行性,而且具有可能性及迫切性。但是也有部分知名专家及政府高级官员认为我国当前各方面的条件还不够成熟,完满地开征遗产税绝非易事。因为遗产税是一个较为特殊也是非常复杂的税种,在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只是囿于民意,没有充分、科学的论证和设计而贸然开征遗产税,其效果也可能是适得其反。

[参考文献]

- [1]朱青,等.开征遗产税离中国有多远? [J].中国经济周刊,2004(42).徐国栋.罗马人的税赋—从起源到戴克里先登基[J].现代法学,2010(5).
- [2]姚秀兰.论西方遗产税制度及其借鉴[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4).
- [3]左宁.发达国家遗产税的改革及启示[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5(6).

- [4]陈岳琴,谌生文.关于遗产税立法的若干问题[J].法学家,2001(3).
- [5]蒋晓惠.财产税制国际比较[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
- [6]王贞韶.我国应当建立遗产税制度[J].政治与法律,1992(5).
- [7]赵伟.遗产税的逻辑[J].浙江经济,2011(7).
- [8]杨玲.西方国家遗产税制与抑制贫富悬殊[J].税务与经济,1997(6).
- [9]邵培德.美国遗产税面临的挑战[J].涉外税务,2001(4).
- [10]王晓霞.美国为什么要取消遗产税? [J].经济纵横,2001(5).
- [11]资中筠.美国还要向右走多远[N].环球时报,2003-1-10(02).
- [12]赵楠.美国富翁要求保留遗产税[N].大河报,2001-2-16(04).
- [13]王宁郎.关于开征遗产税的几点思考[J].中国财政,2009(12)
- [14]林国建.从美国遗产税“空窗期”看我国遗产税的开征[J].涉外税务,2011(3).

(责任编辑 光 翟)

(上接第 95 页)积极性和土地投入热情;也不仅仅在于农村土地使用权利的流转形成了土地的集中;更在于在这种制度下农民的土地投入能够获得应有回报。农业与工业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农民也并非一定要到城市中去实现其利益,现代农业建设的基础仍然是土地,合理高效利用土地提高农民的收入,是农业的社会保障作用创造性实现的最终归宿。

在农村土地制度设置方面,现实至少给予如下启示:其一,必须完善农地流转价格评估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农地经营权价格评估体系。应参照城市土地使用权定价机制,建立农地经营权价格评估机制,综合考虑农地的质量、区位和社会保障功能等因素,由专业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为农地流转双方提供价格参考,实现农地流转定价导向,提高农地流转市场水平,保障农民流转收益,增强农地对农民的社会保障能力。其二,利用当地非农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非农特色产业,提高农民文化与职业技能,既为农地良性、充分流转发展现代农业创造条件,也增强农民非农就业机会,更好实现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

业转移。弱化农地产出的社会保障职能,但不弱化当地资源对农民的社会保障作用,同时缓解城市压力,更好实现农村土地的社会整体保障功能。

[参考文献]

- [1]唐忠.农村土地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农业科技出版社,1999.
- [2]杨连福.发展现代农业的若干思考[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0.
- [3]金鑫.中国问题报告[R].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4]黄守宏.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基础地位[J].经济研究,1994(4).
- [5]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 [6]黄贤金,方鹏,周建春,等.农村土地市场运行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光 翟)

论李渔的文化创意产业活动

陈文兵

(浙江金华教育学院人文学院, 浙江金华 321000)

[摘要] 李渔是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先驱者,他组织家班、创作畅销书、维权反盗版、注重广告宣传、进军出版业。李渔的文化创意活动具有意识形态性、经济属性、商业属性和文化属性。

[关键词] 李渔; 文化创意产业; 先驱

[中图分类号] G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4-0106-04

一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发展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1]。这表明文化产业正日益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

“文化产业”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1926年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本雅明发表了《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在这篇文章里他描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国家萌发的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即由收音机、留声机、电影的发明所带来的文化领域的巨大变革,复制技术使艺术作品不再是一次性存在和使用,而是可批量生产、多次使用。1947年,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阿多诺在其著作《启蒙的辩证法》中,首先提出了“文化产业”(Culture Industry)这一名词,并探讨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状况,其本意是对文化产业化进行批判的。随着历史和语境的扩展,“文化产业”逐渐演变为一种中性概念,用以指一种客观的历史文化现象。“创意产业”的概念最早出现在《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中,文件提出:“创意产业是指那些从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天份中获取发展动力的企业,以及那些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开发可创造潜在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2](P.18)}。不同国家及组织对文化产业的称谓和定义各不相同,如美国使用“版权产业”的概念,

韩国倾向于使用“数字内容产业”的说法,日本称为“娱乐观光业”,英国称为“创意产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产业的定义是:“结合创造、生产与商品化等方式,去运用本质是无形的文化内容,这些内容基本上受到著作权的保障,其形式可以是货品或服务。”^{[2](P.20)}文化产业就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狭义文化产业主要包括文化艺术业中的艺术、出版、文物保护、图书馆、档案馆、群众文化、新闻、文化艺术经纪与代理以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等。狭义文化产业生产的产品主要包括两大类内容,一类是服务型文化产品,如表演艺术、语言艺术和综合艺术服务,以及图书馆、博物馆、广播、电视、电台提供的表演性演出服务、阅读展览服务、游艺娱乐服务等;另一类是实物型文化产品,如造型艺术品、出版和新闻业生产的美术品、工艺制品、书籍、报刊、文物、音像制品和软件光盘等。广义文化产业指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称。广义文化产业包括文化艺术业、广播电影电视业和教育业。

从文化创意产业视角来看待李渔,他的文化活动涉及休闲娱乐业、文学创作业、文艺出版业、广告宣传业、旅游观光业等,他的文化活动给当代以莫大的启迪,李渔不愧是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先驱者。

李渔从事文化创意产业,是有其必然原因的。

[收稿日期] 2011-11-22

[作者简介] 陈文兵(1967-),男,浙江东阳人,浙江金华教育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首先李渔是一个艺术多面手,他在戏曲创作、戏曲理论、小说、小品文、诗词、音乐、绘画、广告、编导、舞美等各方面都有建树。单就文学艺术而论,他在诗文、小说、戏曲、对联、赋、序、祭文、记、传、赞、变、露布、说、疏、券、誓词、铭、引、跋、记略、史论、文论、杂著,都有尝试。其次,李渔的活动也深受当时社会风气影响,明清时期是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时期,江浙一带是商品经济繁荣的区域,兰溪被称为小上海,是著名的商埠,李渔的思想明显受到徽商、浙商的影响。当然,李渔从事文化产业,还与他的兴趣爱好和家庭生活有关,他自称“生平有两绝技”,“一则辨审音乐,一则置造园亭”,“自不能用,而人亦不能用之,殊可惜也”^{[3](P.156)}。李渔从事文化创意产业也是出于生活的考虑。妻妾、儿女、奴仆几十口人,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是不足以维持生活的,李渔曾感叹:“卖文之钱,亦可指屈而数计矣。”^{[4](P.165)}“渔终年托钵,所遇皆穷,惟西秦一游,差强人意,八闽次之,外此则皆往吸清风,归餐明月而已。”^{[4](P.10)}李渔从事文化创意产业与他的思想观念密切相关。恩格斯说过:“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他们的意识是随着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的社会关系,他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5](P.47)}。时代和社会的形势是李渔文化产业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观念是行动的先导,行动源于思想观念,李渔的文化创意产业活动与他的人文精神、务实思想等是休戚相关的。

李渔的文化创意活动主要分为3个阶段:1634—1649年隐居家乡兰溪时期,是尝试时期,他在家乡建造伊山别业。伊山别业坐北朝南,背靠小山,面临清溪,是一座集居住、园林、游乐为一体的园林,是李渔修建的第一座园林,它给李渔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回报。1649—1662年在杭州时期,是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李渔以创作小说戏曲为主,创作了深受读者观众喜爱的文学作品,小说集《无声戏》《无声戏二集》,戏曲《怜香伴》《风筝误》等均创作于这一时期。1662—1677年在南京时期,是繁荣时期,这一时期他从事园林观赏、戏曲创作、戏曲演出、经营书肆、维护版权等,将文化与经济较好地结合在一起,走出了一条有鲜明李渔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之路,获取了丰富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

李渔是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先驱者,他营构园林、经营书肆、广告宣传、组织家班、巡回演戏、旅游

观光、编撰著述、维护版权、打击盗版等,这些活动都带有鲜明的文化创意产业色彩,体现了李渔的文化创意产业思想。他的文化活动有着规模化生产、市场化运营、复制性、创造性等特点。

李渔文化创意产业活动首先表现在创办家班上。明清之际,创办家班,蔚然成风。但大多是为了声色之好,或附庸风雅,自我陶醉。而李渔则希望把自己的特长转化为生产力,带来经济效益,他把家班作为文化创意产业来经营的。在李渔56岁那年远游西北的过程中,他先后得到了乔姬、王姬,她们成为李渔家班的主角,有了这两个天赐的主角,李渔家班的成立就水到渠成了。在李渔调教下,乔、王二姬迅速进入角色,红遍大江南北。李渔带着家班周游天下,奔走于各地达官贵人的门下,以博取钱财养家糊口。几十年间,他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曾经到过浙江、江苏、安徽、江西、福建、广东、湖北、河南、陕西、甘肃、山西和北京等地,“履迹几遍天下,四海历其三”^{[4](P.165)}。每到一地,当地名流纷纷相邀,但李渔的固定主顾,还是各地的富豪大贾、士绅官员,靠给他们唱堂会获取报酬,“借士大夫以为利,士大夫亦借以为名”^①。家班作为李渔自己的实验剧团,给他的戏曲创作和戏曲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使他在戏曲创作、导演、演出等实践活动中如鱼得水。

其次,李渔文化创意产业活动表现在创作畅销书上。在杭州生活期间,李渔成了炙手可热的“畅销书作家”。李渔的作品大多描写男女之情,贴近百姓生活实际,歌颂了青年男女追求自由恋爱、追求幸福生活,反对封建礼教,具有一定反封建和追求个性解放的进步意义。但李渔其实更多的则是顺应读者趣味,把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来看待,他追求的是其经济效益。李渔以旺盛的创作力,数年间连续写出了《怜香伴》《风筝误》《意中缘》《玉搔头》等六部传奇及《无声戏》《十二楼》两部白话短篇小说集。这些通俗文学作品虽在当时被正统文人所不齿,视为末技,但由于通俗易懂,贴近百姓生活,寓教于乐,适合观众、读者的审美情趣,所以,作品一问世,便畅销于书肆,被争购一空。李渔很重视戏曲创作,他说:“填词非末技,乃与史传诗文同流而异派者也。”^{[3](P.2)}这是由于他看到了戏曲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和强大的感染力。他认为“传奇一书,昔日以代木铎,因遇夫愚妇识字知书者少,劝使为善,诫使勿

① 《四库总目提要》《牒草》提要说:“山人墨客,标榜成风。稍能书画诗文者,下则厕食客之班,上则饰隐君之号,借士大夫以为利,士大夫亦借以为名。”(卷一八〇,第1626页。)

恶，其道无由，故设此种文词”^{[3](P.5)}。

再次，李渔文化创意产业活动鲜明地体现在维权反盗版上。因为李渔作品深受观众、读者喜爱，所以他的作品一问世，马上就有几十家甚至上百家书商盗印。李渔的作品只要在杭州市场上出现，苏州、南京等地的书商很快就能翻印出来。更有甚者，不法书商找来几个无名作者的书稿，直接署上“湖上笠翁”的名字就摆上书摊。“每成一剧，才落毫端，即为坊人攫去，下半犹未脱稿，上半业已灾梨；非止灾梨，彼伶工之捷足者，又复灾其肺肠，灾其唇舌，遂使一成不改，终为痼疾难医”^{[3](P.52)}。

为捍卫著作权，李渔勇敢地站出来与盗版活动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一边请求官府为他主持公道，传札布告；一边与女婿四处奔走，上门交涉。李渔曾说“是集中所载诸新式，听人效而行之。惟笺帖之体裁，则令奚奴自制自售，以代笔耕，不许他人翻制，已经传札布告诫之于初矣。倘仍有垄断之豪，或照式刊行，或增减一二，或稍变其形，即以他人之功冒为已有，食其利而抹煞其名者，此即中山狼之流亚也，当随所在之官司而控告焉，伏望主持公道。至于倚富恃强，翻刻湖上笠翁之书者，六合以内，不知凡几。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当决一死战，布告当事。即以是集为先声。总之天地生人，各赋以心，即宜各生其智，我未尝塞彼心胸，使之勿生智巧，彼焉能夺吾生计，使不得自食其力哉！”^{[3](P.229)}

与维权反盗版紧密相连，李渔创办芥子园，进军出版业，创建文化品牌。明中叶以后，由于印刷技术的提高、出版各环节的沟通，再加上成本低廉，所以当时从事出版刻稿的人很多，其中大多数人的刻书目的是“专以货利为计，但遇各省所刻好书，闻价高即便翻刻”^{[6](P.665)}。为打击盗版，李渔全家搬到盗印最猖獗的南京，在《与赵声伯文学》中，李渔曾说“弟之移家秣陵也，只因拙刻作祟，翻版者多，故违安土重迁之戒，以作移民就食之图。不意新刻甫出，吴门贪贾，即萌觊觎之心。幸弟风闻最早，力恳苏松道孙公，出示禁止，始寝其谋。乃吴门之议才熄，而家报倏至，谓杭人翻刻已竣，指日有新书出贸矣。弟以他事滞金阊，不获亲往问罪，只命小婿谒当事，求正厥辜。虽蒙稍惩贪恶，现在追板，尚未知后事如何？噫！蝇头之利几何，而此辈趋之若鹜。似此东荡西除，南征北讨，何年是寝戈晏甲时？”^{[4](P.24)}在南京李渔建立了一个自己的书屋，名为“芥子园”，取“芥子虽小，能纳须弥”之意。他的全部作品都在自己的书铺印制，这是他维权的重要举措。同时，他改造印刷技术，注重装帧设计。他根据读者的心理和需要，除

了出版自己创作的作品，还编辑出版了大量的通俗文学作品，如被他称为“四大奇书”的《三国志演义》《水浒全传》《西游记》《金瓶梅》；编辑出版了诸如《古今史略》《尺牍初征》《资治新书》《千古奇闻》等一大批读者想看而买不到的书；由他倡编并亲自作序、女婿搜集整理、在中国美术界影响颇广、一直被誉为“中国画临摹范本”的《芥子园画传（谱）》也是在芥子园印行的。由于芥子园印行的出版物纸墨精良、装帧精美、特色鲜明，加上重信誉，广告意识强，因而市场销路好，受到人们的欢迎。芥子园成为一个文化品牌，是清代为数不多的延续二百年以上的老字号。李渔深谙创建品牌即是效益的现代经营之道，为创文化名牌，李渔殚精竭虑，想尽一切办法提高自己的文化产品的质量。

最后，李渔文化创意产业活动集中表现在他的广告意识和广告策略上。李渔是一个出色的广告策划大师。芥子园声名远播，除了图书品质独具格调外，还与李渔善于广告宣传密不可分。李渔时时处处注意宣传自己的文化产品，李渔做广告常采用以下策略：一是借他人之口宣传自己，提高声誉。在《尺牍初征》中，李渔借他人之口，大大地表扬了自己一番。又借石鲸和李一贞来信，对自己创作的《怜香伴》《风筝误》《无声戏》等作品加以盛赞。二是见缝插针，连环广告。除了在书坊经营处高悬“芥子园名笺”之类的招牌外，李渔做广告的主要媒介是在自己出版的书上。如在《芥子园画传》中宣告《资治新书》初集、二集已出版、三集续刊即将刊行；在《窥词管见》中推荐《闲情偶寄》一书。在《闲情偶寄》书中介绍芥子园唯一专卖，“惨淡经营，事难缕述，海内名贤欲得者，情人向金陵购之。是集内种种新式，未能悉走寰中，借此一端，以陈大概。售笺之地即售书之地，凡予生平著作，皆萃于此。有嗜痂之癖者，贸此以去，如偕笠翁而归。千里神交，全赖乎此。只今知己遍天下，岂尽谋面之人哉？”后面还有一行小字注明“金陵书铺廊坊间有‘芥子园名笺’五字者，即其处也。”^{[3](P.229)}

三

文化事业主要包括公益性文化事业和文化创意产业。李渔从事过公益事业，比较而言，李渔更多从事的是文化创意产业活动，文化创意产业因其特殊性，它有自身的特点。李渔是卖文糊口的职业作家，把文化产品商品化、市场化，将笔耕作为谋生的职业，实现了文化的价值创造功能。李渔又是经营文化的实业家，积极创办文化实业，经营文化这一特殊

的精神产品,如开设书铺、组建家班等。

李渔的文化创意产业活动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文化的产业化不是取消、抽空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而是意识形态取得了一种新的形式。不同的文化产业活动,都承载着特定的意识形态。由于文化的柔性和隐性特征,也由于其规模化、集约化等特点,文化产业能够通过强有力的宣传攻势,向公众灌输自己的思想理念,诱使公众认同、接受自己的思想理念。《闲情偶寄》主张以“闲”和“适”为人生目标,对世俗生活本身的关注与执着,将艺术依附在日常细微而琐碎的生活细节中。这种休闲思想影响着许多人。周作人在《知堂书话》中称其“文字思想均极清新”,“都是很可喜的小品”,“有自然与人事的巧妙观察,有平明而又新颖的表现”^{[7](封底)}。李渔的文化产业活动渗透着他的审美意识和休闲思想。

李渔的文化创意产业活动带有经济属性。在现代产业经济学中,产业是介于微观经济细胞与宏观经济单位之间,生产和经营同类产品的企业群。因此,文化产业像其他产业部门一样具有经济属性,是以追求利润、产品的价值补偿和增值为目标的。这一属性使文化产业与公益性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李渔创办家班、创作畅销书、维权反盗版、进军出版业无不与他的经济追求有关,“渔无半亩之田,而有数十人之家,砚田笔耒,止靠一人”^{[8](P.204)},李渔追求的是最大的经济效益。李渔强烈的广告意识和精湛的广告艺术,都源于他对经济作用的深刻认识和对经济效益的孜孜以求。

李渔的文化创意产业活动带有商业属性。市场机制、商品观念被引入了文化产业,残酷的竞争使得各种文化产品的生产极力迎合市场的需求和公众的情趣。李渔创作中的娱乐性、消遣性、休闲性,都是为了迎合市场的需求和公众的情趣,它们迎合和开发了普通大众逃避现实、渴望新经验的享乐主义思想。李渔在戏曲创作中强调“结构第一”,追求“机趣”,重视科诨,语言上要求“贵显浅”都是为了实现作品的商业价值。他说:“传奇不比文章。文章作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作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3](P.24)}这鲜明地体现了李渔吸引大众的商业化的追求。李渔著书卖文、出版维权、演出盈利等都是商业性很强的文化活动,以观众为本位、以娱乐为手

段、以经济为目的的文化选择,使李渔的文化活动带上了浓厚的商业色彩。商业属性要求李渔创作突出娱乐性,在小说创作中,他选择大众喜闻乐见的题材,重视以生动的故事来吸引读者,采用小说戏曲化的手段营造悬念,情节离奇曲折、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在戏曲创作中,他充分运用了多种喜剧手法,如误会、巧合、错认、弄巧成拙、弄假成真等,增强戏剧效果,打动观众的心。

李渔的文化创意产业活动具有文化(精神)属性。与传统产业不同,文化创意产业以人为本,是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一种融合。文化创意产业的生产者高度关注自己的生产与产品,创意行为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需要,创意产品某种程度上能够满足生产者的自我需要和消费者的精神需要和情感需要。伴随着社会前进的脚步,文化属性在大众的精神构造中的地位也就更加的重要,没有文化属性,文化产业将是无本之末、无源之水。李渔的文化创意活动都是文化活动,都是以知识性、创造性为核心的,有别于一般物质的经济活动。李渔的文化创意活动都是精神活动,它们影响人的精神、情感、心理,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造着人的精神世界。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N]. 浙江日报, 2011-10-26(02).
- [2] 魏鹏举. 文化创意产业导论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 [3] 李渔. 李渔全集(第三卷) [C].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1.
- [4] 章寿眉. 李渔研究嚆矢集 [C].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8.
- [5] 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7.
- [6] 朗瑛. 七修类稿(卷四十五·下)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7] 李渔. 闲情偶寄 [M].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8.
- [8] 李渔. 李渔全集(第一卷) [C].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1.

(责任编辑 光 翟)

全媒体出版的盈利模式研究^{*}

——以中文在线的全媒体运营策略为例

朱梦莉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 以中文在线的全媒体运营为例,着重研究全媒体出版的盈利模式,得出以“读者”为中心,“渠道为王”,运用品牌效应和创新的版权保护机制,以规模合作效益扩大盈利范围这3种模式。随着全媒体出版商业模式的不断探索,全媒体出版将成为数字出版中一支强有力的出版营销大军。

[关键词] 全媒体出版; 盈利模式; 中文在线

[中图分类号] G23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4-0110-03

一、全媒体出版的发展概况

随着图书的出版由传统纸质图书逐渐扩展到互联网阅读、手机阅读、手持阅读器阅读等多种形式,全媒体出版这种运营模式开始频繁出现在书业的发展进程之中。

全媒体出版(Federated Media Publishing, FMP)是指出版内容一方面以传统渠道进行纸质图书出版,另一方面以数字形式通过互联网平台、手机平台、手持阅读器等数字终端设备进行同步出版,争取在第一时间最大限度地同步覆盖所有潜在的阅读群体,共同开拓出版市场,实现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获得任何内容。

全媒体出版在国内的首次尝试,就是2008年中文在线和长江文艺出版社合作推出的《非诚勿扰》一书。该书的出版采用了传统图书、互联网、阅读器、手机阅读4种形式同步出版发行,其中长江文艺出版社负责传统纸书的出版和纸书渠道的发行,中文在线则是通过17K文学网、移动梦网、汉王手持阅读器在诸多领域全方位将该书推向市场。这本书获得了巨大成功,才过半年时间其手机阅读用户量就超

过了10万,互联网阅读用户超百万。至此,全媒体出版开始被国内广泛关注,逐渐被众多媒体所运用。

中文在线为了强调全媒体出版的巨大优势和发展空间,力推全媒体出版,于2009至2011年间与中国编辑学会等多个单位联合主办了多次全媒体出版相关论坛,另外又于今年7月在第四届中国数博会上再次推出全媒体出版时代的学习——“电子书包”的运营想法,种种举措可见,中文在线十分看好全媒体出版。

目前,中文在线的全媒体出版业务横跨了多个渠道,涉及影视、出版、无线、数字图书馆、手持阅读器和互联网,划分为影视作品合作、实体畅销书出版合作和原创作品自营3个细分领域,并在这3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随着《非诚勿扰》的全媒体出版形式走进公众视野,许多图书开始跟进,涉足全媒体出版,如《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我的兄弟叫顺溜》等。已经尝试过此形式的部分出版社对这种方式带来的效果表示满意,部分传统出版社也开始尝试全媒体出版,形成了一个全媒体出版的热点。

*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数字内容产业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编号:08BTQ008)。

[收稿日期] 2012-5-20

[作者简介] 朱梦莉(1987-),女,江苏江阴人,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二、全媒体出版的问题与可行性

随着《非诚勿扰》和其他图书全媒体运营的开展，全媒体出版这一运营模式在出版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出版业人士对该种出版模式高度重视，认为全媒体出版发展势头劲猛，也有人对其持质疑的态度，认为全媒体出版徒具华美外表，并没有给出版界带来更多的实际意义。

1. 全媒体运营中的问题

虽然全媒体出版进行得如火如荼，很多出版社跃跃欲试，但也有人对此种出版模式表示质疑。他们认为，全媒体出版运营存在着不少的问题。

首先，全媒体出版不过是把同一内容简单地放在不同媒体上进行同时传播，对其认识和操作都过于简单化，不过是停留在炒作概念的阶段。

其次，全媒体出版的内容和媒体特点不吻合，没有针对不同媒体对内容进行加工，只是生硬地放在不同媒体上，尤其是针对不同的终端阅读器，没有相当地对内容进行数字化。

再次，全媒体出版的盈利模式尚显幼稚，不够清晰，盈利增长点不够稳定，尤其是在目前大部分用户还没有脱离免费网络阅读的惯性的状况下，盈利缺乏保障，这也是绝大部分图书还是选择一种模式出版的原因。

最后，有些出版单位所谓的全媒体出版不过是简单的多种媒体互动而已，其涉及的范围和影响很有限。要想全媒体战略得到成功，关键还在于出版方能够根据多种新型媒体自身的资源和优势，实现价值链的重新整合与优化，从而最终实现价值的最大化。

2. 全媒体出版的可行性

对于政府来说，政府是支持鼓励全媒体出版的。在全媒体时代，政府部门适应形势的发展，看到全媒体出版的各种益处，是出版业之福。若是政府能够主动为全媒体发展提供服务，加强媒体之间的沟通合作，相信全媒体出版的明天会更加辉煌。

以中文在线总裁童之磊为代表的数字服务提供商认为，全媒体出版在中国起步虽晚，目前尚属“拓荒期”，但出版方应该给予大力支持。他们认为，全媒体出版作为一种新趋势，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中国的全媒体出版在多种有利条件的支持下，具有引领世界潮流之势，尤其是中国的手机出版，已经形成了庞大稳定的读者群，十分有利于全媒体出版的发展。

由于全媒体出版运营联合了多渠道的媒体，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融合，而数字出版相对于传统出版来说，实际上是种互补型的营销，能够在数字媒体获益的同时，带动纸质图书的销售，两者融合进行出版，最终必然能使版权价值最大化、信息传播广泛化和品牌传播具象化。

三、全媒体出版的盈利模式

目前，全媒体出版市场主要采取的是数字版权预付费和利益分成的模式，通过技术服务商、内容提供商和渠道提供商的共同努力来实现盈利。其中，通过传统纸媒出版发行是盈利的一部分来源，网络付费阅读、手机阅读流量付费与下载付费、手持阅读器阅读与订阅付费是利润的又一部分来源，另外还有面向学校、企事业单位、组织团体、社区等服务机构用户提供服务所获取的收益，囊括了PC用户、手机用户、机构用户、手持阅读用户。此外还可能有广告服务、增值服务等方面收益。

1. “读者”中心，“渠道为王”

不论是传统出版还是新媒体出版，用户所希望获得的都是对自身有价值的内容资源，好作品永远是用户的最终选择，所以“产品”中心、“内容为王”始终是各种媒介所坚持的理念。

但是，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轻易地实现即时的沟通，扩大人们的交往空间。这就为同一时间集中世界各地的读者来与出版商进行交流创造了条件，也为出版商以用户的个性需求来制作文化产品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如此一来，全媒体出版这种依托不同出版渠道的同步出版方式，就可以在现有技术的依托下，覆盖到具有不同阅读习惯的所有对该内容感兴趣的读者，读者可以自行选择其喜欢的方式进行信息内容的阅读。全媒体出版在坚持优质内容的同时，跳跃出了“内容为王”的单一视野，加上多渠道模式，通过多种出版渠道将用户与媒体、用户与用户紧密联系起来，达到覆盖所有感兴趣读者的目的，通过全媒体出版的图书也就获得了最大量的读者，再加上人际间传播的影响，达到的营销效果就大大增强了。这正体现了全媒体出版为何以“读者”为中心、“渠道为王”，正是因为全媒体出版模式体现了全媒体的营销效果，获得最广的宣传覆盖面，吸引到更多的消费者，覆盖的受众群越大，成本率也就越低，从而可实现盈利的最大化。

中文在线全媒体出版的《非诚勿扰》，涉及影视、出版、无线、手持阅读器和互联网等多种媒体渠道，

尤其是在电影门票一票难求的时候,推出电子版的小说进行多渠道发布,能使更多读者接触到它;而且用户可以在符合自身阅读习惯的基础上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进行阅读,可以选择电影版或者传统图书,也可以选择手机阅读或是手持阅读器阅读,按照自己的习惯来,这就大大增加了读者的覆盖面,体现了以读者为中心的理念。

2. 品牌效应和创新的版权保护机制

全媒体出版通过多种渠道同步进行出版,能使读者从多个角度了解到作品,更加全面而且更加深化。尤其是在影视、无线、数字图书馆、手机和手持阅读器上不断提供多方面的宣传轰炸,使得该部作品能被用户深刻记住,无形中对用户产生了影响,无论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都能得到这方面的信息,无疑可以凸显其品牌效应,产生品牌影响力,从而能够较轻易地让读者接受它。

中文在线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先授权、后传播的原则,严格遵照授权权限,坚持数字化版权保护(DRM),并联合国内出版机构、作者和各地律师事务所成立了中文“在线反盗版联盟”,开启全天候的网络反盗版监控。此外,全媒体出版采取多渠道媒体同步出版发行,除了传统的纸媒图书外,其他媒体渠道同步进行。由于数字内容复制简单、传播迅速,出版和发行几乎就是同步进行的,这就使盗版无机可趁,再加上严格的数字版权保护措施,从而较好地保护了产品的版本。

中文在线推出的《建党伟业》不仅在影视剧上依托著名影视剧明星进行宣传造势,还借助互联网、车载广告、传统报刊书店、手机推送信息、阅读器网站首页广告等媒体形式进行大肆宣传,再搭配上国家建党重大纪念日的到来和红歌的不断颂唱,从多种角度体现了这部作品的红火程度和该部作品所受到重视的程度,无形中给人以这部作品很好很优秀、制作用心的感觉,从而凸显了它的品牌效应。

此外,中文在线在多渠道媒体出版形式推出之前,启动了24小时网络反盗版监控,随时发现盗版行为,随时起诉该媒体,为全媒体出版保驾护航,降低了盗版出现的可能性,也使得该部作品的内容不被提前泄露。这些举措不仅保护了版权,还大大引起了用户的好奇之心,想一探究竟,从而激发了用户的阅读需求,扩大了营销范围。

3. 规模合作效益

马太效应指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在经济学界内,指的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目前,数字技术日益发展普及,在产业融合的背景下,网络运营商和软件技术公司等非出版机构只要凭借数字技术,就可以很轻易地进入到出版领域,扩展了他们原来的领域,这就是强者愈强的道理;而同时,数字技术的普及使得出版业的进入门槛大大降低,任何人凭借数字技术就可以在理论上成为出版者,出版领域被更多人进入,弱者愈弱。这就是所谓的马太效应。由于进入出版业领域的企业和个人的增多,从事出版业务的企业和出版者的集中度提高了,从而形成了一定的出版规模。而全媒体出版运营使得传统出版单位和这些数字服务提供商紧密合作,共同操刀,实现产品的传播最大化,从而获得更多的收益,同时实现了各渠道媒体的共赢,这就是规模经济的实现和强化。

再以《非诚勿扰》为例,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融合,不仅实现了电影制作方的巨额经济效益,电影还带动了手机阅读和手持阅读器的下载阅读,更是带动了传统纸质图书的销售。传统出版方作为内容提供商,不仅完成了纸质媒体的销售,而且另外获得了来自数字服务提供商的版权收益,双方都有赢利,并且收益更多。

四、结语

国外出版业多种媒体交叉融合不断深化,并成为了传媒行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出版商也在逐渐尝试全媒体出版运营的模式,电子书将一如既往地蓬勃发展,而手持阅读器更将大量涌现,手机阅读将成为广大消费者的常用阅读方式。另外一点可以预见的是,传统纸媒图书不会被数字出版代替,仍旧有其一定的营销规模,但是将无法比拟线上收入这个主流大势。

而全媒体出版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将是内容提供商、服务提供商和渠道提供方共同面对的问题,不仅要针对受众的个性化需求来展开内容的数字化,加深内容的开发,还需要吸收国外跨媒体运营的成功经验,加强全媒体出版的计划性,有的放矢。

(责任编辑 南山)

电视相亲类节目的冷思考

——以江苏卫视《非诚勿扰》节目为例

陈一雷² 朱贵杰²

(1. 南京晓庄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7; 2. 扬州大学, 江苏扬州 225002)

[摘要] 作为以婚恋交友为主要内容的电视相亲类节目, 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自开播以来收视率接连攀升, 多次创下全国卫视综艺节目的冠军。究其原因, 多种节目形态合力形成的综合性创作形式以及嘉宾、评委共同打造的体验式心理展示平台是节目最大的亮点。

[关键词] 非诚勿扰; 电视; 相亲

[中图分类号] J9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4-0113-03

一、综合性的节目创作范式

相亲类节目作为一种电视艺术的节目形态, 它是通过自愿报名参加, 在预先设定的情境中, 将现实中的婚恋交友搬上银幕, 并按照特定的规则和竞争行为达到相亲目的的节目样式。可以说, 10多年之前, 这种节目形态就已经出现, 北京卫视的《今晚我们相识》、湖南卫视的《玫瑰之约》、山东卫视的《今日有约》等, 只是因为缺少新鲜感和创新性而惨淡收场。今天, 以《非诚勿扰》为代表的相亲类节目再次登上荧屏并受到观众的热捧, 我们不难发现它在节目创作范式上具有了新的魅力特性, 成为一种综合性的电视娱乐节目。

1. 纪实性娱乐因素的融入。纪实性是纪录片的本质特点, 在拍摄上它注重展示生活的原生态, 给人以真实的感受。如今, 这种纪实性被电视娱乐节目巧妙地搬过来, 并极大地提升了自身的艺术魅力, 如真人秀节目、情感节目等。《非诚勿扰》通过一系列短片的设置, 同样将这种纪实性因素引入, 展示嘉宾的真实生活场景、参加节目或寻找对象的真实想法。虽然只是展示嘉宾的一个侧面, 但这种真实生活场

景和语言的流露, 却间接体现了嘉宾的某种价值观念。而且这种纪实性因素注重的是借助语言所流露出的心理的真实, 节目中没有花哨的表演和煽情的对白, 而是参加者带着急切找到适合自己伴侣的心情, 对有意者提出现实性的问题, 以试探和观察对方是否符合做自己的伴侣。这种“秀”是内心真实想法的流露, 男女对话也是直截了当, 让观众感到一种现实相亲的体验性。就像第15期节目开始中, 主持人总结的所谓“男生攻略”: 交友谨慎、表演、奇装异服、手拿道具、Pose出场必死等, 其实这些也是一般娱乐节目中常出现的形式。而《非诚勿扰》主持人评委在给男生提示时, 节目自身也排除了这些杂乱的视觉形式, 使得节目干净利落, 不拖沓, 这就突出了节目语言和表现的纪实性。

2. 叙事的未知性和人物冲突的强化。注重叙事中未知因素和人物冲突的技巧设置成为娱乐节目进展的动力和吸引观众的魅力所在。《非诚勿扰》通过主持人和评委的配合, 使整个相亲过程在未知因素设置上显得自然且悬念十足。同时, 由于参加节目嘉宾的性别差异以及相亲类节目本身的特殊性, 再

[收稿日期] 2012-01-11

[作者简介] 陈一雷(1985-), 男, 江苏盐城人, 南京晓庄学院教师。

朱贵杰(1985-), 男, 江苏连云港人, 扬州大学教师。

加上日常化环境的“假定性情境”限制，使人物之间在语言、表情、性格上都形成了一定的冲突性。冲突性的产生往往使嘉宾在相亲过程中体现出对婚姻、家庭、金钱等的看法，而恰是这种未知的冲突性成了潜在的吸引观众的兴趣点。第10期节目中，“富二代”男嘉宾公布自己的高额存款，与女嘉宾在金钱价值观上的冲突；第15期节目中，男嘉宾与女嘉宾的对话再次将金钱与婚姻的现实问题摆出，并产生强烈的观点冲突，这都体现了节目在整个“叙事”中的未知因素和人物的戏剧式冲突所带来的无限魅力。

3. 面试规则和淘汰方式的“残酷”。将一个人放在众多注意力之下，并进行各种方式的考核，改变了以往相亲类节目中多位女嘉宾和男嘉宾同时出场带给观众视觉注意力分散的弊端。《非诚勿扰》通过24位女嘉宾对男嘉宾依次单独的面试性考核，使观众的心理角色既充当了女嘉宾的审判官，也充当了男嘉宾的面试者，并且在二者的转换过程中使观众的情感内化为舞台上每一个嘉宾的感受。观众由此既可以理解作为女嘉宾在选择自己未来丈夫时所提出的要求和每一问题背后试图要考验的内容，同时也可以体会到作为面试者的男嘉宾要面对众多女人考验的无奈、紧张和做出的努力。这种面试规则的设置作为一种预设环境，让观众确实置身其中，想象着身为荧屏角色的言语和行为。因为每一次提问和回答，都预示着灯的亮灭。与现实中的相亲一样，这本身就是一种双向选择，谁都有选择的权利。节目中有的男嘉宾已经进入到主动选择权的最后一关，可因为坚持所爱却失败退场，有的男嘉宾因为最后的短片介绍或者某一句回答而被淘汰。这种淘汰方式表面的残酷性可以说契合了观众对婚姻的认真态度和心理认同，从而使观众在潜意识中感受到节目的真实性。

二、体验式的心理展示

电视相亲类节目作为速配性的婚恋交友活动，时间的短暂性使得男女双方很难加深了解。这就需要在对彼此形貌观察的基础上，注重通过对言行流露的把握进行心理的体验式感受。《非诚勿扰》通过男女嘉宾的现实性交流，以及评委的心理观察分析，将这种体验式的心理情感真实地展示出来，既体现了现代社会男女青年的婚姻价值观念，也给予观众真实的相亲心理感受。

1. 嘉宾真实的心理展示。《非诚勿扰》节目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对人的心理的挖掘和展示。它通过男

女嘉宾在舞台上的一举一动，每一个提问，每一个回答来真切体现出不同嘉宾的内在性格和对婚姻、家庭、金钱等价值观念的态度。比如女嘉宾对长相的要求，有的不喜欢太瘦，有的不喜欢太阳刚，有的不喜欢戴眼镜，有的不喜欢肩膀窄，有的不喜欢厚嘴唇等等，这些看似表面的偏见，却反映出年轻一代女生的不同审美观，而男嘉宾的问题如是否介意婚前财产公证，是否愿意陪妈妈逛街，是否愿意把工资全部交给丈夫等等，也反映了男性对现代社会女性的某种期望和看法。作为相亲类节目，《非诚勿扰》没有像以前婚恋节目那样注重嘉宾的才艺表演，而是更加贴近现实相亲注重对个人能力、婚姻家庭观念等各方面内在心理的考量。嘉宾对不同问题和观点的回答，甚至是对于某一行为、现象的争辩，都真实地展示了言行背后的内在心理和文化边界。

2. 评委幽默深刻的心理剖析。根据心理学理论，一个人的言行必然是内在心理动机和固有观念的流露。如果说《非诚勿扰》是一个注重心理体验的节目，那么在节目中充当心理专家的评委乐嘉是不容忽视的，他带给节目的不仅仅是幽默的点评和欢笑，重要的是他以旁观者的身份理性地看待嘉宾的言行，以揭示舞台上相亲嘉宾行为举止背后的内在心理，以体验式的心灵剖析判断一个人。

嘉宾们相亲过程中这种真实言语的表达和流露，以及评委的心理剖析，甚至是主持人冷幽默的语言风格，都带给观众一种真实的心理感受。可以说，在泛娱乐化的时代，《非诚勿扰》能够挖掘出这种婚恋交友中的真实情感，并与观众达成一种观念和心理的认同，特别是节目简单利落，不拖沓、不做作更是显得难能可贵。

三、相亲类电视节目的现代走向

相亲类节目作为娱乐节目的一种形式，它今后将何去何从，能否在资讯传播快速化和多元社会的演进中不被娱乐大潮所吞没，保持一份独特的文化内涵呢？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1. 现实忧虑。可以说，中国娱乐节目发展始终是充满坎坷的，真正具有长久品牌生命力的娱乐节目实在难以找寻。当《超级女声》《梦想中国》和《我型我秀》三档真人秀节目异常火爆之时，有人曾认为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必将迎来新的高潮和长久生命力，然而时至今日，《超级女声》停播，《梦想中国》和《我型我秀》也失去当年的异常火爆。其他娱乐节目如益智类节目《幸运52》也在辉煌10年之后退出

荧屏。中国娱乐节目繁华热闹的背后,存在着让无数电视研究者忧虑的现实难题,这值得我们思考其中的原因,也担忧此时依然魅力无限的国内媒些娱乐节目。

概括中国娱乐节目难以长久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一是媒介语境,媒体内外间的激烈竞争,以及收视率标准,使节目之间相互引进、复制、模仿,同质化严重;二是节目形态,常变和不变的节目形态都不利于节目品质的提升和品牌的维护;三是受众审美,忽视受众的主体性、认知体系和审美期待的存在,或是迎合流行俗文化,同样难以创造接受神话。相亲类节目在经历了十多年前的一次惨淡后,才显成功的《非诚勿扰》能否走得更远,在于中国娱乐节目市场的自觉,更在于节目组自身的努力。

2. 思考:相亲类电视节目将走向多远。电视相亲类节目作为在电视这样一种公众媒体上的传播形态,应该在传播理念上注入当下文化的内涵,反映当下大众的普遍心理诉求。《非诚勿扰》正是在当今“剩男剩女”婚恋现象和市场观念被强化的社会语境中挖掘出的一档相亲类节目。它迎合了节目参与主体,也就是青年男女这一社会群体的情感文化心理,同时也满足了父母一辈对儿女婚姻的期待。而且这种情感的诉求和心理期待在较长的时期内不会消失,所以文化的缝合性使得这种节目形态有了生存的价值和空间。也就是说,节目具有了掌控时代文

化和流行价值体系的能力。

然而,在《非诚勿扰》不断吸引观众,取得异常火爆的收视率的同时,也不断有网友和电视观众批评节目嘉宾造假、婚恋价值观导向的问题,一些媒体也开始向相亲类节目开炮。由此可见,相亲类节目以婚恋交友为目的,可以说与个人生活和社会利益密切相关,它在带有娱乐性,注重挖掘人物内心的心理体验的同时,更应该以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价值观引导社会舆论。接受美学认为,只有那些贴近受众情感、利益和社会心理认同的文本结构才更容易被受众接受和喜爱。电视相亲类节目要长久赢得受众青睐,就必须彻底还原到艺术的本质原点上,真正 在节目中体现观众的心理需求和社会的舆论引导作用。

当然,作为电视节目,在符合大众文化价值取向和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的同时,也必须不断注入新的元素以防止受众高期待的落空和交流的失衡与空缺,因为再新奇的节目形式,如果长期不变也会让观众产生一种习惯性的视觉和心理疲惫。《非诚勿扰》作为相亲类节目的代表,能否不断为观众引入一种值得持久观赏的魅力和文化价值取向,这是值得我们期待的,也是决定电视相亲类节目形态能走多远的关键所在。

(责任编辑 南山)

谈新媒体语境下非线性编辑的内涵与创新

陈 舒¹ 王 茜²

(1.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7; 2. 苏州日报社, 江苏苏州 215000)

[摘要] 非线性编辑赋予媒体人更多的创作自由,为影视制作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

[关键词] 新媒体; 非线性编辑; 创新

[中图分类号] J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4-0116-02

非线性编辑,指的是磁带编辑方式,它利用电子手段,根据节目内容的要求将素材连接成新的连续画面的技术。非线性编辑则借助计算机来进行数字化制作,几乎所有的工作都在计算机里完成,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外部设备,对素材的调用也是瞬间实现,不用反反复复在磁带上寻找,突破了单一的时间顺序编辑限制。

一、非线性编辑符合新媒体创新的要求

客观地讲,新媒体是传统媒体在科技的带动下,与各网络合并形成的。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多了几个特点:一是即时性,二是无处不在,三是个性化。从表面上看,新媒体是传统媒体的衍生物,但实际上,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大相径庭。传统媒体目前大多数带有垄断性质,垄断带有保护性,能赚钱,能带来高利润。而新媒体扎根于互联网,互联网却是没有垄断保护的,新媒体一产生,就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传统媒体有明确的发布时效、时段,定时定量。这种传播时效决定了受众的关注,也有了时段性。而新媒体的新闻24小时在滚动,每天必须多次关注,才不会漏掉重要新闻。对于习惯了每天一次性关注的受众来说,很可能会漏掉重要新闻。除此之外,这两种媒体的交流方式也不相同。传统媒体是“主导受众型”,而网络媒体是“受众主导型”的。在网络媒体那里,受众有更大的选择权。管理的不

同、内容的不同、版面不同等等都使得新媒体虽产生于传统媒体,却与传统媒体大不相同。

新媒体是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之上出现的媒体形态。这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熊澄宇教授对新媒体的解释,也是基于这种解释,由双编辑机等器械构成的线性编辑已不适用于新媒体。20世纪上半叶,剪辑技术发展早期,线性编辑由于可以很好地保护原有素材,反复多次使用,且不损伤磁带,制作成本低等特点,而受到广泛好评。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线性编辑的缺点逐渐暴露出来。一是难以对半成品完成随意插入或删除等操作,因为线性编辑方式是以磁带的线性记录为基础的,一般只能按编辑顺序记录,虽然插入编辑方式允许替换已录磁带上的声音或图像,但是这种替换实际上只能是替掉旧的,它要求替换的片段和磁带上被替换的片段时间一致,不能进行增删,就是说,不能改变节目的长度,这样对节目的修改就非常不方便。二是模拟信号经多次复制,信号严重衰减,声画质量降低,节目制作中一个重要的难题就是母带的翻版磨损。传统的编辑方式的实质是复制,是将素材复制到另一盘磁带上的过程。而模拟视频信号在复制时存在着衰减,当我们在进行编辑及多带复制时,信号在传输和编辑过程中容易受到外部干扰,造成信号的损失,使图像的劣化更为明显。此外,生硬的操作界面也是线性编辑被新媒体淘汰的一个理由。

[收稿日期] 2012-01-15

[作者简介] 王 茜(1965-),女,江苏苏州人,苏州日报社纪委书记。

所以用新兴或新型的媒体产业来形容新媒体，只是一个片面的概念。这种概念无法满足大众对媒体的需求，也不利于新媒体的未来发展。创新应该成为新媒体的核心内容。新媒体发展开始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摄影到录像再到多媒体光盘和网络艺术，这一系列变化使得新媒体不再过分强调原作的概念，而是鼓励对作品进行再处理。新媒体因此具有了时效性、虚拟性、互动性和网络化的特质。从这个意义上说，非线性编辑是符合新媒体要求的一种编辑方式。具体到技术层面来看，线性编辑是多个画面以每秒数十格的速度闪过形成的运动心理映象，叙事方式是单一的、一维的、集中的，时间轴是平滑、有序、连绵不断的；而非线性编辑则是多元的、多维的、发散的，它的时间轴是起伏、无序、断断续续的，它可以从任何一点开始，向任何一个方向发展。非线性编辑比线性编辑更符合新媒体的特质与创新要求。

二、非线性编辑能够诠释新媒体的创新内涵

非线性编辑的产生以及发展是对新媒体理念创新的最好的诠释。从非线性编辑系统的作用来看，它能集录像机、切换台、数字特技机、编辑机、多轨录音机、调音台、MIDI 创作、时基等设备于一身，几乎包括了所有的传统后期制作设备。非线性编辑系统的优点由于这种高度的集成性显得更为明显。特别是信号质量高、制作水平高、节约投资、保护投资、网络化等等优势，使得它在广播电视界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首先，非线性编辑系统赋予媒体人更多的创作自由。非线性编辑系统是计算机技术和电视数字化技术的结晶，它使电视制作的设备由分散到简约，制作速度和画面效果均有很大提高，特别适合表现蒙太奇影视编辑的手法和意识流的思维方式，赋予了电视编导和制作人员以极大的创作自由度，与线性编辑相比，非线性编辑更加灵活、自由。

其次，非线性编辑系统符合电视发展需要整合资源与业务的趋势与要求。很多人以为，非线性编辑就是指 Premiere，其实并非如此。Premiere 只是一

种比较普遍，操作比较简单的视频剪辑软件，但后台容量小，难以达到对剪辑技术有较高要求的电视台的标准。电视台需要的是能收录外来节目，能制作和加工自产节目，能保存和再利用媒体资料以及播出和发布节目的综合性非线性编辑应用模式软件，只有大型非线性编辑系统才能满足电视发展这种整合资源与业务的需求。例如大洋的 DPower HD 包括了电视台用户日常工作所需的所有业务模块，包括收录、制作、媒体、资源、演播室演出和演控 5 个主要模块。这样的一个应用模式已经不仅限于普通的非线性编辑软件，它更是以非线性编辑为基础的媒体资源交流平台。因此，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面向全台乃至全社会整合资源和业务已经成为电视发展的必然趋势，非线性编辑系统的出现则为这种发展要求提供了技术支持。

再次，非线性编辑系统为电影、电视剧的制作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Advanced X Video Converter 作为非线性影像编辑工具软件，操作简单，功能强大，可以转换、合并或分割 AVI、MPEG、WMV 以及 ASF 等影片格式，为电影、电视剧导演、剪辑师提供了较大的创作空间。影片《秋之白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网络上许多人看完《秋之白华》印象最深的就是它的每一个画面都很美。画面的美感不仅仅基于摄影师的拍摄技巧，也基于导演、剪辑师对非线性编辑系统恰如其分地运用。在影片制作后期，剪辑师运用非线性编辑系统中的渲染手法对光线进行渲染，令昏黄的晚秋阳光照射在满是落叶的池面上，岸边的垂柳间落满独属于阳光的剪影，整个画面充满静逸之美，似乎在为影片埋下一个幽静的伏笔，预示着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这些画面的处理和细节处的完美展现，既基于导演、剪辑师对美的把握，更基于 Advanced X Video Converter 或其他非线性编辑系统强大的操作功能和技术支持。一部影片的成功与否不仅仅体现在它是否使用了 3D 效果或是其他特技，更在于剪辑师对美的把握和对非线性剪辑系统的操作熟悉程度。

(责任编辑 南山)

谈吴歌中的“词曲异步”现象*

王 小 龙

(江苏常熟理工学院艺术学院音乐系, 江苏常熟 215500)

[摘要] 在吴歌中存在着一种“词曲异步”现象, 即唱词的句逗与旋律的句逗不在一处。这一独特的现象与吴方言“强调表达”特征以及吴越地区的历史文化发展轨迹等密切相关。吴歌“词曲异步”现象保存了吴越地区先民的历史信息, 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关键词] 吴歌; 词曲异步

[中图分类号] J6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4-0118-03

2009年3月20日, 江苏苏州工业园区胜浦镇文体站郭玉梅老师给笔者传来74岁胜浦老人吴叙中的演唱录音。笔者发现, 在老人演唱的过程中, 有一个现象比较引人注目, 那就是所谓“词曲异步”现象^①, 即唱词的句逗与旋律的句逗不在一处。24日笔者和其他老师专门前往胜浦采录了吴叙中老人和其他歌手的演唱, 发觉吴叙中老人这一演唱特点是稳定的, 而在当天录制的其他歌手身上并没有发现这一特点。

仔细听辨吴叙中老人的演唱, 你会发现, 他演唱第一句唱词“耘稻要唱耘稻歌”后并未停顿, 而是紧接着唱了第二句唱词的一部分“依(吴语对第一人称的指称, 相当于‘我’)两膀”才停顿, 也就是说, 他将第二句的部分唱词放在了第一个乐句中。这就是吴叙中演唱的胜浦山歌的“词曲异步”现象(见谱例1)。

谱例1 吴叙中《耘稻歌》(吴叙中唱, 王小龙记谱, ^bA = C)



据笔者所知, 这种现象在吴歌流传的其他区域也有出现, 比如江苏吴江芦墟山歌《山歌勿唱忘记多》, 歌手赵永明唱完“山歌勿唱忘记多”后紧接着唱完第二句唱词的“我搜搜”才停顿(见谱例2《山歌勿唱忘记多》, 赵永明唱, 荷兰施聂姐记,^{[1](pp. 234-235)} 王小龙改记, A = C):

谱例2 赵永明《山歌勿唱忘记多》



*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重点课题“江苏省乡土音乐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建设”(项目编号B-a/2006/01/038); 江苏省教育厅2009年度高校哲社课题“江苏传统音乐文化在省属高校音乐教育专业中的校本课程应用研究”(项目编号:09SJB760006)。

[收稿日期] 2012-04-10

[作者简介] 王小龙(1969-), 男, 江苏如东人, 江苏常熟理工学院艺术学院音乐系副教授, 文学博士。

①中国艺术研究院崔宪研究员曾指出, 词曲异步指的是“在有的歌种中, 词曲的结构句式是不同的, 我们称之为词曲的异步关系”。这是笔者所见有关“词曲异步”的唯一论述文献。但他所举“词曲异步”的实例中, 未涉及本文所谈及的吴歌领域。

江苏张家港河阳山歌手张元元^①的演唱中也存在类似现象(见谱例3,张元元唱《河阳山相对唤英台》,朱新华记谱,虞永良记词):

谱例3 张元元《河阳山相对唤英台》



同样的现象出现在江苏常熟白茆山歌中(见谱例4,万祖祥唱《郎唱山歌唱铜铃》,王小龙记谱)。

谱例4 万祖祥唱《郎唱山歌唱铜铃》



荷兰学者施聂姐在其1997年的博士论文中最先揭示这一现象,由她记录的江苏胜浦山歌手金文胤演唱的山歌谱就反映出这一特点(见谱例5,金文胤唱《山歌好唱口难开》,荷兰施聂姐记谱^{[1](P.250)})。

谱例5 金文胤《山歌好唱口难开》



她将这一现象称为“桥动机”(bridge motif),她首先在其论著的第五章第三节分析赵永明《唔哎嗨嗨》时提出了这一现象,也就是“第一乐句并不结束在第一句歌词上——它仍然持续了四个多十六分音

符,在第二乐句之前有一个停顿。歌手只有在这儿才第一次呼吸,也就是在‘吾搜搜索索’的句中。第三第四句的转换也采用同样的方式,伴随着音乐的休止,打断了歌词词组。这种歌词与音乐乐句的矛盾是吴地歌曲的一个共同特征。”^{[1](PP.231-232)}在同一章第12节,她以如下方式例举“桥动机”现象:

啥个圆圆天上天/啥个
圆圆水浮面
啥个圆圆人人哎用/啥个圆圆
常伴姐身边
月亮圆圆天上哎天/荷叶么
圆圆水浮面
洋钿圆圆人人用/镜子
圆圆常伴姐身边

作者进而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她首先列举了过去的一些说法,有人认为是一种加强听众注意力的技巧,有人认为是为了加强一种不间断的表演,这些她认为都不太正确,她进而认为,根据心理学记忆的观点,开始和结束是记忆的关键部分,歌手用“桥动机”这种方式“保护了下一句歌词,通过把第一部分安全地储存在乐句的结尾,在他们刚完成的乐句中。桥动机是一种重要的记忆工具。”^{[1](PP.307-308)}作者是从“口头——程式理论”的角度分析“桥动机”也就是“词曲异步”产生的原因的。这不失为一种值得参考的说法。

笔者在为著名音乐学家乔建中先生编辑文集《国乐今说》的时候,发现乔先生提到,在桂湘粤交界地区的过山瑶人的山歌中也存在这一现象。^{[2](P.225)}根据乔先生的描述,过山瑶民歌分为两类,一类用过山瑶语演唱,叫“勉宗”,意思是“瑶人的歌”,另一类用汉语演唱,称“官语歌”“山歌”或“民家歌”,属于瑶人学唱汉族民歌。唱词结构七言四句体或“三七七七”体。“它的腔、词结合方式比较别致,常常是上乐句一直延伸到下句唱词的第一顿逗处。如:

天上七星七姊妹 七星 姊妹下凡尘
(上乐句) (下乐句)
七星姊妹下凡要 要了 不久又归天
(上乐句) (下乐句)

^① 江苏省张家港市河阳山歌手张元元(1925-1999),因演唱《斫竹歌》而闻名全国。参见徐荣坤《千年古〈弹歌〉,传存在民间》和易人《一首极具史学价值的〈斫竹歌〉》两篇文章,均刊于《人民音乐》1999年第7期。

为什么南方吴越地区,甚至桂湘粤交界地区会有这种“词曲异步”现象呢?除了施聂姐讲的心理学记忆方面的原因,笔者觉得还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解释:

第一是语言学的角度。“词曲异步”的原因可能是南方方言吴语中特有的一种强调表达的现象。语言学家叶祥苓认为,吴语如果是复句的情况,那么整个句子的重点在第二分句。比如:

瓜子炒是增炒焦,不过稍微有点苦隐隐。

房间收拾得干净是蛮干净,就是小着点。

登记是老早登记葛则,喜酒倒勿曾办勤。^{[3](PP. 55-56)}

笔者在考察江苏常熟白茆山歌时,觉得叶先生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具体表现就是在唱需要强调的内容前先有一个气口。比如白茆山歌著名的曲目《一把芝麻撒上天》,就是吸气后再将强调的“万万千”唱出(见谱例6,闵玉娟唱,王小龙记谱)。上述数例吴歌也符合这样的特点。

谱例6 闵玉娟《一把芝麻撒上天》



第二是历史学的角度。笔者认为这可能与我们南方地区共同拥有的“百越”祖先有一定的关系。

根据民族学家的研究,百越族是居于现今中国南方和古代越人有关的各个不同族群的总称。按较通行的研究意见,主要应在中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台湾、广东、广西、安徽、湖南诸省区和越南北部。百越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和生活、文化特点。

百越语为黏着型,不同于汉语的单音成义,故百越语译成汉语时一字常译为两字,如爰为“怜职”,热为“煦虾”。有人认为越语与今壮侗语系的语言十分接近。百越族的生活、风俗习惯也有特点,主要是:水稻种植,著贯头衣,凿齿;断发纹身,鸡卜;契臂为盟;多食蛇蛤海产;巢居,干栏式建筑;善使舟及水战;善铸铜器,如青铜剑、铜铎(大铃)(与弥生时代文化相似),铜鼓,猎头,食人等。胜浦的水乡服饰有“包头”,与“贯头衣”这一特征相似。马觐伯先生也称“包头”已经有至少三千多年历史。^{[4](P. 30)}

胜浦山歌与芦墟山歌、河阳山歌一样,保留了吴越地区先民的一种音乐信息和生产生活信息,通过它,我们可以穿越时空,去感受数千年前吴越祖先的一种生活状态。

令人担忧的是,在演唱中保留“词曲异步”这样独特吴歌现象的歌手越来越少,像张元元,赵永明、金文胤等都早已去世,万祖祥、吴叙中也都年事已高,如何拯救并传承吴歌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迫切问题。令人欣喜的是,吴叙中老人的演唱,“词曲异步”特征更明显,我们应该继续对老人的演唱多加关注,力求留住吴歌这一难得的历史精粹。

[参考文献]

- [1]施聂姐. 中国民歌与民歌手:苏南地区的山歌传统[D]. 荷兰莱顿大学,1997.
- [2]乔建中. 桂湘粤交界地区的“过山谣”民歌[A]. 国乐今说:乔建中音乐文集[C]. 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
- [3]叶祥苓. 苏州话音档[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
- [4]马觐伯. 谈谈苏州水乡妇女服饰[A].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镇“胜浦三宝”研究办公室. 胜浦三宝资料集(一)[C]. 2009.

(责任编辑 南山)

拉魂腔生存现状与振兴发展刍议

薛 雷

(江苏教育学院音乐系,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流布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地区的拉魂腔戏曲, 是该地域最具特色的艺术形态之一。拉魂腔地方小戏历经二百多年的兴衰消长, 既有必然因素, 也有偶然因素。拉魂腔的振兴发展应从理念的树立、环境的营造、观众的培育、演员的培养等方面入手。

[关键词] 拉魂腔; 戏曲; 生存; 振兴

[中图分类号] J6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4-0121-03

拉魂腔是对流传在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区——淮海地区淮海戏、泗州戏、柳琴戏等声腔剧种的一种指称。一般认为, 淮海地区诸多民间音乐经历长时间交融渗透, 大致在清乾隆、嘉庆年间形成了拉魂腔。拉魂腔在淮海地区经历了两百多年的流布传承, 已发展成为颇具地方特色与艺术特征的地方性声腔剧种。

纵观拉魂腔的发展, 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第一, 形成发展期。“拉魂腔”主要以家庭成员为主体, 采用“跑门头词”“跑坡”(是一种沿街挨门讨饭的表演形式)维持生计。表演的形式和内容也较为粗俗浮泛, 主要以快板书的形式再夹杂着民歌小调演唱, 伴奏乐器也十分简陋, 一把土琵琶(即现代柳琴的前身), 加上梆子、竹板。可见, 其所表现的音乐形态, 多偏重于板眼形态(强调律动)的展示, 音调多是当地流行的山歌、小调(小曲、民谣)。第二, 清末民初时期, 拉魂腔“三小戏”表演模式的形成。此时的“拉魂腔”吸收和借鉴了姊妹艺术与兄弟剧种的成功经验和艺术精华, 在表演中, 有人物角色的分配, 在表演形式与表演内容上也较为完整, 并有了更具吸引力的剧情, 这便使得拉魂腔在淮海地区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 加之一些颇具规模的拉魂腔班社的相继出现, 拉魂腔在淮海地区流传开来并深入人心。

第三, 抗战时期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和进步团体导引下, 拉魂腔民间艺人有组织地为抗战和民族解放事业服务, 也使其地位有了较大的改观。由此, 拉魂腔艺人焕发出了极大的创作和表演热情, 使拉魂腔艺术有了较大的发展和飞跃, 在演出阵容上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充和改观, 最终使拉魂腔从“三小戏”的风格形式向地方性大戏表演形态的成功转型。第四, 新中国成立后。此时的拉魂腔艺术进入兴盛繁荣时期。无论是拉魂腔艺术精品的大量生成, 还是拉魂腔艺术水平的不断提升, 甚至于拉魂腔艺术跨地区的传播和流布, 都可谓“盛况空前”。20世纪90年代后, 我国传统戏曲艺术整体处于举步维艰的生存状态, 淮海地区的拉魂腔艺术也概莫能外。

一、现状与分析

从拉魂腔发展的历史回顾中, 我们不免对曾经辉煌的拉魂腔心生怀念, 而面对如今拉魂腔之现状又心生感伤。今天的拉魂腔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处于举步维艰的境遇。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 河南省唯一一个永城市柳琴剧团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不复存在了。在历史传说中的拉魂腔发源地——江苏省东海县唯一的县级剧团——东海县淮海剧团, 也在20世纪末就彻底解散了。笔者慕名来到连云

[收稿日期] 2012-05-20

[作者简介] 薛雷(1966-), 男, 江苏徐州人, 江苏教育学院副教授, 艺术学博士, 东南大学博士后。

港市淮海剧团，面对剧团那破败脱落的门头和几间破旧不堪的办公室及排练场，不禁思绪万千。江苏省淮海剧团与江苏省柳琴剧团虽然在硬件上还显得十分不错，但是若深入对其进行调研后就会发现，由于长期传统戏曲演出市场的逐渐萎缩，这两个在淮海地区颇具规模和实力的拉魂腔艺术团体，其生存状况也是非常窘迫。除此之外，安徽省各地的拉魂腔泗州戏剧团，其生存状况也是今非昔比。譬如，安徽省最具实力的安徽省泗州戏剧院现以表演花鼓灯而闻名，至于宿州、灵璧、泗县等泗州戏剧团，现在所面临的都是演出成本大，演出（商业化卖票演出）没人看。从这些剧团的演出节目单中可见，歌舞表演已成为这些剧团的演出主体，而拉魂腔已退到从属地位，甚至整场演出不见泗州戏之踪迹。

现实中拉魂腔艺术的每况愈下，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足以折射出部分民众和媒体对拉魂腔艺术所评说的“日落西山”、“四面楚歌”的情状。其实，关于中国戏曲艺术的发展现状和前景，早就有见仁见智的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夕阳西下论”“戏曲消亡论”“总体危机论”“转移发展论”“高潮浪谷论”“改革振兴论”等等观点及认识。甚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竟然有人说“落后的”中国戏曲必然被先进的外国戏剧所替代，所幸言而未中，中国传统戏曲不但没有消亡，而且以顽强的姿态在中国大地上滋生发展。在笔者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曾不止一次地见识和领略了城乡拉魂腔民间班社演出或群众自发性的自娱自乐活动，其红火繁荣的场景与拉魂腔专业院团商业演出没人看的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不能不让我们对此进行反思。试想，“国办”的哪一级剧团，真正做到深入基层？实事求是地讲，一段时期以来，我们“国办”的戏曲团体太脱离基层的广大百姓，没有找准服务对象的口味和喜好，真正为广大基层百姓去排戏、演戏，而是一味追求专家的喜好，以专家的评判作为指导剧团发展方向和目标，即“排戏为评奖”，长期以来的失信于民的演出，自然得不到广大百姓的拥护和响应，其结果是在广大民众中，觅不到知音，得不到共鸣和反响，也得不到应有的回报。

二、认识与建议

重振拉魂腔艺术，再创拉魂腔辉煌，是每一位热爱拉魂腔艺术者的心愿。当下有许多有识之士，正在做着改变拉魂腔戏曲现状，重振拉魂腔戏曲的工作。可喜的是，政府和主管部门已经有了对地方性

戏曲发展和扶持的规划。淮海地区先后举办了颇具影响的拉魂腔戏曲艺术节，譬如，2005年6月，江苏徐州举办了“柳琴戏艺术节”；2006年开始举办的“中国泗州戏艺术节”已经常态化，确定为每两年举办一次；2007年，山东枣庄创办的“中国柳琴戏艺术节”，也已确定为每两年举办一次。这些艺术节的举办无疑向人们传递了一个信息，各地政府及主管部门都已开始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拉魂腔艺术的生存和发展，在各地举办的拉魂腔艺术节期间，相关专家学者共商拉魂腔艺术发展大计，并开设交流拉魂腔保护、发展成功经验的学术论坛，这也成为拉魂腔艺术节中必不可少的一大特色和亮点。

1. 整合性研究的理念树立。

流布于四省交界淮海地区的拉魂腔声腔剧种淮海戏、泗州戏及柳琴戏，长时间以来，在各自的省区行政区划范围内重视和扶持程度不一。譬如，江苏省内有着众多的戏曲声腔剧种，若从地域范围与声腔体系上看，可以划分为苏南地区滩簧腔系统的声腔剧种和苏北地区拉魂腔系统的声腔剧种。其中苏南滩簧腔研究已经成功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顺利通过国家级的验收结题，而作为江苏省苏北地区拉魂腔系统的声腔剧种研究还处在研究的起步阶段，这也势必造成江苏省内苏南滩簧腔声腔剧种发展的突飞猛进，而苏北拉魂腔声腔剧种发展的步伐缓慢。由此，笔者认为，四省交界的淮海地区的拉魂腔，若要得到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重视与扶持，必须充分利用地域相邻，声腔剧种同源共生的优势，打破行政区划单一、各自为营的拉魂腔研究，进而实施淮海地区拉魂腔历史与现状、人文和形态、社会和音乐、案头和田野的整合性研究，淮海地区淮海戏、泗州戏及柳琴戏的振兴发展才会有盼头。

2. 积极引导的舆论宣传。

目前我国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丰富多彩有目共睹，中国传统戏曲只是诸多文化形式中的一小部分。而在这一小部分中，由于地域和方言的阻碍，通常是各地区的民众选择本地区流行的戏曲。因此，地方戏曲的不景气，观众的锐减，我们能够给予理解，但不可就此一味地强调地方戏曲的没落。笔者认为，我们的媒体宣传机构不应一味地对传统戏曲的衰败情形报道得过多，因为媒体宣传对年轻一代如何看待和认识传统戏曲有一定的导向性影响。我们的新闻媒体过多地报道传统戏曲的式微，势必会使相当数量的人，特别是在年轻一代的心目

中,深深留下传统戏曲乃“落后”之印象。实际上,年轻人对淮海地区拉魂腔地方戏曲并不是都拒绝和排斥,其优美动听的唱腔音调也打动了不少年轻人。可是,我们的媒体却对这类情状的报道相对较少,也没能在此基础上进行积极的因势利导的报道宣传,以推动拉魂腔的繁荣和发展。由此可见,这种“报忧而不报喜”的媒体宣传对传承传播,振兴发展拉魂腔十分不利。可喜的是,现如今我们的地方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都引入了地方方言播报节目,这对传统地方文化的传承保护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学界皆知,地方传统戏曲声腔与地区方言音调有着密切的关联,而且地方方言又是区分不同地区戏曲剧种的关键。据此,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淮海地区地方方言节目频道或频率对拉魂腔戏曲进行播放,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开辟一档拉魂腔戏曲节目,再配合不同媒体的地方文化专栏对拉魂腔进行正面引导的报道,真正营造一个适应地区性拉魂腔生存环境。

3.“乐歌”模式的观众培育。

有意识地对观众群体的培养也是拉魂腔振兴、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通常说来,喜好戏曲的观众长期对戏曲倾注情感,持之以恒,忠贞不渝。拉魂腔艺术在淮海大地二百多年的传唱,不知影响、感动了多少观众。老一辈观众的狂热、痴情,定会熏陶和传递给下一代,年轻一代的耳濡目染,定会对传统戏曲拉魂腔产生一定的情感,这也是为什么不乏有年轻一代对拉魂腔戏曲感兴趣和喜好的原因。当前,老一辈的拉魂腔戏曲观众人数逐年萎缩。这一方面缘于老年拉魂腔戏迷的相继辞世,另一方面缘于一些老年拉魂腔戏迷由于年事已高,再加上身体有病及行动不便,不能再亲临剧场观看拉魂腔戏曲表演,其结果,造成淮海地区拉魂腔戏曲观众的青黄不接。不过,我们欣喜地看到了教育部新近颁发的“音乐新课程标准”明确划定的“六大模块”,其中传统戏曲赏析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和加强。由此,我们理应充分利用学校教育这块重要阵地来培育拉魂腔戏曲观众。首先应在淮海地区的中小学中开展基

础教育工作。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史上,“学堂乐歌”的出现与作用可谓家喻户晓,它对中国近代音乐及音乐教育的影响之深远有目共睹。笔者在当下拉魂腔戏曲观众严重缺失的情形下,重提“学堂乐歌”,希望借鉴“学堂乐歌”之模式在淮海地区学校中进行拉魂腔以及传统戏曲的传承与传播,为拉魂腔以及传统戏曲培养更多的观众与知音。

4. 符合艺术规律的演员培养。

在戏曲人才的培养上,我们要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真正做到培养一个,成名一个,带动一帮。年轻戏曲人才一定要真正继承古老戏曲艺术的衣钵,领悟戏曲艺术的真谛。

拉魂腔表演人才应在淮海地区范围内进行挑选,这是与所选人才的地域文化背景及方言掌握程度相关联的。所选人才也应有一定的戏曲艺术潜质,有利于拉魂腔艺术的传承传播。俗话说“名师出高徒”,这一点对年轻一代拉魂腔演员的培养显然是至关重要的。淮海地区要在戏曲人才的使用和人事制度方面,应有灵活适宜的举措。如一些知名的拉魂腔演员和老艺人,年龄到了五六十岁,只要身体允许,自己又有活跃在戏曲舞台上的愿望,就要尽可能地留住他们,发挥他们的传、帮、带的功用。对于一名演员,知天命之年,正是其舞台艺术的成熟期,也是他们树影响,创牌子的黄金阶段,如果在人事制度上实行简单的“一刀切”,让他们退休回家,这纯粹是一种对人才资源的极大的浪费。戏曲声腔“三十年一变”,一名演员的成熟要经历二三十年的磨砺,同时还需要有老一辈艺人在对其艺术上的监督和把关,倘若老一辈艺人辞世了,年轻一代在唱腔和表演上易流于随意和改变,戏曲唱腔和表演若出现走样,传统艺术自然得不到正宗的传承。因此,我们要努力建立一个拉魂腔艺术传承机制,让老一辈拉魂腔演员把拉魂腔艺术精髓毫无保留地传给年轻一代,使拉魂腔艺术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责任编辑 南山)

传统音乐在江苏高校音乐教育专业中的校本课程应用研究^{*}

周振亚

(江苏教育学院音乐系,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江苏地方传统音乐文化是丰富多彩的,保护和传承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教育主管部门已经多次以文件的形式对地方音乐进课堂作出要求,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高等学校音乐教育专业是培养音乐教师的工作机,音乐教育如何在长期的“西制”格局中突出重围,全体音乐教育事业的从业者都要树立责任意识,齐心协力重建传统音乐文化生态。

[关键词] 传统音乐; 教育; 校本课程

[中图分类号] J6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4-0124-03

关于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问题,近年来广受重视,如教育部办公厅在2008年就发出《关于开展京剧进中小学课堂试点工作的通知》。但教育部2008年的文件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争议,主要争议在于要求全国中小学都要学唱京剧的可行性。现在较为统一的认识是:想法很可贵,但是不合地域宽广、民族众多的国情。我国民族音乐资源十分丰富,各省、各民族、各地域都有独特的音乐文化,与当地人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历史悠久。就江苏而言,音乐文化就十分丰富,各地、各县都会留存独特的地方音乐文化遗产。对于当地人民来说,这是极其宝贵的文化资源,相比较京剧而言,处境却更加不堪,有些甚至面临灭绝的境地。因此,对于江苏各地而言,学习和传承地方音乐文化可能是当务之急。

而传承与学习地方音乐文化,光靠文件是不行的,寻找一些切实可行、可持续发展的办法显得十分重要。在这里,师资问题至关重要,关系到该项工作能否持续开展。笔者认为,除了对现职音乐教师进行培训之外,作为工作“母机”的高等学校音乐教育专业应该积极承担。鉴于此,作为江苏省教育厅的

一项课题,笔者提出了省属高校音乐教育专业中地方音乐的校本课程研究与应用命题。通过对全省相关高校音乐教育实践进行调研后,总结,反思,并期待获得共识,再行推广。

一、全省高校音乐教育专业情况调查

从目前统计资料来看,江苏省属高等学校设有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的本科学校有13所,各地级市中只有镇江和连云港缺席,有的地级市则有3所之多(其中一所位于其行政区划的县级市)。本文所统计的13所院校原本都是师范类(教师教育)高校,其音乐院(系)原本也只是设置音乐教育专业,随着国家高等教育总体形势的变化,许多高校音乐院(系)在保留原有音乐教育专业的同时又开办了音乐表演等音乐相关专业,拓宽了办学渠道。从他们的课程设置来看,新增专业或多或少仍然带有音乐教育专业的痕迹。

因为课题(江苏省教育厅课题)内容所限,位于江苏省境内的部分设有音乐学专业的部属院校和专科学校没有纳入本文研究范围。这些院校的专业设置主要是艺术管理和表演。

* [基金项目] 2009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江苏地方音乐文化在江苏省属高校音乐教育专业中的校本课程应用研究”(项目编号:09SJB760006)。

[收稿日期] 2011-03-10

[作者简介] 周振亚(1969-),男,江苏沭阳人,江苏教育学院音乐系副教授。

1. 江苏地方代表性音乐区域分布情况。

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分类因为出发点不同而出现数种类型,本文依据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20 世纪 60 年代编写并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民族音乐概论》中的分类体系,即五大体裁分类法——民歌(包括古代歌曲),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民族器乐。在江苏境内,这 5 类传统音乐形式十分丰富,虽然某些形式之间出现重叠、互融的现象,但是总体来看,江苏境内的地方传统音乐门类还是很清楚的,而且遍布江苏各地。

民间歌曲与民间歌舞丰富多彩,有很多已经流行全国,这里就不再赘言。

如同西方歌剧艺术,中国戏曲艺术也是音乐艺术的集大成者。江苏省内目前已知传统戏曲剧种共有 22 个,其中有 4 个是非江苏地产剧种,但是在江苏省内流行的京剧、越剧、吕剧、沪剧;还有一种是在江苏流行但是产地有争议的柳琴戏、江苏梆子、泗州戏、滑稽戏、柳子戏;一种是可以确认的土生土长的江苏地方剧种,共有 13 个:昆剧、扬剧、淮剧、苏剧、锡剧、海门山歌剧、丹剧、高淳阳腔目连戏、淮海戏、通剧、海州童子戏、丁丁腔、淮红戏。

江苏传统器乐音乐中以古琴音乐、琵琶音乐和二胡音乐最具影响力。古琴音乐在江苏有悠久的历史和很高的成就,如虞山派琴派、江宁琴派以及广陵琴派等,赫赫有名。琵琶音乐如以华秋萍为代表的无锡派,为后世琵琶的普及和流传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二胡音乐如华彦钧创编的《二泉映月》《听松》等更是中国传统音乐的经典作品。此外,江苏传统民间器乐还有众多合奏乐种,如:苏南十番鼓(又称“苏南吹打”)、十番锣鼓、扬州里下河牌子曲、淮安十番、吹打乐、江南丝竹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江南丝竹、苏南十番鼓和十番锣鼓。

江苏省内有较大影响的说唱音乐曲种主要有:苏州弹词、苏州滩簧、苏州文书、无锡评书、南京白局、扬州弹词、扬州清曲、徐州琴书、徐州大鼓、徐州丝弦等,分布于江苏各地。

通过调查发现,江苏境内许多传统音乐形态已经式微,甚至消亡,如:戏曲丁丁腔、丹剧、通剧、淮红戏、大部分曲艺艺术、器乐合奏等。

2. 全省高校音乐教育专业在校学生了解地方音乐的情况调查。

在课题完成前期,课题组成员分别走访了相关院校音乐教育专业在校生,以集中座谈或者个别交流形式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结论令人沮丧。知晓

本地区的传统音乐者占受访者 17%,知道本地区代表剧种占比 9%,能够演唱当地传统音乐(戏曲)占比 1%,喜欢本地区传统音乐占比 1%,认为需要学习的占比 90%。

3. 开设地方特色音乐课程情况统计。

13 所本科院校中开设地方特色音乐课程的 6 所,占比 46%。6 所院校的开设形式包括:选修课形式 5 所,必修课形式 2 所,讲座形式 6 所,社团 6 所。6 所院校师资情况(有专业学习或工作背景):有专职教师的 2 所,有兼职教师的 4 所。

从全省范围来看,开设地方特色课程者不足半数。可贵的是有两所院校作为必修课程开设了地方传统音乐,足见重视程度。6 所高校都开设了讲座和社团作为课外延伸,也是较好的实施办法。在地方音乐课程开设工作中,让所有院校为难的都是师资问题,从调查可以看出,有 2 所高校已经引进了专业师资,这将为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

4. 地方传统音乐校本课程应用成功案例。

从笔者了解的情况和以上数据来看,全省设有音乐教育专业的高校开设地方音乐校本课程的比例还不容乐观,但是又不乏做得很好的学校,有些高校的经验是值得推广的。

(1)淮阴师范学院在专业选修课中设置了“地方与学校课程”,包括区域音乐文化——淮海戏、区域音乐文化——淮剧、区域音乐文化——地方民歌,被安排在第六、第七学期,分别 2 学分。除此之外,该校还在公共选修中设置相关讲座课程和社团。长期聘请专业剧团的优秀演员任教相关课程,还尽可能引进来自专业团体的专业人才,该校的地方音乐校本课程已经取得较好的成绩,在 2010 年 4 月江苏省教育厅举办的江苏省普通高校音乐学(音乐教育)本科专业课程试点总结会上进行了成功展示,受到与会各高校专家的一致肯定。

(2)苏州科技学院 2007 年就在培养方案中设置了苏南民间说唱(评弹艺术)、苏南民间戏曲(昆曲艺术)、苏南民间器乐(江南丝竹艺术与古琴艺术及道教音乐艺术)、苏南民间歌舞(吴歌类艺术)等课程,作为必修课,在 4 个学期内完成,每周 2 学时。在培养方案的实践环节中安排了苏南地方音乐采风,在音乐学院还成立了“石湖曲社”社团组织。因为成绩显著,苏州市地方政府开始关注该校的文化传承并给予大力支持,2008 年 12 月苏州市在该校建立“苏南地方音乐文化艺术研究所”,并创办了《苏南地方音乐文化艺术研究》杂志。这些又进一步促进了地

方和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建设。

(3) 江苏教育学院2004年就开始在专业基础(必修)课中安排舞台(戏曲)表演课程,后来逐步积累完善,形成了系列校本课程,以选修课的形式开展教学,2009年成立了“江苏地方传统音乐教学研究中心”,中心又设有“昆曲社”“江南丝竹社”“扬剧社”“锡剧社”“南京白局社”等社团,聘请在宁专业团体的老师长期执教,利用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开展学习地方戏曲与采风工作。为了加强合作,与专门团体实行相互挂牌活动,该校已经先后与多家传统音乐发源地进行挂牌合作,比如与江南丝竹乐馆(太仓)、海门山歌馆(海门)、南京白局社(南京)等面临传承困难的传统音乐机构进行挂牌合作,将学生深入基地和各乐种传人走进课堂相结合,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可贵的是,该校认为光有上游还不行,还需要下游跟进,于是决定在江苏各地选择有远见的小学进行试验基地挂牌合作,已经先后创建“沭阳县第一试验小学淮海戏实践基地”“无锡羊尖试验小学锡剧试验基地”“昆山东方幼儿园昆曲实践基地”等合作单位,大力开展地方戏曲进课堂等一系列传承工作,收到了实效。

鉴于其出色表现,江苏省教育厅为该校授牌“江苏省地方戏曲进课堂师资培训基地”。另外,国家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国戏曲学院、中央电视台等也肯定了该校的工作并进行了多次合作,比如学院受邀参加国家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办的“第二届海峡论坛之海峡两岸关爱下一代论坛”,并作主题演讲,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专题报道学院地方音乐教学研究工作等等,应该说已经取得不错的成绩。

二、问题及对策

通过以上的调查和案例,可以看出江苏省属高校对于江苏地方音乐文化传承情况可用冷热不均来描述,这种情况其实已经是长期存在了。若究其原因,本文认为在3个方面存在问题:

第一,观念层面。长期以来,师范大学音乐教育专业的教育体系仍然以西乐为主,有相当数量的教师(甚或西洋音乐学得较好者)从骨子里重西轻中。音乐专业教育的“西制”格局非常牢固,中国音乐的学习仍然是“辅料”。师生对传统音乐的认识还不到位,甚至缺乏最起码的认识,从统计图表可见,能够知晓江苏地方传统音乐者寥寥无几,即使有知晓者,也还不能真正从兴趣角度来学习戏曲与相关知识。

第二,技术层面。从技术层面看,存在戏曲唱法与声乐发声方法的纠结,对声乐艺术缺少宏观的意识,这种情况不仅是江苏,全国都是如此。歌剧咏叹调是声乐,戏曲唱段算什么呢?尚无定论。虽然也有师生认识到了保护和传承传统音乐的重要性,但是自身对传统音乐的认识能力却又存在欠缺,尤其表现在对传统音乐认识的高度上,明显存在学力不足。

第三,制度层面。现行高校的管理体制和音乐教育专业的领导或者学科带头人的学力背景直接影响传统音乐课程的开设。从课程设置看多数学校都把地方音乐作为任选课程,并标注相应学分,但是目前我们的学分制大多是虚拟的,所以实践起来又问题不断。另外,因为全省统考招生的缘故,各院校生源涉及全省各地和一定数量外省市单招的学生。方言区存在很大差异,所以院校所在地的地方戏曲不能被多数学生认可,这就对校本课程的开展带来很大阻碍,部分院校开设的讲座课、社团也是不得以为。

因此,在两个方面的工作必须加强。首先,在制度方面国家层面已经足够重视,部分中小学也做得很不错。但是,这些中小学的师资问题仍然制约着该项工作的可持续发展。除了应对现有师资进行专项培训外,作为中小学教师的“母机”——高校音乐教育专业的课程安排必须与基础教育接轨。要做到这些,音乐教育专业的领导必须有足够的热情来支持该项工作,从培养方案的制订到师资配备都应该给予合理的安排,以保证该项工作的正常化。其次,在操作方面。各院校有必要引进相关专业的专门人才,便于工作的开展。同时因地制宜地聘请地方专业院团的演员加盟教师队伍(江苏各地方剧种专业院团的现职演员中基本上都有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作为兼职教师。这是一支热爱本民族艺术又具有相当艺术功力的职业艺术家,他们当中有些老艺术家为了传承濒临消亡的艺术甚至可以不计报酬,义务执教,这些资源应该充分挖掘。对于传统音乐的传承,必须有一个更宏观的视角,需要从文化生态建设的高度来思考当下的传统音乐文化相关工作,只有上、中、下游生态链的有机组成,该项工作才可能科学地、可持续地发展。

(责任编辑 南 山)

传统神韵的更新

——法雅《西班牙民歌七首》的民族特征及歌唱演绎

陈艺为

(江苏教育学院音乐系,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曼尼埃尔·德·法雅是20世纪初重要的西班牙作曲家。他发展了传统的西班牙风格,形成了独特的西班牙风格特色。《西班牙民歌七首》是其代表性声乐杰作,对其进行分析与研究,对了解法雅以及演唱此部作品都有良好的指导作用。法雅以诗作为歌曲创作的基础,歌词和音乐、器乐伴奏与音乐紧密配合。

[关键词] 曼尼埃尔·德·法雅; 西班牙民歌风格; 歌唱

[中图分类号] J614.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4-0127-04

一、《西班牙民歌七首》的创作历程 与文化语境

1. 创作《西班牙民歌七首》的历程。

法雅的出生地卡迪斯省的音乐生活相当丰富,安达卢西亚地区丰富的民间音乐是重要的特色,而且作曲家的母亲是一位极富天赋的钢琴家,这使得法雅从小耳濡目染西班牙民间音乐,同时受到良好的专业音乐教育。20岁时家道中落,法雅随父母迁往马德里,22岁就读于马德里皇家音乐学院,师从J. 特拉戈(Jose Trago)学习钢琴,两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26岁时,法雅师从西班牙民族乐派先驱菲利普佩德雷尔(Felipe Pedrell)学作曲,深受佩德雷尔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系统地学习了西班牙传统音乐,也接触了不同于安达卢西亚民间音乐的复调音乐及流行音乐,还对西班牙民间音乐与教堂音乐进行了比较研究。在学习研究中,法雅掌握了运用民间音乐要素的创作方法。

1907年法雅来到了巴黎,他原本想利用一周时间去了解和熟悉同时代人的音乐作品,但这7天的访问计划后来却变成了长达7年的定居。旅居巴黎期间,法雅与德彪西、拉威尔、杜卡斯及阿尔贝尼兹

等人密切交往,接触到了新的音乐观念和创作技巧。杜卡斯(Paul Dukas,1865—1935)的音乐使他学会了处理西班牙主题的方式。巴黎成为法雅的大学,他曾说过如果不曾到过巴黎,就没有今天的他。法雅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回到马德里时,已是一位国际水准的音乐家。他终于不负西班牙人民的厚望,在此期间创作了杰作《西班牙民歌七首》。这部短小的作品音乐相当精致,运用了大量的西班牙民间音乐元素。1915年由声乐演唱家维拉(Luisa Vela)举行首演,法雅亲自弹奏钢琴。演出获得热烈欢迎,并很快在世界流传开来。

1920年法雅离开马德里,携妹妹定居格拉那达,这是一个位于安达卢西亚地区东部的具有古都风光的城市。这时的法雅,音乐风格有了微妙的变化。创作的作品中虽留有过去作品中的浪漫色彩,但加入了更严格而新鲜的旋律与和声,代表着法雅“新古典主义”手法写作的开始。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法雅不忍离开祖国,直到1939年内战结束,才接受布宜诺斯艾利斯西班牙文学研究院的邀请,携带《阿特兰蒂达》的手稿与妹妹一起前往阿根廷。这次离别成了法雅与西班牙的永别。由于身体原因,直到

[收稿日期] 2012-03-01

[作者简介] 陈艺为(1981-),女,江苏徐州人,江苏教育学院音乐系助教。

1945年二战结束,法雅都未能如愿回到故乡。1946年11月14日上午,法雅心脏病发作逝世,离70岁生日仅有9天。在阿根廷科尔多瓦举行葬礼后,法雅的遗体海运回西班牙,葬在出生地卡迪斯。

2.《西班牙民歌七首》的西班牙情愫。

作曲家的创作都离不开栖居之地,西班牙文化是理解法雅音乐创作的机枢。作为西班牙艺术文化的一支,西班牙的民间音乐艺术表现出多元化的特征。首先是来自东罗马帝国(拜占庭)教会音乐的影响。在阿拉伯人统治时期,单声部的圣咏被当地教会采用,今天教会音乐的多利亚和弗里几亚这两种调式的四音列,是西班牙民间音乐旋律构成的基础。现在西班牙一些地区流行的音乐体裁也都是从教会音乐中衍生出来的。阿拉伯的影响则更多表现在其旋律的下行倾向和丰富的装饰音上。当地主要的弦乐器吉他,也可以找到阿拉伯音乐的渊源。吉普赛的因素则较集中反映在西班牙南部弗拉明戈舞蹈音乐的节奏中,它的特色的乐器是响板。这两种因素,在现实音乐生活中是相互融为一体。

西班牙民间音乐包括民歌、器乐和舞蹈3个部分,在实际生活中,三者通常密不可分。

在中心主题的基础之上,西班牙音乐演变出了多种形式,包括人们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或高雅或低俗),小型器乐伴奏的单声道歌曲的普及(独唱的或小乐团形式的),文本与音乐相结合的深富诗性的歌曲形式的产生,对话或一问一答式歌曲的流行,乐句尾部的混音处理,音乐叙事中震撼人心的高音发声以及能够被归入欧洲音乐、阿拉伯音乐或二者结合体的富有韵律的节奏感的音乐体系等。

西班牙人民能歌善舞,不少民间舞曲体裁都被欧洲艺术音乐所吸收采用,如“恰空”“萨拉班德”“凡丹戈”“博莱罗”等。西班牙的民间乐器主要是吉他类的拨弦乐器(源自阿拉伯),打击乐器铃鼓、响板、小铃(与吉普赛人有关)以及各种管乐器,主要是盖塔风袋管。

二、《西班牙民歌七首》歌唱演绎

在佩德雷利精心培养下,法雅成为民族音乐的新开拓者。无论是他的早期作品还是成熟期作品,都充满了西班牙风土民俗印迹和民间音乐特征。即使有些作品有浪漫主义或者印象主义的影子,也无不渗透着浓郁的西班牙色彩。

《西班牙民歌七首》体现了西班牙民歌风格和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虽然该作品根基扎在民谣之中,

但并非简单的民歌改编,而是展示了高度艺术性、直觉感和想象力的艺术精品。这部作品并不是套曲,每首歌曲间相对独立,由于它们之间的调式调性等因素有着良好的对比平衡,因而为了充分发挥其艺术效果,通常以套曲形式完整演唱全部7首歌曲。

1.《西班牙民歌七首》歌词分析与演唱。

法雅的艺术歌曲创作大部分取材于西班牙民间流传的诗歌,《西班牙民歌七首》这部作品自然也不例外,七首歌曲的歌词都是民间生活的提炼,因此尽管带有“民间”的标签,但它们都是真正的诗歌。在法雅的艺术歌曲创作中,强调音乐与文学的综合,他把诗作为音乐的基础。从这个原则出发,法雅对自己所选的民歌都有深刻的理解和感受,在谱曲时都十分吻合原曲的内在精神。诗中的形象和情感是通过诗中具体情节的展开、刻画并表达出来的。

(1) *El paño Moruno* 摩尔式的呢子(摩尔人的布料)。《摩尔人的呢子》(*El paño Moruno*)取材于西班牙东南部的穆尔西亚地区。从歌词内容可以看出,该曲描写的是发生在西班牙人民生活中一个普通的生活场景;从歌词的表达类型来看,该曲属于叙述兼抒情,前两句歌词讲述了摩尔人店里的一块上好细呢因染上了油渍而不得不半价处理的事件,后两句则表达了歌者的一种惋惜之情。歌曲的速度标记为 *Allegretto vivace*,即活泼的小快板,结合歌词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该曲意图表达歌者发现呢子染上油渍后激动、惋惜却又无可奈何的心情。

(2) *Seguidilla Murciana* 穆尔西亚的赛吉迪利亚(穆尔西亚短歌)。《穆尔西亚的赛吉迪利亚》曲名告知我们一个大致的信息:该曲为一首快三拍的赛吉迪利亚舞曲体裁形式。歌词描写的是有关事件的叙述,属叙事歌曲,大意是告诫别人不要随意在背后说人是非(*No te betirar piedras al del vecino.* 对邻家的房顶石瓦不要论短长),否则很有可能会留人话柄,遭人厌弃(*Y crevendo la falsa, nadie la toma!* 就像那假钱一样,*Nadie la toma!* 都不留在手上!)。演唱此首乐曲,要紧紧围绕着此曲的叙述性与警告、告诫语气的一步步深入,结合三拍的赛吉迪利亚舞曲的节奏特性与西班牙人的热情洋溢的性格特征,把歌词与旋律表达出来。

(3) *Asturiana* 阿斯图利亚斯姑娘(阿斯图利亚斯曲)。《阿斯图利亚斯姑娘》取材于西班牙北部阿斯图利亚斯的一首舒缓忧伤的悼亡曲;从歌词的表达类型来看,该曲属于抒情歌曲;速度为行板,是一首

宁静悲伤的悲歌。每一句歌词都表达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悲痛之情，歌曲处理上应充分表现出对亲人无限思念的情感。

(4) Jota 霍达(霍塔)。《霍达》是 7 首歌曲中篇幅最长的一首，据说霍达最早起源于阿拉贡地区，现在已成为流行于西班牙全境的民间歌舞体裁，常被人形容为“同时传达出眼泪和笑容”。其特点是八音节为一行，四行为一段，其中有两行要反复一次。由于霍达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西班牙民间音乐的性格，所以无论是其本国的，还是欧洲其他国家的作曲家都喜欢用这种体裁进行创作。该曲速度标记为快板，结合其口语化的歌词，似乎可见热闹、欢快的歌舞场景。歌词表达了姑娘娇羞、纯真的心态，恋人间那种依依不舍的留念之情。刻画了既豪放不羁又简单纯真的西班牙少女心态。

此曲的歌词有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几乎每句的结束都是以装饰音的修饰加延长音的处理方式来进行。这正是法雅音乐注重词曲结合的具体体现，即重音很规则：以元音、n 或 s 结尾的词，重音落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上；以其他辅音结尾的词，重音落在最后一个音节上。例如：nos queremos(相爱，动词)，以 s 结尾，其重音应该落在第二个音节 re 上。法雅在谱曲时，与歌词和诗意紧密结合，强调 re 的方式通过 mos 的装饰音修饰又回到 re 的旋律音上，因此，既达到了强调 re 的目的，另外也更进一步表达了此曲整个的情绪——表现了西班牙少女的羞涩、纯真的形象。

(5) Nana(摇篮曲)。民谣研究家马托斯曾说，这首《摇篮曲》是穆尔西亚地方的民谣，据说该曲是法雅的妈妈和保姆唱给法雅听的摇篮曲。歌曲比较短小，歌词描写了慈祥的母亲怀抱着孩子，轻轻拍打他入睡的场景，歌词中“宝贝啊”“我的小星星”等，都传达了母亲对孩子的爱恋，展现了温暖的母爱。因此在演唱该曲时应注意将这些情愫贯穿始终，唱得轻柔多情，努力营造出一种宁静、优美的生活画面。

(6) Canción 歌曲。《歌曲》的原型是民谣研究家贝耐迪特采谱的题作为“格拉纳达之歌”的乐曲。歌曲表现的是歌者怀着留恋与怨恨的心情回忆过往的爱情，表达出对恋人背弃爱情、背弃誓言的恼恨；同时也表现出面对现实的无奈心情，并激励自己忘记过往，珍惜得来不易的幸福。整曲共分为两段，第一段是一种干脆、肯定又稍带愤怒、责怪的情绪；第二段开始是对过往的回忆，但转而立即回归残酷现实，歌词表达了歌者悲愤、忧伤的情绪，特别是最后一句“Madre！尤其

在你母亲身边”是一种乞求、呐喊的情绪。在演唱时应注意将这些情绪上的变化认真唱出来。

(7) Polo Polo 波罗(波罗情曲)。《波罗》是这首歌曲中最具豪放野性气质的一首歌曲。波罗是法雅的故乡安达卢西亚地区吉普赛人的古老歌曲或舞曲之名。马托斯曾说过他在奥孔的《西班牙歌曲集》中发现了此曲，不过拜萨却认为此曲是法雅的纯粹创作。不管怎么说，法雅的确加入了许多巧思，即使有原曲，也是随心所欲地扩大而成的。此曲是一首失恋者的悲歌，歌词强烈、刚劲，歌者痛苦、不安地诉说自己的遭遇，“哎哎”的叹息声表现出绝望与不安的心态，仿佛要一口气把自己内心的痛苦向别人倾诉，可又不安地发现不知道向谁倾诉的矛盾、痛苦的心情。这种痛苦难耐的情绪，急于发泄出来的火一般的热情，充斥在整首歌里面。

在歌词里反复多次出现的叹息声“唉”，法雅运用大量的下行旋律，典型的“深沉之歌”式的旋律与之相对应，既表现出了民族特色，又与整首曲调相对应，使整首乐曲感觉一气呵成。

2.《西班牙民歌七首》不可分割的重要结构成分——钢琴伴奏。

艺术歌曲是 19 世纪欧洲浪漫主义音乐的产物，其特征是歌词的选用极为讲究，几乎都是名家所作的精致诗词；旋律与诗词融为一体，紧密结合，音中有诗，音中有画；伴奏多为钢琴，通常不仅支撑声乐声部，而且承担展示环境氛围，补充刻画人物形象，与歌者对话等多种作用，演奏技巧复杂，是与人声的重奏。《西班牙民歌七首》就体现了歌词、人声与钢琴的高度融合。法雅使钢琴在表达歌曲内涵上成为与声乐同等重要的声部，达到歌声与琴声的完美结合，旋律中的欠缺由于钢琴的补充而臻至完美，钢琴丰富的音响效果与人声配合默契、相得益彰。

此部作品的钢琴伴奏的特点非常明显，模拟西班牙特色伴奏乐器的音效。用钢琴奏出具有其他乐器特色，模仿其他乐器的奏法与织体，甚至舞蹈元素与钢琴本身音色的结合，更具特色。

(1) 吉他风格的钢琴移植。西班牙民歌通常由吉他伴奏，这 7 首歌曲虽然以钢琴伴奏，实际却模拟了吉他的效果，无论是在织体还是演奏法上都深深地印有吉他演奏的痕迹。

第一，对吉他基本奏法的模拟。Punteado(弹拨法)和 Rasqueado(撩弦法)是吉他的两种最基本的弹奏方法，前者用手指连续弹拨单音的旋律；后者右手半

握,放松地由小指开始,各指(除拇指外)轮流从低音部往高音部连续扫琴弦,可以制造出琶音的效果,加强节奏的效果以及和声的效果等。在《西班牙民歌七首》中,为了模仿吉他的音色,法雅在很多地方都运用了这两种弹奏手法。《摩尔人的呢子》一曲中,运用了大量的Rasqueado。在《霍达》中,也有Rasqueado的效果。在《波罗》一曲中大量运用了Punteado的演奏手法。此外,在第三首《阿斯图利亚斯姑娘》和第六首《歌曲》中,也都运用了吉他演奏中最普遍的分解和弦方式,制造了一种吉他演奏的效果。

第二,碎音(Acciccatura)。碎音是吉他音乐中以不和谐音表现粗犷效果的一种方式,它常常出现在热情、激动的快板乐段中,必须是像敲击一般,展现短暂而有力的声音。广义地说,它是一种几乎可以同时弹奏的倚音,以一个全音或半音的和声外音与和声同时弹奏,其不和谐的感觉,正如它的意大利文原意:粉碎后压进去的效果。在第一首《摩尔人的呢子》,法雅在钢琴伴奏中便运用了碎音效果。

第三,内在持续音。波威尔在《吉他对西班牙钢琴音乐之影响》一文中解释说:“以Rasqueado弹奏法重复慢弹和弦,和声中的五个或六个音很少同时改变,留在和声中不变的音,就形成了内在持续音。”在吉他音乐中,这个效果很常见,《西班牙民歌七首》中的《摇篮曲》整曲的伴奏,都采用了这种手法。在该曲的和声中,#do,#fa两个音始终贯穿于全曲的每一小节中,起到了键盘乐器的踏板效果,营造了一种宁静、悠远的背景效果,尽管这首歌曲中伴奏与旋律声部看似是无调性的组合,却另有一番风味。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该曲内在持续音的作用,整曲只需使用一个延音踏板即可,丝毫不破坏乐曲的调性。

第四,快速同音重复。同音重复是吉他音乐中常见的一种音型,以Punteado的方式弹奏。在吉他中,同音重复在同一根弦上用不同手指弹奏,这与钢琴上的轮指弹奏相类似。比如上面所举的《波罗》一曲的例子,便是由大量的同音重复组成的;而《摩尔人的呢子》一曲中,特别是在前奏及间奏中,也大量运用了同音重复。演奏快速同音重复要求弹奏轻巧,在钢琴上要快速地将每个音演奏清楚,就像在吉

他上演奏一样,如拨弦般利落。《西班牙民歌七首》中,法雅标示的指法要求左、右手轮流弹奏,但虽然是两手交替,同样也要求快速清晰,两手指尖保持相同适度的力量。

(2)舞蹈律动的钢琴移植。西班牙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的舞蹈节奏丰富而有变化,因此西班牙钢琴家常用舞蹈节奏来创作钢琴作品。我们在法雅的《西班牙民歌七首》这部作品中就能感受到那些充满活力的民间舞蹈的节奏律动。

(3)钢琴对其他乐器的模仿。西班牙人能歌善舞,其民间舞蹈是歌舞结合的艺术,因此在表演过程中他们除了歌唱旋律以外,还会加入响板(或揉响手指)、拍手、喊叫、舞步踢踏等等,通常气氛非常热烈。受其影响,法雅在他的作品中也经常会运用各种乐器的特殊演奏法来表现民间舞蹈中的特殊效果。比如《西班牙民歌七首》中的《波罗》一曲,钢琴快速、强烈的节奏,似乎是歌者在吉他伴奏下的踏脚和击掌,特别是每次重拍上的踏板提示,更令钢琴伴奏者在不自觉间加入了舞蹈中来。又如《西班牙民歌七首》中的第四首《霍达》。霍达舞是以对舞为基本形式的求爱舞,广泛流行于西班牙全国各地,以3拍子或6拍子为主,节奏鲜明,情绪愉快,舞者双臂弯曲上举,边舞边击响板,并伴有歌唱。在法雅精心编配的钢琴伴奏中多次出现的小三连音效果,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响板的影子。

三、结语

《西班牙民歌七首》中,我们感受到了安达卢西亚民歌的旋律的颤动,体验到西班牙舞曲节奏的活力,甚至能辨别出对吉他、响板的模拟。那种敏感抒情的音乐气质,丰润缥缈的和声色彩,独具匠心的旋律装饰手法,以及对“自然共鸣”(natural resonance)理论原则的首次实践,造就了这部音乐作品无可比拟的个性魅力。而法雅的艺术哲学观,启示我们对民族风格与国际性、现代性关系做更进一步思考。

(责任编辑 南山)

拉威尔 23 首艺术歌曲和声手法研究

——和声手法中旋律的调式特征

王 丞

(江苏教育学院音乐系,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拉威尔在艺术歌曲的创作中突破了传统大小调体系的束缚, 在运用大小调式的同时渗入各种中古调式, 从民间音乐和东方音乐中汲取养分, 以此拓展了和声材料的来源, 通过多样的个性化旋律写作, 使各种调式显现出丰富的色彩变化, 创作出了具有拉威尔自己特色的旋律。

[关键词] 拉威尔; 艺术歌曲; 和声技法; 调式特征

[中图分类号] J614.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4-0131-05

法国艺术歌曲是欧洲艺术歌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 法国艺术歌曲形成了纤巧细腻暗示多于直叙、含蓄多于尽情抒发的风格特点。莫里斯·拉威尔(Maurice Ravel 1875—1937)是这一时期法国音乐的重要作曲家, 他的音乐具有典型的法国音乐的特征: 清新典雅的风格、简洁凝练的曲式、优美动人的旋律。除了借鉴古典音乐的传统外, 他还重视从欧洲各国的民间音乐, 特别是民间舞蹈中汲取养料, 来丰富自己的音乐素材, 博采众长, 形成了独特而鲜明的艺术风格。

拉威尔一生共创作了 39 首艺术歌曲, 本文中所研究的 23 首艺术歌曲均选自作曲家在 1905—1914 年间创作的具有代表性的歌曲。这一时期是他创作的成熟期、旺盛时期, 作品在技法上既体现了与传统紧密的联系, 以及印象主义手法的运用, 又预示了后期作品的严谨简约, 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他在艺术歌曲创作领域的技法特征, 也展示了作曲家的创作个性。笔者认为, 作曲家将钢琴伴奏作为与声乐相互依存的有机体, 通过鲜明的个性化和声语言, 更深层次地揭示了歌曲的艺术内涵, 准确塑造了歌曲中的艺术形象。

旋律是艺术歌曲表现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体现调式的最直接因素。它在体现音乐风格与音乐内容的同时更是和声写作的基础与依托。拉威尔曾对他的学生——英国著名作曲家沃恩·威廉斯说过: “在一切有生命的音乐中, 都有一个含蓄的旋律轮廓。”^{[1](P.8)}由此可见, 拉威尔对旋律的写作非常重视。由于和声与旋律的调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而在分析和声技法之前有必要对拉威尔艺术歌曲的旋律调式进行分析研究。

拉威尔在艺术歌曲的创作中突破了传统大小调体系的束缚, 在运用大小调式的同时渗入各种中古调式, 从民间音乐和东方音乐中汲取养分, 创作出具有拉威尔自己特色的旋律, 而这种旋律又给和声提供了色彩变化的空间。如通过单一调式音阶自身的色彩特征以及不同调式的转换、混合, 产生了多种色彩对比。往往一首艺术歌曲融合了多个特定的调式音阶, 而每个调式音阶只片段性地一闪而过, 或在音乐中只包括少数几个似乎可以暗示这一音阶的音等等, 这样的旋律写作技巧为拉威尔的和弦结构变化以及具有个性的和声进行提供了更多的色彩变化空间, 用不同调式中的特征音来丰富和声色彩, 形成了

[收稿日期] 2012-02-20

[作者简介] 王 丞(1979-), 男, 江苏南京人, 江苏教育学院音乐系讲师。

自己的和声风格特征。下面,笔者分别阐述拉威尔艺术歌曲旋律的调式音阶特点。

一、单一调式

1. 中古调式。

(1) 弗里几亚调式。例 1 中,旋律音调建立在[#]G 弗里几亚调式基础上,通过谱例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其调式特征音——主音([#]G)上方小二度还原 A 的运用,直至乐曲结束。调式音列的色彩特征,含蓄地表达出主人公即将步入婚礼教堂的腼腆而又迫切的心情,结束句的下行音阶使得具有小调般柔和色彩的弗里几亚调式多了一份庄重与肃穆,显示出主人公对圣母的崇敬之情和他内心世界的纯净。正如弗拉基米尔·扬科列维奇对其说明是“淡紫色的[#]g 小调,矜持朴素”^{[2](P.38)}。

(2) 利第亚调式。歌曲例 2 用利第亚调式作为全曲的终止,主音(^bD)上方的增四度还原 G 使得具有明亮色彩的大调式多了一束光,如同月光直射大地,为寂静黑夜带来一丝暖意。

(3) 爱奥尼亚调式。歌曲此处选择[#]D 爱奥尼亚调式作为旋律调式(见例 3),展现出一幅格外和谐与安逸的画面,生动地描绘出天鹅游过水面含蓄而柔美的景色。

2. 西班牙调式。西班牙有着丰富的民间音乐,并合三大洲音乐(欧、非、亚)于一体,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音乐文化,“它们的音阶除使用一般的大小音阶外,弗里几亚调式音阶是很常见的调式音阶,音乐的旋律动态亦常为下行结束于 Mi 音”^{[3](P.416)}。完整的西班牙音阶是在弗里几亚调式音阶的基础上加入主音上方的大二度音、大三度音、减五度以及大七度音,从而形成一种非自然弗里几亚调式音阶。在实际创作中对于调式音阶的运用通常并不完整,其中形成的半音进行与自然音进行多是交替使用。

拉威尔一直对西班牙民间音乐怀着极大的热情,出生于巴斯克地区的拉威尔继承了母亲浓厚的西班牙血统。“甚至西班牙人自己也要模仿拉威尔”^{[2](P.169)} 弗拉基米尔·扬科列维奇曾这样评价他。例 4 中整首歌曲旋律由两句组成,反复三次,拉威尔只加入了主音 D 上方的大三度音[#]F。这里的西班牙音乐风格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奔放而洋溢,少了一分热情,多了些许惆怅。

例 5 这首曲子采用了带有萦绕不断的乡愁的安达卢西亚旋律,乐曲没有唱词,以元音字母歌唱旋律,写于 1907 年,与其《西班牙时刻》《西班牙狂想

曲》属于同时期作品。旋律中加入了 3C 主音上方大二度与减五度音。由于希伯来音阶与此音阶有着相似之处,因而在《希伯来之歌》中,拉威尔也用了这样的调式音阶。

3. 八声调式。拉威尔启用八声调式音阶创作来源于对当时新的音乐风格的好奇,但这不能让他完全接受,使之融于他的音乐语言,只是丰富了他的创作手法,形成不同的旋律与和声音响色彩效果。八声调式音阶属于一种不稳定音阶,由于该音阶由全音与半音组成形成对称结构,使得建立一个调性中心变得更加困难,因而在拉威尔艺术歌曲中仅仅是片段性地运用,在其中期的艺术歌曲中,仅在为马拉美诗谱曲的《叹息》中得到短暂呈现。Peter Kaminsky 曾这样解析:“《马拉美的三首诗》需要更多的基于诗词意境的需要,确立主要的音乐张力、冲突与矛盾,这些都需要拉威尔的创造想象力,以此来寻找到文学描述与试图用音乐置换文学深层内涵的方法”^{[4](P.172)}。

例 6 中,旋律音调围绕[#]D 展开,使得该调式具有一些五声性特征,好像[#]D 羽调式,但是结构内缺少[#]G,并且出现了还原 E,短暂偏离了[#]D 羽中心后又回来了。如果把和声中各音按某一序列横向排列,我们发现该序列是由半音、全音相间组成,形成以 C 为主音的八声调式结构,变化音^bD 等于[#]C,[#]A 等于^bB。具有五声性的声乐旋律音是从该八声调式中提取而来。这一手法显示出拉威尔对调式运用的高超技艺,在注重和声色彩变化的同时又兼顾旋律音调的特点。

此音阶半音与全音相间,如将相邻两音间所含的半音数“1:2”的音程改为“2:1”的音程,则与“里姆斯基——科萨科夫音阶”^{[5](P.42)} 结构相同,只不过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大多在低音部横向运用,而拉威尔则用来作为纵向结构和弦,可能来源于里氏手法,但又进了一大步。虽然低音部的持续音 C 具有一定调中心的作用,但由于此音阶结构的特殊性及其中的音所构成的和弦序进,使得这一片段的调性处于模糊状态。

4. 五声调式。拉威尔在艺术歌曲中常用具有东方色彩的五声调式,为其和声手法带来了丰富多彩的音响变化。

此例 7 旋律以五声调式为基础,F 为主音,如同 F 宫调式。用五声调式来描绘孔雀,渲染了神秘绚烂的东方色彩,同时 F 宫调式也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婚

礼的庄重。

二、混合调式

在拉威尔的艺术歌曲旋律中，调式音阶的运用并不局限于某种单一调式，为了歌词内容以及音响色彩的表现需要，往往引进其他同主音调式的特征音级，从而形成同主音调式的交替，这种多种调式的结合运用称为混合调式。这种调式材料的运用也是拉威尔艺术歌曲创作中的重要技法特征。

例8的声乐旋律是以A伊奥利亚调式为主，第IV级音游荡于升D与还原D之间。旋律音调上行时，[#]D与主音A形成具有利第亚调式特征的增四度音程，构成了具有大调色彩的混合调式，充分体现出中古调式风格。具有大调性质的伊奥利亚、利第亚混合调式与歌词内涵紧密结合，通过增四度与纯四度音程的对比，体现出对心爱之人爱的火热和宽广的胸怀。两种不同调式的混合，使得旋律与和声都产生了色彩的变化与对比。

在例9中，虽然乐谱中有调号，但是从旋律中的变化音可以看出，[#]D是调式的主音，上方E与该主音形成具有弗里几亚小二度的特征音，[#]C为弗里几亚调式的VII级音。同时由于B没有被升高，与主音形成小六度，为[#]D和声大调的VI级音，这样加上具有和声大调性质的VII导音重升C与IV级音重升F的出现，旋律调式成为具有和声大调与弗里几亚调式特征的混合调式，两种调式迎合了歌词对珠鸡从外貌到性情两种不同角度的说明。

三、结语

在调式材料方面，拉威尔运用中古调式、西班牙调式、八声调式、五声调式以及各种调式的混合体，以此来拓展和声材料的来源，通过多样的个性化旋律写作，使各种调式显现出丰富的色彩变化。将更多的不同调式特征音级及构成的特征和弦，纳入一个体系中，极大丰富了音乐表现的调式素材。八声音阶运用于纵向和弦结构，并从中提炼出具有五声性的旋律音调，这一手法在当时是非常新颖并且具有独创性的。拉威尔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艺术歌曲中虽呈现不同调式色彩的变化与对比，但并没有以全音阶为基础进行写作，仅仅是在和声进行中偶合成具有全音阶性质的声部线条，这与德彪西在调式音阶的选择上略有不同。

[参考文献]

- [1] 沈旋. 杰出的管弦乐色彩大师——法国作曲家拉威尔 [M].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3.
- [2] [法] 弗拉基米尔·扬科列维奇. 拉威尔画传 [M]. 北京: 中国大学出版社, 2005.
- [3] 桑桐. 和声学教程 [M]. 上海: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1.
- [4] Deborah Mawer (edit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Ravel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5] 乔惟进.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作品中的色彩性和声手法及其形象表现 [J]. 黄钟, 1987(2).

例1 《希腊民歌》之二“教堂附近”(4—12小节)

The musical score consists of two staves of music for voice and piano. The vocal line is in French, with lyrics including "Là - bas, vers l'é - gli se," "Vers l'é - glise Ay - io Si - dé - ro," "L'é - glise, - o - Vier - ge sain - te," "Lé - glise - Ay - io Cos - tann - di - no," and "Ayio Sidero 教堂." The piano accompaniment features eighth-note patterns. The score is in common time, with various key changes indicated by sharps and flats.

例2 《自然故事五首》之二“蟋蟀”(63—67小节)

The musical score shows a single staff of music for voice and piano. The vocal line is in French, with lyrics including "Dans la campagne mu - ette, les peuplie rs se dress ent comme des doigts en L'air et dés ig net la lu - ne." Below the lyrics,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is provided: “寂静的乡村，白杨树笔直地矗立在月光下，就像一根根手指树立在空中。” The piano accompaniment consists of eighth-note chords. The score is in common time, with a key signature of one flat.

例3 《自然故事五首》之三“天鹅”(26—29小节)

Dou- ce - ment, sur son lé - ger cou - sin de plumes, — le cy - gne rame et s'ap - proche
轻轻地拍着轻盈的羽毛，天鹅游了过去。

例4 《西班牙之歌》(8—16小节)

A - dieu, va, mon hom - me, a - dieu, Puis - qu'ils t'ont pris pour la guer - re; II
再见吧，亲爱的人，他们就要把你送上战场；

n'est dé - sor - mais sur ter - re, Las pour moi — ni ris — ni jeu!
这世界将失去光芒，没有快乐，只有悲伤！

例5 《哈巴涅拉形式的声乐练习曲》(7—13小节)

例6 《马拉美的三首诗》之一“叹息”(24—28小节)

Et lais - se - sur l'eau morte où la fauve a_ go_ nie Des feuil - les
它让昏黄的太阳在死寂的水面上，拖着长长的光芒。

半音 全音

例7 《自然故事五首》之一“孔雀”(55—56小节)

Il ré- pète en- core une fois la- cé- ré - monie.
它又开始它的婚礼

例8 《希腊民歌》之四“采乳香者之歌”(2—19小节)

噢—— joie de mon a - - - - me, 哪,
心爱的 人
joie de mon coeur,trésor qui m'est si cher, 我心爱的小宝贝;
心爱的 人, 我心爱的小宝贝;
joie de l'ame et du coeur tőique 我心爱的人我热
j'aime ar - - dem - ment,--- tu es plus beau, plusbeauqu'un an - ge.
烈地爱着你, 你比天仙还要美丽。

上例是A伊奥利亚与利第亚混合调式音阶：

例9 《自然故事》之五“珠鸡”(23—28小节)

Ain - si, la tè - te bleui - e, ses bar bil - lons à vif,
就像这样, 头脸青紫, 毛刺直竖,
co - car - dière,---el - le ra - ge du ma - tin au soir.
强暴好斗, 它从早到晚怒气冲天。

*D和声大调与弗里几亚混合调式

(责任编辑 南山)

谈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合唱指挥与视唱练耳课程的融合

张 璞

(江苏教育学院音乐系,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合唱指挥”和“视唱练耳”是高等师范音乐教育专业的两门独立的必修课。在教学实践过程中, 我们不难发现两者存在着很大的共通点。如何把这两门理论基础课与技能实践课有效地结合起来是值得探索的课题。本文从课程目标、教学现状和具体做法三个方面, 阐述了这个问题。希望两者的有机融合更好地服务教学。

[关键词] 合唱指挥; 视唱练耳; 课程目标

[中图分类号] J61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4-0136-03

“合唱指挥”与“视唱练耳”是高师音乐教育专业的基础必修课程。这两门课程一直以来都是单科教学。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延续了很多年。两个学科的教学相互脱节, 学生学到的知识往往孤立、分散, 并且理论和实践无法互动。其实, 在长时间的教学中, 我们不断发现这两门课程存在着共性和交叉点。视唱练耳的研究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多声部音乐服务, 合唱的训练离不开视唱练耳的训练成果。同时, 合唱训练又是视唱练耳课程的延伸。所以, 如何把这两门课程融会贯通是我们值得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一、合唱指挥与视唱练耳课程目标

合唱指挥课作为高等师范院校音乐专业的一门必修课, 就其教学目标而言, 主要是通过对合唱知识、合唱训练与指挥技能的传授, 对合唱作品的排练与演出实践, 培养学生的合唱鉴赏力、演唱和指挥多声部合唱歌曲的能力, 进而使学生掌握合唱与指挥教学的基本方法和合唱训练的技能技巧以及合唱团的组建、排练、演出等组织能力, 为学生今后胜任学校课堂音乐教学, 开展第二课堂教学活动, 参与社会合唱活动打下良好的基础。

国家教委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在《关于下发

“高等师范音乐美术专业学科课程”方案(试行)的通知》中明确指出高师视唱练耳课的课程目标是: “培养学生对音乐的感知、听辨记忆知识和识谱视唱的能力; 初步理解音乐各要素在音乐表现中的作用, 掌握音乐表现的常规, 积累音乐语言; 加强与其他学科的横向联系, 全面提高学生的音乐素质, 培养和发展音乐审美能力; 初步掌握视唱练耳的教学方法。”

视唱练耳按照一定的声部划分可分为单声部视唱和多声部视唱。多声部视唱练习是视唱练耳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也是视唱练耳的高级阶段。多声部视唱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从结构上看, 多声部视唱可分为和声性多声部视唱、复调性多声部视唱、卡农性多声部视唱以及对比性多声部视唱。从声部上看, 又有二声部、三声部、四声部及多声部的。多声部视唱能力是学生合奏和合唱能力的基础。

综上所述, 在教学中重视技能、技巧的训练, 是为了更好地感受音乐, 理解音乐, 表现音乐的情感与形象。而音乐的情感和形象也必须通过正确的技能、技巧来表现。因此, 这两门课程的课程目标有理可依, 相互融合并不矛盾, 一定程度上两门学科能够相互促进。

[收稿日期] 2011-03-06

[作者简介] 张 璞(1981-), 女, 江苏徐州人, 江苏教育学院音乐系讲师。

二、合唱指挥课和视唱练耳课的现状

合唱是多声部集体演唱形式,可分为同声合唱、混声合唱和童声合唱。高等师范院校音乐专业所开设的合唱课主要以混声四部为主。由于声部的变化多样,有些合唱作品片段还用到了六个甚至是八个声部。每个声部在演唱的过程中,首先要较好地把握本声部的音准、节奏、速度、力度等要素;其次还要控制声部在整个音响中的地位,随时调整,以达到音准、音量和音色的平衡。

而在实际的教学中,我们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首先在学习一首新的作品时,学生由于受到视唱练耳水平的限制,很难独立准确把握乐谱。一个声部都不能完整地完成,多个声部同时进行就会很困难。往往一个声部经过多次反复练习,终于完成,但是随着其他声部的加入,受到了声部与声部之间的影响,又功亏一篑。面对这种状况,教师只能分声部逐次教学,在确定每个声部熟练后,再一个声部一个声部地累加起来。这种现状严重地阻碍了教学进度,教师教得筋疲力尽,学生也感到力不从心,从而对合唱指挥的热情也随之减少。

视唱练耳课是高师音乐专业重要的基础课程。视唱是通过对乐谱符号准确、生动的音响再现,从而建立正确的音乐听觉。读谱视唱是视唱的基本形式,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要求对音乐的音准、节奏、速度等方面既要唱得准又要唱得对,对音乐记忆和音乐表达能力要求都很高。练耳是培养音乐听觉的重要手段之一。多声部视唱的听写对培养内心听觉起了积极作用。在合唱指挥课中,学生充分运用了视唱练耳的知识,在声部与声部的进行中找到平衡点,在和声与和声的连接中控制音量,做到音量的均衡、音准的谐和及色调的对比。

但是,在视唱练耳课程的实际教学中,教学形式和课后练习的单一化,使得这门课程枯燥乏味。生硬的练习方法、刻板的教学内容致使一部分学生对视唱练耳产生了厌学的心理。在视唱的过程中,没有情感的加入,只是把谱面上表达的东西“念”了出来。其实视唱的要求不仅仅要会唱,还要唱得动听,这才是训练目的。

根据这两门学科的特点,教师应该大胆地改变其教学方法,把视唱练耳课作为合唱指挥的基础,合唱指挥课作为视唱练耳的延伸,找到其中的共通点,让这两门课相互渗入、相互融合,行之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

三、合唱指挥课与视唱练耳课融合的具体做法

1. 专门针对某方面视唱技术展开训练。

《闲聊波尔卡》是我国著名指挥家杨鸿年老师改编自施特劳斯的同名曲。该曲的特点应俏皮诙谐,活泼明快,对比鲜明。谱例上的第三声部是该曲演唱的一个难点。它采用了音阶下行的模进写作手法,模仿了小麻雀的叽叽喳喳。这个片段36、37小节是半音阶下行。38、39小节回到原调。这种片段的训练可以和视唱中的半音阶这一课相结合。掌握了半音阶的方法,上面的问题就迎刃而解(谱例一)。

2. 合唱曲也可以丰富视唱练耳教学。

《哈利路亚》是亨德尔所作的《弥赛亚》中的重要篇章,是混声四部合唱的经典曲目。全曲音乐气势磅礴,感人至深。从谱例二中可以发现这是一部复调性的四声部合唱,横向看,每个声部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旋律;纵向看,是一个规整的四部和声进行。在训练这首合唱作品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歌词暂时抛开,把每个和声单独拿出来在钢琴上弹出音响,用视唱练耳的方法感受每个和弦的色彩和和声进行。然后用歌声替代钢琴,逐步找到这种声部平衡谐和的状态,从和声层面完整理解音乐的内涵(谱例二)。

《牧歌》是一首根据内蒙民歌编写创作的无伴奏合唱作品,乐曲为单乐段结构,但在乐段每次的重复中,音乐都在和声、织体、复调的运用上加以发展变化,使作品带有变奏曲式的特征。演唱中要特别注意气息的连贯和气口的统一。谱例三由两个乐句构成,其中有延留音、后倚音和下滑音等装饰音,并有八拍的连音。众所周知,视唱练耳中的换气问题一直是容易被忽略的问题,装饰音的训练也是不容易达到整齐统一。在装饰音和换气的教学过程中,就可以引入合唱的内容,在熟悉的旋律中实现训练的目的。这样的视唱练耳课不仅生动活泼,并且学生也会较轻松地掌握知识难点(谱例三)。

通过对视唱练耳和合唱指挥课的初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有许多可以相互融合、相互借鉴的地方。对教师而言,两门课的融合大大减少了教学的难度,丰富了课堂,提高了教学效果;对学生而言,两门课的融合激发了学习的兴趣,在音乐实践中训练了枯燥的音乐技能。两者的融合必将服务于教学,为培养音乐人才发挥最大效能。

谱例一 《闲聊波尔卡》

谱例二 《哈利路亚》

5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 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 利 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 利 路亚， 哈利路亚，

谱例三 《牧歌》

A musical score for 'The White Sheep' featuring four staves of music. The first staff uses soprano clef, the second staff alto clef, and the third staff bass clef. The lyrics '翠绿的草地上 哎跑着 白羊,' are repeated across the staves. The music includes dynamic markings 'f' (fortissimo) and 'V-' (vibrato), and various rhythmic patterns such as eighth and sixteenth notes.

(责任编辑 南山)

浅谈钢琴弹奏中的手腕紧张及放松

钱丽萍

(常州幼儿师范学校, 江苏常州 213164)

[摘要] 手腕紧张、动作僵硬是学生在钢琴弹奏中经常出现的问题, 这既有心理因素, 更有弹奏动作不得法、不熟练等技术因素。钢琴弹奏过程手腕手指轻松自如, 才能提高弹奏水平。帮助学生消除紧张, 学会放松十分重要。需要从增强信心、融入情感、指导技巧、加强训练等方面训练。

[关键词] 钢琴; 演奏; 紧张; 放松

[中图分类号] J62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2)04-0139-02

钢琴弹琴中出现手腕、手臂酸疼和弹奏动作僵硬等情况是由于紧张造成的。紧张的原因多种多样, 主要有心理方面的障碍和技术与方法上的问题。要让学生做到放松, 应该根据每个学生的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

一、手腕紧张的原因

学生在遇到曲目较难, 技术上有负担, 或快速跑动的乐句多时, 心里立刻紧张起来, 随之小肌肉紧张僵硬, 肩膀收紧、耸起, 致使手臂的重量不能通过手指下到琴键。这时候就需要帮助学生克服紧张情绪: 一方面要帮助学生分析自己在弹奏技术上的优势, 增强学生战胜困难的信心; 另一方面要指出乐谱中的难点, 分析学生自身的欠缺, 提出解决难点的措施。这样, 才能使学生做到心中有数, 从心理上消除紧张, 放松下来。如果只讲放松, 而不教给学生克服紧张的方法, 这对于悟性较好的学生来说可能不成问题, 但对大部分学生来说仍然不得要领, 也就消除不了心理障碍。手腕紧张其实是由弹奏方法不当、技术不熟练等因素引起的。

首先, 手型不正确会造成紧张, 有些学生心理并没有障碍, 但是因为手型不正确或手指软而缺乏承受重量的支撑力, 根本不可能做到放松。没有一个正确的手型作支撑点, 即使手臂的重量放下了, 也不能顺利达到指尖。如果要弹快速跑动的乐句, 或对

速度、力度有一定要求, 学生手指站不住, 就会用手腕或小臂压, 造成小臂肌肉紧张, 时间一长就会感到酸痛。

其次, 手指基本功不过关, 掌关节不独立, 不灵活, 呼吸不自然都会造成手腕紧张。技术与方法上造成的紧张必须让手腕完全放松下来, 手腕放松是钢琴弹奏状态中关键的环节。尼古拉耶夫认为钢琴弹奏时手不应该像木棒那样僵硬, 也不能像烂布那样松软, 它应该像弹簧那样有弹性。也就是说, 钢琴演奏中手的放松问题, 是运动中的放松, 而不是惰性的放松。钢琴弹奏亦是如此, 弹奏者整只手从肩关节到手腕都完全放松, 不能僵硬, 也不能有一处麻痹松懈, 弹奏的整个状态应是积极而轻松自然的。

二、学会放松的意义

有了正确的弹奏方法, 才能获得表达情感的手段。如果说钢琴技巧训练主要分为手指和手腕两部分的话, 那么弹奏的决定因素是手指。因为它直接与键盘接触而发声, 因而加强手指独立性的训练, 使指尖力量集中, 就能很好地控制键盘。只有手指训练好才能弹出既清晰又明亮的声音。手指必须良好地触键, 手腕过于坚硬, 则发音会干涩、单薄。相反, 如果只有手腕的松弛而没有手指的独立性, 声音也会缺乏颗粒性而含糊不清。因而, 钢琴的良好触键必须由手指独立, 手腕松弛灵活及整个手臂重量互

[收稿日期] 2012-04-20

[作者简介] 钱丽萍(1974-), 女, 江苏常州人, 常州幼儿师范学校高级讲师。

相协调作用。声音的效果与弹奏方法是一致的。所以在基本功练习中,必须重视手指与手腕的训练。有了手腕的放松、胳膊的放松、身体的放松等条件,才能弹奏出动听的乐曲。

在弹奏过程中,演奏者的腕、臂、肩及整个上身应注重保持放松、自然的状态。放松是相对紧张而言的。它的最高体现是自然,即在手指落键后,应立刻找到放松的感觉。如果手指还保持在键盘上,但指间部位的肌肉及手臂已经处于弹性状态了,而不是死压在键盘上,这就是放松。指尖只要恢复到把琴键保持在键盘的底上就够了。因此,只有全面掌握基本演奏方法,弹奏技巧才能提高。钢琴的音色是比较优美动听的,它常给人以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在课堂上,老师应教导学生要有好的手形并加以保持,同时掌握正确坐姿。其实,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放松并可以弹奏出钢琴的自然音色。钢琴家亨利·涅高兹把弹奏的整只手形象地比作一座“吊桥”。“桥”的一端固定在肩关节上而另一端则固定在接触键盘的手指上。“桥身”灵活而富有弹性,它的支柱牢固、稳定。当“桥身”向上、下、左、右摆动旋转时,按住琴键的手指却始终不放开,这样可获得良好的松弛感。只要指尖触键正确、稳定、有把握,那么,弹奏者的整个手的动作就是非常灵活的,就会富有弹性。

三、解决手腕放松的方法

要解决手腕放松问题,就是要明确手腕的一些主要活动方向。在乐曲弹奏中,手腕的主要动作有3种:上下动作,左右动作,上下左右综合动作。

“落滚”动作的练习,可使手臂、手腕与手指协调一致。僵硬的手腕往往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的活动得到解决,变得柔韧。“落滚”式的动作由整个手臂协调带动上下运动,比如在两个音的小连线时,弹第一个音之前,手腕结合手臂先提起来,把手指带动起来,然后指尖冲键盘落下去,一发出声音手立刻放松,并一直保持正确的手形,在琴键上停一会儿再根据音符的时值弹第二个音。“落滚式”的上下动作可以使手腕变得灵活、柔和自如,弹出的音乐也更加优美、丰满。经过这种方式练习,学生弹奏时手指僵硬的状况一定会有很大的改观。它只是手腕的一种动作,多用于弹奏柔和及歌唱性的旋律,而在弹奏轻快活泼的音乐时不适宜。所以说,合理运用手腕的动作,可以避免因手腕扭动过多而带来不良的影响。

手腕左右动作是指每一个手指弹奏时,手腕必

须左右调节位置,以使手指处于最有利于弹奏的位置。涅高兹把手指比喻为在前方作战的士兵,把臂、腕、身体喻为大后方对前方的支援。根据这一比喻,我们可以体会到腕臂的主动积极配合和调节的重要性。不少学生在弹琴时完全不知道手腕应左右调节,而是单靠手指孤军奋战,去弹一些较复杂或多变的位置。手指在没有任何配合和支援的情况下即便竭尽全力,但还是力不能及。手臂想要配合手指必须通过手腕才能起到作用,所以,关键在于手腕的合理调节。而手腕原则在于每个手指弹奏时要让手指处于基本直对着键盘的方向,这种角度和方向最容易把手臂上传下来的重量自然地送进键盘去。如果手指在每个音上能自如地接受到自然的重量,手指将变得轻松、自如。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手腕左右非常灵活,随时作微调。这种微调在开始时需要人为地通过脑子指挥而有意识地去做到,养成习惯后就能自如地去控制了。有的学生手很小,但非常灵活、机敏,能把手指放入任何不顺利的位置,关键就在于他们善于调节。手腕的左右灵活对手小的学生来说是必需的,因为他们不用手腕去帮忙,有些开张位置就难以完成。手大的学生因为不用太多调节便能够得着开张的位置,就不太注意手腕的左右调节,时间长了手反而比较僵硬。所以,手大的学生同样也应进行手腕左右动作的训练,这样对弹琴的协调、技术的发展都有长远益处。

在手腕的上下和左右动作的综合动作中,常见的是手腕圆圈式的动作,一般用一些规律性分组的技术性段落。如四个音一组或六个音一组等同类织体的十六分音符,像《车尔尼 299》的第6首,就是每拍四个音符,根据音的高低和手的左右位置,打一个手腕的扁圆圈动作。这个好像是划一个圆圈的手腕的动作,即是手腕的上下和左右结合来完成的。当拇指弹时,因为是重音位置,因此手腕往上左动,并处于低的位置。第二个音到四指,手腕立刻向右挪动过去,在第二个音到第四个音手指从右往左动,并作一个弧形的波动,从而到第二组再做同样的动作,循环往复。只有这样的解决方法才能使弹奏质量得到改进,使技术得到提高。但是,特别提出一点,手腕圆圈式动作只是一个特定的解决手腕僵硬的一种手段,而不能作为弹奏快速乐曲时采用的方法,那样弹奏速度是上不去的。

(责任编辑 南山)

Teachers' Concepts of Knowledge and Their Behavior Characterizations

MA Chengrong

(Jiangsu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s and Lifelong Education, Nanjing, Jiangsu, 210013, China)

Abstract: The cognition of knowledge is the logical start point of the whol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With the transition of the human society, the nature of knowledge is changing from absolute truth to knowledge construct, from value neutrality to value linkage, from knowledge hierarchy to knowledge classification, and from pervasive knowledge to situational knowledge. Whereas the diversity of the concepts of knowledge, teachers behave differently on the cognition and solutions of practical problems such as selection of curriculum structures and contents,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training of abilities as well as teachers' self-development. Hence, to achieve the in-depth reformation of teachers' behavior characterizations, a way must be sought from the source of the problem, i. e. re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knowledge structure.

Key words: teacher; concept of knowledge; teaching activities

The Job-Hunting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of Master Graduates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Self-esteem Levels and Job-hunting Intentions

CHEN Youqing YANG Liangqing

(Institute of Applied Psychology,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8,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Job Behavior Questionnaire combined with Rosenberg's The self-Esteem Scale and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on 540 participants, the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master graduates' job-hunting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and analyze its correlation with implicit self-esteem, explicit self-esteem and job-hunting intention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way of master graduates' job-hunting is mainly formal. Most graduates used three to six months to find a job and accepted the job-hunting results; explicit self-esteem of them could significantly predict job-hunting frequency -strength, and job intention could significantly predict job-hunting frequency-strength and job-hunting properties, but implicit self-esteem could not.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higher they had explicit and implicit self-esteem levels, the stronger they had job-hunting intentions, and the more efforts they put in job-hunting.

Key words: master graduates; explicit self-esteem; implicit self-esteem; job-hunting intention; job-hunting behavior

On Teachers' Phronesis and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HEN Guoqing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Jiangsu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njing, Jiangsu, 210013, China)

Abstract: Teachers' phronesis refers to teachers' rational ability with which they can make immediate and appropriate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teaching situation in their educational practice. The four dimensions of teachers' phronesis are as follows: rationality as its essence, situation as its starting point, value as its aim and experience as its logic. Phronesi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hich consists in blazing a trail for teachers'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inding a new pivot which is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 for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promoting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o return to teachers' life experience.

Key words: teacher' phronesi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odern Distance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LIU Xing

(School of Distance Edu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China)

Abstract: Modern distance higher education has gone through a rapid development, in particular due to incorporating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us making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all levels of a learning society. The key issue in sustaining this development is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modern distance higher education. This article uses the SEM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o study the relation between education service quality, student satisfaction, and student loyalty. And it also proposes the service quality improvement matrix and the related education quality improvement strategy.

Key words: modern distance higher education; service quality; student satisfactio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Asynchronization between Lyrics and Melodies in WU Songs

WANG Xiaolong

(School of Art, Changsh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shu, Jiangsu, 215500, China)

Abstract: There exists a phenomenon in WU songs, the asynchronization between the lyrics and the melodies, which is that the pause of Lyrics is different from the pause of melodies. The unique phenomenon is relevant to the expression emphasis of the WU dialect, and related with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WU region. It preserved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message by the asynchronization phenomenon, and it has a very high historical value.

Key words: WU songs; asynchronization between lyrics and melodies